

太阳旗下的撒旦

侵华日军
暴行纪实



上海远东出版社

前 言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丛笑难

50 年前的“八·一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日，也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狂欢节。

自 1874 年日军武装侵略台湾开始，经过 1894 年的甲午战争，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宝岛台湾省。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此后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日军得寸进尺，又把侵略势力伸向华北。1937 年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战火遍及中国的半壁河山。直至 1945 年，中国人民才获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你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吗？这是经历过 70 年的漫长岁月，依靠几代人的不屈战斗，付出了 3500 万同胞的牺牲代价，仅八年抗战的财产损失和军费消耗就高达一千亿美元，才避免了亡国的惨祸，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

日本人民是优秀的人民。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宣扬大和民族优越感的同时，自居“东亚霸主”，却把邻国人民视为理应接受日本奴役的“劣等民族”；强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因此必须向外扩展“生存空间”；鼓吹“战争是先进国家和民族改造落后、强行推动世界进步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制造“侵略有理”的好战舆论；长期灌输“武士道”精神，把军人培育成失去理性的嗜杀狂人。凡此种种，终于导致日本走向战争误区，犯下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

战后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取证，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于 1946 年 5 月，审判了日本军国主义领导集团的 28 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罪魁祸首，被送上了绞刑架。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得到了必要的清算，并作出了国际公认的历史结论。

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排除干扰决心访华，和周恩来总理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史的中日关系，跨越了不幸的昨天，迎来了友好的未来。

中日友好永不再战，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誓言。但也无须讳言，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内在原因，日本当局的某些要员并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真诚的反省和谢罪。友好的外交辞令，难以掩盖屡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不友好言行。

回忆当年在决定审判战犯时，日本木户侯爵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昭和天皇裕仁的一段谈话：“想到战犯要诉诸法庭审判，我实在忍受不了。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要忍的时候。”战后的 60 和 70 年代，是日本重建国家经济的困难时期，也是其对外政策相对稳定时期。80 年代后，日本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且已重新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从此，日本的某些政界要员，终于“忍无可忍”地开口发言了。

日本政府某些人的的惊人之举，是公开为侵略战争翻案，篡改历史教科

书则是它选中的突破口。1982年，日方对于过去教科书中所谓的“偏向记述”感到“忧虑”，决定要重新编写能使“青少年热爱国家的历史书”。在文部省审定的新版教科书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建立的伪“满洲国”，明明是实行殖民统治，却被美化为建设“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共产党也参加了战线”，日军“被迫应战”，才“使战线扩大到了中国全境”。把战争的起因、性质，都作了明目张胆的歪曲。对南京大屠杀，“须进一步查明真相”。太平洋战争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全书找不到“侵略”二字，改用“进入”的用语（1988年又改用“进驻”），引导青少年重温“东亚霸主”的旧梦。

1986年，日本在审定教科书时，又故伎重演，再次篡改历史。8月，文部相藤尾正行对记者发表谈话：“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至今未明”，“战争就要杀人，这从国际法来说就不是杀人。”他强调教科书问题是日本的“内政”，别的国家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藤尾的挑战，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得不对“失言”者作出“罢官”的决定。藤尾的支持者向首相提出抗议，中曾根安抚他们说：“我的本质性的想法，是和诸位一样的。如果我是一名议员，那么，我大概会和诸位一样的讲话和行动。但是，我处于总理大臣的位置，”所以“我作了妥协”。

事隔两年，1988年5月，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发怪论：“侵略战争一词，包含入侵、掠夺土地和抢夺财产的意思。”所以我“讨厌使用侵略一词，因为当时的日本没有这种意图。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战前的中国等亚洲国家，都是“白种人的殖民地，只是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结果，才获得了独立。”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大哗。在一片谴责声中。奥野被迫辞职。

1989年2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众议院答辩时说：“关于侵略战争的学说各种各样，我也不认为联合国的议论已经下了结论，所以确定其性质是困难的。”“这是应由后世历史学家评论的事。”日本首相公然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理所当然又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批评。竹下登只好改口，承认日本是进行了“侵略”，表示对此要作“深刻反省”。

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反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一事，本来不值一提。但是他公开宣告：“请去问问自民党的政治家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过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话必然事出有因。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押时，他曾“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一旦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回国后，他在《回忆录》中竟公然宣扬自己恪守“戒烧、戒淫、戒杀”的信条，中国把他的“三戒”篡改成“三光政策”，“纯属无稽之谈”。此外，《日本无罪》、《日本不是侵略国》、《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等书的纷纷出版，参加翻案大合唱，在抵赖罪行、混淆是非方面，也都造成一定的恶劣影响。

战后一直统治着日本的自民党政府，于去年宣告垮台。各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努力塑造革新政治的新形象。准曾料到，防卫厅长官中西启介、法务相永野茂门和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等，又相继重申：“把那场战争说成侵略

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创造了内阁大臣接二连三“失言”的新纪录。他们虽已辞职罢官，但言犹在耳，能不发人深思？！

至于日本政界要员以公职或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战犯亡灵者，每年都有所闻。对于亚洲各国人民的批评，则表现了置若罔闻的傲慢态度。

日本“失言”大臣的这些奇谈怪论，听来十分耳熟，它使人们想起了50年前裕仁天皇广播的《停战诏书》。特摘抄如下，奇文共赏析：

“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于排除他国之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意。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于是天皇决心降诏“停战”，“朕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重读这篇《诏书》，对于时隔半个世纪的中青年读者，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第一、《诏书》是为回应美、英、中、苏四国迫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发，但天皇却颂扬“陆海将兵英勇善战”，只是“战局并未好转”而已。既未“战败”，何言“投降”？因此日本只能接受“停战”。至今日本一直把“八·一五”称为“终战日”，继续回避“战败”和“投降”等有损帝国尊严的用语，是有政治含义的。

第二、关于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诏书》明确肯定：侵犯他国皆非“本意”，宣战是为“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日本法西斯竟和反法西斯的“诸盟邦”一样，“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打来打去全无是非之分，所以天皇也要对此“深表遗憾”了。

第三、最令中国人民愤慨的是，《诏书》只写“向美英两国宣战”，战争是从偷袭珍珠港开始，时间只有“四载”。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竟然一笔勾销了！这当然不是天皇的疏漏，是对中国抗战的轻蔑，是对战胜国中国人民的侮辱。

由此可见，日本政界某些人的翻案风和“失言”流行症，病源由来已久，内心对中国的轻慢态度，也是劣性难改。随着80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旧病复发，自然是势所必至的事。日本某些政要急于丢掉“侵略者”的历史包袱，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渴望实现其在亚洲追求的新目标。

日本当局矢口否认战争暴行也不是始于南京大屠杀。对于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声中，就密商作出“专取辩护手段”的内部决定。向各驻外使馆发出《训令》，统一掩盖事实真相的宣传口径，在报上发表《陆奥声明》进行“辟谣”，反诬外国战地记者的报道，是“来自误传而毁坏皇军之声誉”，首创抵赖罪行之先例，现在的日本某些“失言”者，对南京大屠杀忽而推说“真相不明”，忽而反诬“中国捏造”，忽而又想在篡改“30万”的数字上作文章。各种诡辩自相矛盾，真是欲盖弥彰，愈抹愈黑了。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暴行是不得人心的，教育青少年崇尚军国主义更是危险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德国学校的教科书，让儿童充分了解他们父辈的罪恶；在日本，删改历史以确保儿童对历史一无所知。两者的不同，有助于说明德国人长期以来为欧洲人所接受，而日本在亚洲却继续受到怀疑的原因。”“日本虽然富有，

却很难使人认为是可以放心的。”这样的国际舆论，在亚洲各国的报刊上更是举不胜举。忠言逆耳，值得日本当政者三思。

战败投降的历史悲剧，已经促进了日本人民的反思和觉醒。众多的国会议员、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工商界人士，奋起批判篡改教科书和“失言”大臣的错误，要求政府反省和追究责任，都反映了日本的人心动向。长崎市长本岛先生直言“天皇有战争责任”，竟遭到歹徒枪击。但他的无畏敢言精神，在日本社会已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别是那些曾参加过侵华战争并犯有罪行的日本军人，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会员，他们以“历史见证人”的亲身经历，发表谈话和撰写回忆文章，揭露自己和所在部队的罪行，向受害的中国人民悔过谢罪，更给予冈村宁次之流散布的谎言，以无情而有力的回击，也唤醒了日本人民的良知和维护中日友好的斗争勇气。

在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几位青年学者要我为这本满纸血泪的历史读物写一篇前言。我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回忆烽火当年的悲惨往事，联想到新的、令人不快的“失言”纪录，我陷入了沉思。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我们这一代人正因为经历过生和死的搏斗，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与可怕，因而才最懂得和平的宝贵。为了子孙后代永不再战，才更加珍惜中日友好。中日两国人民决不能让那些篡改历史的图谋得逞。

1995 年 3 月

太阳旗下的撒旦

第一章 白山黑水的控诉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光就落到了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力图把这块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土地变成它大规模侵华的桥头堡。1928年6月4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制造了“皇姑屯炸车案”，炸死东北军阀张作霖，企图为其全面控制东北扫清障碍。

自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日本关东军先后搞了4次“参谋旅行”。分别由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和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烟俊六率领，到我国东北北部、辽西进行军事侦察，制定军事行动计划，并在辽西地区搞了几次军事演习。

日本驻我国东北的军队人数也渐渐增加到1.5万多人，分布在沈阳、旅顺等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上，并频繁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就要下手了。

一、流泪的黑土地

日军的铁甲车占领了沈阳，也占领了张学良的家，连寺庙庵堂也遭了殃。1931年8月1日，侵华老手、当过张作霖顾问的驻华武官本庄繁中将突然被召到日本皇宫，裕仁天皇亲自宣布，任命他为关东军司令官。3月13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宣布，任命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特务机关长。

陆军省将两位“中国通”调往中国东北、为占领东北作了人事安排，危机已经一触即发了。

1931年9月18日，曾担任张学良军事顾问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命令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中尉等人，“接上级命令，今晚动手！”当天晚上，河本带领七八名士兵，以视察铁路为名，带着今田新太郎为他们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向柳条湖方向前进。

一路上，他们一面观察中国东北军北大营的动向，一面选择合适的路段，准备埋放炸药。在距离北大营约8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他们停了下来，迅速地把小型炸药包放置在铁轨下，企图颠覆从长春到达奉天的十四次快车，以嫁祸于中国东北军队。

约10时20分，河本拉开了引信。只见铁道上空强光一闪，接着，“轰”的一声响起了爆炸声。哪知由于河本中尉计算有误，爆炸没有达到预定效果，只炸弯了1.5米长的钢轨。几分钟后，火车驶来，只轻微颠簸了一下，就随着路轨接头发出的“哐当、哐当”声呼啸而过了。

此时，鬼鬼祟祟地躲在附近等待火车脱轨的河本中尉一行，眼看火车仅倾斜一下就顺利通过，气急败坏地对着飞逝而去的火车连放了几枪，以泄一时之气。

接着河本一面命令部下向北大营开火，一面向埋伏在几公里外文官屯高粱地里的川岛大尉报信，川岛得讯，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

10时25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在南站的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和飞机场开炮。

此时，等候在奉天日本特务机关电话机旁的坂垣征四郎认为效忠天皇的机会到了，一边以代理机关长名义向今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东大营；一边向其旅顺的顶头上司本庄繁报告：

“因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我现已和北大营之敌进入交战状态，如果这样下去，将有受到优势敌军围攻之虞。因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请示全力攻击沈阳，职为身历其境的本军参谋已予允可，特此报告。”

本庄繁 10 点 55 分收到报告，脸上流露出一丝狡黠的神色，立即电话命令驻辽阳的第二师团火速进攻沈阳。

11 时 18 分，关东军参谋部，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长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电报，捏造事实说：“18 日午后 10 时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赴现场的我守各队某部发生冲突。”

紧接着又发了一封电报说：“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我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连，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虎石台中队于 11 时许，在与北大营之敌军五六百人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军仍在不断增加机关枪和步炮，我连目前在苦战中。”

12 时，本庄繁召集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召开作战会议，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关东军主力集中到沈阳，司令部也移驻沈阳，先发制人，向中国军队进攻，占领东北三省。

从“柳条湖事件”，到突袭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关东军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袭击北大营时，营内驻防着张学良的东北军陆军独立第七旅之步兵第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三团。当时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下令部队进入预备阵地，同时分别打电话向王以哲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情况。

荣臻在睡梦中接到电话后，连忙向正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赶紧又向南京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接着又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

当即，张学良命令属下：“望冷静隐忍，勿生枝节。”

北大营的士兵接到了上级下达的命令：

“统统放下枪，执行命令！”

一些中国士兵眼睁睁地望着日军向自己进攻，没放一枪一炮即饮弹身亡。

日军的炮弹越来越密集，北大营多处被击中起火。不久，火药库中弹爆炸，霎时间，火光冲天，映亮天际。

这时，东边营房内第六二〇团团部的电话铃响了，团长拿起话筒，传来了旅长王以哲的声音：“如果日军向你部进攻，你部不得抵抗，一切等待交涉后再作决定。”

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荣臻来电，仍然命令不准抵抗。

团长激动地在电话里大声嚷道：“荣参谋长，鬼子侵我国土，毁我兵营，斯可辱，则国格、人格、军威不可辱啊！你快下命令，让我们还击吧！”

荣参谋长厉声吼道：“这是命令，不得违抗！”

团长忍不下这口窝囊气，大声抗拒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卑职无法遵命。”

荣参谋长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们可以撤退，为什么不撤退？”

团长说：“我团只接到王旅长等待交涉的电话，并未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时，荣参谋长才发出撤出营房的命令。

然而，荣参谋长的命令已经晚了。日军在北大营南面已经得手，正向东面发动猛攻。六二一 团紧急撤出北大营时伤亡很大，西北角六二一团的伤亡更加惨重。日军挥舞着战刀冲入北大营，见人就杀，刹时间，北大营里鲜血四溅。

至 19 日 5 点 30 分，日军全部占领了北大营，经过一夜的炮轰枪击，北大营已成一片废墟，东北军伤亡约 300 人。

日军攻占北大营的同时，兵分三路进攻沈阳城，第一路攻商埠地南市场；第二路攻商埠地北市场；第三路攻沈阳城大小西边门。至 19 日 6 点半止，日军全部占领了沈阳城。一夜之间，城池易主，关东军侵占了城内所有军政机关、厂矿、学校。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政损失就达 17 亿元以上。无数民房、商店遭到破坏，居民伤亡严重。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率所属部队于 19 日凌晨 3 时抵达沈阳，与独立守备队联合进攻距沈阳 10 公里的东大营。中午 12 时许，日军占领了东北军的第二大本营。

日军占领沈阳后，掳去沈阳兵工厂步枪 10 万支，手枪 6 万支，重炮、野战炮 250 门，各种子弹 300 余万发，炮弹 10 万发，飞机 300 架。沈阳金库所存现金 7000 万元，也被全部掠去。仅一周内，关东军就疯狂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 30 余座城市。以后又占领了齐齐哈尔。10 月 8 日下午 1 时 50 分第一次轰炸锦州，扔下 25 公斤的重型炸弹 80 枚。经过 4 次野蛮的军事进攻，日军于 1932 年 1 月 3 日占领了锦州。2 月 5 日又占领哈尔滨。至此，日军仅用 4 个月零 18 天，便全部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从此，东北人民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奴隶，大批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日军进攻沈阳时，本庄繁曾下令：凡抵抗者统统格杀不论。事实上根本不管抵抗不抵抗，一夜之间，街道上、公路旁、民宅里，到处尸体横陈，血流如河。

日军到沈阳俱乐部门前，见灯光闪烁，一些人正在里面跳舞。日军架起机枪即往里面扫射，很多人当场死亡。停在门外的汽车也被击毁，车中司机等人非死即伤。

日军来到沈阳迫击炮厂见人即杀，很多工人、门卫被当场击毙。

9 月 19 日上午 8 时，尾追东北军六二一 团的日军来到沈阳市郊的一座寺庙，寺庙里众僧正由方丈带领团坐在殿内为东北军祈祷，祝他们逢凶化吉，乞求佛祖保佑东北人民平安无事。一群日军冲进殿内，一个军官直奔方丈面前，抓住他衣襟喝道：“你的，中国军队哪里去了？快说！”方丈双手合十答道：“这是圣洁殿堂，素与军队无缘，请到别处去搜吧！”日军军官怒斥道：“老东西！不说出中国军队的去向就送你上西天。”“阿弥陀佛”方丈闭目合手，喃喃他说道。

日军军官气得哇哇直叫，举刀对准方丈胸膛刺去，殷红的鲜血顿时从他胸中涌出。接着日军向众僧疯狂射击，可怜佛徒，一个个都倒地身亡，无一幸免。

9 月 19 日，日军在沈阳公开射杀行人。以后甚至将抓到的市民令其面向墙壁跪着，然后用刺刀从背后活活刺死。日军在沈阳的一些街道上贴有“不准逗留”的布告，有些中国人因不识字，在布告前稍作停留，即遭枪杀，有时甚至被抓起来挖坑活埋。

日军所到之处，很多中国妇女遭到蹂躏。9月18日夜，二三百名日军及便衣浪人蜂拥而入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乱射枪弹。然后逐一搜查宿舍教室，抢劫学生金钱、手表、衣物、钢笔等财物，用刺刀木棍把学生驱出校门，稍有迟缓即遭杀伤。有个15岁少女，那天正好来访一女大学生，因晚不及归，即与该大学生同处一室。日军搜查女生宿舍时，见此少女年轻美丽，顿起淫心，也不顾旁边有人，即扯掉少女衣裤，强行奸污。女大学生在旁目睹此景，愤怒无比。情急之中，两手抓起窗台上的花盆，就朝日军头上砸去，可惜用力过猛没有砸准，仅砸到日军背上。日军遭此一击，勃然大怒，抓起刺刀即朝女大学生的腹部刺去，鲜血从该女生腹部冲出，肠子也流了出来，不久即悲惨死去，事后日军还焚尸烧房灭迹。如此死难者，该校有20余人。

9月19日中午，日军在沈阳郊外见到一座幽雅别致的院落，就想进去歇歇脚。走近一看，门上刻有“静虚庵”三字。日军破门而入，见院中有许多素装女子，便知是一座尼姑庵，顿时喜出望外，丢下枪枝，开始满院子追逐尼姑们。

这时，从内殿走出一位中年尼姑，她就是庵中主持，法号静修。虽已40余岁，但仍皮肤白皙，体态丰腴。她在内殿听到院中有人惊叫，就起身走出，见日军正在追逐年轻的尼姑，即厉声吼道：“放肆！你们长官是谁？”

为首的日军联队长见突然冒出一个美人，即乐哈哈地跨前两步道：“姑娘漂亮地干活！”

静修一边招呼自己的弟子到身后，一边对步步紧逼的日军讲道理：“这里是佛门圣地，不许胡作非为。否则将遭上天报应。”

日军在这里见到那么多年轻美貌的中国妇女，即想在此寻欢作乐，哪里还管你尼姑平民、佛门报应。这时，只见日军联队长眼冒欲火，一边逼向静修动手动脚，一边说：“皇军作战辛苦，你的慰安的有！”

静修再也抑制不住愤怒，伸手向日军联队长当胸一拳，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

日军联队长没想到静修会来这一手，顿时恼羞成怒，即令士兵把静修的双手捆起来，撕光她的衣服，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强暴。兽兵们见状也立即扑向吓得浑身乱抖的尼姑们。顿时，尖叫声哭喊声响彻了整个院子。

日军在庵中发泄兽欲后，又用枪强迫众尼姑们为他们准备午餐。临走时，日军将全庵43名尼姑全绑在一起，押上了卡车，然后在庵中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几个小时内，好端端的一座庵堂，即化为乌有。

日军离开静虚庵，于黄昏时分开进了大梁子村。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名为搜查中国军队，实际上这些日军已经杀红了眼，见男人就枪杀，见女子则奸淫。

大梁子村东头有家大户，主人赵得喜，靠做药材与木材生意发了财。一家四世同堂，有男男女女二三十人。赵得喜家三代单传，得女缺丁，家中仅有他和他的父亲两个男人，还有一个男管家，其余全为女人。

日本兵端着枪冲进赵家，赵得喜的父亲赵厚金刚陪着笑脸迎上前准备搭话，就被一个小胡子兵一拳打倒在地。

赵厚金爬起来后依然陪着笑脸说：

“皇军有什么贵干？”小胡子再欲挥拳打赵厚金，被一个黑痣兵拦住了。“你的，见到中国军队没有？”黑痣兵问。

赵厚金捂着胸口，喘着气，说：“我们是良民，没有见到当兵的。”

黑痣兵一把抓住赵厚金的衣襟，恶狠狠他说：“你的说真话，否则，死了死了的！”

赵厚金上气不接下气他说：“我说的是真话，不信，你们可以搜！”

黑痣兵松开手，竖起大拇指连连说“要希”。

兽兵们端着枪一间屋子接着一间屋子搜，把赵家的男女老少都赶到院子中央，然后令女人们把衣服脱光。女人们都吓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小胡子兵见没有人听从命令，就从人群中拉出赵得喜的祖母，一枪便将她击倒在地。管家上前阻挡，又被一枪打死。

这时，全家者小都魂飞魄散，有的索索发抖，有的在小声哭泣。

接着，日军又用枪逼迫赵得喜和他父亲去脱女人们的衣服。

赵家父子一听，赶紧双双跪下磕头求饶。

小胡子兵用枪敲打赵家父子，叫他们必须照办，并威胁说：“不然，就像他们一样！”边说边指着身边的两具尸体。

赵家父子紧咬嘴唇，屈辱的泪水盈满眼眶。

大概兽兵们觉得还不过瘾，竟然让赵得喜去脱他母亲的衣服，赵厚金去脱儿媳的衣服。

赵得喜闭着眼睛浑身抽筋似地走向他的母亲。突然，他像一头发疯的公牛一样，转过身来，挥舞双臂，向边上一个日军扑去。但不等他近身，小胡子手中的扳机已扣响，赵得喜应声倒地。

赵厚金见儿子已死，自己也不想活了，捡起一块砖头向小胡子兵砸去。女人中性格刚强的也纷纷扑向日军，准备与他们拼命。但随着一阵枪声，院子里又多了不少横七竖八的尸体。

兽兵们开始大肆糟蹋剩余的妇女，甚至逼她们赤身裸体地在满是鲜血的地上爬来爬去，还要她们像狗一样地叫，而兽兵们却在旁边乐得哈哈大笑，还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一可耻的场景。

在大梁村的西头，一群日本兵在一个戴眼镜的军官率领下冲入一户居民家中，见屋里只有一个老妪和她的儿媳以及两个十三四岁的孙女，顿时兽心大发。那个军官首先扑向一个女孩，兽兵们也各自捕抓自己的猎物。可怜那个老妪因拼命反抗而被皮带抽得死去活来。

正在这时，老妪的儿子回来了，见屋里这番惨景，立即抓起一根木棒狠命地朝打他母亲的日军后脑挥去，那家伙当场倒地。正当他准备再抡木棒时，被其余的日军开枪打倒了。

当兽兵们走出大门时，这一家5口都浸在血泊里，媳妇与孙女的肚子都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

一家米店里，5名日军将店主夫妇和两个十七八岁的孩子逼到屋角，强迫店主夫妇当众性交。接着，又逼两个儿子与其母乱伦。两个孩子坚决不从，丧心病狂的日军便推倒米袋，将一家四口人埋在米中，然后就是一阵刺杀。

村子里到处可见日军追逐村民，追上男的，便用刺刀捅死。追上女的，按倒在地强暴，不管是七八十岁的老妪，还是八九岁的女孩，甚至大腹便便的孕妇，都不能幸免。

日军占领沈阳后，除了对商店大肆抢劫，还将要人住宅全部占据。先由士兵搜查，然后将宅中财物全部装上汽车掠去，不能载者即予捣毁。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等人的家宅均被惊劫一空。日军用铁甲车占据了张学良的住宅，

把张宅内的财物全部掠去，大门贴上了“日本领事馆占领”之条。

在以后的日子里，日寇还烧毁了很多机关、学校、商店、民宅，杀害了无数东北同胞。请看这些令人发指的兽行：

日军杀害辽宁铁岭镇（铁岭市）人民，并把人头砍下排列成行，作“慰灵祭”。在铁岭龙尾山，竟丧心病狂地刺死儿百名中国儿童，还集薪焚烧以毁尸灭迹。

日寇抓到吉林省通化第六师范校长佟冠英后，用烧红的铁条烫他，活活将其烙死。该校还有一位校长马冀北，被拖到井台上，然后强行从其嘴中灌凉水，直至灌死。

在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江边黑河公园（今王肃公园）内，日军安装了一台很大的电磨绞肉机，将人捉到后投入磨中，活人即刻变成肉酱，然后用水一冲，踪迹全无。这台电磨曾绞死了成千上万名中国同胞。

1933年，日本关东军指令奉天省铁路警护军，在沈阳大北边门外（今沈阳市大东区盘山二里一号，即大东区工人俱乐部、沈阳市一三七中学），建立一所“警备大训练所”，占地一万余平方米，当地老百姓称其为“狼狗圈”。

狼狗圈四周，围绕电网，戒备森严。内有500多间小圆房，豢养着200多条狼狗。这些狼狗经过训练后即分到东北铁路备站段，供日军使用。

在训练狼狗过程中，日军常从监狱、监护所提出一些中国“犯人”，强行投入狼狗圈，任凭狼狗撕咬吞食。因此，狼狗圈内经常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1935年秋天，奉天兵器所内18岁徒工王佩武，因为用砂轮机磨锉刀，不慎将火花溅到日本监工的右眼上，第二天，他就被日军连同其他10人一同扔进了狼狗圈。几十条狼狗蜂拥扑来，当场就有3人被活活咬死，其余人血肉模糊，奄奄待毙。

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还先后制造了多起集体屠杀事件。

二、血洗平顶山

6挺机枪向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疯狂扫射，刽子手们以杀人取乐，仅仅3个小时，就杀了3000多人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满腔愤恨，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在辽宁大地，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声势浩大，已发展成36路，其中以李春润率领的第六路实力最强。李春润属下有个王彤轩，他领导的大刀队，个个英勇善战，闻名于辽东地区。

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存在和发展，使日军深感不安。因此，日军加强了防卫。他们派伪抚顺县公安局大队长李海峰和副大队长邢龙九带兵驻防抚顺郊外，又派日本指导官岛崎和宪兵龟田两人，以协助布防为名，监视李、邢的行动。想不到李、邢在辽宁人民的抗日爱国精神感召下，不久即投奔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

1932年9月15日夜，抗日自卫军分兵3路向抚顺发起了进攻。他们袭击了日本霸占并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长渡边宽一，带走了汉奸、大把头郑辅臣，然后部队悄然离去。

自卫军夜袭抚顺，是对日本侵略当局的一个沉重打击。由于大刀队神出

鬼没，日军防不胜防，日本居民被迫集中到安全区，抚顺煤矿也一度全部停产。

自卫军的夜袭行动，以及李、邢两人的背叛，使日本统治抚顺的军政头目大为震惊，他们在夜袭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那天早上6时许，奉天独立守备队抚顺守备队第二队队长、陆军步兵大尉川上岸，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陆军宪兵准尉小川一郎、抚顺公署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等人在小川办公室密谋报复行动。

人到齐后，川上首先发言。他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梁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是通匪的。现在大家计议一下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

接着，他们议论了一下见闻和情况，并发表了各自对平顶山周围几个村的处理意见，还谈到了如何对付平顶山的居民问题。

这时，川上突然站立起来，丧心病狂地叫嚣仍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

这句话像是对这次会议讨论问题的总结，最后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会议决定，从现在开始就把平顶山附近的几个村子都看起来，不准往外走人，设岗禁止通行。

接着，上午8点多钟，他们又在炭矿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川上岸等认为，平顶山居民同大刀队里应外合，他歇斯底里地叫嚷：“这些村屯统统地通匪，我们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接着，他们策划了具体的烧、杀方案，以及执行者的分工。会议决定，屠杀平顶山居民的任务主要由守备队负责，宪兵队配合；全部烧毁平顶山居民的财物和房屋。

他们甚至讨论到了如何将居民集中起来的问题。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最后决定用哄骗的方法，对老百姓说：“昨日大刀队袭击，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伤，大衙门（当地人称抚顺煤炭事务所为大衙门）为庆祝大家平安无事，给大家照相留作纪念。大家要互相传一下，都到大庙前集合！”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区以南约4公里处，原来是一座小土山，因山上土质多泥沙，便于挖掘，于是煤矿就从这里取土填井，天长日久，土山被挖平，变成一块荒地。后来由于两露天矿向东伸延。迫使居住在杨柏堡和腰截两个村镇的部分矿工搬家，矿工们纷纷在此安家，形成了村落。由于村庄建在挖平的山顶上，人们就叫这村庄为平顶山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当时的山村已居住着400多户人家，共有3000多人口。他们当中，矿工和商贩占去一大半，山村也是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会议刚结束，川上岸就匆匆赶回了守备队队部，布置了血洗平顶山的任务。他对参加屠杀的人员进行训话，说：“这次行动，守备队和平兵队的便衣、翻译要先行一步，先把平顶山居民哄骗出来，软的不行就用硬的，一定要把全部居民赶到指定地点。执行和事后处理均由守备队负责，全部尸体和房屋都用汽油烧毁。”

约11时，由川上和小川率领的近200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守备队和宪兵悄悄地接近了平顶山村。川上就在距屠杀现场约500米的南侧公路指挥这场血腥行动。

在这之前，守备队和平兵队的便衣已先行赶到山村，他们用事先策划好

的哄骗办法叫居民集中。但居民们对照相等事也许是不感兴趣，也许是有某种不祥预兆，许多人不想出来，磨磨蹭蹭，尽量拖延时间。便衣们见此情景，担心时间长了会被大家看出破绽，不能完成大屠杀计划，就立即露出了狰狞面目，强行驱赶居民前往屠杀现场。

就在这时，4 辆军用卡车迅速驶到村北，上面载满荷枪实弹的日军。其中 3 辆车上的日军迅疾包围了村庄，不准一个百姓出村。另一辆车开进村中，逐一检查民宅，强行驱赶着人们去屠场。有些老弱病残者走得慢了些，就被连拖带推地赶着走，甚至当场就被刺死或枪手。就这样，约下午 1 时许，全村人被赶到了山南老君庙前的一块沟形草坪上。

这时，村里的日军将村中的房屋全部浇上汽油点着了火。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乡亲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大家不顾一切地往色围圈外冲去。

这时，原来放在草坪东面、用黑布罩着的 6 挺机枪响了起来，刽子手们开始向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疯狂扫射。同时日军的步枪也从四面八方群众射击。在枪林弹雨中，赤手空拳的村民纷纷倒下，刹时间，鲜血四溅、血肉横飞。

“乡亲们，咱们不能等死，跑啊！”有人在大声地呼喊。

愤怒的人群，又一次企图冲出重围。

可是，北面有铁刺拉的网，西面是二三丈高的悬崖峭壁，东面南面是持枪射击的日军，外加东面机枪的封锁，重重包围，人们无路可逃。

一排排的人倒下去，惨叫声、呼喊声、咒骂声夹着敌人的枪声，连成一片，整个平顶山淹没在疯狂的腥风血雨之中。

等罪恶的枪声停止之后，屠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远处的空村还在燃烧，乌云压顶，空气凝滞。

刽子手们完成了杀人任务，蜂拥上车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不幸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原来，刚才日军机枪扫射中，一些人受伤倒下后并没有死去，他们中有些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有些人见敌人走了就互相说话，有些人还挣扎着往外跑。军车上的敌人见状立刻转向调头，又进入了屠场。刽子手们跳下车来，一个个手握步枪，用枪上的刺刀逐个地向躺在地上的人们刺去，边刺边发出“苦啦、苦啦”的喊杀声。刺刀刺入死去的乡亲们身上，不断地发出“咯嚓、咯嚓”的沉闷声响。刺到活人身上，能听到各种凄厉的惨叫声。

一个刽子手的刺刀捅进了一位妇女的胸膛，她身上带着刺刀坐了起来，双手紧紧地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地拔出刺刀，她 10 个指头“刷”地一下全被割落在地。仇和恨使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还紧紧盯着刽子手，使凶手也一时吓得呆若木鸡。灭绝人性的刽子手还以杀人取乐，有的专往妇女的阴部猛刺，再把肠子挑出来。有的专挑孕妇的肚子，把腹中的胎儿挑出来甩到半空中。一些婴儿呼唤着爹娘，爬来爬去，希望找到自己的父母，日军见了就走过去，狂笑着说：“哈哈……小红胡子，往哪里爬？！”一刀扎下去，又挑起来一甩。

太阳渐渐地靠近西边的地平线，刽子手检查完最后一具尸体，收兵登车。卡车载着满手鲜血的刽子手们渐渐地驶向远方。

老君庙前的屠场上满是尸体，东倒西歪。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丢了手臂，有的断了腿脚，有的血肉模糊，有的面目全非。鲜血染红了

草坪，并在泥地上汇成了小溪。阵阵晚风卷着又成又腥的鲜血味，还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硝烟味与垂死者偶尔发出的惨叫声，飘荡在屠场上空。远处，山村已烧为平地，星星点点的余火还在冒着青烟……，这凄惨的场景，是刽子手们用去3个多小时制造的“罪孽”。

第二天一早，日军指令朝鲜浪人，用铁钩子把3000多具尸体钩到山崖底下堆起来。其中有些还没有断气，也被钩到崖底。接着尸堆被浇上汽油，点火焚烧。最后，又用炸药炸崩山崖，掩埋尸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惨案中3000多人被杀，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全村800多间房屋被烧毁，仅剩一座破庙。整个山村仅有二三十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从此，平顶山又成了一座荒山，同时也成为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的罪证。

三、恐怖的辽西

凶残的报复，几个村庄消失了

为了从精神上征服东北人民，日军对一切敢于反抗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除了平顶山事件，日军到处肆虐，残杀无辜。以下记载的是几件发生在辽西比较典型的惨案。

二车户沟惨案 1932年6月20日，32名日军在伊藤队长的率领下到辽西朝阳县南哈拉贵沟一带骚扰。

当日军进行至尤潭沟通往二车户沟的路上，遭到了驻守二车户沟的抗日义勇军和当地抗日武装100余人的迎头痛击。

经过激烈的战斗，义勇军打死了23名日军，连伊藤也一命归天，只有8名日军逃离战场。当他们逃至曹仗子后山时，又遭到石明信沟联庄会头人王文福的武装人员袭击，当场被击毙2人。最后剩下的6人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回了锦州本部。

23日，又有一车日军队锦州到达羊山乡，再往二车户沟进发，企图进行报复。当时，抗日义勇军已撤离二车户沟。当地群众武装见敌人又来了，就放枪迎击。敌人以为又遇上了人多势众的抗日义勇军，调转车头仓惶逃回锦州。

1933年2月25日，日军占领了朝阳县城。以后，在全县各地先后建立了敌伪统治机构。因日军曾在朝阳县南部遭受过打击，因此一直不忘要报这“一箭之仇”。当地的汉奸为讨好日军。还在龙潭沟为伊藤等人立了一块纪念碑。当时人们也纷纷传言，日本人要血洗这一地区。但过了几个月，日军并没有实行报复行为，人们也渐渐地失去了警惕。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日军虽没行动，报复之心却念念不忘，一旦站稳脚跟，准备充分，就要对二车户沟地区下手了。

1933年初秋的一天，日军的汽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在二车户沟附近的下窝铺屯。村民得知这一消息，快速逃至邻村躲藏起来。日军一到，见是一个空屯，当即点火烧房。全村60多户人家的200多间房舍全部毁于一炬，甚至场院上的庄稼也被烧光。从此，村民们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只能远走他乡。

11月9日，一队日军乘车向二车户内驶来，在接近二车户沟的路上，农民杨玉峰和出风歧正挑着担子往地里送粪，日军叫他们站住，他俩害怕，拼

命往前逃，日军立刻开枪打死了他们。村民们听到枪声，像下窝铺屯人一样，四处逃散，但为时已晚，未能跑出日军的包围圈，最后都被集中在山脚下。一个日本军官站到群众面前，对着这些惊魂未定的村民训话：

“你们刚才为什么要跑？大日本皇军为你们建王道乐土，这次执行任务经过这里，与你们无干。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指抗日义勇军），如果哪个人再跑，就统统的死啦死啦！”

他讲完以后，叫士兵们上车。汽车发出轰鸣声，随着卷起的尘土扬长而去。

日军走后，心地善良的村民们竟相信了那位日军军官的话，因为他讲话后没杀人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日军狡计中的一部分，是对二车户沟村民疯狂报复的序幕。

11月14日，日军的汽车从车梁方向开进了二车户沟，这次村民们没有逃跑。

在村口，日军向村民王勇、周延荣打听龙潭沟往哪儿走，说他们要去看伊藤的纪念碑，并叫他俩上车带路。到了尤潭沟，日军举行了隆重的祭碑仪式后就走了，王勇、周延荣也平安地回到村中，村民们对日军更失去了警惕。

第二天天刚亮，3辆日军的汽车驶到二车户沟，车上跳下60多名日军，他们个个手持子弹已上膛的步枪，手扣扳机。枪上插着刺刀，寒光闪闪。他们迅速包围了村庄，趁老百姓还未起床就挨门逐户地搜查。

这次，日军露出了真面目。进村后，只要见到十五六岁以上的男人，格杀不论。女人稍有反抗，也一并杀死。经过2个多小时的屠杀，全村62名成年男子，除去3名外出，赫文章、王世云躲在草垛里幸免于难外，全部被日军杀害。屋里层外、街头河边到处有被枪击刀刺的尸体。那个昨天给日军带路的王勇，还有王彬等人的全家都被杀害。有的人被割下头，惨不忍睹。日军杀完后，还烧了部分人家的房屋，然后扬长而去。

经过晴天霹雳般的灾难，剩下的孤儿寡妇，有的吓得远避娘家，好久都不敢回村；有的就好几家人集居一处，互壮胆量；也有的因房屋被烧而无处栖身。一些妇女遭此打击，发了精神病，整天哭喊。有的家中尸体没有掩埋，发出阵阵恶臭。街上路边的尸体则任凭野狗撕咬争食。因水被污染，街上时有妇孺小孩拎着桶到远处汲水。每到夜晚，更夫周宽拿着木梆子边敲边喊：“没事了，快睡觉吧！”这凄凉悲惨的景象，在二车户沟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此，二车户沟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下五家子惨案下五家子位于辽西锦州以北70公里处，那里是穷乡僻壤，有“七山二滩一分田”之说。因多山，地势又险峻，给当时的群众抗日武装活动带来便利，他们已多次在这里打击来犯的日军。

1935年秋天，在下五家子西沟里，当地抗日武装把驻守缸窑岭的日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那个绰号叫“小疙瘩胡”的日军守备队长也险些丢掉性命。

日军在这地方吃了亏，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要对这里的人民进行报复。

不久，由于汉奸告密，日军在当地抓走了抗日爱国群众张臣、姜佐州、杨树祯三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企图逼迫他们说出更多的抗日群众。但他们面对酷刑逼供，宁死不屈，使日军妄费心机，一无所获。

11月初的一天，“小疙瘩胡”和他的副手井上正光带着大队人马向下五

家子开来，准备把那里的抗日群众斩尽杀绝。下五家子的群众预料日军会来报复，在得到消息后迅速躲到山里去了，村里只留下一些老年人和妇女。日军到了村庄，没见到一个青壮年男子。“小疙瘩胡”气得刚想发作，但转而一想，何不耍些计谋，先安定一下人心。于是他下令士兵召集留在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开会，会上还说了些甜言蜜语，以麻痹群众。

几天以后，“小疙瘩胡”又率日军进村。这次不仅释放了被抓走的3个村民，还带来了2名医生，给病人看病，又把糖果分给老人和小孩：“小疙瘩胡”假惺惺地对人说：“大日本皇军是来拯救中国人的，是帮助你们建设‘王道乐土’。你们叫家人回来好好地过日子，皇军既往不咎，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这以后的几天，日军没有来村骚扰，躲在山里的人也陆续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

正当人们放松警惕之时，日军预谋的疯狂报复行动却在加紧实施。

11月16日天还没亮，下了一夜的大雪也没有停止，“小疙瘩胡”带领30多名日军，悄悄地闯进了下五家子。他们在村口、要道、高地布置了岗哨封锁全村。然后把张臣、姜佐州、杨树祯3个村民从家里拖到村头，绑在大树上，用刺刀活活挑死。接着在全村挨门逐户搜查，拉起睡梦中的乡亲，把他们捆绑起来，押到村西河套集中。

日兵闯进刘昌家，见主妇刚生下小孩，卧在床上不能走动，上去当胸就是一刀，连在旁照料的接生婆也一并捅死。然后，拎起睡在边上的婴儿，将其摔死。白金祥的母亲走得慢，被日军刺倒在房后。刘明善躲在一口井里，被日军发现后开枪打死。有几个孩子刚逃到门口，也被日军当场刺死。

日军在河套四周集中了300多村民，“小疙瘩胡”一声令下，预先在四周架起的机枪就疯狂地向村民扫射，人们一批批地倒下了，有的妇女被打死后双手还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像通常的大屠杀一样，日军唯恐有人还活着，又逐个检查，进行补刀。屠场上尸体成堆，血流满地，惨不忍睹。然后日军又在尸体上浇上汽油，烧尸灭迹。

日军杀完了人又回到村中，掠走牛羊，劫走财物。临走前还放了把大火，全村400多间房屋烧了几天几夜，成为一片废墟。

日军这次对丁五家子的报复，共杀害了378人，有20多人正逢外出，幸免于难。另有11人侥幸逃出虎口，他们的经历惊人心魄。刘明善在日军搜查时挨了7刀，衣服被鲜血染红，当日军要刺其脖子时他一闪，顺势推倒日兵，夺门而逃。刘勤头上挨了几刀后昏死过去，日兵准备烧他时又醒了过来，忍痛撒腿迅跑，得以生还。13岁的刘志忠先被绑在一棵树上，还在其身上点了火，日军离开后，火却自动灭了，于是他挣脱后躲在一个胡同里，才保住了性命。小伙子白金祥在机枪刚响时没射中就趴在地上了，日军补刀时，他迅速爬起就跑，日兵在他身后连发数枪，不知怎的没有打中，才拾回了一条命，刘国廷藏在秫秸堆里，日军搜查时点火烧秫秸堆，火烧着他的脸面、衣服，但他强忍剧痛没有动弹，等日军离去才侥幸逃出。

日军对逃出者也不肯放过，到处追杀搜捕，于是，他们只能躲到亲友家中，长期不敢露面。或者远离家乡，到处流浪，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下五家子整个村庄就这样消失了。

水泉惨案 1934年，抗日义勇军在辽西朝阳县镜子山（今北四家子乡）北水泉沟南山打死了日军军官小野。事后，日军在小野毙命的地方立了一块石

碑，并在碑前发誓“早晚要给小野报仇”。但此时的日军还没在当地站稳脚跟，一时也找不到对手，就把报仇之事暂且搁置了起来。

至1937年，有人向朝阳县伪警务科告密，说南水泉屯有位外号叫“徐老品”的农民常与日本人作对，此人曾参加过打死小野的那一仗。日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血洗南北水泉一带的村庄。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上午，150余名日伪军组成的马队聚集到了镜子山村公所门前。日军头目找来了伪村长和一名土豪带路向水泉进发，到目的地已是正午时分。那天特别热，村民们经过一上午辛苦的田间劳作，正陆续回家吃午饭。日军在各个山头布下了岗哨，然后包围水泉沟和邱家沟，以召集村民开会为名，挨户搜人。村民见了日军立即逃跑，但随即都被开枪打死。日军把搜到的49人赶进一间大房子，封住门窗，架起机枪，然后在房屋周围堆起柴草点上火。刹时火光冲天，屋内发出喊爹叫娘的惨叫声，有些人捅破门窗冲出去，立即被机枪打死。不多时，屋内人全部遇难。

邻近的东杖子村群众见水泉沟起了大火，又听见那里村民们哀号，一时胆战心惊，慌作一团。村民刘喜提醒大伙“快跑”，部分村民迅速向山上逃去，但立即被山上的岗哨开枪打死。不久，日伪军就来到了东杖子村。他们包围村庄后同样挨户搜人，先将人员集中，然后开枪射杀。

日伪军当时统计被他们烧杀的人数，一共99人。日军头目对未能凑满100这一整数而甚觉遗憾。

当日伪军撤至解杖子村时，忽见一外乡男人走来。一名日军当即走上去，装模作样地问：“什么名字的？”

“毛风祥。”那人战战兢兢地回答。

“哪里的？”

“梁北歪脖子山人。”

“离水泉多远？”

“不远。”

话音未落，日军的刺刀就扎进了他的胸膛。

日军头目在一旁狂笑着伸出拇指，连连吼道：

“100个死啦死啦！100个死啦死啦！”

几天后，水泉、邱家沟、东杖子村被杀群众的尸体经过大伏干暴晒，二里外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恶臭。街上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已被野狗拖得缺胳膊少腿，残缺不全。原来人丁兴旺的村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人敢近的露天大坟场。

太平房惨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东北横行14年的日军仍然十分嚣张。8月23日早晨，11名日军士兵在1名少佐带领下，在辽西朝阳县大平房车站跳下巡道车欲东逃。当时正好有一列从抚顺、阜新方向开来的火车进站停靠，日军借口这辆火车挡了他们的道，强令火车司机倒车，一个日本兵还爬上车头强行扳闸。中国司机上去阻挡，日本兵一枪就打穿了他的左臂。司炉工见状立即抄起煤铲劈向日军，这名日军慌忙跳下车头。此时，日军少佐正拿枪瞄准1名中国工人，铁路警卫队队长杨黑子眼明手快，一枪先结束了日军少佐的性命，接着警卫队在乱枪中又击毙了10个日本兵，只有一个穿便衣的日本兵乘乱逃到金岭寺车站报告去了。

第二天上午，一二百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岭寺车站聚集，乘一辆装甲列车向大平房车站开来。下午，装甲车到大平房站。日本兵迅速从东、北、

西三个方向包抄大平房村，还在东边的高地和西边的山包上架起机枪。

日军在村中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发泄他们已经战败的仇恨。他们见到中国人即杀，远的用枪击，近的用刀挑，街上很快就横七竖八地躺下了许多尸体。

日军还挨户闯入村民家中，把人们赶出集中。见有老弱病残者躺在炕上，当场刺死。有一个姓寇的妇女，怀孕即将分娩，实在跑不动，趁日军不注意时往草垛里躲，被日军发现后追上，刺破肚子，挑出胎儿，甚至连胎儿的腹部也被剖开。有个姓王的 10 岁男孩，日军闯进他家时与他爹一起往外跑。日军当场刺死他爹，然后把他抓到车站，逼着他与十多个孩子一起给昨天死去的日军洗尸，洗完后还要把死尸抬上车，最后，这些孩子全部被杀死，并且砍下头颅给死去的日军祭灵。

日军将集中起来的村民匆匆赶到村南的大河边全部乱枪打死，有几个跳入河中逃命的人也被大水冲走。

日军杀完了人又回到村中，一把火将全村烧得精光。

在两个多小时内，日军共杀死大平房村民 84 人，烧毁房屋 246 间。残忍的日军在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投降后还要进行如此疯狂的报复，可见其内心对中国人民的仇恨是何等之深。

四、被“整治”的村庄

不说出“抗联”的下落就全村遭殃，这就是“整治”

白家堡子血案 1936 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活跃在伪满洲国的东南地区，使日军的殖民统治不得安宁。为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妄图在三年内消灭满洲国的一切抗日武装，同时还提出了分阶段实施计划。

日军制定的 1936 年度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要领》，主要针对东部地区，特别是东边道及东部三角地带。他们在那里划定“无人区”，大搞归屯并户，强令零散居民迁入“集团部落”，以断绝与抗日联军的联系。

那时，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在柳河县兴林乡（今属通化县），那里没有医院、工厂和仓库。

1936 年 7 月初，日伪军前去“讨伐”，抗日联军战士即在日军必经之路雷家沟门设了埋伏。当日军屋岛小队 11 名士兵进了埋伏圈后，抗联战士即把他们全部歼灭、还缴获了一批小炮、机枪和子弹。

驻山城镇的日军司令官铃木大佐听到这一消息，恼羞成怒，随即走到墙边的军用地图前，在德胜岗、窑鹿子沟、黑瞎子沟、大荒沟南门外大杨树地方划了一个圈，圈里方圆 50 里统统是“通匪区”。他指令大荒沟日军守备队中山大尉带领一个中队，具体执行“整治”任务。

7 月 14 日，日军以背给养为名，从白家堡子抓了 30 来名身强力壮的老百姓，把他们骗到了大荒沟警察署严刑逼供，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抗日联军的情报。同时还在自家堡子发布告，要大家第二天到大荒沟开会，还说去的人每人发半月口粮，另外准备一些粗绳捆给养。

第二天一清早，一个中队的日军包围了白家堡子。中山大尉带了几个日兵和汉奸高广荣撞进了刘福贵家，进门就逼问抗日联军躲藏在什么地方。刘

福贵刚说不知道，中山就一枪打死了他，又转身逼问他的妻子赵玉芳。

在一旁的赵玉芳被刚才发生的一幕吓得半死，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她那刚3岁的儿子铁蛋伏在她怀里，吓得“哇哇”大哭。

一个日兵从赵玉芳怀中夺过铁蛋跑到灶边，指着烧开水凶狠地威逼：“你若不说出抗日联军的下落，我就叫你的儿子在这锅里洗个澡！”

赵玉芳见此，跑上去一把抓住儿子，向这日兵苦苦哀求，并说实在不知道“抗联”的下落。

心狠手辣的日兵没有理睬赵的哀求，硬是把她的儿子扔进了锅里，并把锅盖压在上面，赵见状顿时昏了过去。中山一挥手，一把雪亮的刺刀插进了她的胸口。

接着，中山一伙又闯进了一户姓高的家里。这家大小十几口人，主人名叫高为贵。

中山一进高家大院，就示意士兵将高为贵的两个儿子击毙，既减少麻烦，又给一个下马威。接着将其余人赶往院子角落里，然后又从腰中抽出明晃晃的指挥刀，用双手抱着刀柄，刀尖朝下用劲往院中的泥地一插，对高家人大声吼道：“抗日联军杀了我11名皇军，你们要说出他们的下落！”

汉奸高广荣在旁作翻译，并劝高为贵快作回答。

高为贵确实不知道“抗联”的事情，赶快走到高广荣身边，强陪着笑脸，请他看在同族的份上，一定向日军求求情。但高广荣把脸一变，对着高为贵骂道：“少罗嗦，死老头子！快说出“抗联”的下落，不然，你们全家遭殃！”

中山在一旁看着，把高广荣叫到跟前，说了几句话。只见高广荣走到院角的人堆中，把高为贵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拉到了院子中央。

中山又一个手势，转眼间姑娘的衣服就被如狼似虎的日兵剥得精光。

姑娘顿时蹲在地上缩成一团，惊恐、羞辱的泪水直往下滴。士兵们开始骚动起来。

高为贵和妇女们忙跪在地上，乞求日军高抬贵手。

一个士兵放下枪，走近了姑娘。

“停住！退回去！”中山对着士兵大声命令。

然后又指着高为贵与蹲在院中央的高为贵女儿喝道：“你们的，快快的！”

高为贵大惊失色，连忙在地上爬到中山大尉面前，不停地磕头，嘴里哆哆嗦嗦地喊道：“不能呀！不能这样呀！”

高广荣走到高为贵的后面，对着他的屁股踢了一脚，阴险地吼道：“不干也可以，那就快点说出“抗联”的下落！”

高为贵泪流满面，悲怆地说：“天哪！我确实不知道啊！”

中山走到姑娘面前，将战刀放在地上后蹲下，用手托起她的下巴，凶狠地命令她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发生关系。

姑娘吓得面如土色，张着嘴话也说不出，只是不住地摇头。

高广荣扬起皮鞭，在她赤裸裸的背上就是一下，并厉声骂道：“臭娘们，快按皇军的吩咐干！”

姑娘回过头，愤怒地瞪了一眼。突然，她闪电般地抓起地上的战刀，猛地向这个卖身求荣的汉奸肚子刺去。

只听到“啊”的一声，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来不及躲闪，当场倒地，一阵翻滚后就不动了。

中山大尉惊魂稍定，飞起一脚，踢掉了姑娘手上的战刀。士兵们蜂拥而

上，开始野蛮地糟蹋高家的老伴、女儿与儿媳。最后，还把高家老小一个不剩地全杀了。

出了高家门，中山带着日军来到了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屋里只有一个不久将要临产的孕妇躺在床上。

一个日兵走到床边，把孕妇拖下床，扬起皮鞭对着她没头没脑地一阵抽打。

孕妇双手护住自己的肚皮，惨声哀求：“我快要生孩子了，你们饶了我吧！”

中山见事情不顺利，心中非常恼火，就咧着大嘴吼道：“还想做美梦生孽种，快把她的衣服扒光，让她在地上学老母猪爬。”

一会儿，一个士兵又按中山的命令提来了一桶凉水，把赤身裸体正在地上慢慢爬的孕妇掀了个仰面朝天，然后按住手脚就往她嘴里灌水。

孕妇的肚子愈发膨胀起来，仿佛快要爆炸似的。突然，孕妇长长地惨叫一声后，在浑身抽动中死去了。

“腹中胎儿在动！”一十士兵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了起来。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中山这时发话了：“谁能把胎儿弄出来？”

一个士兵端起刺刀剖开孕妇的肚子，一个血淋淋的胎儿滚了出来。鲜血泻满一地，胎儿在地上还蠕动着。

日兵用刺刀在胎儿身上猛地一刺，挑起走出屋外，随后就点着了房子。

以后，日军又将村民押往大荒沟。凡是遇到孕产妇、婴儿、卧床病人及不能走的人，就当场用刺刀刺死。

背阴汀子有个朱作田，那几天正生病躺在床上，日军硬是把他赶到屋外。朱因身体虚弱，走了三四步就倒在地上，日军立刻在他背上捅了几刺刀。

日军进了陶玉声家，见炕上还躺着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刺刀。

在小蚊子沟门，日兵见一户人家有一个产妇躲在炕上，上去也是一刺刀。见边上还有睡着的婴儿，又一刺刀结束了小小的生命。

有个姓刁的大嫂，抱着2岁的儿子走在人群中，后面跟着的5岁儿子走不快，日兵就用刺刀捅他的背，孩子吓得往前跑，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了，日兵上去就是一刺刀。见儿子惨遭杀害，刁大嫂哭叫着，一手抱孩子，一手去抓那个日兵的枪。这时，又一个日本兵上前，对着刁大嫂的腹部连刺几刀。接着，两个日本兵把她踢到路边的河里，回头又把5岁小孩的尸体也扔进河里。最小的孩子正在地上大哭，一个日本兵将孩子拎起来就往河里扔，只见小孩在水中浮了两浮就沉入了河底。

到中午时分，白家堡子一带400余村民被日军押到了大荒沟警察署院内，日军端着刺刀在四周看押，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接着，日军在人群中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子，分批架进屋内，把他们吊起来，用皮鞭抽、压老虎凳、灌凉水，边施刑，边逼问他们“抗联”的去处、谁是“通匪者”。

这些汉子经过这般折磨，个个遍体鳞伤，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日军又把他们从屋里推出来，当众宣布他们“通匪”，然后用刺刀挑死，或者吊在大院东南角的拴马桩上，活活地勒死。有一个姓宋的村民经过严刑拷打后被按在拴马桩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反抗着，不让绳索套上自己的脖子。一个日兵冲上前，对准他的头就猛刺两刀。

院中的妇女见此惨绝人寰的屠杀场面，都掩面低头哭泣着，孩子们则吓得哇哇大哭。

日军还不断地通过翻译李大个大声地向群众喊话：

“皇军问，‘抗联’的人到哪里去了？”

“谁能说出‘抗联’的下落，有赏。不说，像他们一样。”

院中的群众一声不吭，场上顿时一片死寂。

日本兵从人群中拉出一个结婚不久的年轻媳妇，问她：“你是红胡子媳妇，‘抗联’的情况说出来！不说，死啦死啦地！”

年轻的媳妇忙跪下，“不知道”三个字刚出口，中山就一脚将她踢倒，并抽出指挥刀扎进了她的心窝。

院中的群众见屠刀马上要对准自己了，开始骚动不安起来。

中山一看问不出名堂，决定立即分批集体屠杀，刑场就设在南门外的东山根。

一批批村民被日军押出了警察署的院子。

“要设法逃脱。”一些群众交换着眼色，盘算着怎样尽快地逃出魔掌。

村民赵文华悄悄地挣脱了绳子，随即迅速向树林里跑去。押解的日兵当即对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他应声倒地。

村民陈德华的妻子怀有身孕，她也悄悄地挣开了绳子，但不幸被日本兵发现，她一时性急，咬住了日兵的手指不放。另一日本兵迅速赶到，对准她就是一刺刀，她也倒在了血泊里。

村民们被分批押到东山根刑场后，日兵逼他们全部下跪，然后一一刺杀。

杀人场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经久不绝，惊得乌鸦四处乱飞。

日军将尸体堆成垛，地上血流成河。

天已将黑，日军想尽快屠杀完毕，就将院内剩余群众都赶到了刑场，这一次人较多，队伍延伸到了苞米地里。人们的脚步刚站定，日军的机关枪就响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群众应声倒地。

随后，日军端着刺刀，在躺下的人群中挨个地刺上一刀，直到认为没有活口为止。

第二天，警察署派人到东山根挖了9个大坑，把尸体全部掩埋了。他们掩埋时还计了数，总共为374人。加上在村中就被杀害的人，共有400多人。

南岗头惨案 1936年10月底，由于汉奸告密，日本特务在安东县大楼房村南岗头堡子（今丹东地区东沟县十字街镇小楼房村第九居民组附近）搜出两名抗日义勇军伤病员。为此，日军驻安东县合隆镇的守备队决定对南岗头实行一次“整治”与“剿匪”行动。

11月1日傍晚，日军合隆守备队派一小队日军和伪警察押着两名义勇军伤员来到南岗头。他们先在堡子的外围向天空开了几枪以示警告，随后开进堡子，挨户搜查全堡30余户人家，把300多人赶到姜云枫家的大院内“开会”。

守备队小队长村田首先用日本话叽哩叭啦地对集中的群众发了一通训斥，合隆镇伪警察局张局长充当翻译重复了村田的讲话，威胁群众：“马胡子（指抗日义勇军战士）来了，你们要马上报告，不许给他们饭吃！不许给他们衣服穿！如果不报告，就杀了你们的头。烧掉你们的房子！如果有人知情不报，也同样处理！”停了一下后，伪局长又逼问群众：“快说，有谁知道‘马胡子’的情况！”

面对敌人的威吓，群众谁也没有开口，场上一片寂静。

这时，村田小队长在一旁憋不住气了，命令士兵道：“把‘马胡子’带出来，一个一个的认，看究竟哪一个通匪。”

两名义勇军伤员被日军押到了群众面前。他们面色苍白，身体非常虚弱。

全村群众在日军刺刀的比划下，一个接一个地从伤员面前走过，但伤员们什么表示也没有。

日军大怒，当着群众的面，开始拷打伤员。但他们坚贞不屈，任凭日军鞭抽棒打也不开口。

村田无计可施，看看天色已晚，不敢久留，便罗织罪名，硬说王忠素、吕长文、于德文3名群众刚才在伤员面前走过时停留良久，一定与义勇军有关系。于是，日伪军就将3名群众捆绑起来，与两名伤员一起押回合隆镇。

村田回镇后向其上司、合隆守备队头领友枝、牧野等人汇报，友枝与牧野大为不满，为了剪除“后患”，他们决心要把南岗头荡为平地。

第二天，他们就订出了消灭南岗头群众的详细计划。

11月3日凌晨，友枝、牧野亲自出马，带领数十名守备队员，与100多名伪警察一起、向南岗头进发。

到了南岗头，天刚放亮，多数村民还没起床，少数村民正在漱洗烧饭。日伪军首先包围了堡子，然后挨户砸门，把全村老小都赶出家门。村民中许多人衣衫不整、睡意朦胧，他们都是在炕上被拉出门的。接着、敌人将100多名妇女、儿童赶到姜开田家的东厢房，将130多名成年男子逐个捆绑起来，押到姜家后院7间连室的空房子里。

日伪军把后院男人的房屋窗子摘下，外边放上板凳，铺成一个通向窗口的通道，然后赶出里面的村民，每8个人绑成一串，逼着他们走向窗口。

当第一组8个男子全部进入窗口后，预先架设在屋内的机枪“突突突……”地响了，8个男人应声倒地。紧接着是第二组、第三组……

一个多小时后，130多名男人全被机枪打死，屋里屋外，血流成河，尸体如山。

日军杀完男人后，又集中到东厢房。他们先把关押在那里的年轻妇女和少女从屋里拖出来，就地强奸后又把她们重新推进屋里，然后用机枪通过门窗向屋内扫射，直至100多名妇女儿童全部倒下。

友枝、牧野唯恐南岗头还有活口留存，又下令在屠杀男女百姓的两处房子外面堆起柴禾，点火烧房。不多时，烈火就吞没了两处房子。火仗风势又向四周蔓延，最后将全堡20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

日军和伪警察这次对南岗头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全堡36户人家全部遭殃。姜德春、于天发等10人在敌人包围堡子时乘隙逃出，另有37人当天不在堡子，幸免于难。从此，东北大地上又少了一个村庄。

第二章 长城内外的白骨

俗话说，“唇亡齿寒”。东北一旦沦陷，华北就岌岌可危了。

30年代的华北地区包括晋、冀、鲁、察、绥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十一分之一；有耕地3.16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7620余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超过日本全国总人口。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棉花产量约占全国的二分之一，煤产量为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五，盐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工厂企业也较多，其中纺织厂占全国的五分之一，面粉厂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交通条件也较好，铁路总长度占全国的一半，公路长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享誉世界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港。

在中国的经济中，华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夺取东北之后，日本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向华北进行扩张与掠夺。

一、喋血卢沟桥

一镐砸下去，尸体的烂肉竟溅起一尺来高

日本对华北的扩张与掠夺，首先是从刺探与搜集经济情报入手的。1933年11月，满铁炮制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等文件，企图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分会，在山海关、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设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就是开滦、井陘、山西、山东等煤矿资源，冀东的工业，以及整个华北的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经济资源和关税、各国在华北的权利及投资等情况。

1934年3月和6月，日本内阁两次派满铁理事十河信到华北“考察”。经过实地刺探经济情况后，十河信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具体方案。其要点包括：设对华投资公司，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建议满铁在华北设立大型综合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建议将北宁线（北平至沈阳）延长到山西，把晋煤运往日本。

日本经过对华北资源的调查后，就开始实际的掠夺行动。首先是以合办、贷款、直接投资等形式对华北的煤、铁、金矿等重要行业大规模投资，仅煤业一项，1936年日本对华北地区投资达1853.2万元，占当年日本在华煤业投资总额21087万元的88%。尤其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一些厂矿投资，有些是仰仗军队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占为己有的。

在交通运输方面，日本向华北铁路运输业巨额贷款，霸占了青岛、秦皇岛等黄金口岸。1936年6月，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万余亩，修建大型机场；10月，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控制华北至东北的重要航线。日本实际上已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1936年3月，以日本军部为核心的广田内阁上台后，立即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

从 1936 年 4 月起，驻华北的日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6 月以后，驻丰台的日军几乎每天夜里要进行挑衅性演习，并经常与中国驻军发生摩擦。

这年夏秋，日军士兵开始身佩利刀，三五成群地到丰台车站闲逛，遇我士兵少时，就对我士兵摩肩相撞，甚至拳打脚踢，故意制造事端，引起双方殴斗。在“演习”时也向我守军作冲锋状。同年秋冬之交某日，我军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遂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几经交涉，终以误会了事。此后日军益趋骄横，还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出长辛店一带，以便控制华北地区。当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日军就时常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且不断升级，由白天“演习”渐转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还经常在卢沟桥做军事测量和部署。中方屡次提出抗议，但日方均置若罔闻。

为尽快把华北的资源全部占为己有，裕仁天皇于 1937 年春派教育总监督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率一些“中国通”来华作战前调查。

6 月 5 日，香月清司中将视察满洲及华北驻军后向参谋总部报告说：

“华北驻军实行对苏作战为主、对华作战为辅的教育，其进行情况大致良好。但最大缺陷是练兵及演习场所不足。该军主要驻屯于宛平城附近，而宛平城实为中国军队所有。”

根据香月清司等人刺探的政治、军事情报，日本内阁于 7 月初决定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完全陷入孤立无援之中，从而加深冀察的殖民化，并以平津作后方，向华中、华东、华南推进。

当时我国华北重镇平津一带已是国防前线，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被日本华北驻屯军占据。北平东面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听命于日寇；北平的北面，有热河省敌伪军；西北面，有被日本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莫的伪军。诺大个北平，仅在西南面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防，而卢沟桥则成了北平对外通道的门户。

卢沟桥是北平名胜，位于北平广安门西南方 13 公里处，横跨永定河上，全长 265 米，宽约 8 米，有桥拱 11 孔，属宛平县。据史书记载，因永定河常常泛滥成灾，淹没无数良田，还割断北平与南方的联系，于是金朝决定在河上修建大桥。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 1189 年）开工，明昌三年（公元 1192 年）完工。当时南方人进京必经此桥，路过的大官富贾要在这里歇憩，远道而来的游客爱在此住一宿，以便第二天早晨起来登桥观赏迷人的“卢沟晓月”。

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东方见闻录》中，对卢沟桥壮丽的景色作了精彩的描述：

“低低的砾石河岸挟持着河床，黑森森的河面上波光粼粼。东方已是红霞一片，天空却还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月光一泻千里，这座栏杆上刻着狮子的白石桥仿佛是浮在月色之中。当空银白色的月光和东方玫瑰色的曙光交相辉映，像两条大河的水汇合在一起。石狮子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这些狮子各具神态，有的凶猛欲噬，有的肥胖滚圆，有的意志懒散，有的昏昏欲睡，……485 只石狮形象逼真，生动雄伟。每逢拂晓或有月光的夜晚，来到这里游览、散步，格外感到心旷神怡，入诗入醉。”

由于地处要冲，卢沟桥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就在 1922 年直奉军阀战争期间，双方为争夺这一要隘，在此拼杀 5 天 5 夜，使永定河成了一条血河，尸体堆积如山，是为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战。

正因为卢沟桥的战略地位重要，日军处心积虑地要在这一带发动侵略战争。

7月7日夜，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清水节郎中队长带领，在卢沟桥北面荒郊进行军事演习。11时左右，宛平县城东面忽有枪声数响，我守城军队当即严密警戒。

夜12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日兵一名，该士兵可能被中国驻军劫持带入宛平城，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

中方因其所称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予以拒绝。

少顷，松井又来电，声称中方如不接受日军要求，日军将包围宛平县城。

中方再一次拒绝。

这时，驻丰台日军500余人携6门大炮，在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下开始包围宛平城。长辛店和卢沟桥守将、二十九军三十七旅旅长何基沣即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请示，秦为避免武力冲突，即指示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向日方交涉。

8日晨4时，中日双方代表到达宛平县署。正交涉间，日军竟向宛平县城射击，接着用炮猛轰卢沟桥，并强行攻占平汉线铁路桥及附近龙王庙等地。

中方守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官兵对骄横疯狂的敌人早就深恶痛绝，不等上级下达作战命令，就毅然奋起还击。他们纷纷表示：“卢沟桥是吾人之坟墓，要与桥共存亡，绝不后退。”

拂晓时分，金振中营长率部用绳梯爬出城外，分兵两路，向日军反击，一直激战到上午9时多。

双方的调查和交涉还在进行，日军仍不断向宛平增援。

下午3时，战事又起。4时左右，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约中国调查人员出城商谈，并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当天下午6时退至城外，否则即以大炮攻城。中方当即回复日军，双方先行停火，否则不便商谈。如日军不肯停止射击，中国军队不能坐以待毙。

晚6时5分，日军开炮攻城，至夜间，战事更趋激烈。西苑何基沣旅已进抵八宝山，向五里店、大井村方面进发，截断日军后路。

晚12时，中国军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吉星文团官兵，手持大刀、手榴弹、冲锋枪、砍杀声、呐喊声、爆炸声震动四野，全歼了卢沟桥上的日军。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七·六”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方针的既定步骤。据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的回忆，早在6月份，东京就已经知道，7月7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东北的柳条湖事件。可见“七·七”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

随着事变的发生，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新任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急电中央统帅部参谋总长：“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致电陆军省杉山陆相：“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命第二十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7月8日，植田谦吉和东条英机竟以伪满洲国武装部队首脑身份发表所谓声明，颠倒事实真相，说什么“兹因暴戾之中国第二十九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同日，日本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司令部又致电陆军省，要求杉山陆阳并裕仁天皇当机立断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

关东军还先后派遣参谋副长今村均少将、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飞往东京，直接汇报。

杉山接到报告后，为迅速向华北增兵，当即命令东京以西各师团原应于7月10日定期退伍的士兵延期服役，仅此即增加现役兵员4万余名。

9日上午4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中方，称失踪的日军士兵已找到，宣称宛平事件可以“局部解决”。中方信以为真，至清晨5时与日方商定了3项停战办法：

- (一) 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 (二) 日军撤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
- (三) 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二十九军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定300名，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接防。

7月10日，东京决定日本国内增派5个师团去华北。

同日，驻华日军重兵携大炮、坦克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向卢沟桥进发，并占领卢沟桥与北平之间的大井村及五黑店等处。

与此同时，日方放出“和平谈判”烟幕，向中国冀察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 一、二十九军派代表谢罪；
- 二、处分当事者，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
- 三、永定河左岸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 四、严厉取缔共产党、蓝衣社等；
- 五、中国接受以上条件后，双方部队各自撤回原防地。

7月11日，怀侥幸心理的中国当局派天津市市长、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到北平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接触，答应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

7月11日起，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城及附近地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吉星文团长负伤，战事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南苑等处。二十九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又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

日本当局开始加速向中国增兵，至16日，已调派陆军10万人来华。17日，又决定再动员40万日军。

那时，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从东北开进关内。从海上运来的大批日军由塘沽登陆。热河省的日军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空军向天津东局子机场集结，并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还天天派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战术侦察。

日军的战争行动迫使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解决中日两国争端。但同时又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20日，日军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日军参谋本部在东京召开部长会议，正式决定武力解决卢沟桥事变。此后，战争逐渐扩大。

28日，日军动用步兵3个联队，炮兵1个联队，飞机30多架，向华军大本营所在地南苑猛攻。经过血战，日军以绝对优势的火力占领了南苑。华军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督

师苦战，最后向城内撤退时，遭日军截击，双双殉国，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初为国牺牲的中国高级将领。当时正在南苑军训的大学毕业生也积极投入战斗，伤亡亦不少。

同日，北苑、西苑也相继失守。

当晚 10 点，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由北平撤到保定。接着，曾在长城抗战中今日军闻风丧胆的二十九军官兵，怀着痛苦的心情，挥泪告别了古都北平。不久，北平沦陷。

29 日晨，日机狂炸天津，南开大学被毁，天津市民约 2000 人罹难。次日，天津失守。

在卢沟桥事变中，日军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他们一进入宛平城，就挨门挨户搜捕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零散人员。当时城里居民大都躲进城墙洞里，日军靠汉奸带路，一旦搜出年轻人即扒去上衣捆起来，然后将他们成群地赶到西门外朝北跪着，让城里年长的进去认领。凡无人认领者，全都刀砍枪杀，无一幸免。城内有个饲养骆驼的李老大，在城墙洞内憋得受不住，想到外边透口气，不料，刚一露头就被日军一枪打死。

卢沟桥东头有一条二十九军挖的安全沟，长约 3 丈，宽约 1 丈，深有 1 丈多。后来日军常把中国人拉到沟边，用刀挑死，或用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抛到沟里。没多久，沟里就积满了尸体。那时正值盛夏，尸体都腐烂膨胀起来。日军又抓来 30 多人，令他们埋尸。一镐砸下去，竟溅起烂肉一尺来高。卢沟桥头的河滩里也到处是三三两两的死尸。

日军占领宛平城后，在卢沟桥头和东西两门设岗哨，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牵着龇牙裂嘴的狼狗，随意杀害中国人。卢沟桥城北街农民吴老二因眼睛不太好，在过卢沟桥时没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当场对其腹部就是一刺刀。城里居民郭忠福的爷爷去地里拾柴，竟被一群日本兵当作活靶，进行射击比赛，杀人者还夸耀：“我的枪法大大的好”，引来四周日兵的一阵哄笑。三个星期内，日军断断续续不停地向宛平城开炮。城中到处浓烟火海，断墙残屋，无数民房被炸毁，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惨死在日军炮火之下。宛平城东关街有个叫任大嘴的老汉，一天早晨去井台打水，突然一炮打来，顿时被炸得粉身碎骨。

卢沟桥事变导致平津沦陷，日军阴谋得逞，欣喜若狂，从此开始了更为疯狂的战争行动，恨不得把中国一口吞下。中国百姓大难临头了。

二、铁蹄下的山西

在鼻子、锁骨上穿个孔，用一根铁丝就能把许多人串起来

山西是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目标，那里既有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为了巩固对山西的占领，日军在山西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的流血惨案。

天镇屠城 1937 年 9 月 12 日，日军在侵占山西省天镇城后，连续 3 天进行了大屠杀。

9 月 12 日清晨，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便三五成群地挨家挨户搜查。当天刚亮，很多百姓还没起床。日军敲门时，如有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人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他们每到一家，对男子都要搜身，

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搜刮银元，稍有反抗，即被刺刀挑死。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稍露不满就惨遭杀害。日军见到妇女，则强奸轮奸。东南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将要出嫁，被几个日军抓到后轮奸，然后扔入水坑。一个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7名日军轮奸，以后又被兽兵们抓住双腿，活活撕成两半。东南街还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日军发现后全遭强暴，其中一位姑娘被日军轮奸了整整一天后身亡。西街有两位女学生，被日军糟蹋后上吊自尽。西北街有个姑娘叫贺月娥，不甘受辱，奋力反抗，被日军剖腹身亡。西南街郭举子父子俩因怒骂日军兽行而遭枪杀。

上午10时许，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东面的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里院有一8米多长、宽深各5米的大坑，日军先让阎毅、张凤祥等5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将他们刺杀在坑内。随后又将人们分批撵进庙院大坑前，日军端着刺刀在坑后站成一排。军官一声号令，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前胸，再一使劲，便把受害者挑入坑内，有的人被连捅10多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尸体先是堆满了大坑，随后又堆满了院内的三间房子。在此同时，西城门外伪金店前，北城门外狐神庙也展开了类似的大屠杀。

东街、北街也有数百人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具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扔在桌子上。后来两处群众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宽约2米，水深1米余。日军像马王庙大屠杀一样，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整条水壕变成了血壕。

经过一天的屠杀，天色渐晚，日军见还有很多难民没来得及处理，就决定先将难民关在北城门瓮圈中。在驱赶押送时，日军将难民的裤带全都解去，反捆手臂。因没有裤带，难民们的裤子掉到膝下，下身裸露，受尽凌辱。有些人因裤子掉下迈不开腿，又遭日军的毒打。

第二天一早，日军在北城门瓮圈内挑出袁美等40人，每人带上有“苦力”两字的白布袖章，叫他们清理街道上的尸体。因城内40余口水井里都有死尸，日军又押了一些人到城外拉水，供日军食用。余下500余人，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子里。操场中间原先晋绥军挖有3条防空大壕，每条深约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2米，3条壕互相沟通。日军将难民10人一批押到壕边，用机枪扫射。杀了一批，再来一批，整整杀了一个上午，500余人全部被害，尸体不仅填满了大壕，还铺满了操场。

9月14日，日军把抓来的许多妇女又赶到东北街躺满尸体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站在尸体中间，把裤子都褪到膝下，并用枪托子逼着她们绕圈跑。不少妇女绊倒在地，与尸体滚在一起，浑身鲜血。兽兵见妇女们吓得魂不附体，都乐得狂笑不止。

连续3天的屠杀，城里共有2300余人被害，昔日热闹的小城顿成一座阴森森的空城。

灵邱惨案 1937年9月23日，坂垣师团的一部分日军来到山西雁北灵邱县城。他们把守住城门，只准进不准出。然后日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举着刺刀在城内挨家挨户搜捕，把抓来的男人集中到城东北角大云寺的大马场、北城墙下奶奶庙前的大桑园、城西北财神庙和老君庙后的空地上；把抓到的妇女集中起来，剥光衣服，用皮鞭抽打，肆意污辱，并集体轮奸。稍有反抗不从，就当场杀死。城内活着的妇女，不愿被日军蹂躏，不少人悬梁自尽。

还有一部分人在大云寺广显和尚的帮助下，从城墙上攀绳逃走。日军发现城里的妇女越来越少，就到处搜查，从大云寺佛像后搜出很多绳子，即把广显和尚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日军把抓到的居民按高矮分别绑成几串，逼着跪倒，然后日军举行杀人比赛和表演。几十日本兵举着大刀砍人头，如果一个日本兵一气能砍下几个人的头，就会受到围观的日本兵的喝采。如果一颗头也没砍下，就会受到军官的斥责，围观的日本兵也会发出一阵怪叫。有时他们强迫抓来的人坐在凳子上，由日本兵一个一个砍头。有时强迫被抓的居民自己挖坑，然后把他们全部刺死在坑内。有时把抓来的人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让士兵乱挑乱刺，一刀刺不死再补刺，直到断气为止。

城内的男人被杀光后，日军又到城外村庄里逐户搜杀。沙坡村杜锦绣和儿子杜四回家取东西，正好被日军发现。杜锦绣当即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杜四赤手空拳与日本兵搏斗，抓住日本兵的刺刀，十个手指都被割掉，最后被日军开枪打死。聂尧 15 岁的侄子听到日军来搜捕，慌忙往地窖里躲，被日军发现，枪杀在窖口。日军走后，孩子的母亲从躲藏处跑出来，抱着死去的儿子放声痛哭，日军闻声迈回来，开枪将她打死。就这样，日军在城外杀了 400 余人，加上在城内的屠杀，共有千余人惨遭杀害。

在灵邱县城南 55 华里处有西沟和后山两个村，因居民刘姓居多，又统称刘庄。共有 160 户人家，近 500 人，属晋察冀边区管辖，距日军据点北泉很近。刘庄人民常帮助八路军打击敌人，消灭汉奸。1943 年 2 月 23 日，刘庄的民兵勇敢地炸毁了架设在唐河上的桥梁，卡断了日军从北泉通往上寨的通路。为此，刘庄遭到了日军疯狂的报复。

1943 年 3 月 1 日凌晨，北泉的日军队长佐滕率日军七八十人，另有汉奸 10 余人、清乡队 50 余人，从北泉出发到刘庄进行“扫荡”。行至刘庄不远处，被站岗的民兵刘周发现。刘周立即投出一颗手榴弹报警。不久，日军又踩上了民兵埋设的地雷，当场有数名日军伤亡。村方内侦察员孟光禄和刘朋听到手榴弹及地雷爆炸声，奔走呼号，叫群众马上突围转移。不久，日军包围了村庄并进村，首先杀死了在街上的孟光禄和刘朋。

接着，日军挨家挨户搜捕。一伙日军窜到村民刘勤家，威逼其妻出去，因她刚生孩子，走不动，日军当场用刺刀将她捅死，接着又用刺刀挑起婴孩，摔到墙头上。另一伙日军到村民靳大海的家，捅死其不满三岁的孩子。日军将从各家中搜到的两百余名村民都驱赶到村西的西后台，汉奸杜大头在日军队长佐滕的指使下，声色俱厉地审问群众：

“谁是刘周？”

“……”场上群众一片沉默。

“谁是八路军？”“谁是干部？”杜大头气急败坏地连问几声，场上群众还是一片沉默。

佐滕见问不出名堂，就准备对群众下毒手了。他命令部下把场上群众都驱赶到村民刘檀家的大院里，诱骗群众说继续开会。

到了刘家大院，日军将群众关进了院内 6 间房子里，并把柴禾堆在房子四周，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焚烧。

屋内群众见此情景，知道大难临头，大家异口同声地怒吼着：

“冲出去！和狗日的拼了！”

“夺鬼子的枪！”

“冲啊！”

群众纷纷破门砸窗，争先恐后地往外冲。民兵刘贵全一人拆下两根窗档，跳到院中与日军拼搏，接连打倒两个日军后不幸中弹牺牲。

凶残的日军这时已点起了大火，并用机枪疯狂扫射冲入院内的群众。顿时院内沙烟滚滚，叫骂声、哭号声、机枪声混成一片。不久，院内尸体横陈，血流成河。还有很多人没能逃出屋子而被烈火活活烧死。

在这次惨案中，被害群众男女老少共 242 人，约占全村人口的十分之六。其中有新婚的夫妇，临产的妇女，走亲访友的人。全村 35 户人家被杀绝，32 户远避山沟幸免于遇难，刘益三一家密藏无恙，余者每家都有死者。

日军在刘家大院屠杀群众后，还在村中掠物烧房，共抢走大牲畜约 300 头，羊约 150 头，还有一些粮食和财物。烧毁房屋约 1500 间。昔日人欢马叫的兴旺山村，顿时变成凄惨残破的废墟，余下的孤男寡女、零丁老幼，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惨案后，饿死的群众就达 16 名。这笔血海深仇，刘庄的父老乡亲们世代都不会忘记。

朔县惨案 朔县地区地处山西西北部，人口约 8000 余人，商业兴盛，是雁北重镇。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突破南口、居庸关，沿平绥路（今京包线）西犯，侵入长城内，进入晋绥两省。一路上占领天镇、阳高、大同，继续沿同蒲路向雁门关和长城各隘口侵犯。9 月 27 日，万余日军兵分两路，西路第四师团第三十二本间旅团和十二留守师团铃木旅团，从平鲁出发，途经井坪，直下朔县。东路独立旅混成第一旅团在旅团长酒井指挥下，从山阴县岱岳出发，直奔朔县。

9 月 28 日黎明 4 时，东西两路日军会合于朔县城北。朔县县长郭同仁和“牺盟会”特派员宋效先率领驻守当地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部分官兵和地方公安队及政府人员，利用坚固的城墙顽强抵抗，与日军激战 6 个小时。

10 时左右，日军用坦克撞开北城门，蜂拥入城。随后，日军用机枪封锁了东门和西门。城南守军见城北日军来势凶猛，遂打开城门，争相出逃。县长郭同仁和宋效先带领部分政府人员及民众从南门突围，恰遇日军押着朔县城商会会长贾成德盘查军政要员，郭当即被贾出卖，惨遭日军枪杀。宋效先和部分城民夺路脱险。城内居民及政府要员、警察也纷纷涌向南门，来不及逃走的守军扔掉枪械，换上便衣混进老百姓中，一时南城门被挤得水泄不通。日军见状，速冲南门，把手无寸铁的逃难城民用麻绳捆在一起，或用铁丝穿透锁骨连成一串，押至南门外酷刑拷打。同时，日军在城内逐门挨户搜捕，用同样方法把青壮年男子 10 个一伙、8 个一串地押至二道巷等集合点。那里挤满了几百名被捆着的人，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两旁来回走动，不时向人们踢一脚或刺一刀，有的还拿小刀在人们脸上乱划。为了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又拿来很多细铁丝，在每个人的脖子上缠上几圈，一个一个连起来。有的把鼻子穿个孔，用一根铁丝把许多人串起来。等凑足 500 余人时，日军就将串在一起的人们押送到南门外。不少人因鼻子、肩锁骨、脖子上串缠着铁丝，走路时互相拉扯，未到南门已死在半路上。南门外城壕边，到傍晚时分已集中了 2000 余人。起初，日军端着刺刀站在人后，指挥官一声令下，日兵“哇”的一声，便将刺刀从人们背部穿至胸前，再一用劲，便把尸体挑进壕中。接着，日军又改变杀人方法，有的先开膛破肚再刺杀，有的用战刀直接砍头。后来，被抓的群众越来越多，日军来不及逐个刺杀砍头，改用机枪扫

射。顿时，机枪声、人们的惨叫声混成一片，响彻在南城壕的上空。100 米长、9 米深、9 米宽的南城壕横七竖八地填满了尸体。日军唯恐有活人逃生，又开来坦克在尸体堆里压来碾去，人血与泥土混合成黑红色的血泥。为了毁灭罪证，日军又浇上汽油，焚烧尸体。

在南城壕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在朔县城内烧杀淫掠整整 3 天，大街小巷，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在西花园街的一块空地上，百十个日本兵往抓来的 10 多个百姓身上泼汽油，然后枪击，顿时火光随之而起。被烈火焚烧的难民挣扎折腾，痛苦万分，日本兵则在旁鼓掌狂笑，乐不可支。

西街高老汉的儿子被扔进火堆，活活烧死。高老汉愤怒至极，痛不欲生，破口大骂：“狗日的洋鬼子，老子跟你们拼了！”骂罢，发疯似的扑向日本兵，结果亦被扔进火堆，待人烧焦后，日兵才狂呼而去。

朱家巷姓曹的一家 13 口人藏在地窖里，日军发现后就往里扔手雷，把人全部炸死。

草市街“义仲祥”成衣铺师徒 13 人，“义和店”徐达、徐通、徐和三兄弟，“广亨源”布铺的掌柜伙计 20 余人均遭杀害。

躲藏在关帝庙的 60 余名群众，被日军发现后堵在庙内，全部遭杀。其中有 10 多位盲艺人躲藏在庙里西下房，被日军扔进几枚手雷，顷刻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全部遇难。

日军在城内到处奸淫妇女，从幼女到老嫗、孕妇，奸后即杀。南街吕耀先的嫂嫂结婚不久，即被日本兵奸污。日本兵奸后用刺刀从 其下部直刺到腹部，肚肠流了一地。其丈夫见此情景，怒不可遏，赤 手空拳与日兵搏斗，也被残杀。很多妇女不堪忍受屈辱而上吊或投 井自尽。徐宝的侄女也抱着 1 岁半的女儿投了井。

日军在城内见房即烧，见物就抢，大批民房店铺成了废墟，财 物被劫一空。自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日军在朔县城烧杀淫掠 3 天 3 夜。两个月后、大街小巷还是尸骨遍地，无人掩埋。靠城墙的街道，死人 头颅竟比石头还多，野狗成群结队地扒啃死尸，都吃红了眼睛。日军这次屠城，共杀我同胞 4800 余人，有 160 余户满门遭杀，许多居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房屋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历史又记下了日军对中国平民百姓的一桩滔天大罪。

除了集体屠杀，日军还在山西各地用尽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杀害无辜善良的中国百姓。

烧死把人活活烧死是非常残暴的行径，但日军竟然还发明了许多更为残忍的方法。

1933 年 2 月 15 日，日军在火烧介休县绵山古寺庙时，抓住一个上山砍柴的农民，将他投入该寺大铁钟内，竟用小火慢慢地将其活活烤死。

1937 年 9 月 13 日，日军在闻喜县裴社村抓住青年农民贾德功，用铁丝将其捆在石碾上，将他碾得筋断骨裂，然后浇上汽油焚

1940 年 9 月 13 日，日军在平定县马家庄用刺刀将村民 140 余人逼至下街张庆深家圈房内，把门锁住，在周围堆满木器家具和柴禾，最后泼上汽油，点火燃烧，圈房内群众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成焦炭。

1941 年 3 月，日军把终县百余名群众赶进石家窑窑 3 孔窑洞内，用机枪封锁窑门，向窑内投放手榴弹和燃烧弹，窑内群众被炸得粉身碎

骨，无一生还。

1943年3月14日，日军在交城抓住村民覃成簋，将煤油倒在他头发上，然后点火焚烧，使其整个头部成为一个火球，整个人就像一支大火把。

1943年10月29日，日军在阳城滑石坡村，把40余名群众捆绑起来，分批推进大粪池内，然后点燃一捆捆玉米秸扔进粪池，将他们活活熏死。

刺杀用刺刀捅死百姓是侵华日军的家常便饭，而集体刺杀既能恐吓百姓，又能激发士兵们的兽性，更是成了日军屠杀时惯用的手法。由于三八式步枪的刺刀特别长，因此杀人者全是日军士兵。

把被害人捆起来排成行，然后由士兵随着口令同时从背后突刺，这样的集体刺杀，8年间山西有数十次之多。至于把被捕群众当作活靶，让士兵练习刺杀更是司空见惯。

1938年10月30日，日军在沁水县两河固镇南山岭抓住一些群众，把其中男人的衣服脱光，并用深色衣、布将他们的眼睛蒙住，然后让士兵排队，轮流在他们身上练刺杀，而且规定不准刺要害部位。每当刺刀插入肉体时，被害者就发出一声惨叫，肌肉也剧烈地抽搐一次，直到血慢慢流尽后死亡。仅在1942年7月下旬至8月初，日军为训练新兵，竟用这种方法在太原小东门外的赛马场先后刺杀了340余名无辜群众。

砍杀这是日本法西斯武士特有的杀人方法，而且花样繁多，在大屠杀中屡见不鲜。有一刀砍下头颅的，有拦腰一刀把人断成两截的，有从肩至胯斜劈的，还有从头至脚把人一劈为二的。由于杀人的武器是指挥刀，因而用此法杀人者全是日军军官。

1937年9月11日，日军抓住阳高县城南街小书铺的一个青年，用刀砍下他的脑袋，将其扔进饭锅内，煮得稀烂。

1937年11月7日，日军在榆次南谷材勒令农民许其五和郭二货为其引路。行至张村东南时，一名日军少佐突然拔出洋刀，先后砍掉了这两个农民的脑袋，并让军犬撕开两人的胸膛，吃掉他们的心肝。据说这名少佐仅仅是想看看他的军刀是否足够锋利而杀人。

1938年3月9日，日军在太谷县曹村文昌阁遇村民吴印元，一名军官拔出东洋刀，向吴猛砍数刀，把他的手脚先后砍断，最后才劈掉他的头颅。

活埋 这也是日军惯用的屠杀方法，还特别爱用集体活埋，让受害人自己挖坑，以延长死前的痛苦。

1940年10月2日，日军在昔阳县南北都界河，把抓住的75名抗日军民全部用麻绳捆住，活活埋进事先在县城边西河挖好的土坑里。

1942年2月的一天，榆次市108名粮食加工厂的工人因穿类似八路军的灰衣服而被捕。日军将他们押到榆次泰山庙附近的兴亚堂东侧，强迫他们挖了一个大土坑，然后将他们扔进大坑，再把土填满夯实。

1943年春节，大同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请客名义找来当地397名知识分子，然后请他们逐一念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会念的站在一边，不会念的站另一边。等到所有的人都念过后，大同日军特务机关长田中一则宣布：凡懂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分子，应杀掉。说完，将会念英语的知识分子都带到郊外，活埋在5条深沟里。

毒杀 用毒气、细菌大规模杀害百姓是侵华日军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之一。

1940年7月9日，在沁水县城的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有岗部5名日本兵在

汉奸带领下，来到西山村，将近百名村民驱入一座院内的各个房间，然后自己带上预先准备好的防毒面具、向各个房间施放毒气弹，院内群众全部中毒而死。

1941年2月8日，日军将定襄县上零村百余村民逼进该村学校的2个教室内，然后面戴防毒面具，把毒气筒的盖子打开后扔进教室，顿时室内毒气弥漫，使人呛鼻流泪。室内群众纷纷冲破门窗外逃，但终有45人因中毒过重而身亡。

1941年秋的一天，日军在孟县活川口村施放毒菌，使全村伤寒流行，141人死于非命。

1942年2月，日军在晋西北的河曲和临河等地区散布鼠疫，使多名群众致死。

1943年11月2日，日军在阳城西南村发现一个煤窑里藏着10余名群众，于是向该窑内打进一个毒气弹。其中除李木生一人挣扎爬出窑外，吐了一滩带血的污水而幸免一死外，其余皆被毒死在煤窑中。

除了上述虐杀罪行，日军还用水淹、绳勒、剖腹、钉杀等多种方法残害中国百姓。如1937年9月23日，日军在灵邱县城东河南村抓住农民刘大成，用一根炉条从刘的后脑颈部打进脊柱，使其活活痛死。又如1937年10月13日，日军在原平县南怀化村，将一名女孩首足倒置，将两脚钉在树上致死。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在襄垣城关杀死西街老爷庙前铁匠铺中13名职工，还将工人赵银虎头朝下脚朝上，钉死在该店的墙上。

残害儿童 这是侵华日军又一个丧尽天良的罪恶。他们甚至连婴儿与胎儿也不放过，人类的任何言辞都难以准确表达这种禽兽不如的行径。

1938年3月18日，日军闯进潞城神头一户农民家里，男人与妇女都已逃走。也许是人们的心理太善良，认为日军并不会伤害孩子，就把吃奶的婴儿留在了屋里。谁知兽兵们为了取乐，竟把这个睡得正香的婴儿压在10多条厚棉被底下，直到确证婴儿已活活闷死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1940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一名日军在和顺县白云村想强暴一名农妇，他嫌农妇抱着的一名四五岁女童碍事，竟然夺过该女，抓住她的脚踝，拎起后猛摔在台阶上。女童一声未吭，就七窍流血地死去了，他的母亲也未能逃脱魔爪。

1940年12月23日，日军血洗兴县城乡，在西关桥郭家沟村要把一群妇女赶进屋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死死拉住其妈妈不放，却被一个日军抓住她的脑袋，猛地撞向身旁的石墩，当即脑浆混和着鲜血流了一地。

1940年12月31日，几名日军在岚县草子寨抓住年仅4岁的柴花女，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赌，看谁力气大，能将女童撕成两半。当即一名日军上前按倒女童，用两脚踩住其左腿，用双手提起其右腿，任凭女童惨叫凄厉，在同伴的叫好声中，就像撕鸡一样，硬是将她活活撕裂，然后像肉店那样，把碎尸搭挂在墙头上。同日，在岚县踞子寨，日军在奸杀了一名青年妇女后，又将其趴在尸体上哇哇哭着要吃奶的婴孩穿在刺刀上，然后走到大街上，让同伴欣赏婴孩在刺刀上手脚乱动的惨状。

1942年7月，灵邱县的日军为庆祝该县狐狸桥工程竣工，在桥墩左右两端分别杀死男女婴孩各一名，作为“祭桥礼”。

侵略大同的日军为用中国胎儿作试验，先后秘密地杀死在山西各地抓来的孕妇六七百名，取出她们肚子里的胎儿，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然后分别

装入玻璃缸或陶瓷缸内备用，或制成标本。

日军还经常摧残儿童取乐，其手段无奇不有。如把四五岁的孩子单独放在高大的洋马背上，然后策马奔跑，使孩子吓得面无人色，跌下马背。站在一旁的日军则欣赏着魂不附体的孩子，开心得捧腹大笑。有时，日军为了解闷取乐，就迫使十二三岁的儿童身背百余斤重的大石头在上坡路上行走，当这些儿童力尽而被大石头压倒时，围观的日军就会指着口鼻流血的孩子，狂笑不已。有时还会强迫一群孩子分成一对对，逼迫他们互相斗殴，如哪一对不尽力扭打，日军则抓住双方的头发，将两人的脑袋互相对撞，直至昏死过去。其他孩子见状，吓得拼命对打。越是打得血流满面，日军就越是兴高采烈。

以上例子，虽然仅是侵华日军对儿童暴行的极小部分，但已足以使人触目惊心了。

强奸妇女这类罪恶在侵华日军中多得不可胜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禽兽行径都是在日本当局的允许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士气，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实施这一恶行时，往往由军官带头，以鼓励和激发士兵的兽性。

日军侵占山西期间，每到一处，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追逐“花姑娘”，见年轻妇女即欲强奸，甚至连女童老妇亦不放过。他们经常窜入民宅，强奸民女，有时还把许多妇女集中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广大村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强奸或轮奸。至于侮辱妇女之事，更是层出不穷。尤为可恶的是，日军常常杀死受害者，以掩盖罪行。

1937年9月18日，日军闯进左云县西巷一家小店铺内，日本军官禹山将店中年仅14岁的少女强行奸污。

1937年9月22日，日军在灵邱县北城墙根奶奶庙前的大菜园等处，把抓到的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她们的衣服，甚至连老太太的裹脚布也被强行撕下，然后用刺刀和铁棍逼着她们当众跳裸体舞。日军在四周嬉笑起哄，最后又对她们进行集体强奸和轮奸。

1937年10月27日，日军侵占平定县桥头村，逼着该村一些妇女脱光衣服和鞋袜，然后任意拍摄裸体照片，以满足其变态心理。

1938年2月22日，10多名日军窜入离石县九里湾一家民宅，将一名姓杨的老太太轮奸致死。

1939年8月22日，日军在大同大王村对一位年轻妇女强奸后，割掉其乳房，捆住其四肢、并将其扔进地窑中，用火烧死。

1939年9月的一天，日军侵入孟县神泉村后，从人群中拽出男女各7名，逼迫一男一女配成七对，当众交合，以此满足日军的兽欲。

1941年9月底，日军在平鲁县白家庄（辛庄）强奸一名负伤的妇女后，还在该妇女的阴道内塞上木棍、石块等，最后将其杀死。

醋刑拷打这是用来折磨抗日干部和群众的。为了获取情报，日军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酷刑。

灌凉水日军先将受审者仰面朝天地推倒在地，按住其手脚，然后将湿毛巾捂住鼻孔，迫使其张口换气。于是日军趁机迅速向受害者口中灌凉水，使其肚子越灌越胀。日军再使劲踩其肚子，使受害者腹中之水混着鲜血一起喷出。如此反复折磨，使受害者昏迷直至惨死。有时日军还用辣椒水代替凉水灌，那就更残酷了。

火烧日军在受害者头背或手脚腿臂处烧上少许汽油，然后点火燃烧，使

其疼痛难忍。有时几处同时烧，使其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日军还常将受害者衣服剥去，用点燃的烟头在其身上点烧。有时则在受害者全身喷浇汽油，然后点燃，使其顷刻间被烧得焦头烂额，甚至烧成焦炭。

摔麻袋日军先把受害者装入麻袋，把口扎紧，然后几个日军把麻袋抬起，再猛地一撒手，将其摔在地上。一边审问一边反复摔打，受害者往往皮开肉绽，筋断骨折。

坐飞机 先由几个日军分别抓住受害者的四肢，然后异口同声用日语喊号子，一齐用力紧握受害者的四肢，使劲将其高高举起又同时撒手，让受害者由空中摔下。日军一边摔一边问，直至受害者遍体鳞伤以至摔死。有时还剥光受害者衣服，并先在地上布满石块与碎玻璃等物再施行，更为残酷。

打背花日军拿中等粗细的青麻绳，先在绳的一端绕上二三个大结，然后剥去受害者上衣，将其双手捆住，迫其双膝跪地或匍伏在地，再将带结的麻绳浸湿，使劲抽打受害者的背部，使其背部留下花纹状的血印，一边抽打一边审问，直到受害者被打得血肉模糊，晕倒为止。

坐老虎凳日军先将受害者五花大绑地捆起来，逼其坐在一条长而宽的板凳上，令其双腿平伸，并将双腿膝盖处连同板凳一起捆住。然后把砖逐块塞进被害者的脚后跟与板凳之间。每塞一块，受害者的腿骨便“咯吱”一声，最多能塞十余块砖。受害者常被折磨得筋断骨折，不省人事，最后不是死亡就是残废。

跌棒罗 棒罗，山西方言，即棒子。有3种型号，1号棒罗长约1.7米，直径约50厘米，顶端刻有桃状物。施刑时先将受害者捆绑在竖着的木棒上，然后两人将粗棒一推，于是连人带棒一起倒在地上，受害者往往被砸得骨碎皮裂，甚至砸死。2号棒罗长约1.5米，直径约20厘米，顶端有棒锤状物。施刑时由两人拿着棒罗轮打受害者，边打边问，直至受害者昏迷。3号棒罗长不到1米，直径约15厘米，一端有手柄。施刑时一人持棒，专敲受害者头部，使其头痛欲裂。

洗澡 即数九天将被害者衣服剥光捆住，放在院里用冷水浇身，或放入户外冰水缸里，使被害者冻僵，再用烈火烘烤。

此外还有吊、踢、石压、刀子捅、烙铁烫、通电流、站玻璃片、跪灰碴瓦砾、头顶重物、蒸笼蒸、卧冰块、跪钉子、竹签贯指、狗咬、站水牢等等名称。一看便知，其残忍狠毒程度比上述合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还训练了动物来残害中国人。如用狗咬，还用猴子噬。汾阳城内一名小学女教师被审讯时，日军让一群猴子扑在她身上，将其衣服撕碎，遍体乱抓乱咬，她不堪凌辱，当场碰壁而死。

烧房 日军在山西，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放火烧房，企图制造无人区。

1937年9月22日至23日，日军在灵邱县小寨村疯狂杀人，还烧毁民房200余间，村民的粮食、衣物、堆放在场院里的庄稼等都付之一炬。

1938年4月8日，日军在襄垣屠城，烧毁房屋1960间，城中当铺、商号、钱庄全化为灰烬，使昔日繁华的古城顷刻间城破人亡，满目疮痍。

1940年9月13日，日军在平定县马庄杀死村民324人，烧毁民房248处。被烧、抢的财物，包括驴、牛、羊、猪、鸡、衣物家具、粮食农具，价值26万余元。

1940年10月25日，日军烧毁定襄县兰村的房屋2000多间，抗战八年间，日军对许多村庄反复“扫荡”，兰村一地遭日军的“扫荡”13次，该村

房屋财产也先后被烧 13 次。

1940 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三光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

因此，日军对山西解放区的“扫荡”更显凶残。

1941 年 3 月，日军集中 7 个师团约 10 万兵力对晋南中条山地区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大扫荡。所到之处，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在绛县，日军一次烧光 13 个自然村，几百间民房化为灰烬。

1942 年 2 月 3 日至 11 日，辽县（今左权县）日军 300 余人对八路军卫生部及其他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桐峪镇进行“扫荡”，残杀抗日干部和群众 120 余人。将镇中心的房屋浇上汽油点火烧毁，烧掉楼房 120 余间，镇街商号、寺庙全烧毁。

在焚烧房屋中，日军连名胜古迹也不放过。山西介休县绵山有座始建于唐代的云峰寺，1940 年 1 月 10 日，日军将寺内文物、财宝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寺，使该寺大雄宝殿、千佛殿、介子祠（为纪念春秋战国时期晋臣介子推而设）、老君堂、伽兰殿、客堂、斋堂、禅堂等十余处精美古建筑以及大量泥塑木雕和佛像、珍贵的匾额、楹联、绘画墨迹等古文物全部化为灰烬，连寺内的古代铜钟亦被烈火熔化。

抢劫日军在山西，每到一处都要大肆抢劫，能带的都抢去，不能带的就付之一炬，既能补充日军的军需，又能断绝抗日军民的供应。

1938 年 9 月 9 日，日军在代县殷家会，每到一家，即翻箱倒柜，洗劫金银细软和衣物，赶走马牛羊，杀死鸡犬豕，运走粮食，甚至长在地里的庄稼也割去作军马的饲料。

1938 年 4 月 8 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侵入襄垣，杀死群众 250 余名。抢劫商号黄金银两，仅恒茂昌、恒巨昌、天益当、德昌当、保珍斋等 5 家商号就被抢去黄金 3 斤 2 两、银元 2500 个、银元宝（每个 50 两）36 个，以及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在德兴隆古董铺，抢走汉代和唐代的瓷瓶、瓷杯、傅山书画等许多珍贵文物。日军在北街的恒茂昌商号，将掌柜和管帐吊在屋梁上，逼迫他们交出金条元宝。这些东西到手后，日军又烧毁店堂，将全店 13 名职工烧死。日军到德昌当后，把老板的儿子用铅丝拴住肩胛骨吊在梁上，逼老板交出金银财宝。老板不愿交，日军就当着老板的面在其儿子身上割下一条肉。由于儿子疼痛嚎叫，老板只好将所有积攒，包括 2 条黄金、5 个大元宝和 900 个银元尽数交给了日军。不料日军欲壑难填，继续逼要。老板再也拿不出了，日军又故伎重演，继续割他儿子的肉。老板忍无可忍，随手抓起门栓，照准一名日兵头部打去。日军一怒之下，烧死了老板和他的儿子。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占山西 8 年间，仅在清源、徐沟、太原和曲阳四县就烧毁房屋 6479 间、烧毁和抢走粮食 360.7421 万担。而 8 年间日军在山西共烧房约 500 万间，烧毁及抢掠粮食约 8000 万担，烧毁或抢走的其他财物不计其数。日军铁蹄所至，到处尸体横陈、血流遍地，颓垣断壁，杂草丛生，田园荒芜，鸡犬不鸣。即使有房残留，亦是十室九空。人们纷纷离乡背井，

乞讨要饭，四处流浪。多少古老平和的村庄夷为平地，多少无辜善良的百姓化作冤魂。

三、村村戴孝的河北

到处是尸体横陈，血迹斑斑，断墙残壁散发着呛人的烟气

河北是侵华日军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又是八路军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为了站稳脚跟。日军疯狂地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完全杀死、饿死、冻死。

赵县惨案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占石家庄。10月7日，日军对附近的赵县城内狂轰滥炸。

10月12日，日军近2个团的兵力在赵县附近8个村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10月12日傍晚，一个营的日军来到只有59户人家、349人的常洋村，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村南街口一块空地上。一个日军军官对老百姓训话，要老百姓为建“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出力。然后拉出30余名青壮年，要他们立即到附近挖战壕修工事，余者解散。

这30余名青壮年到村南不远处，日军要他们挖个大坑。很快，一个像样的坑挖成了。没有想到，此时日军露出了凶残的本相，竟把这些挖坑的人拉到坑边，拿他们当活靶子练刺杀，当场就刺死了28人，然后逼着剩下的几个人，把被日军刺死的同伴尸体拉到坑里埋掉。最后这几个人也被日军打死，扔进坑里点燃柴草，焚尸灭迹。

第二天，村中的老百姓得到风声，又见昨晚拉去修工事的人没回来，就开始外逃。日军见此情景，立即封锁村口，见有人外逃就开枪击毙。同时，日军在村中挨户搜查，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污，见物就砸。一些日军把19名村民堵在村西头曹根年家的北屋里，然后从屋里一个一个地往外拉人，拉出一个杀一个。19人中，只有一个名叫郑文喜的小孩趁机钻进了坑洞，才幸免于难，其余人都被杀死在院中。然后，日军把尸体堆在夹道中，找了桌椅箱柜，点火焚烧。另一些日军在周根成家的院子里，见到他的父母和妻子，二话不说，当场用枪击毙，又堆了些柴草放火焚尸。3岁的孩子见母亲被杀，在屋里吓得没命地哭叫，日军听见后进屋抱出孩子就往火堆里扔。还有一些日军把郑小井等21人逼进了一个夹道，然后守住夹道口，并堆上柴草点上火，把这些村民全都烧死。李辰民等14人则被驱赶到村南一个大水井旁，然后被日军一个个地推进水井淹死。还有一个妇女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逃往村外，在村口被日军捉住。日军将她拉到水坑旁，强行轮流奸污。事后把她与小孩绑在一起活埋了。

第三天，日军杀光了村里的人，又到村外搜捕群众和过往的行人。抓住了，就拉到村东头大水坑边，用刺刀挑、战刀砍，或捆在一起用机枪扫，100余具血淋淋的尸体躺满了坑里坑外。

与此同时，日军在宋村也进行了连续3天的大屠杀，烧毁房屋70余间，残杀群众近200人。全村几乎家家都有人被杀害，还有许多户人家被斩尽杀绝。

梅花镇的毁灭 河北省藁城县南部有个梅花镇，30年代中期有550余户

人家，2500 多人口，商业兴旺，是华北棉粮集散中心。

1937 年 10 月 11 日傍晚，日军坂垣师团的 2 个大队进犯梅花镇，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伤亡 400 余人。

12 日黎明时分，日军大批援军赶到，中国军队向晋县小樵镇撤离。临走时，战士们在大街上大声喊话：

“老百姓们都走吧！日本人来了要杀人的！”

镇东部多数人家听到喊话，就随队从东门撤走了。但当时镇西部仍在打仗，枪声不断，多数人家未听到喊声，没有撤走。还有些老百姓认为自己不是当兵打仗的，日军来了不至于被杀，家中也还有财物，不忍离家流浪。

不多时，5000 多日军包围了梅花镇，成群日军从镇西南的寨墙冲入镇内，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一时间，镇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砸门声、喊叫声响成一片。惊慌失措的群众扶老携幼、东躲西藏，乱作一团。

几个日军闯进王保云的家，进门就枪杀了王的老伴。王保云操起一把三齿耙，对着儿子王淘气大喊：“孩子，咱没命了，拼吧！”说着，举耙就砸，使一名日军的脑袋当场开花。他正要砸第二个日军，就中弹倒下了。

王淘气挥拳打倒一个日军，夺门而逃，狂怒的日军把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用刺刀挑开他妻子的肚子，血水、肠子流了满地。两个孩子也被穿心挑死。

日军撞开了鲁全成家的大门，将鲁五花大绑带走。一家人哭喊着拼命扑上去，日军当即开枪打死了他两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又将吓呆了的 5 岁小女儿一脚踢昏。鲁全成 70 多岁的姥姥抓起鲁的胳膊死活不放，被日军踹倒后砍下了双脚。鲁全成的母亲被日军扒光了衣服，用刺刀割掉双乳，活活疼死了。鲁全成的妻子见此情景也不想活了，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拼命向日军一头撞去。日军将母子俩推进院内枯井里，用轱辘、砖头活活砸死。鲁全成家的大院共住了 6 户人家，有 20 口人，日军一下杀了 15 人，其中，3 户人家被杀绝。

日军在镇上到处杀人，还把一批青壮年捆起来，强迫他们跪在大街上、大院落内和真武庙前，尔后日军将这些青壮年一批批地残杀，镇上很多地方都成了杀人场。

在轱辘把水坑，日军杀的人最多。当天中午，日军将绑着的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往水坑边。水坑周围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军，并在高坎处架上了 4 挺机枪，空中还有日本飞机低空盘旋，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日军用刺刀和棍棒逼着百姓们往水坑里跳。水根深，很多人跳下去就被淹死。人群中有人发出怒喊：“乡亲们！咱们别等死了，冲啊！”“乡亲们！跟小日本拼呀！”群众喊叫着，有的已经挣脱了绳索四处奔逃。这时，日军的机枪响了，只见一排排人倒下去，顿时血流成河。

日军抓住带头号召百姓与日军拼命的阎洛聪，把他的舌头割掉，然后又割其双脚双臂和身上的肉，让他慢慢地死去，真是残忍至极。

这次，日军一下子就屠杀了无辜群众 600 亲人，仅有数人身负重伤，至深夜才爬出死人堆逃生。

12 日晚，日军把从各户抓来的 100 余名妇女赶到了地主杨洛风的大院，疯狂地发泄兽欲，稍有反抗，就遭毒打和枪杀，甚至被一刀一刀活活剐死。日军为了取乐，还把 11 名孕妇的腹部剖开，然后将胎儿挖出，吊在树上作打靶比赛。有些日军还用刺刀把鲜血淋漓的胎儿挑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

在地主尚五子家的长工院里，有 100 多名百姓被日军押在这里蹲着，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喝水了。一群日军进来，将这些疲惫饥饿的人全部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院内的两个大菜窑和一个大粪坑里。

13 日，农民张里等 62 人拿起棍棒为武器，冲出了封锁线准备逃跑，但不幸又落入日军之手。他们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拖到镇东门外打砖坯的坑里填土活埋。

日军还将 200 余名老人、妇女和小孩押到南门外。日军少佐命令从人群中扯出 4 个不满 10 岁的小女孩，用战刀把她们从头劈成两半，然后下令开枪射击。这些人死后全被扔进寨沟里。

在镇头的一口井边，45 名青壮年全被活活砍死，然后日军把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树上，把尸体扔到井里。镇上其他 10 多口井中也扔满了尸体。

13 日午后，日军拎着煤油桶、举着火把，将镇上大片民房引燃。霎时间，浓烟升腾，烈火冲天，一些藏在屋里的老百姓受不了浓烟和烈火熏烤，纷纷从燃烧的房屋中跑出。但他们一露面，就被日军抓住，这样，日军又抓住了镇上的 200 余名青壮年。日军把这些人绑押到镇东门外空地，一批批地用刺刀刺死。马胜福等 11 人先被日军用铁丝穿透胳膊和锁骨，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全身被泼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

14 日，日军又在镇上杀了一些百姓，至 15 日中午才撤离。

劫后的梅花镇，大街小巷、屋里屋外、井旁树下，到处是尸体横陈、血迹斑斑，断墙残壁散发着呛人的烟气。

日军在梅花镇的烧杀淫掠持续了 4 天 3 夜。据统计，共有 1547 人被杀，占全镇人口的 60%，有 46 户被斩尽杀绝。很多人被挖眼、割耳、割舌、剁脚、砍臂，尸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 600 余间房屋被烧毁，抢掠牲畜、粮食等财物无数。

昔日热闹的梅花镇就这样毁在日军的铁蹄下。

火烧潘家峪潘家峪村离丰润县城 60 里，处燕山山脉的腰带山东麓，当时约有 220 户人家，1700 多人。这里曾是冀东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经常给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此，日军对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

1941 年 1 月 24 日，日军驻伪丰润县政府顾问佐佐木二郎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上级关于“扫荡”潘家峪的命令，具体部署了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1 月 25 日拂晓前，从丰润、遵化、滦县、迁安、玉田、唐山等地赶来的日伪军在佐佐木的指挥下，把潘家峪团团围住。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了几个去赶集的人，然后闯入村里，在村里挨门挨户搜人，强迫人们都到村西冰封的大坑里听“太君”训话。潘德瑞的母亲不愿离家，立刻被日军拦腰砍成两段。潘风柱的老母已经 78 岁了，年老有病，不能动弹，被日军当场枪杀在床上。其他去不了的一些老人，也都被日军杀害。

全村 1000 多名男女老少被日伪军赶到西大坑，大坑附近的胡同、路口，都架上了机枪，大坑四周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伪军。佐佐木首先讲了“中日亲善”、“王道乐土”之类的话，然后就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到哪里去了？村里有谁反对过皇军？等等。

场上的群众怒视着敌人，缄口不语。

佐佐木等了一会儿，见群众没有反应，便气急败坏地下令从人群中抓出

一个青年，要他回答。青年大骂敌人，被日军一刀砍倒在地。佐佐木还不死心，又命令拉出几名妇女，想从她们身上得到点消息，结果仍是枉费心机。佐佐木恼羞成怒，下令日军挥动屠刀，将几名妇女全部砍死。

接着，日军在潘世良 70 多岁的祖母和南街来的 30 多人身上浇上汽油，点燃后用刺刀逼迫他们说话。他们哪里还说得出来，痛得直往坡上跑。这时日军开枪射击，将他们一一击毙。

随后日军又从人群中拉出 30 多名年轻漂亮的妇女，拖到白薯窖里去侮辱，逼迫其丈夫或父母说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去向。可是仍没有结果。于是日军把玉米秸填进窖里，放起火来。一阵惨叫声过后，窖里的妇女全被大火吞没了。

日军在大坑里迫害群众的同时，另一些日本兵和特务们在大坑的东南坎上发现了村民潘惠林家的院子。这院子四四方方，有二三亩大，四周有一丈高的院墙。佐佐木二即得此情况，想出了更凶残的主意。他命令日伪军在院中铺满松枝、柴草，门边围墙上架起机枪，四周墙上、屋顶上布满了岗哨，一个杀人场布置好了。

上午 10 时左右，村民们在刺刀的威逼下走进了潘家大院。

佐佐木抽出战刀，威胁说：“再不说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去向，就全部按通八路论处，统统死啦死啦的！”

老百姓仍然保持沉默。

佐佐木终于下令对老百姓下毒手了。

院中的大门被日军关上了。

人们见日军杀气腾腾的样子，知道将要大难临头，人群开始骚动。有 10 多个青年人拼命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但还没等他们靠近院门，就被把守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

凶残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人群扫射，还向人群中扔手榴弹。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们立刻涌向后门，想从那里冲出去。但日军的机枪又无情地挡住了人们的生路，人们一排排地倒了下去。突然，潘国生和 4 名青年趁敌不备，冲到一个端机枪的日本兵跟前，踢倒日军，夺过机枪。可惜他们不会使用，被一群日本兵围上来，乱枪乱刀杀死。

四周的步枪、机枪向人群猛射，尸体又把后门给堵塞了。人们见这里冲不出去，就转身奔向大院的东北墙角。

日军又把点着火的玉米秸扔进大院，很快引燃了院内的松枝、柴草，一时浓烟四起，大火冲天。人们在浓烟烈火、枪林弹雨中寻找着生路。潘树密的妈妈与一群妇女一起拥向院子东面，她见日军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正冒着黄烟，就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向日军扔去，炸死了 3 名日本兵。潘善续等奋力冲到门边，将守门的日本兵眼睛打瞎，冲了出去。潘辅庭等 20 多人冲进了东北角的仓房里，因仓房是泥顶，窗口又用土坯堵着，没被烧着。院内烟火弥漫，日军没有发现他们，这些人侥幸保住了性命。

有 50 多名老百姓挤进了潘家的牲口棚里，大火烧塌了屋顶，人们被压埋在下面，不是压死就是烧死。

大院墙外，还有一些没来得及被赶进院里的孩子哭声连天。日军抓起孩子就往院内火堆里扔，有的幼重在地上嚎哭乱爬，被日军像踩蚂蚁一样踩死。潘瑞高 6 岁的女儿被 2 个日本兵各抓一条腿，“嚓”的一声撕成两半。王贵不足 2 个月的孩子被一个日本兵扼死。更多的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起，向墙

壁和石头上摔去，墙上和地上到处是鲜血和脑浆。

大火从早晨烧到下午，日军的枪声从早晨响到黄昏。日军还在大火过后的尸堆里搜索着尚未死去的人，发现有奄奄一息的人，就补上几枪。有的还用手榴弹炸，直炸得血肉横飞。

天快黑时，日军又到村内大肆掠夺一番，临走时还放火烧了房

第二天，附近各村群众赶来收拾残杀场地，只见潘家大院里尸体盖着尸体，焦骨并着焦骨。潘正萱的妻子怀孕6个多月。肚子被日军用刺刀划开，胎儿横在她的肚肠上，她的半个头被手榴弹炸飞了。像这样惨死的孕妇还有10多个。院中小孩的尸体多得数不清，被炸断的小手、小腿，烧焦的小人头，到处可见。

有30多名妇女遭到日军轮奸后被戳死，日军还刺破了她们的下身，弄得肚肠拖出，脸上、身上沾满血污。

人们怀着悲愤的眼泪，把一堆堆难辨男女、焦枯的残躯残肢收敛起来，埋在4个坑里，起名“肉丘坟”。

在这次血腥惨案中，共有1237人被烧死、炸死和枪杀，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儿童，很多人家被斩尽杀绝。全村房屋被烧毁1100多间，财物不是被掠去就是被烧毁。

幸存下来的潘家峪人，永远不会忘记日军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

制造“无人区”1938年5月，八路军开始深入平北、冀东开创抗日根据地，并逐步向东北推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为了“确保满洲”，便将在东北实行的“归屯、并户”措施搬到长城线上。他们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焚毁很多村庄，残酷地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无人材”，搞所谓的“民匪分离”。

冀东长城线两侧“700里无人区”，是当时日军制造的最大“无人区”。1941年8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北平召集了兵团长会议，决定在冀东建造“无人区”。其范围西起古北口，东止山海关，共长35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广及滦平、承德、兴隆、平泉、凌源、青龙、密云、遵化、迁安9个县。

为了制造“无人区”，日军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了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围剿台击外，还专门组成快速部队，血腥屠杀无辜群众。

以兴隆县为例，1941年秋冬之际，日军在该县南部的前于涧村搜捕到男女19人，将他们的衣服全部扒光，用木棒打得血肉模糊，然后推进萝卜窖内全部烧死。在马尾沟，村内70多户人家，有一半多人被日军抓去烧死砍死，其余的人躲避到山洞里。于是，日军放出狼犬，到处搜寻人群，搜到后立即杀掉。有一个妇女背着孩子出洞寻找野菜充饥，被日军发现。15个日本兵抓住这个妇女轮流奸淫之后，又追问其他人藏在什么地方。她拒不回答，日军又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直到把她和孩子折磨至死。在栅子沟的一个村子里，日军杀害村民140多人。1942年，日军把大灰窑的80多人拉到兴隆城南的“万人坑”旁，在四周布好警戒，架起十几挺机枪对着群众扫射，80多人全遭杀害。随后，日军又杀害了该村60多人。

1943年初，日军到兴隆城东南100华里的揪木林村“扫荡”。他们挨门挨户搜捕，见青壮年男性就抓，有2个小伙子由于反抗而被当场打死，其余的99人被装上4辆汽车押往县城。前面两辆车装的56人被送往监狱，这些

人在监狱受尽折磨,先后死去。后两辆车装 43 人,被直接送到城南“万人坑”,用机枪扫射。42 人当场死去,只有一人中弹后受伤,深夜逃出,回到家后因伤势过重而死。楸树林村有近一半人被杀,成了一个“寡妇村”。在兰旗营村南的土坑下,日本宪兵一天就用刺刀挑死了一百多群众。

1943 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主力 4 万之众,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西阜平一带的北岳区发动长达 3 个月的大“扫荡”。其属下荒井部队 500 余人在阜平县平阳地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是要制造一个“无人区”。荒井曾扬言,这次大“扫荡”,就要“杀个鸡犬不留”!他们在长 60 余里,宽 40 余里的平阳近百个村,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一个怀孕 7 个月的妇人被敌人捉住,带到荒井那里,荒井和他的翻译官打赌,一个说怀男,一个说怀女,争论不休,荒井便命令其部丁剖腹查看。在杨树沟,有个 60 多岁的老太被日军抓住,刀刚后扔进火里烧死。在山嘴头,日军打死放羊的韩小更,挖了他的心带回踞点炒了下酒。在北水峪,日军抓住孟祥的儿子,将他捆起来,然后叫狗咬。凶恶的狼狗嚎叫着扑到孩子身上,一口一口将他的肉撕扯下来,孩子被活活咬死,在旁的日本兵却狂笑不止。日军在搜山时抓住一个 20 余岁的青年,将他的衣服扒光,用绳子拴住他的生殖器,拉着在山上乱跑,最后拉到村子里,用锥子活活扎死。在上平阳村,日军将 20 岁的孕妇王金亭的衣服扒光,按在一口红木棺村里,用刺刀逼着 20 余名妇女脱光衣服,围在棺材四周观看。日本兵将她开膛破肚,摘出血淋淋颤动的心与肝,挖出已成形蠕动的胎儿,还把心用脸盆端走加油炒熟,逼着被抓的妇女吃掉。凶恶的日本兵威胁说:“你们谁不吃,就和她一样死啦死啦的!心的炒了吃!”

日军对妇女的侮辱,凶残至极。在山嘴头村,有 250 多名妇女被奸污。一个 16 岁的少女,被一群日本兵抓住后,轮奸了整整一夜,致使皮肉肿烂。有很多人被当众轮奸,然后加以残杀。日军撤退前抓到 60 余名妇女,把她们绑在一起,问她们:“你们愿意跟着走,还是愿意回家?”妇女们一起回答:“愿意回家!”结果这些妇女全被扒光衣服强奸,之后又全被砍头杀害。

据统计,日军在平阳扫荡 87 天,杀害村民 1100 多人,烧毁房屋 5200 多间,抢掠粮食 18 万斤,牲畜 1200 多头,衣物 4000 余件。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制造“无人区”时,如搜捕到抗日军民,屠杀手段极其残忍。罗峪村妇联主任刘耀梅被捕后送到荒井那里,荒井审不出名堂,就命令汉奸剥下她的衣服,亲自将她大腿上的肉割下来、让人烤熟,用刀叉起一块,边吃边说:“好吃,好吃。”随后,荒井还指使日本兵把刘腿上、胳膊上、胸脯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烧熟后逼抓来的群众吃。许多群众都难过得流下眼泪。日军抓住兴隆县大西山村的村长,把他剁成了碎块。双庙踞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先后挖吃过 50 余名抗日军民的心。抗战 8 年中,日军在太行山区就杀害 17 万余人,奸淫妇女 36 万余人。

冈村宁次的华北方面军在制造“700 里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暴力、刺刀逼迫老百姓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迁入变相的集中营——“集团部落”。

对于那些不进和延误期限迟进“集团部落”的人,日军见一个杀一个。还把们规定的“无人区”里的房屋烧光,财物抢光,甚至树木也要烧光,造成一块开阔地,使人无法藏身。“无人区”方圆几十里内,见不到一个人影,见不到一丝炊烟,听不见一声鸡鸣犬吠。田野里长满蒿草,村村镇镇只

见残垣断壁。乌鸦在空中盘旋，饿狼在草丛中穿行。

在“集团部落”里，日军用各种法西斯恐怖手段，把老百姓像牛羊一样圈起来，并对他们横加奴役迫害。人们愤怒地把这种“部落”称为“人圈”。

“人圈”四周是高墙，墙上架满电网，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筑有碉堡，由日军严加把守，限制出入。“人圈”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日军规定由各户自建住房。老百姓被赶进“人圈”时，财物已被搜掠一空，哪有力量盖房？只好搭个马架子窝铺。冬天风雪袭来，四面通风的窝铺冰冷彻骨，很多人被冻伤冻死。仅兴隆一县，几年中就冻死 1000 余人。到了夏天，遍地污水粪便，泥泞发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虱子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广为流行。1943 年夏季一次瘟疫流行，兴隆县就死亡 6000 余人。遵化县新立村一个“人圈”，因传染病而死亡者达 530 余人。那时节，家家停尸，户户嚎哭，十分悲惨。当时“人圈”中流行着一首凄惨的歌谣：“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

被赶进“人圈”的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由于“人圈”周围被划定允许耕作的土地少得可怜，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被占用来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因此真正能租到或借用的土地微乎其微。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老百姓只能靠极少的收成过日子，连橡子面、谷糠也不能吃饱，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兴隆县大水泉的“人圈”一年内就饿死 200 多人，占全圈人口的 20%。厂沟的“人圈”两年内饿死 265 人，占全圈人口的 38%。

日军对“人圈”控制极严。“人圈”内实行保甲制度，30 户为一保，10 户为一甲，有些地方甲下还设有牌，分别设保长、甲长、牌长，有一人出事，就互相牵连。还要老百姓参加“自卫队”、“协和会”、“道德会”之类的组织。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规定要服劳役，包括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封锁沟、上圈墙守夜。许多人不堪重负，劳累致死。日军在“人圈”内实行“大检举”制度，经常有人被加上“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偷运犯”、“可疑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有时“大检举”后就进行集体屠杀。1942 年至 1943 年，日军在兴隆搞了两次大检举，有 11400 多人被日军抓去后枪杀，其中一些人被刑杀、监毙或被狼狗咬死。

日军在对“人圈”内男性老百姓大肆屠杀的同时，对妇女则百般凌辱，奸淫妇女竟成了公开合法的事。日军勒令人们必须“门户开放，夜间也不得关闭”，以便他们任何时候都可到老百姓住宅去奸淫妇女，如稍有不从，就会被扣上“通匪犯”的罪名遭到杀害。妇女因不堪侮辱而自杀或因抗拒侮辱被杀的事，屡屡发生。据一个“人圈”的统计，十之八九的妇女遭到过侮辱，有很多人无数次地遭兽兵奸淫。在被侮辱的妇女中，患性病者高达 30%。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确实用尽了一切最残酷的手段。

第三章 大江南北的血河

长江中下游的华东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鱼米之乡，自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垂涎已久的目标。因此“七·七”事变后仅一个月，日本就迫不及待地以重兵在长江口登陆，力图一口吞下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大江两岸的生灵难逃血光之灾了。

一、流血的大上海

在炸弹与刺刀下，大上海遍体鳞伤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在上海地区疯狂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战争初期，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到处狂轰滥炸，使城市变成废墟，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上海原有两个火车站，“八·一三”以后，北站处于战区，交通完全断绝，南站就成了陆路交通的唯一出口。当时上海及其附近的难民蜂涌而至，争相出逃，使南站拥挤不堪。

8月28日下午2时许，日机疯狂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第一批4架日机投弹炸死难民500多人。不一会儿，又有8架日机在站内投弹，又炸死200多人。当时，炸弹的爆炸声、站屋的倒塌声、人们的惨叫声混成一片。有的人刚走几步就倒下去了，血从创口像喷泉般地射出来。也有的人跌倒还想爬起来，然后又倒下去，伤口汩汩地冒着血。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与伤残群众。母亲死了，孩子还要母亲给他喂奶；孩子死了，母亲不忍抛弃孩子，抱在怀里痛哭不已。这种情景，比比皆是。房屋在燃烧，黄烟烈火直冲天空，天桥、月台、铁轨被炸得稀烂，电线杆也横倒了。此情此景，使人惨不忍睹。日机投下的燃烧弹还使南站外的郑家桥等地起火，延烧甚烈，直到傍晚才被救熄。

以后日机经常轰炸南市，大东门、大码头、南栈一带大火数日不熄，斜桥的火一直烧到海潮寺，直径3里方圆之地，尽成废墟。南市的大火一望无涯，吞没了无数幢房屋，融化了无数同胞多年的血汗，葬送了无数人民的生命。能逃出的难民既无财产，又无家可归，只能流落街头。

老北门附近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上，挤满了2万多难民，扶老携幼，站立在街头，几乎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他们在这儿已几天几夜没有吃喝了。

国际救济会向南市难民赠送馒头。发馒头的人来了，人群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产妇，伸出一只虚弱无力的手要取馒头，她的裤子被鲜血染红了，身边躺着一个紫红色皮肤的死婴。当馒头送到她面前时，她已饿得昏死过去了。有个被打破脑袋的青年，一下子跑开去，用淋湿了的衣服揩净了脑袋上的血。一会儿，他从人群中跑了回来，两手空空，馒头已发完了，他的脑袋上冒出了更多的血……

1937年10月4日夜，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嘴、金山卫一带登陆。日军上陆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沿途村庄变成一片火海，其中汀南、倪家、新江、海光、卫东、杨家等村受害尤甚。

在倪家村，日军闯入孕妇姜杏多的家，立即纵火烧房。姜杏多拖着2岁的儿子急忙往外逃，日军见了，硬是将母子两人往火堆里推，将他们活活烧死。日军抓住吴顺宝的两位叔叔，将他们押至海塘上刺死，并将他们的内脏

也挑了出来，还将姜连生等 9 人绑在一起，集体屠杀。在卫东村，日军开枪打死了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李泉宝。在杨家村，日军闯进裴引宝老太的家，把他的儿子从床上拖下来，一刀刺死。接着夺过裴引宝手中 3 岁的小孙子，用刀将他劈成两半，最后又杀死了裴引宝。在向阳村，日军拖出躲在稻田里的朱家和等 3 人，扒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押到农民胡阿四的家中，砍去他们的四肢，连同身躯都堆在织布机上，然后放火烧房，将 3 人烧死。日军在村庄上还恣意强奸妇女，仅倪家、卫东、杨家、海光等 4 个村庄，就有 121 名妇女遭奸淫，其中很多人最后被杀害。在山阳一带：日军杀害无辜农民 351 人，烧房 4177 间，杀死耕牛 708 头，田中大片水稻棉花也被烧成灰烬。

11 月 5 日 10 时许，金山卫沦陷，卫城南门口内外的朱海、南门两村首先遭难。日军把守村口和道路，挨户敲门，把村民赶出屋外，或推入河中淹死，或绑着推入火中烧死，或赶到城门下枪杀。一时间，老人小孩的呼叫声、哭喊声、怒骂声和日军的枪声、狞笑声，汇成一片。日军在两个村中杀了 71 人，烧房 94 间，卫城内外烈火熊熊、尸横遍地。南门外村陈主堂家，除一名 9 岁的小孩在外幸免，其余 8 人全部被杀。南门口内村沈春泉一家 10 人，全被杀光。日军又转至西门城口和西门外的村镇杀人放火，在西北村，将潘阿木头、腰、肩、腿部连刺 5 刀。在西门镇北，将鲍迪卿等 12 人砍杀，后又推入泥坑，还烧房百余间。在西门外黄弄村，用机枪扫死盐民黄赖和。

城内十字街的熊阿大在路上被日军一刀劈在脸上，脸皮挂到了颈边，当场昏倒，日军走后他苏醒过来，忍痛爬回家。第二天，又一批日军闯到他家，把满脸血污的他拖到塘边戳死。60 岁的吴小如夫妇被捆绑后投入火中，双双烧死。

11 月 8 日，日军在金山卫北门外仓头村，将奚斗树夫妇以及他们 3 岁的儿子杀害后抛入鱼塘。又刺死沈金祥和他 60 多岁的母亲，抛入鱼塘。侮辱孕妇董金宝后连同她 3 岁的小孩一起抛入塘中。这名叫“赤旱塘”的鱼塘，竟成了日军的“杀人塘”，共有 32 人被抛入塘内。

在日军侵占主山卫的最初三四天内，烧房 3000 余间，杀害 1000 余人。日军所到之处，还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所犯罪行，惨绝人寰。

1940 年 4 月 14 日至 27 日，日伪军 4000 人对青浦抗日根据地凤溪、陆家角、刘夏周围进行毁灭性大围剿，杀害千余人，很多村庄被烧成焦土。或变成“孤寡村”、“无人村”。

在观音堂镇，日军将朱阿虎等 17 人押至朝阳门，先叫他们挖一个齐腰深的坑，再用刺刀将他们戳死在土坑内。

在章家角，将章伯荣等人架在浇上火油的稻草上，活活烧死。

在嵩子庙，日军用火钳在王湘涛脸上烫，还将他吊起来，下面用火烧，最后用刑至死。日军还将他怀孕妻子的肚子戳穿，将他 7 岁的儿子刺死，刺刀从口中刺入，把头分成两瓣。

在秦家湾，日军抓住朱其昌、朱阿六，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他们杀死，还剥光他们母亲的衣服用刺刀刺死。抓到王辛如，用铁钉把他的头钉在长凳上，再灌水，最后对准他的耳朵开枪致死。将秦阿二的父亲绑在石头上，沉入官路浜河中。

在陆家角，日军将 15 人押至大坑边，两个日军用刺刀将被害人一个个戳死在坑内。

在横港村，日军叫人烧大量开水倒在大缸中，将抓到的人扔入缸中烫死，

或用烈火烧死。

在徐家宅，日军扫荡三天，临走时将村中所有房屋、粮草、牲口等全部烧光。

在南崧塘，日军连续杀了 96 个人，有的被抛入开水缸中，有的被戳死在土坑里，有的抛入河中，河水亦被鲜血染红。

从打铁桥到刘夏，日军烧了 20 多个村庄。整日大火，浓烟滚滚，仅赵巷、徐径 4 个村庄，就烧了 1600 余间房，还到处刺杀、枪杀村民，日军还放出狼狗撕咬村民的尸体。

在张家浜，村中共 18 户人家，有 17 户人家遭难，其中很多是满门遭杀。

……

大上海在呻吟、在流血。

二、惨案累累的江苏

无锡、江阴、扬州、盐城……十室九空

江苏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当日本侵略军直扑南京之时，沿途的城镇乡村就难逃蹂躏了。

太湖明珠的苦难无锡地处宁沪杭三角地带，风景优美、工业发达。境内有大运河与京沪杭铁路及几条公路，交通繁忙，成为附近农产品和生丝的集散地，人口 90 余万，商业兴旺，是太湖边上的一颗明珠。

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一路西行。为了打通进攻南京的道路，日本的海军航空兵开始频繁地出动飞机对无锡进行狂轰滥炸，大批民房、工厂、学校、医院被夷为平地，居民伤亡惨重。10 月 28 日，一架日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一个防空壕，当场炸死 40 多人。

由于日机连续不断的主袭，日军地面部队也日益逼近，无锡居民纷纷弃城外逃。拥挤在车站、公路的难民潮更成了日机袭击的目标。

11 月 21 日，苏州方向的日军从望亭出发长驱直入，沿京沪铁路西行。从常熟开来的日军西泽师团和其他部队渡过河网地带，也接近了无锡。

日军前锋在 21 日下午受到无锡外围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至日薄西山时，战斗暂告段落，双方偶尔对射些冷枪冷炮。

日军一个连队的几名官兵挤在堑壕里一起吸烟聊天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哭泣声从一间平房里隐隐约约地传出来。他们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位姑娘抱着她母亲的尸体在哭泣。

他们嫌这哭声烦人，起了杀心。一名日本兵像疯子一样，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对着姑娘的胸膛连捅三刺刀。其他士兵也用自己的刺刀不管是头还是肚子，乱扎一通。没有几秒钟，姑娘就倒地死去了。士兵们因兴奋而涨得通红的脸上溅满了带有腥味的、温乎乎的鲜血。

第二天上午，这几个日本兵在执行任务时，又在一条小河边看见有个婴儿伏在一个死去的女人身上哭。他们端起了枪，对着那婴孩放了一枪，婴孩的哭声就停止了。

日军杀中国平民百姓简直比杀只鸡还随便。

11 月 27 日，无锡失守。日军打着太阳旗，趾高气扬地开进无锡城。

日军进城后就开始进行大屠杀。阊口桥一带躺满了被日军残杀的尸体，

有的四肢不全，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半个身体在岸上，半个身体在河中。很多女尸下身赤裸，有的被挖去眼睛，有的被割去双乳。还有很多小孩的尸体，其中有些被劈成两半。屠场情景，惨不忍睹。从日军占领无锡的最初二三天内，仅从闸口到吴桥一段路，被杀无辜百姓的尸体就达 2000 余具。

在屠杀无锡人民的同时，日军还进行了有组织的全城洗劫。将各机关团体有用的物件、各布厂的布匹、各商店的货物、各旅社的家具，统统抢掠一空。各纱厂、铁厂的机器和设备，重要的先行抢走，其余的封存，准备以后再运回日本。

日军在无锡的奸淫暴行更令人发指。城内有一绅士家中有 6 名女佣，年龄都在 50 岁以上，竟全部被奸污。丰庆纱厂一个职员因孩子有病，来不及逃走，日本兵到他家中见其妻子，就要强奸。她拼死不从，日本兵恼羞成怒，举刀将夫妻两人全部杀死，然后放一把火把房子点燃，他们病在床上的女儿和一个吃奶的孩子都被活活烧死。有些妇女死后尸体还遭到日军野蛮的侮辱。

日军在无锡屠杀抢劫之后，就开始大规模地纵火焚烧城区。烈火借着风势逐街逐巷扩展，以致整整烧了 7 天 7 夜，火光和浓烟 30 里以外都能看见。这场大火使无锡的繁华城区、文教机构、工厂商店、仓库民宅、名胜古迹等，大部变成废墟。无锡周围的郊区也遭日军的烧杀淫掠，洛社、石塘湾、东亭镇等十几个村庄，全部被日军焚毁。

无锡，这颗太湖边上的明珠，被日军涂满了鲜血。

刺刀下的江阴江苏省江阴县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江边没有炮台，扼守着长江下游的水道。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为防止日军溯江而上，中国海军的舰队又在长江的咽喉要地江阴建立了水上封锁线。淞沪抗战后，这条封锁线成了日军西进的重要障碍。为此，从 8 月中旬起，日军的飞机对据守此线的国民党中央舰队和江阴军事要塞发动了猛烈轰炸。中国海军予以英勇反击，展开了为期 3 个多月的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海空作战。

日机的轰炸很快蔓延到了江阴县城。从 8 月 14 日起至 11 月底 3 个多月里，日机几乎每天都要到江阴上空侦察轰炸，出动飞机最多的一天达 96 架次。日军飞机轰炸民房，用机枪扫射无辜平民，给江阴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害。在一次轰炸中，城中东大街石灰行地下室中弹塌陷，炸死、压死多人。北外闸桥西首芦苇场某户一个 10 余岁的男孩卧病在床，日机机枪扫射时子弹穿透屋顶而下，小孩的腹部被击中，当场死亡。一次，一批青壮年农民集中在肖山操练，突然 5 架日机飞来，对着人群扔下 10 余枚炸弹，场上人员躲避不及，结果被炸死 30 多人，伤者更多。一时间，血肉横飞，惨叫声不绝。11 月 26 日，日军飞机轰炸江阴县城，城中张桥、燕桥、砚春茶桥、惠陞商店、招商旅馆等地毁损惨重。

日军从长江占领江阴要塞的企图并未得逞，但陆路的西进取得了进展。随着战事的发展，日军相继占领常熟和无锡，分兵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国防二线”，江阴城面对着日军的包抄进攻。11 月 28 日至 30 日，国民党一二师三三六旅在江阴城外的花山地区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使日军损失惨重。但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中国军队最后撤走，江阴亦从此失守。

日军占领花山后，即在当地进行疯狂的报复。花山山北的计家湾，曾是中国军队的兵站，日军攻下花山后，将该村所有男女老幼总共 47 人全部枪

杀，尔后又将村庄烧成一片瓦砾，计家湾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1937年12月1日，日军从江阴南门和西门进城后，疯狂地屠杀江阴人民。他们把机枪架在卡车上，在大街上边驶边射，横冲直撞，来不及闪避的同胞都死于乱枪之下。城中大街小巷的人只要被他们看见，不论男女老幼，休想活命。在新北门、黄田港等许多地方，日军采用了机枪扫射、集体屠杀、把人员集中关在屋中放火焚烧等方式杀害群众。日军进城的最初几天内，就有千余人被杀。城内城外到处尸首横陈、血迹遍布。原先住在西门城角及南街一带的老弱妇孺想从西门外逃，结果全被日军杀死在城门洞里。街上危险，家中也不安全，日军有时会闯门搜查，见人必杀。杜康巷（今征存路）红十字会内，躲藏着52人，被日军搜查发现，即令排在空场上，用绳索捆绑，随即以机枪扫射。其中包车工人小许的儿子阿虎、闻枪声即倒伏在地，佯作已死，得以幸免，其余的人全被杀死。驻扎在南门忠义街花承祖家的日军，有一次抓到19名青年，强迫他们为其杀6头生猪和十几只鸡鸭。完工后，日军竟将这些青年的手脚捆住，活活砍死。家住城南的张丽纪，其三叔被日军抓去，用铁丝穿过手心拖着走，痛得他死去活来，最后被杀。东门外的沈主仁被日军砍去一只手臂，在地上呼痛哀号，三天后才死去。十六庵有个和尚被一日军砍去四肢，一时痛得在地上翻滚，另一个日军上去放了一枪，把和尚打死了，事后还指指菩萨，翘起大拇指，以示自己很“慈悲”。日军杀了人还不准老百姓收尸和打扫，妄图以此恐吓江阴人民，街头巷尾的尸体被日晒夜露，直到2个多月后才准许掩埋。

日军在江阴大肆奸淫妇女。当时留在城里没有逃走的妇女，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很少有不遭日军侮辱的。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城郊大吴家村有一吴姓的媳妇被日军轮奸后想投河自尽，但日军又把她从河里捞起来，再次轮奸，直至被摧残至死。日军强奸扛煤工人刘大炳的妻子后还百般戏弄，最后用竹杆插入其阴户，将其杀害。一次，日军在西乡小茅山上的庵中发现在此避难的数十名妇女，其中年轻的妇女均遭日军凌辱杀害。

日军进江阴后还大肆抢劫金银财物，全城工厂的机器，学校的书籍、仪器，商店的货物，住宅内较好的家具、铜锡器皿、名贵书画、古玩，只要日军看中了，就立即搬走，到后来连百姓家中挂的祖先遗像也当作字画掠走。江阴沦陷后的一个月里，江阴至无锡的公路上卡车不断，日军把大批劫掠来的赃物运往无锡、上海，然后再送往日本国内。日军占领江阴期间，财产损失最大莫过于火烧。日军进城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有计划的纵火，他们组织了“烧杀队”，在江阴大街上到处放火，逢人便杀。见有稍好一点的房屋，就进屋抢劫，然后在外面写上醒目的“应征”字样，“应征”即应烧，马上就有人夹放火。放火的地方一多就连成了一片。顿时，江阴城成了大火场，浓烟弥漫，烈火冲天。大火绵延燃烧，半月不息，共烧去城内房屋千余间，使昔日繁华的东大街，从方桥到高巷一段，变成了一大片瓦砾场，城内到处断墙残垣。石子街郭炳之家被烧掉房屋22间、宋阿炳一家父母被害，烧掉16间房屋。东门至县政府一段。约有二三百间房屋被烧毁，其中包括江阴著名的天章缎店、宏泰源南货店、善泰源钱庄等。城西被烧毁的房屋达617间。

一些工厂，公司、机关、学校的房屋财产也毁于一炬，如天纶布厂除几间烧饭的厨房外，全部房屋、财产都毁于这场大火，其中包括一百多台织布

机、轧绒、浆缸、染缸等设备。江阴商办电话公司交换所楼房烧塌，楼内 400 门电话总机被烧毁，仅留下总机的铁座脚和两只架总线的大铁架。南菁中学 5 幢楼房被烧毁，楼内由南菁书院遗留下来的、收藏了 80 多年的 3 万册图书，还有一部堆满 3 间房子、颇有价值的《皇清经解续编》全套木板都化为灰烬或散失。征存中学约 2 万册图书亦烧毁散失。南菁、征存两中学还有 10 多组当时珍贵的高中物理仪器、几十组化学仪器、钢琴、10 多架高倍显微镜、很多珍贵的生物标本都在大火中损失殆尽。县中大礼堂和 40 间教室、寿山小学全部校址都被烧毁。

除了这次大火，日军后来还经常在江阴城内纵火烧房。抗战 8 年期间，除了 1937 年 12 月的这场大火，日军还在江阴烧毁了近千间房屋。

日军侵占江阴期间，还对江阴周围的村镇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淫掠：

1937 年 11 月 26 日早晨，有个叫徐惕三的医生在江阴郊外去塘头桥的路上碰到日军。日军先在他身旁发了一枪以示警告。接着，3 个日本兵把他扯去，满身搜查，查到法币 200 元，马表一只，包裹一个，围巾一条，手中一方，记事本一本，悉数掠去。红十字袖章被一个日军扯掉。接着，在他肩背上套上了笨重的弹药箱，权充民夫。

日军每到一个村庄，总要搬些凳子农具，或打毁些织布机，戽水车等木器，堆在场上生火取暖，有的搜寻食物，有的拘捕村民。一次，日军在一村庄中见到一个穿西装的中国人，看上去像过路人，却避在一户农民家中，就一把拉出，不问情由，劈头就是一刀，那人立即横倒于阶下。见农家中带有带壮丁符号或着壮丁制服者，亦不问情由地刺死或枪杀。临走时把坛坛罐罐都打破，在稻堆上放火，再烧掉一些房子。

1937 年 11 月 27 日，日军占领江阴县南的青阳镇后，烧毁镇上房屋 200 余间。万源布厂有 17 人被日军缚在一条绳上，然后用机枪扫射，仅一名学徒闻声仆倒而逃脱。劫后的青阳镇到处是焦垣残壁，幸存的房屋也十室九空。

花山嘴地区的转奚村、朱家村、徐关杨三村、胡家村、卢家村、曹鲍村，以及周家湾等 9 个村庄，位于日军与中国军队交战场所附近，日军击退中国军队后进入江阴县城，但对这一地区怀有刻骨铭心之恨，必欲灭之而后快。

1937 年 12 月 3 日傍晚，10 多个日本兵闯进了转奚村。年轻妇女卫二妹正准备给日军拉夫逃回来的丈夫曹云坤吃晚饭，抬头发现七八个日本兵径朝她家走来，连忙放下手中的碗筷，推丈夫躲上阁楼。日本兵发现卫二妹，顿时发出狂笑，饿狼般地向她扑来，把她按倒在地，欲行强奸。卫二妹拼死反抗，日军见不能得手，恼羞成怒，竟拔出刺刀，猛地扎入卫二妹的心口。卫二妹惨叫一声，胸口鲜血如泉涌出，喷得地上到处都是。她的一个年仅 3 岁的儿子，哭喊着奔向妈妈，手人成性的日军竟提起孩子的小腿，狠命地往地上一摔，这孩子顿时脑袋开花，惨死在日军的魔掌之中。日军最后又在阁楼上搜出曹云坤，将其杀害。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转奚村的鲍锦才家也发生着一幕惨剧。4 名日军闯进他家，鲍锦才与其兄慌忙躲藏，他们年方 17 岁的妹妹和两人的妻子均遭奸污，然后杀害。兄弟两人也被日军搜出后枪转奚村是个仅有 37 名村民的小山村。这天夜里，全村竟有 30 多人遇难，仅有几名老年妇女幸免。村上 18 间房屋也被烧成一片瓦砾。在这之后，花山咀的朱家村、徐关杨三村、胡家村也先后遭到日军的烧杀血洗。

周家湾村位于中花山的北坡，当时有 120 余名附近的村民在村中避难。

12月3日晚上10时许，10余个日军队西沿山闯进村中。村中天主堂的吴神甫和高神甫认为只要充当日本人的“顺民”，就能瓦全山乡。于是两人手执小太阳旗，带领数名老人到路上迎接。一个身佩指挥刀的军官用奸诈的目光对他们看了看，突然皮笑肉不笑地转向高神甫发问：“这里，花姑娘的有？”高神甫为难地与吴神甫交换了一下眼色，摇了摇头。这个军官顿时拉长了脸，劈手就打了高神甫几下耳光。几个日军上来。把两个神甫架到了天主堂门口。日本军官“霍”地抽出指挥刀，当场把他们一一劈死。接着，日军又从教堂里拉出了翟生和、翟生宝等7个村民，用刺刀把他们戳死在教堂后面的山地上。日军随后又进教堂搜出一名中年妇女翟某，用带血的刺刀威逼她脱光衣裤。一个日本兵上前，用刀尖拨弄她的下身，在旁的其他日本兵发出阵阵狞笑。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几个日军开始在天主堂内和村中用硫磺枪放火。不多时，天主教堂与村中的60余间房屋都被点燃，烈焰腾空，火光冲天，周家湾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与周家湾遭难的同一天，100多个日军闯进了花山北麓的曹鲍村。这是一个仅有30多间房，40多人的小山村。下午1点多，几个日军在村头发现了一件废弃的旧军装，于是怀疑村上有“支那兵”，立即将全村男女老少，包括几十名外来逃难的亲友，全部关押起来。第二天上午，荷枪实弹的日军把这些无辜的百姓全部押到场上，然后将妇女和小孩驱赶到村西的一个土堆上。接着，数十个日军将剩下的42名男人全部用绳子背靠背捆绑起来，锁进了村民周林根的3间独宅屋子里。屋子四周堆满了门板柴草，并在上面浇了汽油，几个日本兵上前放火。刹那间，屋子四周燃起熊熊烈火，屋内呼喊声、哭骂声响成一片。此时，有个名叫曹云才的青年奋力挣断了绳子，推倒了墙壁，从烈火中冲了出来。丧心病狂的日军竟用刺刀在他的腰背部猛扎，再将他推入火海。这一天，曹鲍村除了2个小男孩幸存外，全村所有在家的男子全被日军活活烧死，其中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17岁，从此曹鲍村成了寡妇村。

离日军驻地较近的高家弄、黄石桥和钱家村的老百姓听到日军在转奚村、朱家村等地杀人的消息后，纷纷逃到偏僻的卢家村避难。短短一天时间里，卢家村的卢永生家10多间房屋挤满了百多名男女难民。但偏僻的卢家村并没能免遭日军摧残。12月5日，日军来到卢家村，发现了卢永生家里的难民，就用麻绳把其中102名男人绑成一串，一起押到村西的大塘河岸边，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到2个小时，102名手无寸铁的农民全被日军残杀在大塘河边，原来清澈见底的河水，此时已变成了一条可怕的血河。

扬州屠城扬州为苏北之门户。日军要占领苏北，必先攻下扬州。历史上的扬州曾遭过屠城之灾，当日军兵临城下之际，扬州又一次在劫难逃了。

1937年12月14日，日军天谷支队由施家桥两江口先后登岸，循镇扬汽车公路猛扑而上，攻破了中国保安队与驻防仙女庙镇的东北军缨毁流部布置的防线。

日军进城后，每过一街头巷口，即用机枪扫射，居民屋顶上之响声如降冰雹一样，屋瓦与子弹一齐乱飞。城内秩序大乱，街口巷尾，遍地皆是饮弹丧命的尸体。

日军接着在绿场旅馆设立了临时司令部。

当时，扬州城有来不及逃走、及顾念产业不愿迁避和无力逃走者几万人。第二天拂晓，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逐街逐院搜杀，所到之处，

无一幸免。大宁寺内有中国军队重伤员五六十人，尽被枪杀，寺中7个和尚亦全部被杀。福缘寺和尚数十人乘船逃难未成，也全部被害。当晚，日军经过一条深壕，恐遇埋伏，就向弄口开枪，枪弹碰到坚固的墙体回弹，打死了一名日军。日军以为城内有便衣队，一遇人影，不论男女即开枪乱击，或者用刀刺杀。日军攻占扬州的头3天，杀害无辜市民就达500余人。在日军攻占扬州城后，一部分日军由凹子街经万福桥到达了仙女庙镇。在途经二道桥时，用机枪射杀手无寸铁的乡民数十人，一时间道旁河畔，尸骸枕藉，河水也为之变赤。

在扬州东郊万福村，日军杀害了100余名无辜村民。其中有几个造桥工程人员，日军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反剪双手，用刀在腿上、胸脯、肩头上块块割肉，直到他们的肢体分离，白骨显露，痛苦万分地死去。

12月17日，扬州日军抓了400余民夫，逼令他们搬运物资到仙女庙。事后，日军给每个民夫发了路票，叫他们循原路回家。民夫返城途中到达江家桥时，桥边一队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站在那里。日本兵令民夫排成队，交出路条，接着又把他们押到万福村边的万福桥上。这万福桥长达406米，当民夫们走到桥中间时，日军预伏在桥两头的机枪同时开火。只见无路可逃的民夫们一排排地倒下去，惨叫声、怒骂声、机枪声混成一片。仅一支烟的工夫，400多个民夫、除一个叫卞长福的跳水逃生外，全部遇难。

在仙女庙镇，日军在每一巷口皆竖有“禁止通行，出入者杀”的木牌，每牌之下，仰伏尸身，少者三五具，多者十余具。镇上人家，几乎家家有骨肉残缺。

日军在扬州城到处搜索妇女，不论老幼，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抓住妇女就强行奸淫，奸后被杀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尸体还被残害。仅日军占领扬州的第一周就有600多名妇女遭难。

扬州城内有妇孺收养所七八处，除法国天主堂办的一所未受骚扰外，其他几处的妇女都惨遭凌辱。日军在扬州还命当地“自治会”招妓供日军淫乐。

在仙女庙镇，有很多妇女来不及逃避，遭日军轮奸杀害。日军还在一所巨宅内囚禁了30余名年轻的中国妇女，以供日军日夜蹂躏。一些日本军官要求仙女庙镇的浴室招60名女擦背，有时日本兵还随便拖女子入浴室共浴。

日军在扬州大肆抢掠，所到之处，十室十空。日军抢劫特别钟情于富户，其中汪鲁门、贾颂平、谢箴斋、钟味嘏等几家损失惨重，各家均十几次遭日军搜掠，一批去后一批又来，几乎络绎不绝，连“自治会”委员们的家也不能幸免。

日军在扬州还随意纵火，闹市中各家书局与文化机关均遭焚毁。在仙女庙镇，大批民房被日军焚毁，致使很多人无家可归。

扬州这座名城，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得遍体鳞伤。

“小上海”的毁灭盐城位于苏北，经济繁荣，素有“小上海”之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新四军的军部所在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它也曾遭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野蛮践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4月25日，一群日本轰炸机由南向北掠过了苏北通榆一线，不停地往下扔燃烧弹。顿时，盐城南北数十里烈焰突起，火光冲天。数不清的民房、店铺在烈火中燃烧，大片大片地倒塌。人们有的绝望地嚎哭，有的悲切地呼唤，有的愤怒地诅咒，悲恸和恐怖气氛一时笼罩着古城。

侵入苏北地区的日军少将佐藤正三郎指挥一师团，共5个步兵大队

和1个野炮大队，由如皋向北出动，先后洗劫了海安、东台等地。4月26日清晨，日军以轰炸机开道，进犯盐城县境，县城南面的重镇伍佑首先遭到日军蹂躏。

伍佑是个千年古镇，镇内店铺、粮行、盐行众多，街道繁华，屋宇鳞次栉比，是盐城的一个商埠、海港，粮、棉、盐的重要集散地。

日军一到伍佑，即在镇内烧杀抢掠，日机的轰炸，顷刻之间使伍佑南北4里长街变成了一条大火龙，房屋大片倒塌，财物毁于一炬，人们慌乱地四散躲避。日军进镇后，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居民近者被刺杀，远者被枪击。一伙日军窜到居民宋吉安家要“花姑娘”，宋吉安听不懂日军的意思，刚摇了摇头，凶残的日军即用刀将宋劈杀，把他的肚子也刺破，挑出肠子，扔出很远。一个姓王的妇女被一伙日军团团围住，要对其施以兽行。她不从，即被扔入火堆，当她挣扎着冲出火堆，又被日军抓住，重新投入火堆，活活烧死，一个姓吴的年轻妇女被2名日军拖至居民蔡玉得家中轮奸。其中一名日军被愤怒的居民当场杀死，另一名慌忙逃走。不久，他带来大队日军，抓住居民刘占子等16人，先强迫他们跪于日兵尸体四周，然后逐一用刺刀戳死，进行活祭。伍佑角便仓居民51人，被日军掳去拆房筑碉堡后，全被押至一座破墙框内用刺刀刺杀。

26日下午，日军一师团的白尚小川联队小林小队300余人，在进犯盐城途中，一路烧杀。马家庄共有32户居民，其中28户的房屋被烧，被日军抢去猪、牛数十头，鸡鸭数百，衣物无数。村民陈广福、李庭香被日军抓去毒打后惨遭活埋。

26日黄昏时分，日军侵入盐城城区，在东西大街肆意纵火，投放燃烧弹，并劫掠财物。一时间火光冲天，数十里外都可看见。全城成了一片火海，无数名胜古迹、楼台亭榭毁于一旦。南宋末年民族英雄陆秀夫公祠，规模宏大，文物众多，被劫被烧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门楼。盐城西问著名的登瀛大桥，横跨串场河，气势雄伟，也烧得只剩下几根枯黑的桥桩兀立水面。全城被日军烧毁的房屋有5.8万余间，店铺有1000余家。省立盐城中学、旧商会楼、县政府机关几乎荡然无存。商业最繁盛的西大街，原有店铺400余家，大火后仅剩徐同茂号大楼一幢，余全烧毁。

日军还灭绝人性地摧残屠杀盐城人民，所到之处，逢人便杀，手段极其残忍。被抓获之居民，或被汽油浇身烧死，或被截肢、挖心、切腹、剜眼，或被当作射击演习的活靶子。一日军用枪上的刺刀刺穿一名幼儿的肚腹，扛挑在肩上，在旁的日军则大笑不止。

日军在盐城还肆意侮辱妇女，略有姿色的年轻妇女被抓后，先凌辱一番，然后，又都被关进城内的迎宾旅馆，特设一“慰安所”供日军泄欲……

数日间，原有13万人的城市变得人烟绝迹，满眼都是残壁断垣，间有几只野狗在大街小巷窜行游弋，不时撕咬一些人尸充饥。日军在盐城城区到底屠杀了多少居民，无法得出精确数字，但仅慈善机关、红十字会在城西的一条大街，就收埋了480多具尸体。

6月29日，日军又向盐城北部的上冈镇进犯。当地军民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溃散，日军进镇后，见人即杀，很多老弱妇孺躲避不及，均遭屠杀。高鹤三等人被日军用铁丝穿透掌心，敲牙割舌，刺胸开膛，最后被抛至龙王塘。许大宝被押至日军驻地后，铁丝穿双掌拴于木桩上，日晒夜露，几日颗粒未进，发出凄惨的哀嚎声，而日军则以此为乐。在他奄奄一息之际，

日军以刀将其戳死，把他的尸体推进了梅花沟。日军见了妇女，则肆意奸淫屠杀，他们抓了30多名妇女，关押在中德医院的楼上，逼迫她们脱光衣服跳进大缸洗冷水澡，然后逐一进行轮奸。稍有反抗者，日军则用刺刀挑破其小腹。一个妇女被破腹后挣扎翻滚，不停地咒骂兽兵，众日军则用皮鞋脚踩压住她的四肢，将汽油灌入其腹中，然后点火将她烧死。日军在上冈镇东发现陆鸿章的女儿躲在深水沟里，就威逼她上岸，她没有马上听从日军的命令，当即被打得脑浆四溅，惨死在沟里。

日军施暴之处，无论路边沟旁还是瓦砾灰堆之下，尸体随处可见。镇东的龙王塘，尸体堆得像坐小山。镇西串场河的宽阔水面上，尸体横七竖八，随波逐流。被杀的男人，许多头颅已被砍掉。女性尸体则多半赤身裸体，曾遭凌辱。上冈镇原有人口数万，经此一劫，从此萧条冷落，一蹶不振，常住人口只剩数千。原有大小店铺数百家，大都被洗劫一主。居民房屋被烧达2.9万余间。

盐城历史上盛产粮、棉、盐，城镇繁荣，商贾四集，是苏北的“鱼米之乡”，经日军数日的暴行，尽成一片焦土，满目凄凉。

三、沦陷后的安徽与浙江

芜湖、广德、乔司、龙溪……残垣断壁

芜湖的苦难芜湖是长江流域一个相当繁华的商埠，距南京90公里，30年代约有人口18万。

1937年12月4日起，日军出动飞机大肆轰炸芜湖，每批有五六十架，连续轰炸了5天，投下无数燃烧弹和炸弹。湾里机场以及车站、码头、商业中心都变成了瓦砾废墟。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终日不熄，许多民房、店铺被烧毁。

日机轰炸期间，还集中攻击了停泊在江边的“德和号”客轮和“大通号”、“秀山号”货轮。其中“德和号”是英国怡和洋行船只，当时由芜湖籍人崔松国租来运送想撤离芜湖的商民。船上80%的乘客是妇女儿童，船桅挂着英国旗帜，可供识别。但日机不顾国际公法，对之狂轰滥炸。炸弹正中该轮机舱，顿时浓烟腾空，不久船身断裂下沉，乘客非死即伤，漂浮江面。日机在轰炸后又反复俯冲扫射在水中挣扎的无辜平民，有成千名乘客在江中遇难，另有约100人受伤，鲜血染红了江面。那天，太古洋行的“大通号”也被炸弹击中，幸没有起火。

轰炸在接连不断的进行中，人们也忙着撤离该城。所有离城的公路上，从早到晚挤满了四处逃难的城市居民。中国军队撤到了郊外，芜湖的县长专员也在8日离开了城区，留下一些不能走的穷人和有货物搬不走的商人，躲在破城中等候着不可知的命运。

12月10日上午，日军第十八师团从东南乡小荆山清水河一带逼近芜湖近郊，在卡子口、白马山、大姑山一带遭到中国军队的正面阻击，但不久中国军队就因腹背受敌而向南陵方向撤退。这样，日军就顺利地进入了芜湖市。

日军到芜湖之后，即在城中大肆放火，江边一带的房屋全被烧毁。长街是一条商业街，街上店铺毗邻相连，从江边一直延伸至西门，是芜湖的商业

精华所在。日军将这条街的房屋几乎焚烧殆尽，闹市区的中山路国货大楼一带，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很多人在这次大火中被烧死或被倒塌的房屋压死，或有逃出者，往往也被日军抓去。

与此同时，日军还大肆残害无辜平民。日军进占芜湖的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 2000 余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日军还在市内横冲直撞，乱杀乱砍，大街小巷，尸骸狼藉。有的被枪弹打死，有的被穿心刺死，有的被剖腹挖心而死。日军在铁路附近的江边，及太古洋行附近的江边构筑了炮兵阵地，日夜监视着江面，任何试图驶往对岸的民船或舢板，都会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芜湖寺码头王天成中药店店主 17 岁的儿子无故被日军杀害，还将他的头割下来，戴上一顶呢帽子，口里塞上一根香烟，放在柜台上。并威胁店主说：“不准移动，否则烧毁街坊。”过了几天，这颗头颅腐烂发臭了，店主家人才将之掩埋。日军还在街上随心所欲地砍人，很多人被砍掉了头，有些人被砍掉了腿臂，仅大矾山医院一家就从街上抬回断肢缺臂的受害者近 300 人，可见受害者人数之多。日军占领芜湖最初一段时间，在城内共屠杀了 1 万余名无辜的市民。

在烧杀的过程中，日军还大肆抢掠，粮食、布匹，百货，见什么抢什么。要毛线、内衣裤到百货店取；肚子饿了，南货店里的桂圆蜜枣抓来放入口袋作粮食；要吃鸡，找人抓，往往摇动两臂作鸡扑状，或找根鸡毛示意；要吃鸡蛋，就摸摸屁股蹲一蹲，作鸡生蛋状，找人取。商店里吃的用的都被抢光。富户人家的箱笼衣柜统统都被劈开，发现值钱的东西立即抢走。看见皮大衣就用刀当腰一截，改成短袄穿在身上。家具门窗，大都被拿去烧火取暖。有很多人在日军敲门入内搜查时被打死。日军还侵入外国侨民的住宅大肆抢掠，只有两三处由美国人驻守的地方才得以幸免。

日军在芜湖还大肆侮辱奸淫妇女，他们特别注意搜索妇女，哪怕找到白发苍苍的老妪，也会一哄而上，肆意侮辱，侮辱过后则比赛谁的杀人手段高明。在街头巷尾，到处都有被日军残杀的裸体女尸。妇女们根本不敢上街，就是呆在家里也很危险。有几个日本兵闯进一个电话局职工的家，侮辱他的妻子，他去阻拦，结果被身后一名日本兵用刺刀穿透后心，当场死去。其妻奋不顾身地去夺日本兵的刀，被另外几个日本兵乱枪射死。后来日军还委托当地的汉奸组织“治安会”搜罗妇女，这些汉奸因人熟地熟，搜罗了很多当地妇女和一些宜兴等地逃难来的少女。漂亮的则集中起来，设立俱乐部，供日本军官侮辱，其余的则送往兵营，供日军士兵泄欲。

日军占领一个城市后，就在外围设立据点，修筑防御工事，还得运送子弹、粮食、食盐、木材等军用物品，这就需要大量劳力。他们先后在芜湖抓了很多壮丁作苦力，还规定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要到汉奸机构报到，服一段苦役后才能拿到“良民证”。没有“良民证”，若一旦被查到，轻者服苦役，重者当场处死。

郊区乡村的情况同城内一样悲惨。日军在城里住，食物就到乡下去抢。见到牛，一枪打死，割下 4 条腿运回城里去。见了猪，跑上去就是一刀，死后拖到城中。碰到姑娘妇女，立即围上去轮奸强奸。有 3 个日本兵在麻浦圩乡村寻乐，抓到 13 个老老少少的女人，马上拉出几个年轻貌美的肆意蹂躏，另 2 个日兵发现了一个哑巴，马上拖去当苦力。当行至村中，见到一名妇女，2 个日兵相视而笑，约定一人守哑子，一人去强暴，而后轮换。在濮家店一带，有个 70 余岁的老太太被日军奸淫后一刀杀死，同村的乡辛们偷偷地将之

收敛，结果被日军知道，硬是把棺木盖掀开示众。一些驻扎在乡村中的日军，更是不分昼夜地骚扰村民，对稍露不满者当即杀人烧房。村民们实在不堪忍受，纷纷忍痛离开故土，举家逃亡。

日军在芜湖犯下的滔天罪行，主要是牛岛真雄师团长率领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干的。12月21日，“杀人魔王”谷寿夫率领的日军第六师团在南京大屠杀后，也参加了残害芜湖人民的罪恶勾当。

沦陷后的广德安徽东南部的广德，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是芜湖到杭州的必经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前，广德城内约有2600余户人家，共约8000人。日军进攻上海后，为从背面包抄南京，就把广德作为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了。抗战期间，日军先后4次侵占广德县城，疯狂推行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广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大起，日军就派出数架意大利产的新式轰炸机，从浙江方向飞窜广德，数次轰炸广德飞机场等地，最终将广德飞机场和东门天主堂全部炸毁。10月6日，广德县城内遭到日机轰炸，当日共死伤40余人。10月8日后，日军又多次派飞机轮番轰炸广德县城和县属城镇。特别是11月26日至29日，日机大队飞临广德县城，连续轰炸4天，居民死伤300余人。至此，广德县城已遭日机轰炸20余次，城内除较贫穷的五六百人外，都已逃往外乡，县政府也在27日迁到城外的小镇上去。

11月28日，日军第十八师团（牛岛师团）的一个联队共4000多人，从浙江长兴、泗安入侵广德。

11月29日，日军进入广德县城，这是抗战时期安徽沦陷的第一个县城。

日军进城后，立即挨门挨户搜查，凡是青壮年男子都用绳子捆在一起，强迫搬运东西，掩埋尸首，打扫房屋。日军还每天分头到城郊村庄搜索壮丁作劳工，后有成百的壮丁被日军用玻璃瓶插入肛门中活活弄死。

对于妇女，只要破日军见到，不管老少，尽数轮奸。如稍作抵抗，立即就彼刺刀戳死。日军司令部设在北门内孙正和北号时，还从浙江吴兴、长兴带来了几十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将他们分在各营房中“慰安”取乐。

日军占据广德县城一个月左右时，广德的老百姓破坏了广德到宣城间的公路，烧毁了公路上的所有桥梁，抗日游击队又把广德到泗安、长兴去的公路挖断了。这样，日军就失掉了左右的接济，非常恐慌。后来，游击队又分头在广德城四周挖陷阶，埋下地雷，使日军不敢轻易出城。最后，日军因在孤城中的给养发生困难，只得全部撤出县城。

1938年1月13日游击队入城时，城中未埋的陈尸多至200余具，发出的腐臭味使人掩鼻。在东门里一间烧倒的房中，有一个孕妇残尸，肚子已经划开，胎儿和肠子一齐流在灰土上，肚皮中填了许多盐。十字街头砖堆下埋了三四颗人头，尸身已不知去向。王福记米庄内有好几条焦枯的人腿。因城中原有的五六百人几乎全被日军杀光，因此要组织埋尸队、扫除队、岗哨队等都非常困难。

日军在撤退前还在城中到处烧房，他们先将搜集到的木制家具堆起来，拣好房子先烧。烧时先在墙上喷上汽油，然后点火，不多时，火场连成一片，烈焰冲天，这场大火足足烧了3天3夜，大火过后，广德城内已看不到一间有顶有梁的房子了。

日军撤退前还恣意进行破坏。粮食不是被日军带走就是丢进了水沟。许

多油酱店的酱缸内有酱，但日军不是放进尸体就是扔进了粪便，每一口水井里都有死尸。可以说，城中没有一点可食用的东西。

由于广德地理位置的重要，又处敌我交错地带，双方对广德的争夺非常激烈，广德也因此多次易手。除了1937年11月29日至1938年1月13日日军首次占领广德外，以后1938年3月21日、1940年10月7日、1943年10月2日，日军又先后3次占领广德。

抗日战争期间，广德县境内死于日军之手的群众共有2.4万余人，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日军占领期间，不仅在广德县城内烧杀淫掠，在郊外乡村亦是无恶不作。

有一次，一名日本兵在北乡邱家村一带失踪，后来一百余名日军赶到邱家村，将当时留在村中的三四十名老百姓全部关在一所大房子里，外面用木棍石头顶住，再在周围喷上汽油，点火焚烧，把房中人全部烧死。全村只有一个79岁的老太太走不动，被日军刺了一刀后装死才得以幸免。当时离县城一二十里以内的村庄上没有逃走的村民，几乎全被日军斩尽杀绝。李窑村的王二瘤子不能走路，日军抓到他，要他用手在地上爬进城去，背上还要背一只小猪。到了城门口，日军一刺刀又将他刺死。日军第一次从广德撤退时，在广德至泗安的公路旁，就躺着被日军残酷杀害的数十具尸体，有的尸体还被乌鸦和野狗争夺抢食。邱村乡后岗村周绪民一家12口躲在坟洞里，日军发现后用步枪对着里面射击，除5岁男孩周和成偎在妈妈怀中幸存外，其余11人全遭杀害。邱村乡前路村有五六百人躲在一条大沟里，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步枪打死47人。东亭乡大塔村一个野棚内躲着8个逃难的人，日军杀了7个，留下一个叫江小奉的，要他带路。他带错了路，被日军用棉絮包起，活活烧死。在广乡山关岭，日军将周家窑厂的一个窑工和周老五一家6口全关在屋里放火烧死。在东北乡西米桥，日军将七八十名群众围团在一个三面临水、只有一条路的小树林里，用机枪步枪扫射杀光。

日军在乡间对妇女的凌辱残杀更令人发指。如日军第一次占领广德期间，每天都要分头到城郊各村庄搜索妇女供他们奸淫。1937年冬天，广德郊外某村的一个童养媳与其姐姐、母辛一起被日军拖去，强迫她们下水塘洗澡，然后将她们提到场上，迫令她们赤身裸体地在地上爬，那个童养媳的姐姐不堪凌辱，头撞房基自尽了。在广德乡间的公路旁，常有奸后被杀的妇女尸体，死状惨不忍睹。十八里店李三儿的母亲已50多岁了，也被奸后暴尸。

日军在广德乡间的掳掠也是司空见惯，被抓去的鸡、猪、羊之类，多得难以胜数。

另外，日军在广德所到之处必烧民房。广德东乡、南乡村子里，到处可见火烧惨迹。日军第一次占领广德期间，离县城一二十里以内的房子几乎全被烧光。以后，广德词山殿粮库、盐库被日军放火烧了几天。誓节渡是个小镇，镇上原有40多家商店，400余户居民，1300多人。结果日军飞机丢下燃烧弹，全镇房屋都被炸毁，附近的朱家庄、牌坊村、赛里村等几乎夷为平地。

整个广德地区，被日军蹂躏得面目全非了。

乔司惨案 乔司是余杭县六大镇之一。镇上房屋鳞次栉比，并有学校、图书馆、文艺社、足球场等公共设施。街道东西横贯一里余，设有电气公司、汽车公司、3家蚕行和各种商店，是周围乡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各地农民常来此赶集。乔司交通十分方便，附近有沪杭公路、钱塘江、笕桥机场、沪杭铁路，能通向全国各地。

1937年12月24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及周围地区，有100余人盘踞乔司镇，驻扎在五仙殿，东汽车站旁、平家桥等处。他们在乔司奸淫掳掠，强拉民夫，闹得乔司不得安宁。

1938年2月17日深夜，原驻乔司的国民党军第十集团军第六十二师的一百余名官兵，从钱塘江南岸渡江偷袭驻乔司的日军，消灭了平安桥的日军40余人，其余日军仓惶逃往览桥机场。吃了败仗的日军老羞成怒，立即决定对乔司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早，览桥的日军乘着多辆汽车来到乔司，他们下车搬走了昨夜被打死的日军尸体。紧接着，驻临平、杭州等地的日军也赶到了，总共200余人。他们包围乔司镇，封锁了水路道口，然后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烧杀。

日军先是见房即烧，不一会儿烈焰成片，乔司镇变成一片火海，躲在屋里的老百姓不是被活活烧死，就是夺路奔逃时被守候在各路口的日军打死。搬运工人金贵荣和侄女金宝珠带着吃奶的孩子，悄悄上了一条小船，想从水路脱险，不料被日军发现，当即击毙在船上。外地一条运甘蔗的船正好路过乔司西头的保庆桥，桥上的日军逼迫船只靠岸，然后把船上的人都枪杀了。城皇弄汪凤珍等7名妇女和一婴孩，同乘一船向保庆桥方向逃命，也遭桥上日军射击，6名妇女及婴孩当即被打死，汪凤珍倒在同伴尸体下装死，到天黑才上岸，逃出乔司镇。那一时期，街道上、公路上、河岸桥头，到处都躺着尸体。

与此同时，日军还将搜到的老百姓一批批押到保庆桥旁的汽车站里，前后共约三四百人。大约从上午9时开始，日军将关押在车站里的群众叫出一个，枪杀在东面公路上。接着再叫出一人，让他把尸体拖到后面的池塘里，然后命令他返回刑场，又加以枪杀。如此反复了几十遍，日军大概觉得这样干太慢，就改用一根绳子捆绑2个人，同时枪杀。这样，一直杀到下午3时，日军还不罢手。车站里剩了的人，听到一次次揪人心肺的枪声和惨叫声，知道日军兽性大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与其一个个被杀，不如集体冲出去，或许有条生路。于是，他们设法打开了车站后门，一窝蜂似的往外冲。日军马上集中力量对着人群射击，逃出的人大多死于日军的乱枪之中，只有张宝福、陈文奎等少数人逃出魔掌，幸免于难。

2月19日早晨7时左右，日军杀了个回马枪，又从览桥机场突然来到乔司镇，几百名刚回到家的群众又被日军杀害。

2月20日，日军又一次突袭了乔司。连续3天的大屠杀，使乔司镇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汽车站旁的池塘成了尸体成堆的血肉塘，乔司方圆十里的农村也同遭劫难。

日军在乔司地区共杀害无辜百姓1360亲人，烧毁乔司镇上房屋2000余间，使全镇成了一片废墟。此外还烧毁乔司周围农村的房屋5000余间。当地群众流离失所，再也不敢返回这人间地狱，直到之年多以后，才有人陆续地重返乔司镇，在废墟上搭起了草棚。

百里龙溪烈火 龙溪是连接杭州至大湖的一条重要水道，它流经杭县（今余杭县）、德清、吴兴等处。南段在杭县塘栖附近，与通往杭州的运河相接，北段经过吴兴菱湖，流入太湖，全长一百二十里。

日军占领杭州后，尤溪就成了日军在杭州与吴兴及其邻县间运送军火物资的重要通道。

1938年3月，日军在韶村树角和尤溪沿岸的雷甸下桥等处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为了确保这条水上交通要道的“安全”，日军竟出动飞机和汽艇，对龙溪沿岸的村镇进行了一场有计划的大烧杀，把沿河两岸的村庄全部夷为平地，使两岸居民数百人被子，数万人无家可归。

1938年3月26日早晨5时左右，日军飞机不断地从南方飞来，对龙溪两岸10多里范围内的村庄进行了毁灭性轰炸，大量燃烧弹引起的烈火很快就一个个村庄吞没。当时正值清晨，很多人在睡梦中被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日军1000多人在联队长片冈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由吴兴的菱湖沿龙溪南下，一路从杭县塘栖东面的武林头沿龙溪北上。南北两路数十艘日军汽艇在龙溪中穿梭往来，见到村庄，日军就拿着火把、提着汽油或煤油桶上岸，挨家挨户放火。从火中逃生者，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被赶回火中烧死，还有的被打伤后扔进了火堆。

日军的轰炸、焚烧、杀人行动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南起杭县王家庄，北至吴兴菱湖的查家簕，长120里，宽10多里范围内的近150个大小村庄，全部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场。第二天黎明，距龙溪10多里外，还能看到浓烟烈火滚滚不断。

这次大火使德清县8个乡镇中110个村落后被焚毁，有2045户7799间房屋被毁，778人被烧死或残杀，财产损失无数。如加上吴兴、杭县境内40里龙溪两岸的损失，更是大大超过以上的各项数

四、魔爪中的武汉与炸弹下的重庆

她仅仅藏了几块法币，就被割鼻挖眼……；近万架次飞机、2万多枚炸弹，重庆一片火海

魔爪中的武汉武汉由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组成，是长江边重要的工业中心，抗日战争前人口约100万。

日军1937年“八·一三”进攻上海后，为造声势，摧毁我抗战力量，从8月20日起进犯湖北，随后便开始对武汉三镇进行长达一年的狂轰滥炸。

1937年9月24日下午，日军数架飞机空袭汉口武圣庙贫民区，当时那一带有居民约万人。

轰炸后的武圣庙地区，窄小的街道旁，破旧的棚屋大片坍塌，居民和路人都被埋在里面。在成片的碎砖乱木下，有时会伸出一只手或一条脚，无力地摆动着。这些人还没有断气，不时发出微弱的呻吟声。至少有数百人已被炸死、压死，其中多半又是小孩。因死伤人员过多，警察、学生以及一些自告奋勇的市民一起救送伤员，搬运尸体，至深夜还不能结束。

汉阳和武昌也遭到了空袭，一颗炸弹落在汉阳一座难民营中，炸死了60人，炸伤多人。

当天晚上，一群日机再次飞临武汉上空，轰炸了10分钟，扔下很多燃烧弹，使许多地方发生大火，至深夜还在熊熊燃烧。

9月25日，日机又一次轰炸武圣庙地区，再次造成大批人员伤亡，使更多无家可归的受难者流落街头。有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背着他母亲瘦小的尸体，到医院门口停下，把他母亲恭恭敬敬地放倒在医院看门人的脚边，恳求给予适当安葬，然后再去寻找失散的弟妹。

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日机对武汉的空袭更是接连不断。

1938年3月29日，日机在汉阳腰路口、长堤两处沿堤低飞，以机枪反复扫射路人，造成400余人死伤。

4月14日，36架日机在汉阳大别山（今龟山）附近投弹百余枚，炸毁房屋40余栋，死伤260余人。

6月17日，日机对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铁厂疯狂投弹，兵工厂顿成废铁残垣，炼铁厂5座炼铁炉被毁坏。

7月12日，日机40余架对武昌人口密集区投弹50余枚，死伤500余人。

7月19日，39架日机轰炸徐安棚一带，炸毁民房百余栋，死伤平民1000人以上。

以上只是主要的几次轰炸。据统计，自1937年秋天开始，至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力止，日机侵入武汉上空61次，出动飞机近千架次，投弹近5000枚，造成9000余人死伤，炸毁房屋近5000栋。

从10月25日开始，日军先后进占了汉口、武昌和汉阳。日军在市区没有受到抵抗，但进城后仍旧大肆烧手掳奸。

日军一进汉口，持斧拿锯，劈开居民住宅的门窗，翻箱倒柜，洗劫财物。中山路上所有的商店都被日军占领，家具货物都成了他们的财产。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铁厂的生熟铁被作为军需物资，全部运走。日军在一妇女的棉袄缝里搜出了几张法币，当即抢去，并将她挖眼割鼻，削掉双乳，砍断手足。日军还对行人随意搜身，即使搜到5分镍币，也要拿走。日军侵占汉口后，立即开设“汉口野战邮局”，这邮局的主要任务是存汇日军官兵劫掠所得的赃款。自1938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一个月间，这个邮局的存款折合日币已达60万元，士兵汇往日本的款项也达60万，还不包括日本军官的汇款在内。

可抢则抢，抢不了则烧。日军占领武汉期间，还有计划地连续在城内放火。汉口和武昌不断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民房的大火，有时一天竟有10多处地方出现浓烟烈火，有的地方大火竟连烧7天7夜。民权路、民族路、襄河一带许多地区都被焚为一片平地。武汉沦陷后的最初一个月，仅汉口中心地带，就有约3.5万户居民的房屋被烧，受难居民约125万人。

日军对有军人和游击队嫌疑或稍有不满情绪的人，都格杀不论。在汉口江汉路海关前，日军抓住了70余人，当场刺死几个，将其余的人推入长江，然后在岸上用机枪扫射。殷红的鲜血随波扩散，染红了江面。在汉口大智门附近的华景街，也横六竖八地躺着许多被日军残杀的尸体。汉口街上的许多房屋中，都可以发现被绑的市民尸体，大部分身首分离。

对有些病人，日军也要屠杀。如有人拉肚子，往往被视作霍乱病人活活烧死。难民区有个妇女，早晨起床打个喷嚏，恰被巡逻的日本兵听见，闯进门拖着就走，其丈夫拿出打预防针的证明，还是被拉去烧死。一个家住郊区的老人经过景华街，坐在地上休息一下，也被拖去烧死。

汉口日本宪兵队在市内采取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大肆抓捕所谓的嫌疑犯。这些人被抓到大孚银行（现南京路武汉图书馆外借部）宪兵队队部后，采用狼狗咬、灌水、钉竹签、电烙、电针等残酷的刑罚审讯，有时甚至采用挖眼、剥皮、浸镪水、刀劈、电死等方法杀害，宪兵队常将抓到的人押到岱家山金银滩、武昌大矾头、东西湖走马岭和硃口等地枪杀、砍

头和集体活埋,在大孚银行处死的人也拉到礄口掩埋。从 1938 年 11 月到 1939 年 11 月的一年内,礄口就埋葬了约 2 万具被宪兵队杀害的中国人尸体。1939 年至 1945 年,汉口宪兵队常将抓到的人押至离汉口 20 多里的黄陂坦教湖,先叫他们挖沟,然后在沟边砍头掩埋。武汉沦陷 7 年期间,在那里被害的中国人至少在 4000 人以上。

日军刚侵占武汉时,奸淫残杀妇女的惨剧每日都发生。日军进占汉口的当天,有 3 个日本兵闯入金城银行附近的一家商店,先将店主及小孩禁闭起来,然后轮奸主妇,使其瘫痪。第二于晚上,在三阳路及平汉路的主车中,又有难民妇女被奸污。一个年轻的妇女被轮奸后杀死,尸体被日本兵踢进了河中。武昌下新河一个防空壕内有 10 多具裸体女尸,都是被日军强奸后杀害的。在武汉特三区,日军奸死了一个产妇。在汉口花旗银行旁边,3 个日本宪兵抓住一个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对其实施轮奸。后来日军在汉口的六合里、生成里和联保里等地设立“慰安所”,将很多中国妇女集中起来,随时供日军蹂躏淫乐。

日军侵占武汉 7 年,武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据估计,有 4.3 万余间房屋被焚毁,数万人被惨杀,劫掠的财物按 1945 年物价计,约 1000 万亿法币。

炸弹下的重庆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对中国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妄图以此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政府机关全部迁往重庆,重庆成了中国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重庆在抗战开始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重要基地。当时沿海各省工厂因战火逼近而大量内迁,往往将四川省,特别是重庆作为内迁的最终目的地。据统计,当时沿海各省内迁的民营工厂共计 452 家,迁入四川的占 250 家,其中大部分设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官营工厂 1937 年内迁的有 63 家,1938 年有 209 家,1939 年有 419 家,1940 年有 571 家,1941 年达 866 家。这么多官营工厂内迁,其中约有 44%是迁往四川省的,加上重庆还陆续开办了一些新的工厂,使重庆的工厂数量就相当可观,其产品为中国的抗战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此外,重庆也是中国大后方的重要交通枢纽,水运、公路以及航空运输业都有相当规模。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重庆市区迅速扩大了 20 余倍,人口也从战前的 10 余万猛增至 1939 年初的 50 万,其中从汉口、上海等地迁来的难民就达 30 万。重庆市内商业繁荣,银行林立,也是中国大后方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

基于以上原因,日军选择重庆作为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使重庆成为我国 8 年抗战中遭受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

日军飞机对重庆的轰炸主要集中在武汉失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

1938 年 12 月 6 日,日军第一航行团第六十、第九十八两个战队出动 22 架轰炸机分两批从汉口出发轰炸重庆。因当时重庆上空云层密布,无法辨认目标,第一批机队没有实施轰炸,无功而返。第二批机队对重庆东侧进行推测性轰炸,胡乱丢了一些炸弹。从此,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连续大轰炸。

1939 年 1 月 7 日,日军派出 31 架飞机对主佛山地区进行了轰炸。

1 月 10 日,日军又派出 30 架飞机对重庆市区轰炸,投弹 4500 公斤。

通过以上 3 次的试探性轰炸,日军觉得“重庆的防空态势尚未完备”,

于是决定大规模进行轰炸。

1月15日，日军派机29架，又一次对重庆轰炸，但这一次日军轰炸机遭到了国民党战斗机的拦截。

以上4次轰炸，由于受天气影响，加上日军缺乏战斗机掩护，轰炸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而日军飞机已损失了5架，很多飞机机身中弹。为此，日军决定暂时停止轰炸，补充装备，加强远距离飞行训练，为展开大规模的集中轰炸作准备。

3个多月后，日本陆海军决定联合轰炸重庆。5月3日下午，日机自杭州起飞，分两批各18架侵入重庆市上空，沿长江北岸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和燃烧弹。人口稠密、工商繁荣的大梁子、左营街、苍平街、都邮街、一牌坊、储奇门、商业场、小十字、神仙口、陕西路、五四街、朝天门、玛瑙溪一带都遭到日机的轰炸。那里的27条街中，有19条几乎被炸成废墟。炸弹所到之处，烈火冲天，浓烟滚滚，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中山公园的电线杆上、树枝上挂满了断肢残躯，楼亭残壁上溅满了斑斑血肉，太平桥下堆满了妇女儿童的尸体。长江沿岸一公里长的贫民窟木板房被炸起火，火势借着风势向南扩散。南区繁盛路一带落下了无数枚燃烧弹，火舌吞噬着一排排商店和民房，被炸断手脚、炸破头的市民，在血泊火海中挣扎惨叫，还有一些人在街上慌乱地跑动，以躲避炸弹和烈火。

5月4日下午5时左右，日机27架再度轰炸重庆市区，造成的后果比前一天更为严重。日机对都邮街、小梁子、夫子池、七星岗一带俯冲轰炸，致使重庆市区成为一片火海，无数家店铺和民房被炸塌或烧塌，市民伤亡更加惨重。这次大火延烧数日，使重庆的水电设施全遭破坏。一到晚上，除受灾地区有火光烈焰，许多街巷的瓦砾堆边，闪烁着无数祭悼亡灵的烛光。大轰炸后，遍地死尸狼藉，手、脚、头颅、内脏等残骸到处可见，电线和树枝上也挂着残臂断肢、血衣破片。从通远门到都邮街一带，许多高楼大厦变成了瓦砾堆、37家私人银行有24家被毁。重庆市区的精华部分，主要毁于这次轰炸。

据统计，仅这两于的大轰炸，就使重庆市区房屋毁损4871幢，约占重庆房屋总数的三分之一。市民死亡3991人，伤2287人。财产损失无可计数，仅都邮街一带的绸布店就有15家被毁，损失布匹16.72万匹。此外还有很多银行被毁。

接着，日机又多次连续轰炸重庆及其附近地区。

12月27日，日机袭击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等9名师生被炸死。

据当时记载，仅在1939年一年里，日机就出动飞机865架次，轰炸重庆34次，投弹1897枚，毁损房屋6599幢，炸死市民5247人，伤4196人。

1940年5月12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接到日本大本营“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进攻作战”的指示后，立即命令第三飞行师团与海军协作，轰炸重庆等城市。为此，日本海军专门组成了以海军少将山口多闻为司令的“联合空袭部队”。

第二天，第三飞行师团与海军“联合主袭部队”达成《陆海军——一号作战协定》，决定由陆军派出81架飞机，海军派出212架飞机，联合轰炸重庆。轰炸时间从5月中旬起，约30天。5月19日，日军还从华南调来了第十四、第十五航空队，编入“联合空袭部队”。

5月18日、19日两天，日本“联合主攻部队”为歼灭中国空军，掌握制空权，首先袭击了重庆附近的自市驿机场和梁心机场，并轰炸了成都、温江、南充、宜宾等地。接着，日机把轰炸重点转向了重庆。

5月20日，70架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进行空前野蛮的大规模轰炸。炸弹和燃烧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整个市区被黑烟烈焰笼罩。市内的自来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救火工作无法进行，大火蔓延，连续烧了七八天。

旧火没灭尽，新的轰炸又连续展开，重庆上空差不多每天有日军轰炸机盘旋扔弹，特别是5月26日至30日期间，每日有二三批日机轰炸重庆。

从5月18日至30日的10多天里，日军共有608架次飞机分十几批执行轰炸任务，投下的炸弹达419吨。经过这样的轰炸，半个山城被炸毁烧毁。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中弹50余枚，大部分校舍被炸毁。法国人开办的真元堂圣母院及附设的难民收容所也遭到轰炸，有100多难民被炸死、烧死。

6月份，日军陆军第三飞行师团协同海军“联合空袭部队”参加空袭，重庆等地又遭大规模轰炸。6月11日，日军分4批，出动126架飞机轰炸重庆，投弹310枚，炸死、炸伤居民236人。6月12日，日机分4批，出动117架飞机轰炸重庆市区，炸死、炸伤平民685人，毁损房屋1112幢。6月16日，日机117架，分3批出动，炸死、炸伤平民394人，金陵兵工厂和江北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6月24日至29日，每天约有90架飞机轰炸重庆，使重庆市区连日烈焰冲天，一片火海。6月份，日军共出动飞机1334架次，共20次对重庆实施轰炸，投下炸弹达7916枚。

7月至8月，日军继续以密集的机群连日轰炸重庆。其中，8月19日出动135架飞机，包括12架首次投入轰炸的零式飞机。这天，炸死、炸伤平民313人，毁损房屋2194幢。20日，日军出动飞机126架，投弹422枚，炸死、炸伤281人，毁损房屋5921幢。在出动飞机架次、投弹数、民众死伤、房屋毁损数量方面，都创轰炸重庆以来的最高记录。两个月的连续轰炸，使重庆西部商业区、江北区等遭到彻底破坏，“重庆街道口已无法辨认”。

9月以后，日军力准备武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将第三飞行师团调往华南，并于9月4日下令停止“一一号作战”，结束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轰炸。但以后的小规模轰炸仍然经常出现，如当年10月份，日军仍出动飞机171架次，轰炸重庆6次，至11月才暂时中止了对重庆的轰炸。

1940年，日机轰炸重庆80次，共出动飞机4722架次，投弹10587枚，炸死平民4149人，伤5411人，毁房6952幢。

从1941年5月3日开始，日军动用了在中国的大部分机动航空部队，对重庆实行了连续不断的“疲劳轰炸”。参加轰炸的有陆军第一、第三飞行师团，从东北调来的第十二、第九十八战队，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第二十二航空舰队，并配备了新式的陆上攻击机。

5月3日，日军出动63架飞机分两批袭击重庆，开始了对重庆的第三轮大轰炸。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机或以密集机群轮番轰炸，或以小批机群连续骚扰。在日机的“疲劳轰炸”下，市民人心惶惶，疲于奔命，只要一听到飞机声就竞相躲进防空洞。6月5日，日机持续很长时间对重庆进行轰炸，致使市中心石灰市、磁器街、十八梯之间的防空隧道中避难的市民愈集愈多。由于隧道缺乏通风设备，致使许多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酿成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后来工人们将隧道中的尸体拖出来，用了20辆卡车，连续一天一夜才将尸体运完，据估计，死亡人数在1.2万人以上，其中，运往朝天门

的尸体就达 4000 多具。

7 月中旬，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制定了《第五次内地航空作战计划》，再次把重庆定为其战略轰炸的重点。为实施这一轰炸计划，日军将配有 180 架新式陆上攻击机的第十一航空舰队调往汉口、孝感。8 月下旬，又从我国东北将第十二、第九十八战队调往运城，用于轰炸重庆等地。整个 8 月份，日机基本上每天以 6 小时的间隔，连续轰炸重庆，并借助月光进行夜间轰炸，使重庆轰炸达到高潮。日机的连续轰炸，使山城连日被浓烟烈焰笼罩，民宅商店大半被焚毁，水电设施多遭破坏。国民政府大礼堂、蒋介石宅邸以及英国使馆均遭到轰炸。停泊在长江上的美舰“图图拉”号亦被炸伤。

9 月 6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航空部队纷纷南调，从此结束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1941 年，日机轰炸重庆 81 次，共出动飞机 3495 架次，投弹 8893 枚，炸死居民 2448 人，伤 4448 人，另有万余人在防空隧道中窒息而死，毁房 5793 幢。

1942 年，日机又空袭重庆 2 次。

1943 年，日机空袭重庆 9 次，出动飞机 348 架次，投弹 151 枚，炸死、炸伤居民 39 人，毁房 99 幢。

从 1938 年 10 月 10 日到 1943 年 3 月 23 日，日机轰炸重庆总共 210 次，出动飞机近万架次，投弹 2.1 万多枚，炸死居民 11844 人，伤 14055 人，毁房 17462 幢。日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加剧了重庆经济的恶化。在此期间，重庆的物价指数上涨了近 200 倍，大批工厂停工减产，商业萧条，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日军对重庆等城市的大轰炸，最终并未达到摧毁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瓦解中国的抗日阵线、迅速征服全中国的目的，反而使其战线更加延长、兵力更加分散，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在中国战场上愈陷愈深，以致最终遭到灭顶之灾。

第四章 南国城乡的杀戮

广东、福建是祖国的南大门，湖南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为了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络，打通大陆南北的交通线，日军把战火燃遍了南国城乡。

一、血火粤闽

狂炸羊城、“扫荡”东江、两占福州，居民被迫背井离乡

“七·七”事变后仅2个月，日军就将战火烧到了广东。此后，随着战火的扩大，华南人民也日益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狂炸羊城 广州座落在广东省南部人口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上，是我国南疆的用户，也是中南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就开始不断地对广东地区进行狂轰滥炸，作为对其他战场的战略配合。广东省许多村庄、城镇、商店、铁路、工厂及广州市受到日机轰炸。至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止，一年多的时间内仅对广州就轰炸了800余次，平均每天2次以上。

1937年9月，日军机群飞临广州东郊东山附近的贫民居住区，扔下大量炸弹。一时间，炸弹引起的烟雾和房屋倒塌的灰尘弥漫空间，当时炸死几千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一些人从废墟中爬出来，脸上流着鲜血，又爬到废墟堆上，一边大声地呼唤着被埋在底下的亲人，一边不停地翻挖着破瓦残砖。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捂着血淋淋的头，恳求抢救人员赶快救救乱瓦堆下的儿孙们。许多孩子哭着跑着，呼唤着自己的父母。一位满头满脸是血的男子，抱着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从倒塌的天花板、地板和墙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洞里艰难地钻出来，他的母亲、妻子以及2个小一点的孩子还埋在倒塌的房子下，生死未卜。更多的人倾家荡产，无家可归。

经过几天抢救和挖掘，东山的日机轰炸现场尸体密布，炸断的身躯和四肢横七竖八地乱堆在一起。几百名哭泣的男女还在废墟中不停地翻挖，寻找他们亲人的残骸。成千上万的难民徘徊街头，神情恍惚。

1938年初，日军飞机连续10多天猛烈轰炸广州。死亡人数超过7000，大量商店和民宅在烈焰中被毁，更多的人因无家可归而露宿街头。

1938年5月，日军飞机在广州黄华塘扔下炸弹，顿时房屋倒塌，血肉横飞，炸死居民100多人。一户姓徐的居民，全家8口被炸死7人，其中还有一个孕妇。见亲人突遭飞来之祸，活着的人悲痛万分，有的孩子抱着爹娘的尸体尖声嚎哭，有的父母对着子女的残体断肢痛不欲生。

1938年5月28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日机70余架分3批轰炸广州市区，投掷300至500磅的炸弹150余枚。中山纪念堂、昌华大街、逢源三巷、田庆新街、荔湾北区、中央公园、合华路等地灾情最重，房屋被烧毁600余间，平民被炸死600余人，炸伤1000余人。黄沙一带房屋全毁，附近的柳波桥中了燃烧弹，当即起火，周围有许多人葬身火海。沿河岸一带停泊的大小船只有20余艘被炸沉，水面上漂浮着100多具肢体残缺的尸体。

6月4日上午9至12时，日机25架分两批对广州市区轰炸，投重磅炸弹40余枚，下午2至5时，日机36架分3批又来轰炸，投弹近70枚，炸毁

房屋 300 余间，炸死、炸伤市民 3000 余人。惠爱路一带 30 余间房屋被毁，死伤近 200 人。南关一带被炸区域延绵数里，炸毁民房店铺 150 余间，炸死平民 600 余人，炸伤 1000 余人。昔日熙熙攘攘的汉民路被炸成颓垣残壁的瓦砾场。东横街西端的一座四层大楼被炸塌，里面的 100 多人被炸死、压死。贫民区有个浑身是血的妇女从被炸处跑出来，她怀中的孩子已不成人形。一个贫民区的妇女被压在砖石下面，呻吟待毙，她的七八岁的孩子惊慌失措，一边哭叫，一边给其将死的母亲喂水。从砖石瓦砾下挖出的尸体断头缺肢，血肉模糊，有的胸前被炸出一个大洞，有的内脏被炸飞。

6 月 6 日上午 8 时至 10 时，日机 41 架分 3 批轰炸广州市区，投掷炸弹、燃烧弹 100 余枚，炸毁房屋 700 余间，炸死 1200 余人，炸伤千余人，灾区遍及全市。汉民中路、文明路、东川路、长庚路、王仙路、中华南路等地，落下炸弹 50 余枚，响声震天，烈焰腾空。有数万市民集中在长堤一带躲避轰炸，日机发现后对着人群投弹扫射。一颗炸弹落在人群中，顿时泥沙石块夹杂着碎肉残肢腾空而起。河里停泊小船，有 67 艘被炸沉。船上的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伤，都掉入河中，鲜血染红了河面。王仙路落下 4 枚燃烧弹，50 余家店铺均成灰烬，店主、伙计、顾客死伤颇众。

6 月 8 日上午 10 时 50 分，日机 32 架空袭广州市区及河南、黄沙车站、白云山附近。河南那稣教新村被炸，伤亡惨重。黄沙车站附近的油库被炸，当即发生大火，火焰喷起，高达 50 英尺。西村电厂院内落下 8 枚炸弹，部分厂房被炸毁，造成全市停电。

1938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9 日的 13 天内，日军飞机天天都要到广州轰炸，每天几批，每批少则 10 多架，多则 50 多架，轮番投掷炸弹或燃烧弹，并俯冲扫射。轰炸有时从清晨到午夜，给广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广州市民被炸死者近万人，伤者无法统计。广州街上到处是用芦席盖着的尸体，街面上残砖碎瓦沾了很多血迹，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和血腥味。广东土敏水泥厂、西村水泥厂、杜美医院、岭南大学等许多工厂、医院、学校、民房、商店被炸毁。

活着的广州市民整天生活在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尖叫声、爆炸声中，不知哪一天自己会被作死或炸成残废。他们长期在恐慌紧张的心情和环境里生活，惶惶不可终日。几十万人被迫出逃，远走他乡，离开这被日寇炸得阴森恐怖、满目凄凉的城市。广州原有人口 150 万，抗战爆发不到一年，人口已降为 50 万了。

“扫荡”东江 东江地区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及广九路两侧，是日军侵略华南诸省的基地。1938 年 10 月日军侵占广州后，原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使当地的日军不得安宁。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根据地不断进行“围剿”和“扫荡”，妄图消灭抗日游击队。在“围剿”和“扫荡”的过程中，召军大肆烧杀，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有些地方敌我双方反复争夺，当地人民就多次受到日军的摧残蹂躏。

以东江地区的重要城市惠州市为例，该城曾受到日军的 4 次入侵。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第二天就入侵惠州。在惠州城内，日军四处开枪，向市民扫射，还纵火烧毁了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水东街和矿下街。在烧杀的同时，日军还大肆抢掠财物，强奸妇女。1941 年 5 月 3 日，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在郊外的蓬瀛村屠杀当地居民，又在城内屠杀避难群众，共杀害 400 余人。同时，日军在惠州城乡四处纵火烧房，城内的民宅和商店

十之八九被毁，整个惠州地区几乎成了一片废墟。1942年1月，日军第三次入侵惠州，连续3天屠杀了5000人左右。他们抓到男人就活埋，见到小孩就刺死，还集体枪杀居民，或将居民捆绑起来丢入东江淹死。1945年1月14日，日军第四次入侵惠州，又屠杀了四五百名当地居民。

在东江根据地的其他地方，日军也实施了“扫荡”。1941年6月，日军“扫荡”大鹏半岛，烧毁了冷澳、东山等10多个村庄。1942年春节，千余日军猛攻顺德县的西海村，占据村庄后大肆烧杀抢掠，杀害无辜，有6名老太太竟被推入一所草房中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全村搜索抢劫财物，然后将全村100多间房屋全部烧毁，村庄成了废墟。1943年11月，日军出动万余兵力对东大岭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同时对宝安阳台山区实施5路围攻。在行动中，日军采用了在华北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一些战术，如“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毁了大环村、半山村、大公岭、百花洞等村庄，在村庄附近搜得躲避者，全部杀害。在高田、大王岭，日军将当地村民驱赶到一片空地上，进行拷打、灌水、灌沙、活烧，直至摧残至死。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共对东江根据地发动了千余次“扫荡”，其中千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达10多次。但日军最终没能消灭东江抗日根据地及其军民，而自己却走向了灭亡。

两占福州 福州位于闽江下游，是福建省的省会，又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要冲和著名的贸易港口。抗战期间，福州曾两度被日军占领。

为了侵占福州地区，日军于1941年2月开始调兵遣将，到4月份，已经集结了2艘航空母舰、30余艘军舰、100余艘帆船、40余架飞机，在闽江口海面伺机入侵。18日，日机20余架次轮番轰炸连江、长乐等地。19日清晨，日军以陆军华南方面军四十八师团为主力，由十八师团4个步兵大队和近卫团多贺大队配合，在海军第二分遣支舰队协同和3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从闽江的长乐、连江两县沿海登陆。

20日，侵占长乐、连江的日军分兵数路围攻福州。

21日，面对日军强大阵容的进攻，驻福州地区守军、原国民党第一军不战而退，日军占领了福州。

福清、长乐、连江、福州沦陷后，各地群众在中共福建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抗日游击队，不断袭击入侵的日军，使之不得安宁，驻福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亦发动了反击。日军多面受敌，加上当地物资奇缺，不仅无法继续扩大占领区，而且对已占领的地区也难于固守，只得于1941年9月3日分路全线撤退。

1944年9月27日，日军陆军六十二独立混成旅团2000余人在长岭熹一的指挥下，从闽江口的晓沃、道沃、浦口、东岱等地登陆。10月1日，日军从连江分兵两路攻掠福州。10月4日，福州地区第二次陷入敌手。

此后，福州地区各路游击队经常袭扰当地日军，迫使他们于1945年5月18日第二次撤退，福州地区再次光复。

日军两次侵占福州期间，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狂轰滥炸日军两次入侵，都先派军舰和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以掩护其部队登陆和进军。1941年4月18日，日机20多架次轮番对长乐、连江、福州等地进行轰炸。20日，日机又对福州地区进行轰炸，仅福州市仓山的龙潭角一处，就有100余人被炸死、炸伤。1941年8月，日机轰炸连江下洋乡，炸

毁民房 8 座 43 间，炸死、炸伤居民 6 人。9 月 2 日清晨，日军撤出连江县城时，又派出飞机投下大批凝固汽油弹，使整个县城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傍晚，烧毁了十字街周围全部店屋民房，共五六百幢，遭难者千余户。据不完全统计，福州两次沦陷期间，被炸毁炸坏房屋 2745 幢，损失达千万元。

放火烧房日军所到之处，常将工厂、机关、学校、民房、船舶烧毁。长乐县第一次沦陷期间，沙京乡有千余间房屋被烧毁，该乡六村、石马村等村庄，共有 300 多户人家房屋被烧毁。1941 年 6 月 10 日，在一次日军的袭击后，集仙桥一带有 290 余间房屋被烧毁。整个长乐县有 2100 余间房屋被毁坏。连江县的下洋乡有 12 幢共 82 间房屋被烧毁。

屠杀凌辱 1941 年 6 月 18 日，日军以肃清所谓“反动分子”和共产党为借口，对福州全市实行 5 天的大搜查，凡发现有武装明信片、军人用品、机关文件、抗日日表、传单、标语等，都以有“反日”嫌疑加以逮捕，并施以酷刑，野蛮虐杀。其手段方法也十分残忍，有活埋、剥皮、电刑、枪毙、砍头、剖腹等。还用烧红的铁条将人活活烙死；用煤油与水灌人，待腹胀后踢其小腹，残害致死；用绳索将人捆住，倒悬在梁上，活活吊死；用鞭子毒打后抛入河中溺死；将人捆住，让毒蛇缠身咬死等等。长乐县第一次沦陷期间，沙京乡有 50 余人被打死、打伤。集仙桥有 60 余人被打死、打伤。北山农民卓玉双在田里耕作，被日军作为活靶打死。长乐县共有 336 人被打死、打伤。福州市两次沦陷，有 320 名无辜市民被杀害。林森县（今闽侯县）两次沦陷，有 299 人被伤害，还有众多无户籍的外乡人及游击队员被杀害。

在日军侵占福州期间，市民备受凌辱，当时，日军在主要交通要道口都设立了岗哨，检查行人。中国人通过必须向哨兵鞠躬行礼，如不知行礼或行礼不台标准，轻者受侮辱，或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残废；重者被枪杀。有的妇女经过岗哨时被强迫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有的人被日本哨兵诬指为游击队，当场杀害，或押往闽江边抛入江中淹死。日本兵到处欺侮中国人，当地市民稍有“不慎”就被掴脸、弹鼻、提耳、拔发、拳打、脚踢。还有人被逼趴在地上模仿蛤蟆、鳖、犬、蜻蜓的样子，有人在盛夏被罚晒太阳，雨天罚跪污泥。若有不服举动，常被杀害。

奸淫妇女福州地区沦陷期间，许多妇女惨遭日军蹂躏。日军规定每星期三、五为行乐日。一到那一天，日军便成群结队在大街闹市强拉妇女，任意奸淫侮辱，甚至在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稍有反抗，即遭杀害。福州第一次沦陷时，在大根区被奸致死的妇女有 35 人，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如 1941 年七、八月间，福州北门云步山蔡永宽家和九彩园陈璇琨家即满门灭绝。有的农妇进城卖菜，被日军强脱衣裤，当街猥亵，甚至强奸。由于妇女不敢上街，日军找不到女人，就三五成群，走巷穿弄，看见门前晒有女人衣服，即破门入室搜查，发现妇女即行强奸。若找不到，便在门前留下暗记，到晚上再破门入内施暴。长乐县洋屿王某之妻刚生孩子数日，因体弱无法躲避，被日军发现后轮奸了数次。洋屿郑某之妻被 7 名日军轮奸至死。长乐县一群日军强拉一少年，迫他奸其生母，并拍摄了照片。在福州仓山，日军抓了很多妇女，将她们囚禁于烟台山乐群楼的外侨俱乐部供其随时糟蹋，大楼内不时传出被辱妇女的凄惨哭声。日军还在福州城里广设“慰安所”，逼良为娼，供其泄欲。

抢掠财物日军占领福州初期，几乎天天成群结队以检查居民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翻箱倒柜，见有金银首饰、古玩瑰宝、红木家具等，均悉数掠去，

甚至衣服、日用品、粮食家禽亦要抢去。有的家庭被搜劫达 10 余次之多。第二次沦陷时，仅福州市南台的一家商店，就被劫去价值数万元的各种物资。林森县在第二次沦陷时，被宰杀掠去耕牛达 790 头。日军还在各交通要道上设立哨卡，凡汽车、轮船、行人通过，都得接受查验，并以种种借口任意没收财物或敲榨勒索。日军还对工厂、仓库、商店的金属、木材、粮食、棉花、布匹等重要战略物资进行调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大批掠夺。两次沦陷期间，福州市被掠夺的杉木价值约达 34.7 万元，林森县被掠夺布匹 1233 丈，约值 6065 元，粮食 3.65 余万石。福州市第二次沦陷时被掠夺粮食约 3.2 万市担，约值 33.3 万元；棉花 24.4 万市斤，约值 12.24 万元；布匹 24 万匹，约值 72 万元。

占地征工日军第二次入侵福州后不久，就在义序无偿霸占土地 3000 亩，在这块土地上拆房伐林，毁坏作物，强征民工，修建军用机场。侵占这些土地，使当地农民损失地价 70 万元，毁坏稻谷和柑桔等果树约值 15.7 万元；拆毁房屋 60 座，损失约 60 万元；征用材料约值 200 万元；另无偿征用民工 5 万名。日军要求每天有万余人修建机场，每人自备伙食，每户要负担 5 工以上，如自己不能参加就缴交“代金”，每工法币 100 元。

福州地区的人民群众受尽了苦难。

揭阻之灾 1944 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已走入穷途末路，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垂死前并未收敛其罪恶的魔爪，驻广东的日军仍然在当地穷凶极恶地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

广东省揭阳失陷前，日军飞机在当地狂轰滥炸。仅官硕乡，日军一个多月就投下了几百颗炸弹，炸死乡民 60 余人，炸毁房屋 1000 余间。在小小的揭阳全县，死于日机轰炸的平民百姓就有数百名之多。

1944 年 10 月初，日军向揭阳、丰顺地区大举进犯，沿途在官硕、梅北、锡场、汤坑等地先后杀害当地群众近千人。

10 月 5 日，日军分兵 3 路包抄了埔尾乡。进村后，日军挨门挨户地搜查，见男青年就抓起来，将他们集中押到南厝前，强迫他们拆民房修工事。见老年男女和小孩，则任意杀害取乐。他们将黄阿旺、黄炳松、如想嫂、科銮母等 10 余人当活靶射击。当看到如想嫂被击中腹部肠子往外流时，日军在旁狂笑不已。黄举清被砍头后，日军在一盆水中洗刀，接着强令在旁留着长须的黄阿和老人将血水喝下。黄阿和坚决不喝，又遭日军砍头。村民大暖被日机炸伤，无法走动，日军将他强行拉拽到河边，其母跪地求情，凶残的日军将母子全都刺死，然后将尸体抛入河中。这一天，日军在乡中枪杀、砍杀了 70 亲人。在疯狂杀人的同时，日军见了年轻妇女，则百般凌辱，甚至连刚分娩的产妇也不放过。这一天，日军在乡间奸淫了 400 多名妇女。在村民家中，见到有用之物、喜欢之物，则一抢而空，最后点火焚烧房屋。乡民木泉的妈妈见日军烧她家的房子，想去救火，结果被日军推入火屋，活活烧死。全乡千余间房屋被烧去了 900 余间。

日军烧杀奸掠之后，剩下的村民已无法留在村中生活，纷纷背井离乡，有的走往江西，有的逃至福建，还有 100 多人在逃难途中贫病交加，相继饿死、病死。

1944 年 12 月 13 日清晨，日军 1000 余人再次袭击官硕乡。天刚亮时，日军进了东面村，村民苏赛贞身背 5 岁的孩子刚出门口，左手就被日军开枪打中，鲜血直流。接着日军就在她家屋外烧房。苏赛贞和她的孩子被活活烧

死。新寨村的潮南嫂被日军开枪打死后，怀中的婴孩还在吃奶。桥头村一个 8 岁的男孩叫阿鹅，刚走出门外，即被日军刺了几刀，死后胸口还被压上了石头。溪尾村三猪伯一家，儿子被活活打死，老夫妇同时死于日军刺刀之下，新媳妇先被轮奸，后被枪击，再扔进粪池，全家被斩尽杀绝。日军还将乡中猪、牛等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大规模地烧房。整个官硕乡到处是浓烟火场，很多人来不及逃出，被活活烧死，这一天，官硕全乡被日军打死、烧死者共有 486 人，被打伤者有 300 多人，被烧毁的民房达 1200 余间，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1945 年 1 月 23 日，1000 余名日军从揭阳赤肚岭出发，25 日控制了锡场、新亨、盘东区以及义顺等几十个自然村的交通要道，疯狂进行烧杀抢掠。日军占领锡场的第一天，就有 60 多人死伤于日军屠刀之下，其中林清泉等 14 人被列成一排砍头示众。第二天，日军又在石洋、石林等村放火烧房。各村一片火海，死伤居民无数。

从 1944 年下半年至 1945 年初短短几个月内，日军就杀死揭阳乡民 1500 余人，杀伤 500 余人，烧毁民房数千间，劫掠财物无数，其中以官硕、锡场、埔尾三乡受害最为惨烈。

二、凋零的芙蓉

长沙数劫、衡阳大难、厂窑屠杀……，河中的尸体竟阻断了河流

“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铁蹄不仅踏遍了黄河、长江流域，也踏遍了湘江南北，使湖南人民饱受战火的蹂躏。

长沙数劫 长沙是中南地区的战略要地。抗战爆发不久，长沙就成了日军飞机大肆轰炸和扫射的目标。

1937 年 11 月 24 日，日机 4 架首次侵袭长沙，在小吴门和火车站一带扔下 6 枚炸弹，炸死、炸伤市民 300 余人。

1938 年 4 月 10 日，日机 27 架侵袭长沙，在岳麓山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学生、工人、居民和游人 100 余人。湖南大学损失惨重，学校内图书馆全被炸毁，科学馆被炸毁三分之二，两幢学生宿舍楼被炸，全校精华毁于一旦。

8 月 17 日，18 架日机在长沙市内狂轰滥炸，在南门外东瓜山、中六铺一带的贫民区，以及中山路、宝南街等繁荣街道并 20 余处，投下炸弹 120 枚，炸毁民房和商店 300 余幢，炸死、炸伤市民 800 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8 月 25 日，日机轰炸潘家坪贫民区，炸毁民房 40 余幢，使 200 余人无家可归。

此后，日机对长沙的侵袭更为频繁，特别是 1938 年 11 月日军进攻岳阳前后，曾数次大规模轰炸长沙。

1938 年 10 月 19 日清晨 7 时起，长沙市各处响起了凄厉的防空汽笛，预告日军飞机将对长沙空袭，要求市民即刻疏散。不久，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脸色苍白痉挛，微张着颤抖的嘴，成群结队慌忙涌向城郊，汇成了一股悲愤而惊惧的行列。

这一天，日军出动飞机 44 架，三度侵袭长沙。

经过两次轰炸后，约到下午3时半，远处的天空传来轻微的马达声。一会儿，声音逐渐变响，最后，发出震撼大地的巨响。日军的轰炸机群，开始了对长沙的第三次轰炸。3分钟之内，日机扔下了几百颗重磅炸弹。从南门天心阁，到浏阳门，一直到小吴门外的韭菜园，顷刻之间，500余间房屋成了瓦砾堆，500余人被夺去了生命。

小吴门外的黄土塘，一片瓦砾旁，躺着一个年轻的孕妇，脸色苍白，微张的嘴角冒着殷红的、还没凝住的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平伸的手捏成了两个拳头。她的腹部高高隆起，从她那略嫌窄狭的蓝布短衫上，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生命不久将要脱离母体了。可是，这可怜的小生命在出世以前就遭到了杀戮！在她的旁边，一个男人躺在血泊中，他的肢体扭曲得如同一条生在石缝里的树根，临死前经过了痛苦的挣扎。稍远一点，在一堆破砖中间，压着一个半截残缺的小男孩尸体，他的小腹以下已经化为肉酱，溅粘在一段短短的泥墙上，几条零乱的红色小肠，还杂乱地悬挂在残墙上，滴着红红的粘液。在不远处，还躺着一名妇女，身下一片殷红，脸上露出痛苦、仇恨的表情。看来，这是一家5口，就这样在飞来横祸中突然死去。

一个头上带伤、苦力模样的人，逢人便断断续续地述说着他的愤恨和家破人亡的不幸。

再走过去，巨大的弹窟呈显在眼前。一所房屋倒塌了，被折断的梁和柱子像一具鱼骨。一群人在手忙脚乱地搬动木头和大块的砖头，企图挖掘出一个被埋葬在瓦砾堆里的受难者，他还活着，正在瓦砾下面呼号求救。一个白发的老太太在一旁，她那干瘪而布满皱纹的脸孔已被泪水弄得模糊不清了。她悲惨地哭号着，声音也嘶哑了，却还浑身颤抖地挤在人群中，拼命地挖那一堆瓦砾，企图尽快地救出她的亲人。

小吴门外大街边，人们围着一个垂死的人，这人看上去已无法救活，因此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他，无能为力，在炸弹下坠的嘶叫声里，他从自己的屋里逃出，刚踏上马路，一块弹片从他的头后飞来，削进了他的后脑。他的后脑已经开裂，白色的脑浆和着红色的鲜血向外流，但他的呼吸还没停止，嘴里还发出轻微的呻吟声，他脸部的肌肉完全走了样，显示出万分痛苦的表情。

在火车南站铁路两边，烟焦味和着血腥味，散发到弥漫着烟雾的空气中。

一堆刚熄火的瓦砾灰土旁，一个中年男人像女人一样地嚎哭着。他的两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眼泪滴落在颧骨上、腮角上、衣襟上、地上的灰土上，他绝望地跺着脚。在他的面前，陈放着两具已烧成焦炭的亲人尸体，已看不清面目，分不清男女了。

一个少女从一问半塌的屋子里钻出来，脸色灰白，充满绝望和恐怖的表情，脸上还留着污泥和血迹。她木然地站着，环视着周围面目全非的场面开始哆嗦，突然，她若有醒悟，放声哭叫起刚刚死去的爹妈。

在层层叠叠浓黑烟团之下，巨大的火舌残忍地舐着危墙、断梁、折柱、将要倒塌的房屋……。电线杆变成了焦炭，电线像残破的蜘蛛网散乱一边。救火队员在不停地忙碌着，但杯水车薪，救不了熊熊大火。从车站到邮政总局一段路，原来食品店、饮食店集中，现几乎全被埋在了烟火中。一段铁轨被炸弯曲，连着枕木断成数截，飞出很远。

车站旁，一个受伤的挑夫，仰躺在血污的担架上，瞪着愤恨的眼睛，嘴里不停地在咒天骂地。

邮政总局门前，躺着几具已被炸死的人。

水风井街的第一师范一带，房屋被炸毁，形成一堆巨大的瓦砾，有很多学生埋葬在瓦砾堆下。拐弯望去，里边还有更大的瓦砾堆，至少有 100 余间房屋倒塌才能形成，有多少生灵被压在这残砖破瓦之下啊！

浏正街那里，四分之三的街道上空冒着浓浓黑烟，黑烟下面，大火正上窜下跳，蔓延扩散。梁柱爆裂，墙壁坍塌，受难者在哭号，救火人员在慌乱地忙碌着。

在瓦砾、木炭和污水狼藉的街边，一个满身尘土的中年妇女跪在水渍里，面向眼前由瓦砾、木炭组成的巨堆不停地磕着头，拜着、呼号着。就在半小时以前，她家的房屋在猝然的灾难中成了眼前杂乱的墓地，她的丈夫被埋葬在这堆瓦砾之中。

浏阳门外的铁路边，日军飞机扔下了一些燃烧弹，那里的百余间小店铺全部变成了灰烬，很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现场除了焦黑的瓦砾、炭灰、骨骼、残肢断臂外，就是弥天的烟火。

一根烧焦的电线杆下，2 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正互相搀扶着。她们一边啼哭，一边呼喊着刚被大火埋葬的丈夫和儿子的名字。在她们身边，围着一块已经烧毁了一半的破棉絮、残破的小凳、小铁锅、碗、盆……

黄昏降临了，长沙陷入了黑暗，眼前的沉寂、凄凉、孤寡们的啼哭以及浓烟、大火、瓦砾代替了昨日的喧闹、车马、人群、夜市，人们的心中，新增添了一份对日军法西斯行径的愤恨。

以上仅仅是对日寇一次大轰炸后长沙人民悲惨情景的片断描述而已。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共达 100 多次，造成的惨剧与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从 1939 年 9 月中旬开始，日军 4 次对长沙用兵，即“四次长沙会战”。在会战中，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使长沙地区的老百姓饱受战火之苦，遭受空前浩劫。

1939 年 9 月 14 日，日军出动 2 个师团约 10 余万人的兵力，派遣 300 多艘舰艇，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长沙发动了猖狂进攻，中日双方展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主力在新墙河渡河南犯，9 月 25 日陷营田，28 日陷平江，接着进扰永安市一带，控制了长沙城北 30 公里以外之地。在控制地区，日军烧杀淫掠，见到粮食、牲畜以及民家什物、金银饰品、法币，均掳掠而去。不便载运之物，则加以焚毁。从湘阴沿长沙袁家岭，至平江县城之道路两旁，房屋全部焚毁，长春街被烧 200 户，嘉义岭三分之二民房被烧，其余各乡房屋被烧情况亦相差无几。日军所到之处，还肆意奸淫妇女，杀戮群众，仅新市一地，被杀百姓就达 500 余人。

1941 年 9 月 7 日，日军出动 4 个师团 10 余万人的兵力，在 100 余架飞机、320 门火炮的掩护下，向长沙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和平野支队与中国守军第九十九军一九七师的一个营血战 2 日后占领青山，竟对手无寸铁的当地群众大施淫威。他们将 400 余名平民百姓用铁丝穿起来，在三圣庙前集体杀害。在新农村，日军将肖蔑生不满周岁的孙子抛在空中用刺刀挑死。一名日军用刺刀戳进一个婴儿的屁股，抓住两腿撕成两块；许清梅一家 8 口人被杀，仅他一人外出得以幸免；肖胜文被打得遍体鳞伤，后用刺刀剖开其胸腹，再用木棍撑开灌满泥沙。在中山村，日军杀掉黄跃文一家 7 人，最后在他的胸腹部砍了 6 刀；一个孕妇被强奸后又割开腹部取出胎儿。在周家嘴，日军用棉被堵住一个地洞，灌进毒气，将躲在里面的 24

名上山材村民全部毒死。9月29日，日军占领长沙，在掠夺了大批粮食和财产后退往岳阳。

1941年12月24日，日军出动7万余兵力，在炮兵、工兵、战车、飞机和舰艇部队的配合下，向长沙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中国方面用14个军的兵力在郊外顽强阻击。1942年1月5日，日军溃败，残部撤退。此次会战，日军使用了飞机轰炸，使妙高峰中学的云南轩图书馆、潇湘一览楼及两间教室，并吾南村5号等建筑物及其中财物均被炸毁。1月4日下午，日军溃退前夕，纵火焚毁了湘雅医学院。

1944年5月29日，日军出动近20万人的兵力，在海、空部队的掩护下，再次大规模进攻长沙。6月19日，长沙沦陷。日军侵入长沙城后，大肆烧杀，长沙人民受尽劫难。日军在城里放了2次大火，从南正街、八角亭、药王街，一直到中山马路、北正街、北大马路口，火光冲天，被烧死、打死的市民尸体堆满了新建的永华、永安两大金店的店堂。在城南一带，除了妙高峰中学、第一中学等少数建筑外，全部被大火焚毁。

日军先后4次入侵长沙地区，使长沙人民遭受了惨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有36460人被日军杀死，46536人受伤，财物损失总计达法币1252亿元。

衡阳大难衡阳地处湘南，是粤汉、湘桂铁路的枢纽和湘、蒸两水的汇合点。日军为了打通粤汉铁路，配合太平洋战争，把衡阳作为重点攻击和破坏的目标。

从1937年9月起，日军就对衡阳进行了空袭。这之后，连年都有轰炸，至1944年6月，总计轰炸了100余次，每次轰炸都给衡阳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1938年中秋节晚上，9架日机侵入衡阳上空，先俯冲飞行，用机枪扫射，后又投下很多炸弹。顿时，城内火光冲天，烟尘弥漫，房屋倒塌，尸横遍地。有对当天结婚的新婚夫妇被双双炸死，新娘的腿被炸得飞挂在树杈上，新郎血肉模糊地躺在树下。

1938年11月的一天，日机20余架飞临衡阳，在城北正街、帝王宫、堰塘巷等处，扫射投弹，死伤居民达千余人。

1939年4月6日，日军大规模轰炸衡阳。这一天，由武汉、南昌等地出动的108架日机，分3批对衡阳轮番轰炸。其中，一批从城北草桥到城南回雁峰；一批从江东岸飞机场到江西岸的大西门、小西门；另一批在北正街、司前街、上下长街、大西门正街一带投下大量燃烧弹。顿时，衡阳全城浓烟弥漫，火光冲天，路上到处是死尸，还有很多人被炸伤，街道房屋烧成焦土。轰炸从上午10时持续到黄昏，大火至夜未熄。2华里的长街化为灰烬，一个伤兵收容所内数百名伤兵全被炸死。这天，共炸死居民近万人，炸毁房屋500余栋。

1940年8月10日、15日，日机两次轰炸衡阳，投弹700余枚，炸死、炸伤居民2000余人。

1941年8月中旬的一天，日军出动飞机86架，侵入衡阳上空，分向各处投弹，炸死数千人，仅回雁峰附近就炸死居民500余人，雁峰寺毁于一旦。

1944年6月19日，长沙沦陷后，日军长驱直入，逼近衡阳。从6月23日开始，日军分3路进攻衡阳，除飞机、大炮猛烈轰击外，还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催泪性和糜烂性毒气袭击我守军，强渡耒河。此外，日军还用飞机投掷大量燃烧弹，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仅在忠爱社临时野战医院，就有数千名

重伤军民被大火吞没。

日军在攻城的同时，还窜到城郊四处掳掠。一队日军到易赖街附近抢粮，并抓了一些老百姓为其挑粮食和炊具。有位姓贺的老人，挑着担子在下坡时滑了一跤，一个日本兵上前就抽打他几鞭子，另一个日本兵端起枪将他击毙。一个性杨的挑夫因担子太重，走得慢了些，日军将他打得头破血流，而后拉到一边枪杀。

一群日军窜到二塘附近一个村子，在竹林中发现了4个藏在里面的妇女，就一哄而上，将她们包围，企图强奸。4个妇女见无法逃脱，就乘隙抱住日军，一同滚进深水塘中，同归于尽。其余的日军见既丧同伙又失猎物，一怒之下，将整个村子全部烧光。

8月8日，衡阳失陷，日军进入一片焦土废墟的市区，对那些来不及撤离的居民和少数店铺进行烧杀抢掠，而对国民党军俘虏，则进行非人的折磨和虐待。日军先将战俘集中在残破的西禅寺院里，后又叫他们运送物资、挖坑埋尸，如发现尚存一息者，也逼着俘虏们将其一并活埋。有近500名伤病战俘被集中关在船山中学，日军不给饭吃，不给医药，任其饿死病死。有些伤病战俘爬到附近菜园摘瓜充饥，被日军岗哨当场用刺刀活活刺死。

因市区破坏惨重，缺乏物资、缺乏女人，于是日军又疏散到城郊和邻县继续作恶。松山乡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被日军打死或奸后杀害，弯弓塘屋场有90多个居民，竟被日军杀死70多人。几个日本兵在二塘附近唐家，用铁丝将唐某穿挂在树上，浇上汽油，点火烧死，又将其妻轮奸后用刺刀刺死。在铁炉门江边，一个日军凌辱了一名抱小孩的妇女后，将母子俩推入江中淹死。日军在一条船上发现了一群避难的男女，就用绳索将男人捆绑起来赶上船尾看押，其余日军分成几组，每组轮奸一个妇女，事后就从河里打上一桶水，浇到被害妇女身上，然后换人奸淫。几个妇女被这样摧残得晕死过去。

因生活条件过于恶劣，很多人死于流行的痢疾、伤寒、疟疾等疾病，有个只有4户16人的桐子坪村，不到一个月，死于瘟疫者达12人。

日军对衡阳的破坏之大实为惊人。原来50万人口的城市，经过日寇47天战火，已化为一片废墟。5万幢房屋被毁，全市仅5幢房屋完好，能住人的仅剩60幢。财产损失约值法币5700多亿元。约3万市民死于战火，伤残者达2.5万余人，死于瘟疫者亦达3万余人。

岳阳之灾 岳阳地处洞庭湖边，是湖南北面之门户。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开始向湖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岳阳首当其冲。

1938年11月上旬，日军从湖北用重兵突袭岳阳，经过几天战斗，击破岳阳国民党守军的防线，于11月11日占领岳阳。当时城内居民大部已南逃避难，日军入城后，挨户砸门连续抢掠2天，然后放火烧房，使城内先锋路、棚厂街、县门口、学坡岭、滨阳门、卫门口和西门正街等地成了一大片瓦砾堆。不久，日军在城内扶植成立伪县政府和维持会，让他们招诱居民回城，搜括钱粮、搜寻年轻妇女当慰安妇供日军寻欢作乐。日军还三五成群自行四出劫掠财物，强奸妇女，甚至逼父奸其女，逼子奸其母，如有不从，当场刺杀。1941年9月20日，5名日军在金沙乡上甘冲屋轮奸一名10多岁的少女，事后又强逼邻居、68岁的吴葵清去行奸，吴痛骂日军无耻，日军将他当场打死抛入粪池中。

对不肯归顺的群众，日军则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加以杀害。

1941年10月，余家瑕村的方朝佩与余幼伢两位青年乘机杀死一名日军

军官，日军后将两人全家7口人抓到驻地，剥光他们的衣服，放出一群军犬将他们活活咬死，然后用尸体喂狗。

1942年1月，日军在潼溪街的一个小塘边上，杀死附近被抓来的26名群众。日军先逼他们跪在塘边上，然后用刀砍头，将尸体踢入塘中，鲜血染红了一片池塘。

日军占领岳阳后，昆山、烟家塘等地人民群众目睹日军奸掠暴行，无不切齿痛恨。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夺取日军枪支，袭击日军据点，破坏公路、桥梁，使日军坐卧不安。日军将这些群众视为眼中之钉，必欲清除而后快。1942年10月19日至25日，日军旅团长他田率领1200名日伪军，对昆山等地进行了连续7天7夜的大规模“清乡”、“扫荡”，将昆山一带纵横10公里的地方包围起来，逐村逐户地搜捕，将老百姓都叫出集中，将房屋全部烧毁。后将集中的村民和从山上抓到的群众分别赶到5个刑场，用机枪、手榴弹和刺刀进行集体屠杀。日军在罗坳和叶家坳抓到400余名无辜百姓，10人一组用绳子连起来，带到田里、塘边或山坡上，迫令他们跪在地上，然后，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疯狂扫射，不到10分钟，数百名村民全部倒下。日军又检查一遍，见到那些还在蠕动的受伤者，就用刺刀补刺，直至全部杀死。日军在烟家塘一带搜捕到167名村民，用绳索将他们一个个全绑在烟家塘后坡的树上，然后用刺刀对着村民的胸部刺去，刀一拔出，血如泉涌，溅得树下满地都是。这次“清乡”、“扫荡”，日军杀害了1800余人，洪山附近几个村庄有72户人家被全部杀绝，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昆山血案”和“烟家塘血案”。

1942年11月，日军在徐家凉亭一带抓获男女群众100余人，带至一稻田中，四面围住，用刺刀和指挥刀将他们一个一个地砍死。

整个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岳阳长达7年时间，共杀害群众4万余人，烧毁房屋9.8万多栋，使许多村庄变成了“无人村”，无数家庭失去了亲人。

常德血火 常德地处洞庭湖南岸，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是湖南的重要粮仓。日军侵占了洞庭湖北岸后，即开始凯觎常德地区了。

1941年11月4日，日军开始用飞机空投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对常德地区施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这天早晨6时许，常德市区响起了空袭警报。不久，一架日军巨型飞机由东向西低飞而来，围着常德市上空盘旋3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向市区方向飞来。日机在市区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空袭警报解除后，市民们将空投物集中，共约500斤，警察局拿了一点去检验，其余全部焚毁。

检验发现空投物中带有烈性传染病细菌。11月11日晚，关庙街有个12岁的女孩蔡桃儿发高烧，周身疼痛。次日，广德医院谭学华医师通过血液、淋巴液检验，诊断她患了鼠疫症，当夜女孩病情恶化，第二天上午不治而死。接着，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此类病例，均迅速死亡。染疫人数越来越多，平均每天有10余人，往往一人有病，波及全家。家住桃源县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染上鼠疫，回家没几天就病死了。他的2个儿子、媳妇和一名幼儿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他全家死后，还波及邻居，以后又死了十几人，连这布贩的岳父也得鼠疫死了。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多岁的老人，病死后被埋葬在自家菜园里，家人在菜地里种菜拔菜，结果一家人先后得鼠疫死去。到1942年3月后，常德的鼠疫才有所缓和，这次鼠疫流行，常德有600余人

受感染而死亡。

1943年11月初，日军调集10余万兵力，分3路向常德地区发动进攻。

日军在进攻常德德山时，先出动飞机轰炸，当即炸死、炸伤近10名无辜居民。有个穷苦的老妇人正在街尾靠山的地里挖野菜，一颗炸弹落在身边，把她炸得四分五裂，一只手臂挂在了电线杆上。日机轰炸过后，大批日军涌向山村，在前后山地挨门挨户搜捕。见到老弱病残及躲避不及者，全部杀死。日军还到附近的村庄掳掠烧杀，使这一带村民绝迹，鸡鸭犬豕杀绝，粮食全部搜去，家具用品被砸烂当柴烧，最后将房屋全部烧毁。

德山附近被夷为平地后，日军又窜至离德山较远的苏家渡、蔡家湾一带奸淫杀掠。

在毛家湾，日军进村，见到人就举枪射击。一群日军在街上发现了一个姓袁的少女，把她剥得一丝不挂，轮奸后用刺刀对准她的阴部猛戳，将其残杀。另一群日军闯到一户居民家里时，夫妇俩慌忙从后门走脱，但来不及抱走睡在床上的2岁多的孩子。日军不见妇女，就搬起一片石磨砸在小孩身上，把这小孩砸成了肉泥。

在苏家渡街后的蔡家湾，一个老年妇女逃避不及被强奸致死，2个年轻妇女被轮奸成疾。码头工人蔡和父子均被乱刀砍死。农民蔡惠全80多岁的祖父，被日军用皮鞭活活抽死。蔡昌保的父亲也被杀死。日军在各家搜掠了很多财物，需人搬运，就在村中抓夫，见到老人，先问你年龄多大，你说多大，日军就叫你挑多少斤。毛家大屋的毛立六已78岁，日军强迫他挑约80斤的重担，可怜这老人连走路都感到吃力，怎么能挑得动！日军先用皮鞭抽打一顿，再将他刺死在大堤上。梅家湾梅述林老人已65岁了，被强迫挑约70斤的担子，走了5里多路，压得头昏眼花，倒在地上，被日军拳打脚踢后关在苏家渡的渡船内。他半夜钻洞逃出，匍匐爬行回家，遍体鳞伤，不久吐血而死。被日军抓去当挑夫的诸志四、曾昭辉等人，都死在外面，连尸首也不知下落。有个叫尹鹤丰的青年，被拉去挑担，夜晚逃脱回家，由于惊吓，不久便精神失常，每到深夜便梦魇惊呼：“日本佬来了，快……”

在枫树岗，农民诸民辉被日军杀死，割下头颅，吊在枫树上，惹得乌鸦在空中盘旋啼鸣不已。有个姑娘被日军抓住，剥光衣服轮奸，后丢入屋前池中淹死。还有一个孕妇遭日军轮奸后流血不止而亡。

日军在黄市港附近的一个村庄，抓了5个老百姓，将他们绑在一起，然后在中间塞了颗手榴弹，顿时5个人被炸得肢体破碎，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也找不到。

在前乡，一群日军抓到一个逃难而来的店员，在押解他的途中，又掳住了一名少妇。几名日军一哄而上，剥她的衣服欲轮奸，忽然发现少妇身上长有疥疮。这时另一名难民路过，于是日军强迫该难民躺在地上，再逼赤身裸体的少妇躺在难民身上，最后逼迫店员去奸淫少妇。不多时，一名日军猛地用刺刀从上贯刺下去，男女3人当场断气。另一群日军抓住姓杨的父女俩，强迫那父亲奸淫自己的女儿，父亲死活不干这禽兽之事，日军一枪将他打死，然后再轮奸他的女儿，直到将她活活折磨至死。还有几名日军在一所茅厕里抓到2个姑娘，掳走轮奸，最后全部枪杀。

在永竹山的一所学校里，一群日军抓获2位年轻的女教师，对她们轮流施暴，后又将她们赤身裸体反绑在校门口的树干上，用刺刀猛戳她们的阴部，她俩挣扎了半个小时后才悲惨地死去。

在善卷村，日军要吃鸡就到村中抓，抓来后踩头、剥皮、去内脏，烤熟后蘸调料吃。要吃肉，到村中搜，发现了猪不管大小，一枪打死，割下两条腿取回，叫被抓来的苦力烧煮。他们对抓来的苦力稍有不满意，就用刺刀刺死。在茅湾黄石港，一个姓问的苦力被日军叫到一棵树下就刺，那苦力不顾一切地捏住日军的刺刀，结果两只手的手指全被割掉。恼怒的日军立即把他杀死，再扒光他的上衣，用尖刀剜出他的心脏。在这群兽兵的心目中，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在作恶时已完全丧失了人性。

在常南二里岗乡有个 32 岁的刘姓妇女，被日军按倒在地上轮奸了 7 次，已气息奄奄，后到的日军仍继续轮奸，直至该女气绝身亡。罗家桥乡有个 12 岁的少女，遭日军奸污后被分尸两段，悬挂在路旁的小树上。

11 月 23 日早晨，日军在石门桥活捉我一个班的军人，当场将这些战俘的头颅砍下，悬挂在树上示众。日军同时还抓到我方士兵与来不及躲避的老百姓 100 多人，将他们押往东门外盐关一间密闭的屋子里，然后喊出一个就用力砍死一个。屋里的人听见外面声响不对，死也不肯出来，日军便在大门口用汽油焚烧。结果屋内除一人冲出逃脱外，100 多人全部死于日军的屠刀下和烈火中。

11 月 24 日，日军从三面包围了常德城。他们先以飞机轰炸。重炮摧毁城防工事及市区建筑，继而施放毒气，最后采取火攻。常德城里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毒气熏人。这次进攻，日军共放毒气 80 余次，仅 11 月 26 日、27 日两天，日军就用飞机、大炮、掷弹筒、毒烟罐等向常德城施放毒气弹 24 次。12 月 7 日，仁和坪的日军用山炮、迫击炮向我十三师傅家庙阵地发射毒弹 500 余发。这些毒剂都是催泪性、喷嚏性、窒息性、糜烂性气体。毒气弹爆炸后，散发的多是芥子气味，初嗅很像厨房里炒辣椒的味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在前线作战部队中普及，战士们就用土法，将随身携带的毛巾擦上些肥皂和酒捂在脸上。如这也没有，就把棉军服的棉絮抽出一部分，再撒些自己的小便当防毒口罩。后来，日军施放窒息性毒气弹，我方中毒者一下上升至千余人。

12 月 12 日，日军占领了常德城，在城中到处搜索国民党五十七师负伤官兵，抓到后集体屠杀。同时还在城内用火烧死 300 余名无辜居民。在城中，日军抢掠市民服饰、粮食，捣毁家具，奸淫妇女，甚至跑到天主教会强奸修女。还抢劫了 7000 多家商店。最后，日军有计划地焚烧城内房屋，全城烟火遮天，到处是破墙残垣，共约 1 万余栋房屋被烧毁。

日军侵占常德，给常德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据统计，常德附近各县，包括桃源、慈利、石门、洋县、安乡、临沅、汉寿等地，有 5.3 万余人被日军杀死，约 19.6 万余人受伤，约 8.35 万人被掠去，3.5 万余名妇女被奸污，其中 4237 名妇女被奸致死。烧去房屋 7.3 万余栋，抢去粮食约 1659 万石，损失耕牛 8.65 万余头。还有 300 余万难民无家可归，流浪他乡。

厂窑屠杀厂窑位于洞庭湖北岸，是一个由 28 个小垸并成的湖州大坑，方圆 50 平方公里，三面环水，形如半岛，土地肥沃，物产富饶。

1943 年 5 月，日军为掠夺滨湖一带的物资，西取常德，威胁长沙，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调集第六、十三、四十、五十八师团以及第十七旅团各一部，共 1.5 万兵力，在空军掩护下，由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兼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指挥，从湖北荆江各渡口大举南犯，发动所谓的“江南战役”。日军相继占领了洞庭湖北岸的华容县、南县、安乡县，逼迫当地

驻军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主力进入南北长 10 公里，东西宽 5 公里的厂窑一带。华容县、南县政府机关、地方武装，及武汉、长沙、滨湖各县的难民共 2 万余人也被逼入这狭长的口袋里了。

5 月 8 日，日军以针谷支队为主力，出动 3000 多兵力，60 余艘汽艇，在空军支援下，从水陆两路对厂窑地区实施包围，使国民党军政人员、逃难群众和当地居民共四五万人加入瓮瓷，成了日军的杀戮对象。

5 月 9 日以后，日军针谷支队主力从鸡窝岭渡河，第十七独立旅团从汀侠南下，开始了以厂窑为中心的大围杀。他们像发狂的野兽，见男人即杀，见房屋即烧，见财物即抢，见妇女即奸淫。

日军窜到永固垸后，即以搜捕国民党残军为名，挨家挨户地搜查，稍有迟疑，当即枪杀。然后把人们驱赶到禾场上，四周架起机枪，威逼人们成排地跪下。叫年轻力壮的男子到沟港里去摸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拖年轻妇女到屋里强奸。在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抓到的 120 多人分批捆在两排杨树上，每棵树捆三四人，然后用机枪扫射，结束后见有活者，再用刺刀戳死。肖明生一家 29 口，数代同堂，有 25 人被杀害。六七平方公里的永固垸，被杀军民有 2000 余人。

日军解决了永固垸后，即扑向约 3.5 公里长的瓦连堤。在堤上，日军挨门逐户搜查，见人即杀，还奸淫了多名妇女，未及逃走的村民几乎全被杀害。农民粟呈光一家 6 口被日军包围，粟呈光想逃走，刚冲出门就被日本兵一刀刺死。其大弟被日本兵抓住后乱刀砍死。二弟正欲出门，被一枪打死。母亲和一个 10 来岁的侄儿被刺死，弟媳被轮奸。农民王仲林一家被日军堵在大门内，父亲王树青刚从田里回来，在门前被日军当胸一刀砍死。弟弟王达素躲在门后，被日军发现，抓住刺了五六刀而死。岳父、岳母和一个吃奶的婴儿都被日军刺死。有很多村民在宋梅甫家避难，日军端着刺刀冲进去，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见到年轻妇女则拖到一边强奸后再杀，结果，仅这一处就杀了 80 多人。有户姓曾的人家，其媳妇怀孕即将分娩，日军在其肚子上猛划一刀，血淋淋的胎儿滚了出来，母子皆死于非命，一群日军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农民彭连山被日军砍成数块，尸块抛进藕塘中。日军杀完人，就放火把村中房屋全烧了。然后小股日军上堤搜索，大股日军则排成长队，沿大堤两侧梳篦式地来回“扫荡”。当时有数千难民以及附近村民躲藏在堤边的沟港、树丛和庄稼地里，凡被日军搜到的，全被杀死，总共有 3000 亲人。当地居民共有 33 户被斩尽杀绝。

在厂窑西部的甸安河一带，被逼在这里的国民党七十三军残部 5000 余人和数千难民，因沅水航道被封锁，欲进不得，欲退不能。日军先派飞机轰炸，骑兵追杀，然后步兵反复搜索、“扫荡”，将他们几乎全部杀害。当时尸横遍野，甸安河成了血河，河中的尸体竟阻断了河流。有首民谣是这样描述的：“甸安河，甸安河！日寇来了遭惨祸。几千同胞齐遇害，尸体挤得个挨个。5 里长河成血海，野狗无桥可通过。”

在厂窑河边，集结了从各地逃难来的大小船只和当地民船近 3000 艘，有船民和难民万余人。日军先派汽艇来回巡逻，堵截船只，封锁航道，并用飞机轰炸、扫射。然后派出大批部队登船搜索，把船民和难民全部驱赶上岸，将船上的金银细软、粮油食品抢劫一空，最后在船上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熊熊大火燃烧数日，昼夜不熄。对驱赶上岸的船民和难民，则进行集体屠杀。或用机枪扫、刺刀捅；或用纤索把三五十人拴成一串，拖在汽艇后面淹死；

或用长纤索以双套活结逐人套入颈项，用力绷直，再赶入水中，把头尾两人砍死。头尾倒下，绳索越拉越紧，其余的人被活活勒死，没有死的再补上一刀。日军就这样血腥屠杀了近7000人，河滩上躺满了尸体，水里也到处可见漂浮着的尸体。

除了以上地方，日军在厂窑的其他各处亦杀害了很多群众。日军采用的杀人方法有割耳朵、绞舌头、剁四肢、挖心脏、取胆囊、刺肛门、火烧盐胯等，残忍至极。还用铁丝穿过各人的锁骨，将十几人连成一串，做步枪射击“穿透能力”试验。在同成烷，日军将60余岁的农民汪宏奎的舌头与下颚割掉，使其痛得死去活来，几天后才慢慢死去。在汀泱洲，将陈况生、陈若林兄弟俩的舌头绞掉，再往口里灌泥沙，最后将他俩剁成几块，丢入河里。在罗裁缝家，日军用刺刀刺进了一个刚满周岁小孩的肛门，将其杀死。在浹北，日军将一个姓周的农民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上盐，再用坛子在其身上滚动，直到把他折磨至死。有个日军用刺刀刺穿了农民高丰华1岁多孙子的胸口，扛在肩上走了数百米，再扔进正在焚烧的房子中。日军还将2个难民绑在树上，用刀剖开肚子，将胆囊取出，然后将胆汁挤入瓶内“珍藏”起来。

穷凶极恶的日本兵蹂躏我女同胞的罪行更是令人发指。在茅草街，2名日军闯入一户人家，轮奸了一个才10岁的女孩。一群日军在一条乌篷船上，对一名年仅12岁的女孩施暴轮奸，将她摧残致死并抛入河中。在德福村，有一个60余岁的老年妇女，见日军抢杀了她的2个儿子，就跑出屋去，想与日军交涉论理。刚一出屋，就被4名日军抓住惨遭轮奸。有一位62岁的老太被8个兽兵轮奸后，用刺刀从阴道刺到小腹致死。瓦连堤有个孕妇惨遭7个日本兵的轮奸，腹部也被这些兽兵踢伤，几天后就悲惨地死去了。

于家垵一户人家，有4名妇女被日军强奸，最后，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捅刺阴户致死，有的被日军用异物塞入阴户致死，有的被日军活剐，惨不忍睹。

从5月8日开始，日军的屠杀持续了整整4天4夜，总共杀死我同胞3.2万人，杀绝200余户，摧残致伤者3000余人，强奸妇女2000余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焚毁船只近3000艘。

惨案过后，厂窑地区断墙残垣，尸体满地，河水变色，腥臭难闻，乌鸦成群，野狗遍野。这是继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又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屠杀。

三、陷落的海岛

三灶岛上的恐怖统治，海南岛上的“三光”……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

在南海沿海有许多美丽宁静的海岛，就像一颗颗晶莹洁白的珍珠撒落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但在8年抗战中，这些可爱、平和的大小岛屿也未能逃脱日军贪婪的魔爪。

三灶岛上的恐怖统治 三灶岛是广东省珠海市（原属中山县）112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位于珠江口畔、南海之滨，与南面的万山群岛遥相对峙。岛上山峦重叠，海湾险要。周围海面辽阔、水位较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军港。

该岛属亚热带气候，全年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又处于咸淡水交界处，浮游生物多，便于鱼类觅食、栖息、产卵，水产资源丰富。因此，岛上居民亦农亦渔，生活还过得去。

1937年8月，日军占领荷包岛、高栏岛，欲在当地建立海、空军基地。后来日军发现那里地势不怎么理想，遂改而觊觎三灶岛。

1937年11月4日，日军先出动2架飞机，在三灶岛上空侦察地形。次日早晨3时许，日军从高栏岛抽调军队400余人，分乘2艘舰艇直向三灶岛南部驶来，靠泊在莲塘湾。接着来了一架飞机，低空飞行，向地面散投传单。传单上伪称日军将要在这里进行登陆军事演习，当地居民勿自惊扰。还对岛民提出要求：日本“皇军”到乡，所有父老应排列村口，两手高举，以示欢迎。村民如有刀枪武器者，一概缴出。最后，又恫吓老百姓说，如若违反，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等等。

不多时，日军果然大规模登陆进犯。当地群众闻讯大批日军来岛，纷纷向山后逃避。当时，日军因不熟悉当地地形，不敢贸然深入岛内，就在莲塘湾附近各乡占驻，对乡民多有骚扰。登陆岛上24天后，日军全部撤离。

1938年农历正月十七日上午11时，日军出动6000余兵力，分乘20多艘舰艇在莲塘湾再次登陆，第二次入侵三灶岛。这次，日军在岛上设立下陆、海、空军司令部，由曾指挥入侵万山群岛的滕田中将出任司令，配备有步兵陆战队、海军防御大队和一个空军师，包括20余艘军用船只和100多架飞机。

日军占领三灶岛后，对岛上的居民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当地人民不畏强暴，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日军。如定家湾关帝庙里占住着11名日军，结果被当地村民杀死了10个，还有一个只得仓惶逃回队部。鱼弄村农民罗定志、袁定池等人，某天傍晚埋伏在村西南的路旁，乘隙杀死了一名日本军官……

日军对当地的抗日民众又恨又怕，于是，他们以日军被杀事件为借口，叫嚣要“斩草除根”。三灶岛人民将面临一场血雨腥风的灾难。

1938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日军连续3天对三灶岛的鱼弄、上表等37个村庄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三月十二日，日军出动大批军队，浩浩荡荡地向鱼弄村进发，准备“剿灭”当地村民。鱼弄村的村民们见日军大批人马向本村扑来，迅速互递消息，紧急上山躲避。

等到日军进村，已是人去房空。面对一座空村，带队的日本军官马上指使汉奸上山，设法诱骗群众下山回村。

一些甘心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战战兢兢地来到半山腰，对着山上大声呼喊：“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大家放心下山来吧！……快快下山！……下山来领取良民证！……”

山上的村民大多数不相信这些汉奸的鬼话，仍然在山上观察着村中的动向。

日军军官见下山来的人不多，不便于整体“剿灭”，于是命令部队上山抓捕。

日军上山抓到群众后就残忍地用铁丝穿透每个人的手心，然后用麻绳串绑起来，牵着下山，关进村中的祠堂里。对那些自愿下山的“顺民”，亦如法炮制。

祠堂里的人越关越多，最后集中了386名村民。

接着，日军从人群中选出30多个年轻力壮的村民，逼迫他们挖一个3丈见方、7尺多深的大坑。待大坑挖好，已是下午5点多

下午6时许，日军将祠堂里被捆绑的村民5人一串、10人一排地全部拉

到坑边，还有那些挖坑的村民也被拉到坑边。坑的外围，架设了机枪，四周有端枪的日军密切监视着。

日军军官一声令下，机枪手对着村民们疯狂扫射起来。霎时间，枪林弹雨，机枪扫射声与人们的惨叫声混成一片。

直到村民们全部倒下后，机枪才停止了射击。然后，日军将尸体都推到坑中，洒上汽油，焚尸灭迹。

十三日傍晚，日军出动大批军队，分别扑到上表、草塘、圣堂等 36 个村庄。日军进村后，立即点火烧房。村民们见房屋起火，纷纷冲出屋子，逃向村外。但多数人立即被日军抓住，只有少数人乘乱逃脱。那些不能逃的老弱病残则被大火吞没，活活烧死。日军来到海边，即纵火焚烧渔船。到了晚上，只见岛上星星点点，到处是日军制造的火场。这场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共烧去房屋 3264 间，渔船 164 艘。

第二天，日军将抓到的村民分别押往草塘沙岗、莲塘沙栏、春园祠堂、石湾关帝庙、鱼林先锋坑、青湾等地进行血腥屠杀。男的用木棒打死，女的强奸后砸死或刺死，小孩则抛入水中溺死或刺死，无一幸免。仅春园祠堂就有 60 余名妇女和小孩惨遭杀害。

日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岛上居民的无比仇恨，他们纷纷组织起壮丁队，断电线、毁工事、夺武器、杀鬼子，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敌人，开展抗暴斗争。

日军连连遭到壮丁队的袭击，对岛上居民的报复亦更凶残。他们成百地杀害无辜村民，成千地抓捕成年男女。抓到男的，逼迫其充当苦役；抓到女的，则迫令其充当慰安妇。日军在莲塘湾的大本营内，就开设了一家很大的慰安所，供兽兵们淫乐。

日军为了把三灶岛作为其侵略华南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选择在该岛的田心乡旷地建造飞机场。他们强征民工，将全岛三分之二的农民劳力抽去砍伐树木、挖掘壕沟、布置铁网、平整跑道、建筑工事。由于岛上人数不够，日军还从台湾、朝鲜征来 3000 多名苦力一起劳动。

造成的机场最初只能停机 10 余架，后又逐渐扩大，能容飞机数十架。日军还在附近山下建造机库，将大多数的飞机藏入库中，以防遭到袭击。后来日军又强迫民工将土质机场地面全部改建为 60 厘米厚的混凝土地面，以便于重型轰炸机升降。机场及军营四周，加筑堡垒、壕沟等防御工事、又派轻舟快艇不分昼夜在海面巡逻，以防被袭。

1939 年，占地 1800 多亩的飞机场初步建成，其主跑道长 1300 米，副跑道长 850 米，4000 平方米以上的停机坪有 9 个，可停放飞机 100 余架。后来经常轰炸广州和佛山等地的飞机，都由三灶机场起飞。为了保守军事机密，机场建成后、日军将那些修建机场、工事的民工全部杀害，其中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活埋。

日军从台湾运来大批军需品储存在三灶岛。为了防范壮丁队的袭击，日军增调台湾、朝鲜籍工兵 300 余人、日籍陆战队 200 余人到岛上，负责保卫这些军需品。另派出军舰一艘、汽船 10 余艘、武装渔船 4 艘，加强巡逻。

日军增兵三灶岛后，对岛上居民的压迫更加厉害。他们要各村实行“联保制”，10 人联保，每夜 10 时点名，禁止出入，一人有罪，联保之人同受惩处。日军还大肆掳劫渔民和农民的粮食，岛民的财物及工具等都被洗劫，以致无以为生。壮丁们被抓到澄海修建飞机场，或抓到大林矿山做苦役，剩余的群众纷纷离乡背井，向外逃生。1943 年华南大饥荒，瘟疫流行，很多逃

亡者饥病交加，客死他乡。

日寇对三灶岛的侵占统治，使当地人民饱受创伤。8年中，岛上同胞被杀害者达2891人，饿死3500余人，卖儿鬻女186人，使岛上居民从原来的2716户、12577人，降为战后的914户、6000余人。有些乡村的灾难特别深重，如鱼林乡战前有482户、2123人，被日军杀害160户250人，淹死饿死896人，卖掉的子女88人，战后仅存220户826人。又如草塘村，战前有1200余人，战后仅剩218人。

海南岛上的“三光”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原属广东省，位于南海之中，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要道。

日本军国主义要向东南亚、南亚扩张，就要将海南岛作为其南侵的跳板。于是，1939年2月，日本派兵侵占了海南岛。

日军虽然侵占了海南岛，但海岛的东部仍有一块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华南敌后解放区一部分的琼崖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展开积极主动的军事斗争，给当地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巩固占领地区，消灭琼崖根据地军民，日军加强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频繁、残酷的“扫荡”，疯狂蹂躏根据地人民。

1939年9月，日军1000余人，分兵4路合击我琼山根据地，以后日军又连续不断地对琼山根据地发动疯狂的“扫荡”。

1940年12月17日，日军1000余人围攻海南美合根据地，疯狂屠杀当地人民群众，琼崖抗日公学内的100余名伤员和华侨惨遭杀害。

琼山县长泰村，是当年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的故乡，也是海南岛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日军侵入海南岛后，即把长泰村一带地区作为“扫荡”重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长泰村更是多次惨遭蹂躏。几年来，这个原有33户220口人的山村，被日军杀害的有95人，19户被斩尽杀绝。全村有10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其中有70多岁的老妇和未成年的小女孩。

1942年8月的一天中午，日军突然包围了长泰村。当时有17名妇女和儿童正在吃午饭来不及逃生，被日军抓住。日军一哄而上，将其中的11名妇女全部强奸，然后把她们和剩下的6名不满10岁的儿童一起赶到一间厨房里，堵住门窗，四周堆放柴草，浇上汽油，放火将这17人全部活活烧死。有个农民在惨案发生后回到村里，在人肉焦炭中找到了已有6个月身孕的妻子，其妻肚子已被烧爆，胎儿也露出腹外。

1942年10月起，日军调集了第十五、十八两个警备队，对海南岛琼山、文昌两县接壤的许多乡村进行了大“扫荡”，实行野蛮至极的“三光”政策，企图把这一带变成“无人区”。从1942年冬至1943年，该地区共有一万余人无辜被杀。其中文昌县南阳乡的群众全部被杀绝，房屋全部被烧光。琼山县树德乡也有5个村的群众被斩尽杀绝，村庄夷为平地。就连村子里的木瓜树、芭蕉树、椰子树、菠萝蜜树也被砍伐殆尽。日军在咸来乡的一座木石桥边，一个早晨就用刺刀刺死了200多名妇女和儿童。

1942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日军窜到云龙乡，把42名村民集合起来，押进一间祠堂，然后向祠堂内灌汽油，将无辜的群众全部活活烧死。日军在强奸一位怀孕几个月的妇女后将她杀死，还剖腹取出胎儿放在母亲尸体上取乐。

1943年5月的一个下午，日军突然包围了海南三江云石村。当时村里的所有男人都已逃跑，只剩下27名妇女和小孩。日军先挨家挨户搜查，将妇女

小孩全部捆绑起来，集中到场上看押。然后，日军将村中房屋全部点上火，让其焚烧，再回到场上，架起机枪对着妇女小孩疯狂扫射，场上妇孺全部倒地死亡，日军还不放心，恐有活人在地，遂向尸堆中掷了两颗手榴弹，炸得尸体血肉横飞，支离破碎。

从1939年初日军侵占海南岛至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的6年多时间里，日军对琼崖根据地军民发动了无数次的“扫荡”，其中较大规模的就有十几次。日军所至，只见刀光血影，浓烟烈火，给当地留下的只是遍野横尸，焦土废墟。

苦难的南澳岛 南澳岛属琉球、台湾之脉系，位于东海与南海之间、闽粤交界处，广东省的东端。岛上群山连绵，峰峦矗立。海岸线总长77公里，周围有南澎列岛、勒门列岛、凤屿岛等22个大小岛屿。东南面临太平洋，与台湾、澎湖、金门相望，在华南海面具有重要军事地位，亦是海上渔业贸易的重要通道。岛上居民主要从事渔业。

1938年夏天，日军大举向南澳岛进犯，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登陆。从此，南澳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日军侵入南澳岛后，实行“封海”政策，严禁渔民出海捕鱼、并把大量的渔船、竹排烧毁，断了渔民们的生路。在乡村中，则实行凶残至极的“三光”政策。

日军进乡后，见人就杀，对有些妇女则是先奸后杀。在前江的一次大屠杀中，日军共杀害民众334人，其中有86名妇女，大都是奸淫不遂或强奸后被杀的。日军还将7名妇女掠到后江蹂躏，其中1名还怀有身孕。事后，日军用刺刀将她们一一刺死。在其他地方，有的妇女被奸淫后扔进大海，有的孩子被活埋。日军还威逼渔民带路，上山搜索我抗日军人，稍有不从，即被枪杀。有的地方粮食全被日军抢光，当地群众不能忍受饥饿，又找不到其他食物，就偷偷出海捕鱼，一被日军发现就遭杀害，尸体抛入海里喂鱼。

日军在岛上大肆杀人的同时，还大肆抢掠、烧房、烧船。仅在隆东乡、隆西乡，日军就烧毁房屋3900余间，烧毁渔船、竹排462只，抢去衣物2000余件，大米3000余石。陞粤、云粤、深粤、青粤等地被日军烧成一片焦土，满目颓垣瓦砾。日军在烧房前，先进入民宅搜索，发现细软值钱之物、一概掠去。

岛上居民财物被掠，房屋被烧，无家可归，又不能出海捕鱼，纷纷逃往山里。市镇成了废墟，到处是腐臭的死尸和黑污的血痕，导致瘟疫蔓延，无数渔民死于疾病。

南澳岛原有2万余人，被杀2000人以上，被毁渔船1000余艘，使6700余人成为难民，孤儿、难童800余人。

日军侵占南澳岛后，就直接面对着对岸大陆的广东潮汕地区了。1939年夏，日军大批军舰在航空母舰掩护下，由南澳的澳弯起渡，占据了汕头、澄海、潮阳等地。

日军来到汕头市郊的金沙乡，见人就杀，第一天就杀了300余乡民。日军把50余名农民的掌心刺穿，然后用铁丝穿过，连成一串押走，最后用刺刀全部刺死。后来又从金沙乡抓走700余名青壮年，把他们送到海南岛、菲律宾等地当劳工。这些劳工在外受尽折磨，很多人先后被日军处死或累死病死。至抗战胜利后，仅有10多人返回家乡。金沙乡原有7000多人，抗战期间，被日军先后杀害800余人，抓走900余人，很多人不堪忍受日军残酷统治，

远走他乡。至抗战胜利之时，金沙乡只剩 3500 人左右，减少了一半人口。

1939 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军侵入潮阳县海门镇，大肆烧杀。1941 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日军烧毁了北门和睦桥后，又在全城进行大烧杀。抗战期间，海门镇共有 1400 余间房屋、467 条渔船被烧毁，140 余人被砍头、570 余人被活埋。日军占领海门后，封锁海港，不准渔民出海捕鱼，使广大渔民断了生路。日军还统制物资，在通行要道上设哨站，对过境人员、货物严加盘查，凡是食品一律没收。1943 年 4 月、5 月闹饥荒，全镇约 1.8 万人被活活饿死，饥毙的路尸到处都是，以致横街塞巷。还有 1.5 万余人被迫流落他乡。

第五章 三十万人的冤魂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进逼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陷，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市民和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士兵落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南京城成了血淋淋的人间地狱……

一、金陵古城陷入魔爪

太阳旗映着落日的血色与浓重的硝烟，在南京城头升起

南京是中国的历史名城，人称金陵古城。当时，它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在侵略者看来，攻占南京是对“支那”决定性的一战，只要把中国的首都攻下，一个国家就亡了。于是，淞沪会战的炮火刚熄。日军大本营又在1937年12月1日下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中国首都南京！”

为了迅速拿下南京，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10万日军在松井石根的统率下，分兵3路，向南京城实行大钳形的围攻。东路由中岛师团长率领，沿沪宁线进袭镇江，然后沿尤潭、栖霞山一线，进攻紫金山，占领主峰制高点，正面插进南京城；中路由谷寿夫师团长率领，循宁杭线，取溧水、句容，攻占雨花台，袭南京之背，由中华门进城；西路由牛岛师团长率领，自广德、宣城、芜湖，截断南京中国军队的退路，以迂回方式包抄南京。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当局不断鼓吹武士道精神，鼓动入侵官兵好战、要强、争功的情绪，唆使纵容入侵官兵以最残酷、最恐怖的手段，达到征服中国人民的目的。

松井石根在部署进攻南京的军事会议上谆谆告诫他的师团长们：“我们大日本帝国建国2600年，皇军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败仗，惟有回顾这一历史伟大事迹，才能产生粉碎敌人的信心，要拿出我们大和民族武士道的精神，克服任何困难和障碍而前进，坚决拿下南京，以保持帝国的荣誉！”松井的法西斯侵略言论，煽动着师团长们争强好胜的野心，使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攻占中国首都的战斗中立下头功，其中尤力突出的要数谷寿夫。

谷寿夫是日本昭和军阀中一员惯于冲锋陷阵、生性极为残暴的悍将。他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就已从军，在我国东北与俄军激战，曾为日军立下功勋。从此，谷寿夫在日本陆军中不断擢升，青云直上，至1937年，他已晋升为日本陆军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七·七”事变后，他率部来华，先后在卢沟桥所在地的永定河上，以及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处作战，跋扈骄横，不可一世。这次在攻占南京的战斗中，他下决心要率部抢先攻入南京，抢这个头功。

谷寿夫的师团司令部设在宜兴。他在那里不断召集联队以上的军官会议，反复鼓动“第六师团是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是精锐部队”，“第六师团一定要抢在别的师团前面进入南京”。不断鼓吹“现在是我们效忠天皇陛下的良机，希望每一个人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时机！”他还宣布：“首先攻入南京的部队，一律重赏！还要放假。”谷寿夫的鼓动使他的属下兽心勃发，抢先攻入南京的欲望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他们也不断向谷寿夫表示决心，“一定不辜负师团长的厚望，请师团长在指挥所等待我们的捷报！”他们当然更懂得“重赏”和“放假”的含义，那就是说，官兵们可以在南京这座名城中随心所欲，痛痛快快地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这对于远离国土、思恋家眷，

正需要发泄兽性的日军官兵而言，无疑是最富有刺激性的诱惑。于是，侵略官兵就像一群最凶残的野兽向南京扑去。

为了固守南京，蒋介石在12月1日前，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研究对策，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虽然唐生智名义上有15个师的部队，可实际上只有10万多人，参战部队大多是上海战场败退下来的，未及休整补充，便仓促上阵，其中又有部分是连枪也不会放的刚补充的新兵。

12月8日，日军三路兵力同时发起对南京正面进攻。

12月9日，日军飞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雪花般的劝降书从空中飘落下来。唐生智怒不可遏，将劝降书往地下一扔，向守城部队发出命令：“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军心。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照委员长命令接连坐法从严惩办！”同时命令炮兵予以回击，城内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巷战。但是，当日军逼近南京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却电令南京：“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于是，唐生智于12月12日下午匆匆召开了师长以上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南京，当晚突围。这一命令下达后，10多万守城部队即开始混乱，纷纷从西门和北门撤退。在日军炮火和飞机的扫射下，只有少数部队冲出重围，按照计划路线向浙皖边区转移，其余大部分牺牲。有些来不及撤退的士兵，丢弃武器军服，散落在附近农村或躲入难民区，南京实际上已是一座“无力抵抗的城市”。

与唐生智宣布放弃南京的同时，谷寿夫师团白土光臣联队所属的野田直树中队已率先攻占雨花台，并用重炮轰开中华门，抢到了攻进南京城的头功。当时野田直树登上中华门城楼，用右手的食指蘸着城头上战死的中国士兵的鲜血，在城楼古老的柱子上写下血淋淋的文字：“12月12日野田中队占领。”随后，他又拿过太阳旗，带着士兵直奔礁楼，把它插在城楼东边已经剥落的朱红色窗户格子里，太阳旗在落日的血色与浓重硝烟的映衬下，狰狞地在南京城头飘起。

谷寿夫用望远镜看到了插在城门楼上的日本国旗，洋洋得意地点点头，一面向身边前来报告的白土光臣祝贺首先攻进南京，一面拿起电话，向松井司令官报告第六师团已经攻进中华门的消息。松井听后大加赞赏：“第六师团首先攻入支那首都，立下赫赫功勋，等待大军进城以后，我一定要请求东京陆军省给你们论功行赏”。

夜色已越来越浓，南京城家家户户都关上了大门。有的锁上门逃难去了，有的不敢睡觉，紧闭大门，躲在床下桌下，或者蒙头大睡，怕听到窗外门口的任何响动。街道死一样寂静，像是一条条墓道，悄无声息。唯有驻扎在城周围的侵略军瞪着那凶残的眼睛，望着城里……

南京陷落了！

二、砍头竞赛集体屠杀

杀人比赛：看谁最先用刀劈死100个中国人；一把砍死了300人的军刀

13日早晨，恐怖笼罩天宇。谷寿夫与中岛、牛岛、木松等部队，从雨花台、光华门、中华门三路入城。

谷寿夫的第六师团安置在贡院街原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里。这里警戒

森严，门口停了 2 辆战车，4 个门卫手执上了刺刀的步枪，眼睛盯着马路上的动静、生怕有什么不测。附近的房屋都给烧了，变成了一片瓦砾堆。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阵寒风吹过，残存在路旁树上的黄叶，不时有三五片飘落下来，静静地躺在地上，一片凄凉、冷漠和阴森的景象。这里从此就成了南京大屠杀的大本营、阎王殿。

兽军驻扎下来以后，士兵涌上大街，如同动物园里所有关锁野兽的铁门都打开了，一群又一群饥饿的野兽都扑向大街，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

兽军使用机枪、冲锋枪和手枪，对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等马路上逃命的人群疯狂地射击，只见成群结队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及混杂在难民队伍中的放下武器的国民党散兵和伤兵纷纷倒毙在街头。南京这座有 24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到处听到救命的呼喊，到处有鲜血在流，整个城内尸体纵横，血肉狼籍。

在大屠杀中，兽军不仅使用现代化武器，而且还采取了种种原始野蛮、残酷无比的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剖腹、挖心、水溺、火烧、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这些杀人狂竟通过上述屠杀中国同胞的方法来寻欢取乐：

他们把被俘士兵第百人连结一团，作刀靶练习劈刺；把过路青年悬挂在电线上，下面堆放干柴，点火燃烧；把许多难民绑到广场上，令他们站开，分排立定，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用机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汽油燃烧，全场一片火光，将死未死的难民惨叫奔跑，日军则狂笑引以为乐。

在南京东风头，有一个面积很大、数人深的粪池，日军硬说这粪池里藏有值钱的东西，便吆赶来 30 多位中国百姓，硬逼着他们下粪池去打捞。时值严冬，天寒地冻，30 多位中国同胞既冷又怕，站在粪池边上瑟瑟发抖。兽兵们见状，随手便是一枪，一位同胞中弹倒地，当场惨死。其余同胞抖得更厉害了，日兵却发出疯狂的狞笑，他们不再喝令也不再催迫，却把在粪池边上哀哭求饶的中国百姓当作活靶，每次枪声响处，便有一人猝然栽倒在粪池里。灭绝人性的日军在连杀 10 余人后，再用步枪横扫猛击，把其余中国百姓尽数扫下粪池。粪汁四溅，骇呼凄厉，连兽军也连连倒退。渐渐地，大粪池里安静了下来，那些中国同胞都沉入了池底。这时，兽军却吹着口哨，得意而去。

在南京板桥附近有条小河，水深仅没膝，当地居民为了避免敌军过河杀人，将河上的小桥拆了。当日军杀至该地，无法过河时，便从附近村庄内捉来乡民，强迫他们伏于河中，乡民不肯，兽军就用刺刀威吓，并以枪柄猛打。无奈之下，乡民们只好伏于水中，层层叠起，作成一座“人桥”。兽军在上面来回践踏，又用刺刀乱戳，玩累后即鼓掌大笑而去，乡民们有的被淹死，有的被戳死，无一生还。

在南京的一所福音堂里，有 3 位 60 岁以上的老太躲在其中。3 名凶狠的日本士兵进堂搜查，老太们一一落入恶魔手中。兽兵竟强迫老太们脱去衣服，然后有的用刺刀拨动老太干瘪的乳房，让老太哭喊；有的用小刀乱戳其阴户，令老太怪叫，直到把三个老太活活折磨死了，他们才狂笑而去。

在全城杀人如麻的兽行中，杀得最凶残的是向井和野田。他们两人都是谷寿夫师团白土光臣联队的下级军官。这两头嗜血成性的野兽，竟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杀人取乐比赛：即看谁能用最短的时间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人的方法只能用刀劈，就像劈柴禾一样，看谁首先劈死 100 个中国人、杀完后在南京最高的地方紫金山会台，以示“皇军”的威风和气派。

还有一个叫田中军吉的日军中队长，竟用一把锋利的战刀先后砍杀了整整 300 个中国人。

对兽军在南京的“杀人比赛”日本当局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在报刊杂志上刊出了向井和野田持刀拎人头的照片与田中那把浸透我同胞鲜血的军刀照片，作为“耀扬国威”的“光荣举动”。

在进行街巷零星屠杀的同时，占领南京的日军遵照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关于“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的命令，从 12 月 13 日开始，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怀疑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大现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集体屠杀又是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列举了以下几例：

1937 年 12 月 15 日，谷寿夫命令贺屋大队将 3000 余名中国军警，解赴汉中门外实行集体杀害。

当日早饭后，贺屋大队长根据谷寿夫的命令，带队向着水西门莫愁湖方向走去。在莫愁湖公园里关着 3000 多名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军人，他们多数是十二军所属 88 师和七十四军所属 51 师以及教导总队的，这些都是唐生智宣布放弃南京后，来不及撤退的部队。他们从中华门、水西门和紫金山溃退下来后，就像大海上没有舵的船只一样，不知驶向何方，也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归宿。他们想出城，可是城门都有敌人把守；想躲到百姓家里去，但是家家户户都紧闭门户，于是只好在公共场所和小巷角落里藏身。敌人进了城，到处搜查，一个个、一群群地被俘虏了。在城南和城西区一带被抓到的，陆陆续续送到莫愁湖公园里监禁起来。

贺屋大队到莫愁湖以前，日军看守早已把园内各个建筑物的门打开，里面走出一批批由于缺少睡眠和营养而显得疲惫不堪的被俘军人。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装，有的上衣是灰布棉袄，下面却是单军裤；有的全换上了老百姓服装，可是脚上却穿着胶底军用鞋。他们迈着迟缓的步子，有气无力地站在那儿。敌人欺骗俘虏，说是转移到别处去，要他们排成 4 路纵队，25 排编成一个长方形队形。日军用在水里浸过的结实麻绳把这个俘虏的左手和那个俘虏的右手捆在一起，一根绳子接着一根绳子，把 50 个俘虏捆成一串，两串合在一块，正好是 100 人的长方形队形。

一个小队的日兵在前面开路，长方形的俘虏队伍在他们身后缓缓移动。俘虏两边，隔一段便有持枪的日本兵警戒，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在后面押着俘虏的是一个中队的日兵，贺屋太郎则骑着枣红色的大洋马走在最后，一路上还耀武扬威地东张西望。他们过了秦淮河上的石城桥，来到汉中门外。这里荒无人烟，城墙下一片杂草。秦淮河冰块破碎，露出发黑的脏水，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队伍走到西柴丁附近，便停了下来。等俘虏都走到高大古老的城墙脚下，日军命令他们改成 8 路纵队，贴着城墙，不许动。当俘虏们还未来得及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10 架轻机枪就同时喷出了火舌，俘虏们顿时一排排倒了下去，好久，枪声才逐渐停止。然后，兽兵们就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尸首分别从两头检查，发现活的就补上一枪。空气中尽是浓烈的、令人欲呕的血腥气，汨汨流淌的鲜血，由于天寒地冻，很快凝结起来，以致兽兵们的军靴竟沾上了一二寸厚的血膏。

为了掩盖屠杀俘虏的滔天罪行，日军把带来的汽油向尸体上浇去，然后点火焚化。汽油和尸体的脂肪使得火焰越来越大，在吱吱的燃烧声中，还掺

杂着尚未断气者凄厉的哀叫。

第二天，汉中门外成堆的尸体尚在冒着刺鼻的黑烟，日军的屠刀又杀向了华侨招待所。那儿已拘押了 5000 多名难民，男女老少都有，双手都被反绑。日军把他们排成 4 路纵队，押往中山码头。这些人都是无辜老百姓，他们没有参加过军队，也不懂得什么叫纵队，出了华侨招待所就不成为队形了，只是拖拖拉拉地茫茫然向前走去。一过了挹江门，大家以为要押送他们过江，原先走不动的人，都加快了步伐，准备抢先上船渡江，好逃出灾难重重的古城。等他们走到中山码头的时候，码头边却没有一只渡轮，江边的水是红的，一些无人的木船夹杂在江面漂着的无数尸体中浮荡。

兽兵们非常吃力地迫使 5000 多难民站在码头上，然后又命令他们一律面对长江，不准回头。正当大家望着江中漂的尸体发愣，希望渡轮快来把他们送过江去时，背后 10 多挺轻机枪“格格”地向他们扫射过来。转瞬码头上哀呼号叫，血肉横飞，难民们不是栽进江里。就是倒在码头上。扫射完后，不管死的还是活的，日军把他们统统扔下江去。捆着双手的难民尸首在江里随波逐流，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死不瞑目，有的血肉模糊。码头附近的尸体更是层层叠叠，血水染红了长江。

12 月 18 日夜间，被囚在幕府山之中国军民 57418 人又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劫难。

这 5 万多人，是逃难未成而被日军抓住的。南京城陷落那一天，下关江边人潮汹涌，万人攒头，集结在这里的 10 多万军民纷纷抢着过江逃命，其场面混乱无比。在潮水一般的人群中，掺杂着各种各样的车辆，把十数里的江岸挤得水泄不通。突然，远处响起了“轧轧”的战车声，一队队日军直向下关冲来。紧接着，炮声、机枪声伴随哀哭嚎叫直上云霄，下关江滨的 10 多万难民顷刻成了日军的活靶。随着火舌喷出，每一分秒都有成千上百人中弹倒地。人们东突西闯，狂呼奔逃，但是日军的火网，早已严密封锁了每一条逃生之路。结果，除了被打死的与跳江淹死的，约有数万人被抓。这些人以后陆续外逃被抓的军民一起，作为俘虏关押在中央门外的幕府山上。

幕府山一片荒凉。光秃秃的杂树和枯草间，有 10 多排乱竹支架起来的草房，这里原是教导总队野营训练时的临时营房，四周用竹篱围着，还装上了铁丝网，铁丝网外边是陡峭的壕沟，如今却成了理想的牢房。

十几排草房中都塞满了人，背靠背，面对面地挤在一起。这里没有吃、没有喝，只有兽性和暴行。日军拿着粗大的木棍和刺刀在巡逻，大声说话的，好强反抗的，就用木棍狠命地揍，或者用刺刀使劲地捅。女人的尖叫和呼喊产日夜不断，每天都有被奸死的妇女扔进深深的壕沟。12 月 16 日夜里，一个四川兵把芦席草盖的大礼堂点着了。一刹那，风吼火啸，烈焰腾空！草屋里的人都趁机冲出门朝外面奔跑！日本兵的军号“嘀嘀哒哒”地吹了起来，四周的机关枪开火了。已经爬上铁丝网的，像风扫落叶般地掉下来；踩着人背越过铁丝网跳下壕沟的，也在爬陡峭的沟壁时纷纷被打死在深沟中。人群像没头苍蝇似地到处乱窜，混乱中，不少人跑进伙房，抓起水缸中的大米饭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吞咽，这是他们 4 天来第一次吃饭。礼堂烧成了灰，人潮渐渐平息下来，奔逃的人群死了好几千，其余的被抓了起来。

18 日早晨，天还没亮，几辆卡车开进了幕府山。车上装的全是整匹的白洋布。鬼子兵一群一群地守在每排草房的门口，用刺刀把白洋布“吱啦吱啦”地撕成布条子。

大约凌晨4点钟，日本兵吼着让难民从草屋中出来。草屋里的人一个个地出了门，门口的日本兵用白布条将出来的人先是背着手反绑，再把两个人肩膀靠肩膀捆起来。哪个要犟一犟，当场就是一刀。就这样，一直绑到下午4点钟左右才结束。然后，难民4个人一排，像一条黑色的长蛇，从幕府山的草房里慢慢地游动出来。

拖着沉重的脚步，队伍来到了老虎山下的江边。这地方叫草鞋峡，又叫上元门、大窝子。冬季是枯水期，江滩上生长着稀疏的柳树和一些枯萎了的芦苇。

“坐下！统统的坐下！”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大声吼叫着，“送你们到江心岛去！”

透过苍茫的暮色，可以看见江边停靠着两艘小汽艇。“过江？这两条小船能过多少人？”有人在小声议论。与此同时，不少人看见日本兵四面架起了机枪，连小艇上也有黑洞洞的枪口。“坏了！没得命了，要下毒手了！”有的人叫了起来。又有人说：“咬，把疙瘩咬开！不能绑着死，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于是你帮我、我帮你，许多人都松了绑。

这时，江边两条小艇上探照灯的白光像刀一样地刺射过来。路边早撒满浇过汽油的稻草，一点火，像火把一样照亮了夜空。没等警戒的日本兵撤离，江边已乱成一团：

“卡死他！卡死他！”

“夺枪！夺枪！”

“要死一起死！”

难民们几个人拖住一个日本兵，用拳头揍，用手扼，用脚踢，用牙咬。鬼子们扔掉了枪，哇哇的乱叫，腿快的都跑上了大路。这时四面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一场天崩地裂、鬼神皆惊的大屠杀开始了。在敌人火力网的封锁下，5万多同胞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只能在哀哭惨叫声中成批倒下，尸首成堆，血流成河。等枪声停后，兽军唯恐还有生还者，又派出大队上好刺刀的士兵，到处翻检尸体，对在喘气的人一顿刺刀。乱戳之后，又在层层迭迭的尸体堆上浇汽油点火焚烧，当烈火升腾之后，活人的惨叫声顿时和尸体燃烧的“吱吱”声、“哗哗剥剥”的爆裂声响成一片。兽兵们捂着鼻子，匆匆离开了这恐怖的屠场。

以上只是日本侵略者在南京进行集体大屠杀中的几例。根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日本侵略者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对南京市民和国民党军队实行集体屠杀共28案。除上述几次外，主要的还有：

12月13日下午，日军在紫金山活埋难民3000余人；在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2万余名。

14日，在太平门城门口，500余名俘虏被日军集体屠杀；在汉西门外又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7000余人！

16日，日军将9000余南京军民押往上元门外鱼雷营江边集体屠杀！

17日，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当天，凶狠的日军又将从城里搜捕的难民和首都电厂工人共3000多人拘禁下关煤炭港，先以机枪扫射，继而放火焚烧！逃至三汉河边的四五百名难民也校日军用机枪杀死在河边！

在日军集体屠杀的28案中，有8处在长江岸边！

据目击者、湖南木商盛世征、冒开远说：日军在长江岸边的上新河地区，共杀害被俘军人及逃难百姓2万8千多人，“尸体由我湖南木业商掩埋。尸

横遍野，见之不忍。”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疯狂大屠杀历时 6 个星期之久，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被集体屠杀的人数就有 19 万人。同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还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千人冢”。经法医鉴定。这众多的尸体皆因窒息而死。而集体活埋，正是日本兽兵在南京大屠杀中惯用的手法。也许，至今仍有众多冤魂长眠地下而未被发现，毕竟兽兵们是决不会为自己的滔天罪行留下任何证据与记载的。日本兽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真是惨绝人寰，天地难容。

三、安全区内并不安全

成队日军开进安全区，凡见日军而奔跑者，概枪杀。……江面上布满尸体，长江似乎消失了

当进攻南京的日军分兵三路杀来的时候，国民政府及所属的机关都已撤往长江中游的武汉。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南京不少市民携者扶幼逃离古城。面对战争的威胁，却有几位无畏的外籍人士甘愿留在南京，他们决心与南京人民共思难。为首的是法国西门子洋行的雷伯，还有金陵大学美国教授史密斯博士、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职员福娄、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丹麦德士古火油公司职员汉森等 23 人。为了保护难民的安全，他们组织了以黑圈红十字为标记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难民区又叫安全区。它设在外国使馆和侨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汉中路以北，山西路以南，东起中山路，西止西康路。自东到西 2 公里，自南到北 3 公里，总面积约为 4 平方公里。区内有日、美、意、荷等国使馆，金陵大学、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四周插有白布红字的旗帜。

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的、“特殊”的。按照国际惯例，在非军事区内躲避战争的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官兵是受保护的。

日军攻打南京前，南京市共有人口 100 万，到日军陷城后，留下来约 50 万市民大都进入了难民区。守城的官兵，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也有人向安全区交了武器，换上便衣，混在难民中。为了解决几十万人的吃饭和生活问题，南京市长马超俊给难民区提供了 3 万担米，1 万担面粉，一些盐和 10 万元法币。难民们都把安全区看作是一块汪洋中的绿岛。

但是，安全区并不安全，那里没有武装警卫，周围只有象征性的铁丝网，别说日本军官和士兵，连一般小偷也可以偷偷地溜进去。日军也根本无视国际法规，照样闯入难民区肆意地进行虐杀。

12 月 13 日，入城日军开始在全城搜索已经放下武器，而且大多已经改装易服、匿藏民间的中国守城部队官兵。于是，一队又一队的日军开进难民区进行检查。

中国人不懂日本话，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也很少，因此，在检查中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词难达意，往往因一字一语之错讹，便是一条人命。

日军为了便于他们自由出入，随时搜查，滥施杀戮，还特别规定难民区里的所有房屋，一律不准关上大门。但是，由于有的难民根本不知道日军方面有此规定，又由于一些难民实在是太害怕了，基于自卫的本能，常常偷偷地把门关上。关起大门来的中国难民，倘若撞上了日本兵，那就立刻大祸临头。单薄的门板抵挡不了日军的皮靴和枪托，等到大门一被砸开，凶狠的日军便遇物就抢、见人就杀，一转眼就是血腥扑鼻，尸骸狼藉。

日军对难民的检查实际上是一道鬼门关，凡受检查者首先得经过下列 5 关：

1. 洗劫——身上的钞票、钢笔、手表、铜板、皮带、皮夹，每一样稍微能值两文的东西，都会先被日军抢去。

2. 摸头——由于战时军人多半剃光头，所以日军检查的第二步是摸摸有没有蓄发？蓄得够不够长，否则就地枪决。

3. 验额——验出来像头上有钢盔印子的，必是军人，当场处死。

4. 瞄腰——脱下裤子来瞄一眼，凡腰上有系过皮带痕迹者。日军一律认作是军人，手一挥，拉出去执行死刑。

5. 看手——命中国人把双手张开来细细验看，如果右手有持过枪的老茧，那就毫无疑问是军人了，当下处决。

万一有天大的幸运者，能逃过上列 5 道关口，也休想就此逃出鬼门关，因为还有更可怕的一关：详加盘诘，不烦其详。而盘诘的方式通常都是日兵和被盘诘者的一问一答：

问：“你是不是华军？”

答：“不是。”

问：“那么，你是警察？”

答：“是的，我以前干过警察。”

至此，又是一条中国人命无故丧失了。那位警察直到临死才知道：日本兵见了中国警察也是要杀的。

以此类推，当日本兵问到：“你是宪兵？”答：“是。”——杀！“你是学生？”——“是。”——杀！“你是公职人员？”——“是。”——“哈！做官的，杀！”“那你是干什么的呢？”——被检查者逼不得已地回答：“我是做工的。”“我是做生意的。”“我是种田的。”日本兵的“判决”更妙了：“哈哈，你是壮丁！”其结果呢？又是杀！杀！杀！

关于日军在难民区中的暴行，有一位当时直接参加难民区工作的外侨有这样的记载，他写道：“从南京沦陷的第一天起，就有成队的日军开入难民区进行搜索、绑架、屠杀中国人民，强奸妇女，掠夺财物。13日上午11时，日军第一次侵入难民区，几分钟以后他们就杀了因惊骇而奔跑的10名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是成为日军的定律。”“14日，日军潮水般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15日，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的难民1300多人全数拖去用绳子缚着，每100人捆做一团，押赴刑场。”“16日早晨，开始听到了强奸妇女的事情……”

鉴于日军在难民区的残酷暴行，国际委员会不断向日军提出抗议。12月17日，国际委员会又专门写了文件和备忘录，由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与松井石根交涉。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设在原来的国民政府里。雷伯和史密斯带着文件和备忘录来到了这里，却不料吃了闭门羹。因为松井一听到美国人就头痛，根本不想见面，就让秘书转告他们去找日本驻华大使馆。

雷伯只好和史密斯一同回去修改了文件措词，由史密斯送往日本大使馆。

在日本大使馆阴森森的会客厅里，史密斯与福田参赞进行了文涉。他慢吞吞地说：“我们委员会过去送给日本大使馆的文件和备忘录，请问，看过

了吗？”

“看过了。”

“你们为什么没有答复？”

“我们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答复。”

“这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关系人的生命的大问题啊！中日双方进行战争，我们严守中立立场，不支持任何一方，也不反对任何一方。但许多俘虏和中国老百姓被贵军杀害了，许多妇女被贵军奸污了，许多财物被贵军抢掠了，许多房屋被贵军烧毁了。这属于人道主义范畴的问题，我不能不提请贵军注意。”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根据？”福田企图抵赖。

史密斯把文件和备忘录送了过去：“请你看看。”

福田看了看，仍然推诿说：“你们委员会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大部分在我们使馆权力范围以外。我们可以转请派遣军考虑。”

史密斯无功而返。

就在史密斯交涉之际，大批日军已恶狠狠地冲进了安全区，直奔国际难民委员会。

国际难民委员会设在金陵大学校部，大多数难民住在学校区域里，因为那儿有学生宿舍和临时改为宿舍的教室，没有床铺，没有桌子，都睡在地上。为了管理方便，把宿舍、教室和能住人的建筑物都按次序编了号码，叫1号楼、2号楼……

一名日军联队长坐在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门口加了警卫，并且在门外架上了两挺机枪。士兵们站在旁边，随时准备扫射他们心中幻想的敌人。日军先查1号楼，他们动作很快，寻找方法十分简单，凡是青年男子都被认为是“支那军”，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带到5号楼旁边的田径跑道和足球场上，并派了一个小队的士兵在那里监视。

到了下午，足球场上的中年和青年难民越来越多，估计有一万多人。史密斯当即向日军抗议说：

“这些人都是难民，请贵军再仔细检查鉴别一下。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军人，你们要带走，可以；无辜的难民不能带走，应该留下。”但日军根本不予理睬。

这时，被捕的难民中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愤愤不平地大声抗辩：“我们是难民，不是士兵！”

他这一声叫喊，引起全场骚动，“我们是难民”、“难民区应该受到保护”，难民们怒涛般的呼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难民们的反抗使日军的兽心大发，一名军官抽出钢刀快步向前，对准带头喊叫的中年男子一刀劈下去，那个中年男子尸分两半，倒在地上。

日本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押着那些难民陆陆续续走出足球场，走出国际难民委员会的安全区。

被押走的难民知道，不管安全区怎么不安全。但是一二十万人住在一起，有个依靠，精神上互相支持，还有雷伯和史密斯这些人可以说些公道话，日军多少会有些顾忌。一旦离开安全区，便一步步走向死亡了。因此，不少人快走出足球场的时候，蜂拥到球门那儿，紧紧抱着球门柱子，像抱住生存之门一样，不肯再往前走了。

日军拼命吆喝，那些难民就是不理。一名军官掏出手枪，对着前面那个

不肯走的青年难民背部开了一枪，青年难民松手倒地。军官一开枪，士兵也“砰砰啪啪”地开枪了，抓住门柱的难民们有的倒在球门口，有的倒在球门里，鲜血不断涌出，流了一地。

日军把难民们径直带到了死亡之门——下关码头。他们让难民站在码头和趸船上，面对长江。江边小道两头，派出士兵警戒，禁止行人往来，不许任何人靠近，紧接着，机关枪对着人群猛扫。难民们一排又一排倒下去了，站在趸船边沿上的人，不由自主地倒向江里，其余的人也纷纷被日本士兵推下江去。原来站在码头上的一万多青年，挤得满满的，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码头上、趸船上留下一滩滩血迹，顺着倾斜的坡度，四散开去，流到江里去了。红色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几乎布满了江面，随着波涛起伏，忽起忽落，远远望去，似把两岸联在一起。刹那间，长江似乎消失了！

暴行越演越烈，尽管国际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抗议，日军仍我行我素，以至使安全区一样变成了人间活地狱。据日本战犯自己估计，在难民区里被屠杀的中国同胞，约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四、奸淫烧抢无恶不作

日军对一位 80 岁的老太说：“我并不需要你生孩子。”

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日军强奸暴行数量之多，情况之惨，也是世所罕见的。在当时的世界舆论中，有人把南京屠杀事件称之为“南京强奸事件”。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说：“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妇女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据估计，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城，至少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事实上，情况比这严重得多。”

日军占领南京后，强奸暴行始终不断，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几千件。一位当时在南京的外侨说：“单以金陵大学职员宿舍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就有关于 100 次以上强奸案件的详细记录，以及约 300 次强奸案件的确实报告。痛苦和恐怖的情形简直使你难以想象。”这是发生在“受到保护”的“国际安全区”内的情况，至于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

日军的野蛮、无耻更是难以形容。日兵所到之处，第一要花姑娘，第二要金表，第三要纸烟。在马路上见了男人，搜查完毕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在裤裆里摸一下，以防女子冒充男子。强奸妇女的暴行，不仅是日军士兵，就连日军高级军官及谷寿夫都参与其中。他们在大街上、公墓里，甚至日本大使馆门口，都不择地点、不分昼夜地任意发泄他们的兽欲。一位外侨在日记中记载：“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件，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 37 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旁边有 5 个月的婴儿啼哭不止，便把他活活闷死。”一个名叫田所耕三的士兵，在 1971 年 1 月 28 日《朝日艺能》周刊登出了他当年进入南京城内所作所为的自白：“当年没有一个士兵未强奸过女人。”“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我们从下关把女人装上车，送到各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 15 至 20 人玩弄。在仓库等墙边选个有阳光或暖和的地方，拿些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把由中队长盖上圆章的纸片，叫做‘红券’（入场券），拿在手里，排起队来、解开兜裆布，等着轮

到自己。”

日军无耻的暴行，将人类的丑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下关，有一位 80 岁的老太太被兽军强奸。当时老婆婆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你还能奸淫吗？兽兵厚颜无耻地说：“我并不需要你生儿子。”对未发育的少女，残忍的兽军先用手撕破下部，然后轮奸。许多妇女在奸后被杀，有的破肚露肠，有的割去乳房，有的阴部被插入竹枝，有的挑出血污的胎儿。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了无数关于这类事件的证据。例如幼女丁姑娘，经 13 名兽军轮奸后，因不堪狂虐，厉声呼救，当场被割破小腹致死。市民姚和隆携眷避于斩龙桥，其妻经兽军奸杀后，8 岁幼儿及 3 岁幼女因在旁哀泣，均被兽军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兽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在遭兽军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一位佚名的老人在他写的《京敌兽行目击记》中讲到：1937 年 12 月 16 日那一天，我走到街上，黑烟红焰，仍然没有断，同胞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特别多添了许多裸体女尸，十个总有八个是肚子破着，肠子挤到外边来了，还有几个母子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那些兽军对于已经死了的女人还要再来一番侮辱。

日兵出来奸抢，单独的时候很少，总是三五成群的。找到妇女也是几个人轮流奸淫，而在事后他们还要找几个中国人继续兽行，以此来侮辱我同胞人格。有一位老者名叫郭岐，当年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由她的父母用尽心机加以化装，改扮成一个男孩，再在父母的陪同下，想由中华门逃出城外求一生路。当这一家 3 口通过中华门时，照例向兽兵行了个礼，并拿出难民证，请日军检查放行。一名日军看到了那位女扮男装的女孩子，便问：“你今年十几岁了？”那女孩子压低声音回答：“18。”谁料，这一开口被日军听出了破绽，不由分说，当下把那少女拉进卫兵室去呼朋牵侣，轮流强暴。女孩子的父母在门外听到女儿声声地哀呼惨叫，真是心肝欲裂，热泪长流。这时，正好走来三四位进城的同胞，日军就逼他们糟踏姑娘。他们顿时吓得魂飞天外，立刻跪地求免，誓不相从。正在相持的时候，却来了一位和尚。日兵一把抓住这和尚，非要他和姑娘交媾。和尚面对着那位饱经摧残的裸女，紧紧地闭上眼睛，同时双手合十，口里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就是不为所动。日兵恼羞成怒，竟然割去了和尚的生殖器，使他活活疼死。

对日本兽军来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在国际检察处向远东法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命令针对日军大肆强奸中国妇女一事说：“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在事后将她们杀掉。”谁都明白，让日军“给以金钱”只是装点门面的空话，“将她们杀掉”才是命令的真意所在，事实上日本兽军也正是这样做的。冈本健三这个当年随日军近卫师团杀到南京的刽子手，在证言中这样说道：“强奸？当然有啦！军中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嘛，自杭州湾登陆就有接触女人的冲动，长官们只是交待大家，要是搞了女人，就得当场杀掉她，最好是捶死，可不要用刺刀或枪弹喔！……有些长官带头去干，士兵们眼看长官那样干，当然会想到自己又何必老实呢？”因此，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本兽军的一条规律。

日军不仅疯狂地屠杀和奸淫，同时还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使陷城后的南京，变成了一片苦海和火海。

在街上，日军常常把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唤住，强行搜查他们的身体，如果搜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杀掉；或者不但物被劫走，人也不能幸免。有一位难民，在逃出城时带了一枚金戒指，为了不被兽军发现，他既不敢把戒指戴在手指上，也不敢把它暗藏在衣袋中。最后他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对安全的办法，即用一根 1 尺长的细麻绳，将其吊在背后裤裆中。这样如遇到敌人搜身检查时，顺腿摸不着，开怀又看不见。结果，他及他的戒指仍然未能幸免。

日本兽军还不断地闯入住宅和商店进行抢劫焚烧，其手段既阴险又残酷。有的日军一闯进民宅和商店就放火，居民们为了免于丧身火窟，就会拿着钱财夺门而逃。这时，等在屋外的日军就将逃生的人一个个地逮下，刀劈枪杀，夺下财物便走。有的则先将宅院或商店的财物洗劫之后，再将其放火烧毁。就这样，全城所有的住宅、商店，不论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一律被日军劫掠一空。劫掠来的物品，强迫中国人搬运。他们什么都要：布匹、衣服、箱子、金银、手表等等，连不值钱的白糖、食盐、糕饼、大米及日用百货也被席卷一空。强盗一样的日军闯进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宿舍，竟抢走了女护士用的 2 个手电筒、2 副手套、2 捆绷带和一件毛线衫。

日军还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和破坏南京的文物，在珠江路一座大厦里，日军设有专门指挥抢劫文物的机关。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发现某处有重要文物、珍贵书籍、仪器，就由专门的抢劫队前往劫掠。如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以及石云轩等私人藏书、朝天宫院内埋存的古物，都是由这些专门的抢劫队抢去的。据统计，日军共出动 697 人，另外用苦力 830 人，卡车 310 辆次，共掠夺南京名贵藏书 85 万册。还有像寺庙中的大钟铁鼎、文德桥的铁栏杆、商店的大铁门、工厂的锅炉也都用汽车运走。

日复一日，南京城不断被洗劫、不断在燃烧。经过长达 6 个星期燃烧的南京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团漆黑，肮脏龌龊；每个人的头发，都沾满了余烬飞灰。市内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掉了。东门以外，约 20 里的城区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全市约有三分之一被烧毁。据当时的目击者讲：“只要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望去，从紫金山通过市中心区，以迄下关，只剩下黑黝黝、冷清清的断垣残瓦、焦木余灰。”这种情境，当时也有人称之为“整个首都在火葬”。

对于日军在南京的烧抢行为，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更有个详尽统计，他在《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 73% 的房屋，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 96%，房屋总数的 89% 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了。白下路、中华路、健康路和太平路的损毁，有 98% 由于纵火造成的！”他还指出：“南京市民每家平均损失 838 元，总损失达 2.46 亿元！”它充分说明，被日军糟蹋后的南京已空无所有。

五、铁证如山岂容抵赖

30 万冤魂的尸体，排起来有 600 里长

“南京大屠手”——这 5 个字，是日本侵略军于 1937 年泼洒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写在 20 世纪人类史上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名词”。它在当时就被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内仍有少数人胡说这一历史事件“等于虚构”，还有人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的暴行进行洗刷和开脱。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只要稍微尊重历史事实的人，都会对当年日本侵略军所犯的罪行深表愤慨。

在大屠杀持续的时间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尽量缩小事态的规模。当年东京的日本报纸宣称：“早在12月28日，南京已恢复安宁。”如此说来，南京大屠杀最多只进行了2个星期。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记述占领南京的过程：“各兵团在华中方面军17日入城式前，完成了内外主要扫荡任务，21日退出城内。从22日起由16师团担任警备。在1月5日前进行肃正及宣抚工作，努力恢复治安。”这里可以看到：直到1月5日以前，“肃正”工作尚在进行，“治安”并未恢复。但即使是按照这一说法，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也只是到1938年1月5日结束，时间为3个多星期。这比通常所说的6个星期时间缩短了一半。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要比通常所说的6周还长。所谓6周的计算，一般是指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下旬。但是，日军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从13日正式占领南京城的前几天，就已经在南京的郊区开始了。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在南京四周围200华里以内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居民为了躲避日本兵逃到了乡间，在各地他们都组织了难民村。日本人占领了许多这样的难民村，对于这些难民也施以像南京居民一样的办法。”日军在南京郊区的屠杀，应该说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当年，东京《日日新闻》（12月6日、13日）、《日本广宣报》（12月7日、14日）都曾经刊登过描写日军在南京开展“杀人竞赛”的报道，事情就发生在南京市郊的紫金山下。中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也曾列举了日军占领南京前后在南京郊区的暴行。可见，日军对南京军民的大屠杀，包括“集体屠杀”、“杀人竞赛”等各类最残酷的屠杀，早在占领南京前多天就已经开始了。

从大屠杀的终止时间来看，据国际难民委员会记载：占领南京的日军当局，从12月下旬开始对难民和所有居民实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仍以种种借口屠杀壮丁和奸淫妇女。次年1月28日，日军当局宣布难民可以“重返故居”。但是，返回故居的难民依旧受到日军的屠杀、奸淫和抢劫，于是许多人又返回难民区。2月初，日方又宣布：所有难民必须于2月4日以前“重返故居”，否则日军将强迫驱赶难民出收容所。但由于日军的暴行仍在继续，难民们生命财产仍无保障，故都不愿离开难民区。最后，日军强迫撤销难民区，国际难民委员会才不得不从2月9日开始办理结束手续，并且于2月18日起改为“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从事难民的救济工作。在南京国际难民委员会存在的整个期间，该会的工作人员几乎逐日记录了他们所见到的日军暴行，不断向日军当局提出抗议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直到2月9日国际难民委员会工作结束时，日军对南京居民的屠杀、奸淫等暴行仍在继续。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的持续时间，从1937年12月中旬起，至1938年2月中旬止，至少有2个多月的时间。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时，当年目睹日军暴行的外侨巴兹博士在法庭上作证说：“南京失陷后，在两个礼拜半到三个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顶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一书中说：南京的暴行，“继续了3个月，直到作者于4月间离华时，尚未完全终止。”这些叙述、均可作为大屠杀时间远非6周，至少持续2个月以上的佐证。

关于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杀害的中国人人数，日本文部省在审订教科书时，说什么“南京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对其可靠性有怀疑。”这是装着要深究可靠的样子，想轻轻一笔抹掉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欠下的累累血债。但是，南京暴行中的被害人数是完全有根据加以考查和判断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各方面的调查，作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法庭声明说：“这个数字只是根据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的统计，还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投入长江或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里所说的掩埋队及其他团体，主要是指“南京红十字会”和“索善堂”。当时，被害尸体的掩埋工作，主要是由这两个团体进行的。起初由于人手少，只是把主要地区的死尸填至塘内沟内，或堆叠起来。后来从外地招雇来一批人，才正式开始收埋工作，他们的全部收埋工作均有档案记载。南京红十字会从1937年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到次年10月份结束工作，共埋男女尸体43071具。索善堂组织了4个掩埋队，从1937年12月开始到1938年4月止，工作了4个月，共埋尸体112267具。仅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155338具。至于被日军焚毁的尸体，以及投入江中或用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数字很难精确计算。中国军事法庭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所作的调查，根据日军在雨花台、汉中门外、下关草鞋峡、中山码头及江边几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和毁尸灭迹的事件估计，这种死后尸体被灭迹的牺牲者至少在19万人以上。加上前述被收埋的10多万人，总共为35万人。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他们在南京“获得旷古之大战果”。

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日军当局所实行的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血腥恐怖。1937年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的《攻占南京城要领》中就规定：“在南京城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在敌之残兵仍据地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备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这就是说，早在进攻南京期间，日本华中方面军当局就确定：无论中国军队弃守也好、抵抗也好，日军在攻入南京后都要进行“扫荡”，这是一个既定不移的方针。

日军在南京奸淫、烧杀、掠抢的种种罪恶行径，又几乎都是在日本军官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以屠杀而言，对中国人搜捕捆绑、机枪扫射、刺杀活埋、焚尸灭迹，显然都不是士兵个人擅自的行为，而是按命令执行的集体行动。无耻的奸淫活动也是由日军指挥官带头参加、并且鼓励进行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不但亲自持刀杀人，而且还在大街上强奸妇女，仅事后查到证据证明被他奸污的妇女就有10多名。一个日本军官曾经宣称：“奸淫是日本军队所特许的。”至于抢劫破坏活动，则更是有计划组织进行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确实是代表日军最高当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行动。驻南京日军当局是这一血案的直接策划者、指挥者，而日本政府和军部则是这一暴行的总后台。

历史是无情的。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日

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终于受到法律和正义的审判。当年统率 4 个师团攻占南京的最高统帅、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首犯被押上了审判台。由中、苏、美、英、法、荷、加等 11 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等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在核实了全部犯罪事实之后，最后判处他绞刑。南京大屠杀的另一名主犯谷寿夫，也在 1947 年 3 月被押上了中国的军事法庭。在铁证如山的罪证面前，中国军事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并于同年 4 月 26 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南京城的居民亲眼看到了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可耻下场。

30 万冤魂的躯体，排起来有 600 里长！

30 万生灵的鲜血。泼出去有 1200 吨重！

第六章 残害活人的医学

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可是，在战争中还有一种被公认为惨无人道而以国际公法的形式加以禁止的作战方式，这就是细菌战。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侵略者在美丽的松花江畔，集中了日本全国优秀的医生和科学工作者，组织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部队。他们以 3000 多俘虏为对象，施行了骇人听闻的活人实验，突击制造了大量的细菌武器，并把它投入于建立“王道乐土”的实战之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日本陆军细菌部队的技术和技术情报，在日本战败时被美军生物、化学部队所独占。美国从全球争霸和安全防卫的角度考虑，“对日军细菌战班子的所有队员都不作为战犯起诉。”战争暴行被掩盖了，亡魂得不到安息，而恶魔却在怡养天年。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在泛黄的片片史料中搜寻血迹斑斑的往事，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位原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队员在战后写的《背负十字架》的诗句，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深处

切画冻伤，画家的手儿战栗，
眼见得“原木”们，冻得骨肉剥离，
活人开剥，手术刀上血迹模糊，
伏天里手铐声，大楼都在哭泣，
为逃脱、求解放，浴血而死，
反帝的“原木”，热血涂满了墙壁，
“原木”的尸骨堆积如山。
十字架上的“原木”，污染的跳蚤还来袭击，
狮子吼的恶魔医师汗水淋漓，
崩溃的白魔巨塔，哪里去寻梦迹？
汗臭的亡命货车，在旷野中疾驱，
钻山洞时，汗水、煤烟和了泥。
货车中间败很，哭又何及？
越国境心始安，轻拭满身汗，
一个个汗流浹背釜山夜语。
祖国在望，仙崎绿树如染，
寒侵五层无名塔——多磨墓地。

这首诗读来虽然洁屈聱牙，半通不通，却记述着以下这段令人心怵的秘密往事……

一、神秘的军事禁区

“哪怕是友军的飞机，无故从它的上空通过，也可将它击落！”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的省会，它位于我国东北平原北部中心，濒临松花江右岸。到过哈尔滨的人，无不为其迷人的北国情调所折服。在那绿树浓荫之中，欧洲风格的建筑各领风骚。夏季，美丽的太阳岛游人如潮，一阵阵悠扬动人的歌声，将松花江畔点缀得令人流连忘返。冬天，一年一度的冰灯展，巧夺天工，绚丽的彩灯折射着洁晶的冰体，把北国冰城装点得五彩斑斓。豪爽的小伙子、浓装的姑娘、天真的儿童、奔忙的商贾，给冰城带来常青的活

力。皮货、木材、家具、啤酒、东林商场的烤面包驰名中外……

就是这座美丽的城市，历史上曾屡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奉天的关东军，不断扩大军事占领区域，占领了从北满的齐齐哈尔、吉林到辽西的锦州。1932年3月，成立了满洲国，炮制了傀儡政权。哈尔滨在这一过程中，落入关东军之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行政上是当时滨江省省会。

从哈尔滨市中心往南大约20公里，与当时滨江省平房镇相邻接的地方，日本关东军于1938年6月13日划定了一大片特别军事区域。该区域位于平房镇附近三屯、四屯、五屯3个材落的中心，约有6公里见方。周围用架设高压线的围墙、干壕和铁丝网圈着，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还配有大规模的军事设施——飞机场，有约供3000人起居用的宿舍群、发电所、专用铁路线、学校教育设施；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研究室，以及教练用的马场、大礼堂、运动场和神社；甚至还有一座能收容80人至100人监狱。

这个军事区域里，到底在干什么、研究些什么呢？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关东军甚至授权给这个部队“哪怕是友军的飞机，无故从它的上空通过，也可将它击落”。它的秘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揭开。那是日本侵略者在哈尔滨设置的细菌战秘密研究所——关东军防疫供水本部（通称石井部队）。最初，为了隐瞒部队的性质，称为“加茂部队”，设在哈尔滨市滨江站附近的背阴河。1939年移到平房镇附近，改名为“东乡”部队，代号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第七三一部队的设施，大略分为以下6个区段：

1. 被称为“口号”的是第一部、第四部集中的主要建筑。
2. 挨着或邻接“口号”的是总务部和资材部等建筑。其中，内设总务部、诊疗部的建筑叫着“1栋”。
3. 食堂，包括有放映室的大礼堂。
4. 对少年队员和卫生兵们进行教育的教育部建筑。
5. 住着队员和他们家属的称为“东乡村”的宿舍群，这里也包括独身宿舍和部队建立的东乡神社。
6. 在哈尔滨市滨江车站附近背阴河的第三部，以及诊疗所建筑物（通称“南栋”）。

在以上设施中，被架设着高压电网的围墙圈着的区域，其中的建筑物，通称为“本部”。

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市还有一个秘密联络处，那是个叫白桦寮的带里院的“□”字型建筑。七三一部队的人员到哈尔滨市去时，先坐客车或卡车到白桦寮；然后从里院化妆成老百姓出大门，上市区。回七三一的时候，与此相反。在哈尔滨上学的队员子弟，也是先用军用客车送到白桦寮的里院。

七三一部队的组织全貌是这样的：

部队长石井中将（1936—1942年，1945年3月一战争结束。1942—1945年2月为北野少将）

总务部部长太田上校（前任为中留中校）

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长菊地少将

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长太田上校（兼任）

第三部制造滤水器部长江口中校

第四部制造细菌部长川岛少将

教育部队员教育部长园田上校（后由西中校接替）

资料部实验用资料部长大谷少将

诊疗部附属医院部长永山上校

除此之外，第七三一部队在沿中苏边境还有4个支部和一个实验场，即海拉尔、林口、孙吴、牡丹江各支部和安达实验飞机场。

在大连还有安东技师（将官）领导的满铁卫生研究所，直属于关东军，在与第七三一部队的密切联系下，进行着疫苗的制造和实验，也可以说，实质上是第七三一部队的一个支部。

自从1939年平房附近的一系列设施完成之后，第七三一部队里约有2600余人从事着细菌战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国内大学医学部、医科大学和地方研究所派遣来华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的身份是军队中的文职人员或技师。

该部队有17个研究作业班，具体分工是：

特别班管“原木”

第一部所属

笠原班 病毒研究

田中班 昆虫研究

吉村班 冻伤研究

高桥班 鼠疫研究

江岛班 赤痢研究

太田班 炭疽研究

凑班 霍乱研究

冈本班 病理研究

石川班 病理研究

内海班 血清研究

田部班 伤寒研究

二木班 结核研究

革味班 药理研究

野口班 立克次氏体（跳蚤）研究

第二部所属

八木泽班植物研究

第四部所属

柄泽班 制造细菌

这些研究班最初曾用正式科名，如“病毒科”、“昆虫科”等相称，后来出于军事上保密的需要，正式科名被完全隐蔽起来，一律以班相称。

这些研究班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呢？

二、“初画冻伤 画家的手儿战栗”

良好的技艺与丰富的色彩产生的是充满血腥与邪恶的作品

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是惨无人道地用活人作实验的。这种被用来做实验的人称作“原木”，音译为“马鲁他”。他们是被关东军宪兵队、特务机关及其下属的哈尔滨保护院所捕获的中国人、俄国人、蒙古人和朝鲜人。

关东军宪兵和特务机关，从我国各地逮捕了很多抗日军人，参加抗日运动的工人、学生、记者、学者，以及他们的很多家属，还有苏联红军情报军

官等，统统采取特别移送措施，送进第七三一部队已号栋内的特别监狱，每年多达 600 人左右。据有关人员一致的证词，“原木”中的中国人占七城，年龄 20 至 30 岁的占绝大多数，最大的为 40 多岁。

被关东军捕获的爱国者们，一旦送到这里，就成了剥夺人格的“非人”，成为木材一样的、可随意处置的实验材料。因为是无法生还的“原木”，所以不需要人的姓名，记录各种实验时，按其性别，只在格式纸上记“♂原木”、“♀原木”。每个“原木”被标上 3 位数的号码，然后按号码，作为各研究班所有物被分割，根据各班的研究目的，成为活人实验的材料。

“原木”的特设监狱，在口号栋的中心，牢房分左右两栋，通称为“7 栋”、“8 栋”。原则上 7 栋收容男“原木”，8 栋收容女“原木”。为防止“原木”越狱，口号栋墙很高，没有出口，玻璃窗设在二楼的最上方。通常这里被关押有 200 至 300 名“原木”。

“原木”牢房是第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场所，是“圣域”。“在去 7 栋、8 栋的本馆一楼通路的两侧，通往牢房中庭的铁门处，一天 24 小时都有用手枪和六角棒武装的特别班员，他们在交替执勤，严密把守。……在一楼中间通路上行走时，如果有人稍稍把视线偏向那边，马上会遭到这样的申斥：‘不许往旁边看！’我们都是以赶紧离开这里的心情，小跑着通过中间通路的。”一个原队员这样追述着往事。

管理“原木”的是第七三一部队特别班。特别班的班长是石井四郎部队长的亲哥哥刚男（石井四郎中将的 3 个哥哥虎雄、刚男、三男都在第七三一部队任要职）。特别班的人数约有 50 人，他们大多数来自石井部队长的老家——日本千叶县武郡芝山町农村。为了防止泄露特别监狱的秘密，石井是采取了用家人和亲朋故旧加高薪的办法。他并不强调他们的学历和知识水平，只要求“忠于职守，守口如瓶，身体强健。”

一个原队员回忆说：“石井特别班一分为二。一部分管动物饲养，一部分管‘原木’。让矮个子、胖敦敦的人首动物，高个子、有力气的人管‘原木’。”由于“大多数特别班员是乡下的年轻人，也有纯朴的、身份低贱的人，为此，他们还受到了‘壮胆’的特别训练。所谓特别训练，就是让他们用六角棒揍死‘原木’。……开始时，见习班员还战战兢兢，但很快便都学会了不把‘原木’当作人看待，把他们当作实验材料。”就是这样，高薪和“壮胆”训练，将千叶县农村的纯朴青年，变成了凶残冷酷的杀人机器。

特别班的办公室里，摆有桌子和黑板。黑板上的日期、数字和下面这段文字，用粉笔写了又擦，擦了又写：

“×月×日×××（号码）石川班使用作病理实验。×××凑班使用作霍乱实验。×××高桥班使用作鼠疫生注。×××，×××，×××，田部班。×日×××，吉村班。……”

这就是“原木”们的死期预告。它是根据各研究班的联系，安排出的活人实验日程表。

让我们通过一名“军画兵”的工作，透视第七三一部队的“冻伤”研究。

在第七三一部队中，有一名很擅长画日本画的队员。他出生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参军前是一位在印染的绸布上画花鸟草木图案画稿的画工。

战争年代，在“奢侈就是敌人”的口号之下，定做艳丽的印染和服的人显著减少，画工们失了业，只得改行。为了施展自己的绘画才能，他到军事

系统求职。1942年1月，被分配进第七三一部队。

具有精良绘画技艺的人加入七三一部队的消息，不久便传到了领导层的耳朵里。有一天，他被叫到特别班。特别班班长，也就是石井部队长的亲哥哥命令道：“拿着画笔、画具等绘画工具，到吉材班报到！”

当时，侵略我国东北的关东军士兵中间，由于在严寒中执行作战勤务，被冻伤的很多。第七三一部队急于收集冻伤的原理、改善研究治疗方法和在严寒状态下细菌是怎样感染的资料，吉材班就是以研究冻伤为主的研究部门。

吉材班的冻伤实验，主要在冬季进行。哈尔滨的冬天极为寒冷。夜间低于零下40度不足为奇。吉材班在夜里11点至12点，把“原木”们带到特别处置室，让他们手脚浸在装了冷水的桶里。然后再把“原木”们赶到屋外，把浸过冷水的手脚在室外气温中冻上一定的时间，直至冻伤。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下，“原木”们的皮肤开始是白而贫血，接着由红变紫，生出水泡，又变成红黑。完全冻伤时，就变成了乌黑色，冻伤部分的皮肤和肌肉变得僵硬，神经完全麻痹了。

为了检验是不是已经完全冻伤，吉材班班员们用四楞木材敲打“原木”的手脚，如果被敲击时喊痛或有疼痛的反应，表明还没有冻伤。

当证实“原木”们确实冻伤，就让他们回到室内。把冻伤的四肢浸在微温的温水里，由5度、10度到15度，慢慢给水加温，看热水的温度和冻伤度之间，在治疗方面有什么关系。一个原队员追忆说：“吉材班的实验，与其说是以给“原木”治疗为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积累如何正确测定皮肤表面的温度，和细胞到坏死状态所需时间以及整个过程的资料。……把“原木”的手脚浸在热水里，也是为了发现治疗冻伤的适当的热水温度和浸泡时间。……但是，已经完全冻伤的“原木”的四肢，骤然浸在热水里，冻伤部分的整个组织、就会脱落。……因为白骨裸露出来，下一步就得截去四肢，否则就无法让“原木”活下去。”

吉材班的实验，拍摄了详细的冻伤研究记录影片。然而，这样的实验记录中，他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记录片是黑白的，没有真实准确的颜色。那时候还没有彩色胶卷，拍下来的照片，除了人工着色，还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吉材班就注意到那位有绘画天才的新队员。这位曾为印染漂亮的绸布而绘画的画工，成了军画兵，一次次地接到命令，去将“原木”冻伤的手脚如实地画下来。他的画再也不是红梅、红叶、名胜八景，而是一些变了形的、坏死的四肢。有的是两只手，从指关节往前整个烂掉；有的是两只脚，从踝骨以下都没有了；还有的是从脚踝到大腿，白骨裸露；还有四肢渐渐变成乌黑色过程的冻伤画。后来，叫他去的已不单是吉材班了，各种细菌实验结果的画也需要他绘制，对他所要求的，是为指定的部分写生和着色。良好的绘画技艺、丰富的色彩与残酷的活体实验相结合，产生的是一幅幅令人不敢正视、充满血腥与邪恶的作品。

三、活人开剥手术刀上血迹模糊

初次见到陈列室的人，哪怕是堂堂的男子，也要软绵绵地蹲下

在第七三一部队总务部二楼的左端，有一个“陈列室”。它有普通一套

住宅的4倍宽，被雪白的围墙围着，一打开门，福尔马林的臭气扑鼻而来，令人窒息和睁不开眼。一个原队员回忆说：“初次见到陈列室的人，不由得吓瘫了，哪怕是堂室的男子，也要软绵绵地蹲下。”

到底陈列着什么，令人如此恐怖？

原来，沿着雪白的墙壁，室内2层或3层的架子上，成排地摆着宽45厘米、高60厘米左右装满福尔马林溶液的玻璃容器。在福尔马林溶液中，泡着活活砍下来的人头。这些人头，有的怒目圆睁，有的紧闭双眼，有的残缺不全，有的皮肤溃烂……他们的头发漂浮在玻璃容器中。

除了头颅以外，陈列室里还陈列着人类的各种器官和身体的各个部位。有从大腿根截断的人腿，也有无头、截去四肢的躯体，胰脏和肠子原样不动地在溶液中蛇盘着。凡是人类所有的一切器官，都漂浮在容器里。

这些人的肢体和器官是从那里来的？它来自口号栋一楼左边的解剖室。

在口号栋里，有一条秘密的地道。那条地道从与收容“原木”的特殊监狱7栋、8栋相通的口号栋走廊一个角落出发，笔直走，往左拐，连扶手的钢筋水泥楼梯，就是它的入口。下了楼梯，往右拐走大约30秒钟，又要上钢筋水泥楼梯，就能见到一个装有从外侧开关的铁门，这里就是地道的出口。

“出口”其实是一间铺着钢筋水泥地板的相当大的房间，高高的天棚上，吊着一只超大型的集合型照明器具（相当于现在医院手术室里的无影灯），灯底下有一张铁制的手术台，乍一看，像是大学医院的手术室，然而与手术室不同的是，在铁制手术台以外，却看不见医疗器具一类的东西，代之以放着几个水桶和盛着福尔马林溶液，装标本用的大型玻璃容器。

这里就是第七三一部队的解剖室，即以“原木”为对象，秘密进行活人解剖的场所。自从1939年，部队移到平房附近这个新建的军事地区起，直到1945年夏部队崩溃为止的6年间，通过秘密地道，解剖室活活地解剖“原木”的人数，连战后审判战犯的哈巴罗夫远东军事法庭也没搞清楚，据说有几百人。但如下这段询问原冈本班队员的问答，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一组数据。

问：“包括一般病理解剖，冈本班和石川班两个病理室一天解剖几个‘原木’？”

答：“两个研究室，有技师冈本、妹尾等三人，……技术员H、S、K及另外2人，雇员10多人，总共刚好20人。记得这就是停战前夕的人数。最兴旺的时候还要多一些。技师们老是回本国，到金泽和京都的大学去讲课……。一个技术员，一天最多也只能解剖3个，所以5个技术员最多一天也超不过15个……实际上还有非当班和休假的技术员，充其量一天少的时候做二三个，多的时候8个就到顶啦。”

问：“所有的都是各班要求解剖的吗？”

答：“是的。每天都在催促：‘解剖请尽量快一点’。解剖当中，有时也有实施破伤风细菌实验的。破伤风实验尸体的鲜度是个大问题，过了三个小时，就采集不到好标本了。再如，注入毒物死亡的尸体，从实验完了到解剖这段时间，也成问题。”

不难算出，在每天都催促“解剖请尽量快一点”的情况下，这间解剖室里6年间要活活解剖多少人。

让我们接着听这场问话：

“听说一个女‘原木’被活生生地解剖了，这是事实吗？”

“是的，是事实。她是个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中国妇女，还不到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听说这个女‘原木’还有过孩子？”

“啊，有的。是在狱中生产的女‘原木’之一。在临被活着解剖之前，大概她知道今天是她的死期了吧……在被送到解剖室的时候。曾低声哀求说：‘只请你们饶了我可爱的孩子……求求你们。对我随便你们怎么都行。’……”

“‘原木’活人解剖时，事先都与各研究室联系了吗？”

“主要担任执刀的是冈本、石川两个班，活人解剖从医学角度也有很高的价值，因此预先都与各班进行了联系。只要有‘×月×日有珍贵的解剖……’的通知，各研究室都马上知道这是活人解剖。”

“对担任执刀人有何要求？”

“让我带一个轻便钳子去，我就知道要进行活人解剖了，……因为尸体是不需要止血作业的。可是活人解剖的时候，如果不用轻便钳子从刀口旁边止血，血浆就会把解剖室从天棚到墙壁进得一塌糊涂，就会乱套。”

“麻醉的方法呢？”

“用浸了三氯甲烷的纱布掩盖口鼻，……只用5分钟，就会进入完全的睡眠状态，变得意识不明。然后把手术刀对准咽喉，一边止血、一边从腹部一直开到阴部。那个女‘原木’被杀大约是1944年。……”她被活人解剖时，不仅是冈本班，其他如石川班、田部班、凑班、内海班等各班都有技师、技术员参加。

“活人解剖的步骤呢？”

“解剖室的前边，高桥班研究室的对面，有个更衣室，在那里换上解剖服。……解剖服是上身密闭式的，胳膊上戴着一副长手套，外边再罩上布手套。……执刀大体上是由技术员来担任的，特别稀奇的解剖时，技师也会站在一边，口述解剖所见，……说：‘喂，某某部位充血’、‘喂，接着是肺’……印刷好的解剖所见书有好几份，说到‘肺’时，就‘唰’地一声把印着肺的图纸拿出来。作笔记是雇员的任务……。活人解剖，一般需要3个小时左右。做完时，人也累得精疲力尽了……”

“为什么比起一般病理解剖来，活人解剖要用3倍以上的时间呢？”

“因为一边开刀，一边还要做各种实验，特别是女‘原木’。以女性生殖机能为中心，在各个地方要放置各种测定器具，来检查排卵机能，进行细致的解剖……，所以很费时间。为了不让一个研究室过于占用时间，事前提出实验计划。”

“脑的切开呢？”

“做了。切开头颅之后，先用小手术刀触动延髓，一捅到叫作‘桥’的部位和延髓之间时，‘原木’的嘴就会突然‘吧’地一声张开，‘咯吱咯吱’地咬着牙，嘴一张一闭的……。因为这是用麻醉入眠的，看上去令人作呕。一触动中脑的稍为隆起部位时，脚就会‘嘣’地抬起来，胳膊就会动……。一边做看这样的实验，一边把切开的地方一件一件地作为标本。执刀人累得很厉害。”

“活人解剖结束以后呢？”

“更衣室的旁边有个浴室。浴室中有两个浴槽，一个里边装满了升汞水，另一个里边装满了热水。……解剖结束以后，为了预防感染，先进升汞水浴槽。现在会说怕水银中毒什么的，可是在当时的七三一，就是按这顺序办

的。……在升汞水中浸泡后，用热水好好洗干净，在更衣室换上新的白衣服。……白衣服下边只穿一条短裤，这副模样回到研究室，在研究室再更换衣服。”

“在解剖‘原木’时，包括活人解剖，难道没有过罪恶感吗？”

“完全没有。也并非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薄情……，当时、不仅是在七三一的人，凡是从事战时部队工作的人，即使听说要解剖‘原木’，为此也决不会转过脸去的。……为了国家而解剖‘原木’，有什么不好。整个部队的人都充满了这种盲目的爱国心。……到了战后，每当想到那个女‘原木’的小孩不知是怎么处理的就感到心痛，感到自己干了些残酷事。因此，在战后，再也不愿干医学方面的事啦，……战争把人变成了疯子！”

这里还有一个在当事人印象中特别强烈的将活人“大卸八块”的实例，因为那是个无辜的少年。

1943年的一天，解剖室里领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据队员们说，这个少年不是“原木”，不知是从哪里拐骗来的。

在解剖室的一角，少年就像听天由命似的呆呆地蹲着。解剖台的周围，站着身穿白色衣服、撸着两只消过毒的胳膊的几十名队员。一个队员用短促的话催着少年上了手术台。

中国少年按照命令脱去上衣，躺上了手术台。

往仰卧少年的嘴和鼻子上放浸了三氯甲烷的脱脂棉，施用了麻醉。当脱去少年的下衣一看，他的生殖器周围几乎还没有长阴毛，推测他的年龄只有十二三岁。

围绕着手术台的田部班队员用酒精把少年的身体擦拭干净。K技术员握着手术刀走下一步，沿着胸廓，用刀切成Y字形。用轻便钳子止了血的皮肤上，血珠噗哧噗哧地冒出来，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人解剖开始了。

“少年不是‘原木’，因为还是孩子，也不会参加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才知道。所以要解剖他，是因为想弄到一个健康的少年男孩的内脏。少年就是因此而被活活地肢解掉的……。”这是一位后来回想这次解剖情形的原七三一队员说的话。

从麻醉着的少年体内，心脏、肠子、脾脏、肾脏以及肺和胃等各种内脏，被娴熟地、有条不紊地取出来，一个个分别拆开，扔进水桶里。然后又很快转移到早已准备好的装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玻璃瓶内，盖上盖子。

到此，解剖便告结束。一个无辜少年的生命就被这群恶魔残杀了。他是谁？他的家在何处？他的梦想是什么？永远是一个谜。人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个令人发指的过程。

在这里，凡是人所能想象到的各种物质，都给“原木”注入过。往“原木”的静脉注入空气，看身体的各个器官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才导致窒息；把“原木”倒吊起来，看需要几小时多少分致死，身体各个部分有什么变化；把“原木”装入极大的离心分离器中，作高速旋转的实验，在“原木”死前，反复进行；把尿液和人的血液注入“原木”的肾脏，看人体会有什么反应；进行猴子、马和人血的交换实验；实验到底能从一个“原木”身上抽取多少血液；将大量的烟送入肺中会怎样，以毒气取代又会怎样；把糜烂性的东西、毒气送入胃中，将会出现什么变化；X光射线的长时间照射，对人有何影响；各种药物的反应……

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人解剖的目的，一是为了采集标本，二是为了进行“医

学”实验。石井部队长把“活人解剖”这种实验，当作引诱感兴趣的日本医学家入队的钓饵。身为七三一队员，同时又是医科大学讲坛上讲课的日本教授也为数不少。

派到部队的医学家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是“原木”的脑子。当时日本医学界脑外科的研冗，刚刚有点头绪，对人脑的内部结构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这样的活人解剖“实验”，有不少是来自日本的医学教授参加的，也有来自医科大学的“研究委托”。战后日本医学界中，有的医生、专家的外科手术技术非常精良，有的因医术高明而获得政府的勋章。而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物，其手术经验，竟是在罪恶的七三一部队积累的！

四、“十字架上‘原木’污染的跳蚤还来袭击”

“原木”死命地扭动身子，大声嚎哭，但无法躲避跳蚤的袭击

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最核心的还是细菌的制造、细菌如何运用于实战，以及细菌战的实战效果。

细菌制造的工程是绝密中的绝密，它是由第四部的柄泽班负责的。柄泽班在口号栋一楼，这里集中了第七三一部队的经验和技巧之精粹，是一座巨大的“细菌制造工厂”。柄泽班以外的队员，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要事，是不准进入“工厂”的。当然，谁也不敢贸然进入这个专门培植各类细菌的地方。

在1栋的正后面，有镶着瓷砖的消毒槽和更衣室。柄泽班的人必须先更衣，“入浴”后才能到“车间”去工作。为了细菌制造的需要，进入“车间”的人需保持无菌状态。他们在更衣室里脱去衣服，换上白工作服，戴上白帽子和厚厚的口罩，一条橡皮围裙从脖子一直挂到脚颈，脚穿一双长没膝盖的深筒胶靴，再戴上胶皮手套和特制眼镜。他们以这副打扮进入浴室，浴室的浅浴槽里装满了石炭酸溶液。从消毒槽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膝盖以下就成无菌状态了。

细菌制造工程是流水作业的，进口号栋一楼往左拐，就是培养基室。这里备有4口巨大的蒸汽锅，用蒸汽锅溶解琼胶，装进培养基，然后把它们放入中间走廊右边的高压锅。高压锅里可以达到摄氏180~250度的高温，能够给溶解了的琼胶完全灭菌。此后，再把经过灭菌的培养基和琼胶放进冷却室使之凝固。接着，把已成固体的琼胶按每块培养基放进无菌室。在这里给琼胶表面涂上被培养菌。

无菌室是一间大约有30铺席（榻榻米）大的玻璃房子。进入无菌室的队员，还必须通过灭菌室。从灭菌室的天棚上喷下消毒液，对队员全身施行消毒，以防止被培养苗以外的细菌附在琼胶上。

往琼胶上移植细菌，使用的是叫作“棉棒”的铝制棒子，长约50厘米，有铅笔粗细，尖端卷着棉花。

移植细菌之后，培养基被搬入培养室。培养室是室内全部镶满铜板的宽房间，天棚上只点着两盏电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暗室。培养室温度是20~80度，能由入口处的仪表进行自由调节。根据培养菌种的不同，按需要调节室温。因菌种的不同，既有当天能够繁殖的，也有要花费一周时间才能繁殖的。在培养期间严禁开门。在适当暗度和室温下，得到琼胶营养的细菌，就在培养基的表面变成黏糊糊的白色乳汁继续繁殖。到此时，柄泽班人员就要

看准火候开始刮取细菌的作业。

刮取细菌的作业，使用的是名叫“刮棒”的铝制工具，把隆起在培养基上面的生菌，刮进特殊容器里。

鼠疫、伤寒、霍乱、赤痢、破伤风、结核、炭疽、麻风……等所有种类的细菌，都是由柄泽班这家“工厂”制造的。

在制造细菌的操作过程中，偶尔脚下打滑就会摔倒，搞不好就会从头到脚染上细菌。空气中变成粒子的细菌四处飞散，稍不注意就会将细菌吸入口中。

“多行不义必自毙”，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大肆繁殖细菌，想用它来建立“王道乐土”。但细菌是不分对象、不分敌我的，在制造细菌的过程中，许多柄泽班的队员病倒丧了命。“下次死的……该是你啦……”这话像幽灵一样，缠绕在每个柄泽班队员的心里。虽然他们大多数人也是被昏昏噩噩地引入这个恶魔工厂，但他们作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洗刷不了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恶魔行为的牺牲品。到底死亡了多少队员，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一年至少有30人。”而且，死者本身也将成为细菌战研究的对象。部队要求每一个队员以及家属作出保证：“自己死亡时，无论是何原因，都要同意解剖自己的遗体。”可见，恶庵导演的战争同样要吸干这些日本人的每一滴血。

要将细菌用于实战，必须找到合适的、便于细菌大规模传播扩散的载体。这个载体，第七三一部队主要选用的是跳蚤。

负责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各研究室，在口号栋的一楼，紧靠着解剖室。高桥班与其说是鼠疫研究班，不如说是鼠疫跳蚤制造所。其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

为了使鼠疫、跳蚤繁殖，需使用大量的老鼠。先给老鼠注射鼠疫苗，然后再将老鼠固定在石油罐里，每个罐里一只或两只，让它们不能动弹。再装入跳蚤，让跳蚤吸老鼠血，把老鼠吸成皮包骨，在那里繁殖。

跳蚤吸吮着用鼠疫病毒污染的老鼠血，在老鼠的体温保护下，猛烈地繁殖起来，高桥班大约有4500个这样的鼠疫跳蚤饲养器，每两个月，就能够制造出几十公斤的鼠疫跳蚤来。几十公斤跳蚤足有几千万只。所以，高桥班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鼠疫跳蚤制造工

开展细菌战，主要有3种方法：

第一是人员投放。侵入敌方纵深地带的细菌战人员直接往河流、水库、水井、蓄水池等处投放细菌，污染水源；第二是炮弹投放。在特制的大口径炮弹中装入被细菌污染的小动物、物品、食物等，让炮弹在敌占区内爆炸；第三种方法是飞机投放。用飞机在敌占区投放细菌炸弹。

石井四郎部队长主张，应当把细菌战从过去依靠少数细菌战特工潜入敌方直接投放这一“狭窄的方法”中解放出来，把它作为近代战争的正面作战之一摆到应有的位置上。炮弹投放，受炮弹口径、射程、射速的限制。石井认为，最理想的方法是用飞机投放细菌炸弹。

在用“原木”进行了大量试验后，七三一部队的恶魔们还发明了“石井式陶器炸弹”。即不用金属用陶器制作的炸弹，使用少量的炸药，用定时引信在离地面一点点高的地方爆炸。在这陶器炸弹里，如果装满用鼠疫菌污染的跳蚤，散落在地面的跳蚤本能地要去谋求人类、牲畜及其它动物的血液，鼠疫就能有效地得以传播扩散。——这就是石井式陶器炸弹的秘密。

从1939年到日本战败前夕的1945年夏天，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鼠疫跳蚤和陶器炸弹的“实验”。安达实验场成了“实验”的舞台（安达就是现在的大庆油田所在地），“实验”时出动了航空班。

在战后1949年12月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公审时，川岛原军医少将就安达实验作了证言：

——用于实验的15名被实验者是从部队营房内的监狱里送来的，他们被绑在实验场中特地埋设的柱子上。为了让飞机容易确定方法，认准特设实验场，在实验场上插上旗子，升起烟雾。

——从平房站飞来的专机，飞到实验场地上空时，投下约20颗炸弹。炸弹在离地面100~200米处爆炸，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蹦了出来，这些跳蚤在整个实验地域蔓延开来。

——投下炸弹以后，得等待相当长时间，让跳蚤蔓延开来感染实验者。然后，把这些被感染者经过消毒，用飞机送回平房站部队营房的监狱里，在那里对他们进行监视、观察，看有没有感染上鼠疫……。

川岛证言虽然竭力掩饰侵略者的罪行，但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利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大致情况。从战后第七三一部队原队员的回忆中，我们能清晰全面地了解安达实验场实验研究的情景。

带着手铐脚镣的“原木”被塞进第七三一航空班的飞机，运到安达飞机场。为了不使局外人看到时感到可疑，给“原木”穿上日本军服。在机场的一角，有卡车来接“原木”，在那里取下“原木”的脚镣，把他们运到特设实验场。从七三一部队的本部所在地平房到安达之间的距离有120公里，由空路转送“原木”，同机的警卫人员数量受到限制。据说，让“原木”着日本军服也是为了万一飞机遇到不测，对外界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说法。

实验场的一角，每间隔5~10米立着一根捆绑“原木”的柱子。用来作实验的“原木”被剥光衣服，用塞满棉花的硬棉被裹上，用绳子捆紧。然后在“原木”头上扣上铁盔，在身体的前面和后面各安上一张铁制的褐色胸甲，也用绳子扎死，让它固定在身上。再将“原木”的四肢紧紧地绑在柱子上。

每颗“石井式陶器炸弹”中大约塞了3万只鼠疫跳蚤，当炸弹在低空爆炸时，鼠疫跳蚤铺天盖地而下。无数的跳蚤从“原木”的脚下柱身上跳。“原木”们因四肢被紧绑在柱子上，只能拼命地扭动身子，大声哭嚎，但无法躲避跳蚤的袭击。为了让跳蚤吸足血，一般等4~5小时以后，再把“原木”经过消毒，从柱子上解下来，送回平房站部队本部观察和研究。

这些恶魔有时还让十几个“原木”裸露臀部，进行气型坏疽菌的强制感染实验。

所谓气型坏疽，是在战场受枪伤、被炸伤的士兵得的一种可怕的病。就是对手上、脚上的小伤口不做消毒处理的话，生存在土中的气型坏疽菌就会侵入人体，6~8小时后开始发病。在发高烧的同时，由于细菌的毒性作用，身体各处出现肌肉坏死。随后发出刺鼻的恶臭，肌肉腐败变色，在产生气泡和剧烈的疼痛之后，患者就会很快死去。当时为了防止死亡，只有截肢。

对准“原木”裸露的臀部，用被气型坏疽菌污染的榴散炸弹在最近距离爆炸。无数弹片深深地扎进“原木”的臀部，在“原木”的痛苦呻吟声中，队员们一一“检查”气型坏疽菌是否已确实命中“原木”。

接着，“原木”们被送回平房的特设监狱，在那里对他们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不施行任何一点治疗。第七三一部队所希

望得到的，就是气型坏疽菌贪婪地乱吃“原木”臀部肌肉的全过程。一周后，腐肉上发出猛烈的恶臭，“原木”全都死一个。原队员回忆说：“气型坏疽实验反复进行了不知多少次。不仅是气型坏疽……，还进行了钢笔型细菌手枪的实验，以及更加原始的实验。让手榴弹在裸露的‘原木’臀部附近爆炸，调查弹片扎进去的深度；用莱福枪对准脑袋从各种角度击发，尔后解剖大脑，制成标本；或者猛地用木棒把他们活活打死，调查肌肉挫伤的程度，留下资料……”这种“实验”丧心病狂，让人难以相信这是正常人的行为，更何况它还被冠以“科学”这个人类理性结晶的名词，更令人万分愤慨！

第七三一部队在安达实验场不仅做过细菌武器和普通杀人的“实验”，还进行过以“原木”为对象的常规兵器杀伤性能试验。

1943年夏日的一天，在安达特设实验场上并排停着十几台报废的破旧坦克、装甲车。从飞机场开来的汽车上，押来被绑成一串的十几个带着手铐脚镣的“原木”。第七三一部队摄影班队员对着他们按了快门。

这些“原木”多数是工人、知识分子或者学生，从特设监狱被拉出来时，他们的直觉感到死神在等待自己，因此都不肯出来。七三一部队的翻译操着中国话和俄国话对他们说：“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你们只要进了车里就行了，完了以后马上释放。”连哄带骗地让他们上了飞机，带到安达实验场。

穿着草绿色日本军服的“原木”被带到坦克或装甲车前，四周由用轻机枪和步枪武装的特别班队员包围。这些手足被绑着的“原木”被一个一个的推进坦克或装甲车，每辆坦克装2人，装甲车装1人。随着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车门被关死了。

等到“原木”们一个不剩地进了坦克和装甲车，安达实验场的一角跑出一伙关东军司令部派遣来的士兵。士兵们的背上背着深绿色的桶子，桶子里装满了压缩空气、凝固汽油和从重油中提炼的液体燃料（燃烧剂），从桶的右上方伸出一根管子，管子的前端装有金属喷嘴，这就是火焰喷射器。

背着火焰喷射器的士兵们，分别立在离坦克10米、20米、30米的地方，摄影班也已持机待拍。高亢的号令震撼整个实验场，士兵们用跪姿把火焰喷射器对准了坦克和装甲车。

实验场上空又一次响起狼嚎似的号令声，这时，出现了惨不忍睹的情景。从士兵手中的火焰喷射器中喷出的白炽火焰，一瞬间就将装有“原木”的坦克和装甲车吞没了。车辆彻底笼罩在发出呼呼响声、温度高达摄氏1000度以上的焦热地狱之中，不时发生着小的爆炸。

时间只有20秒，也许更短一些，随着号令的结束，火焰喷射已告完毕。

当人们再向赤黑的烟雾中望去，只见车辆被烧得面目全非，坦克的炮口还在断断续续地冒着残火，履带及装甲板因高温已变形弯曲，有的车辆已倾倒。坦克和装甲车内部的设备仪器全部烧毁，“原木”们焦黑炭化的尸体冒着焦臭的残烟……

这一切，只是为了进行陆军新研制的燃烧剂和火焰喷射器的实验。

在安达，还进行这样的实验：

七三一部队有时把运来的“原木”蒙上眼睛，分成几个组，命令他们身贴身紧挨着，每10个人成一路纵队。有的队身穿厚厚的日军冬季军装，有的队多普通单军衣，还有的队赤身裸体。

这是第七三一部队拿前后不留间隔、身贴身排成一路的“原木”进行子弹贯穿人体性能实验的实验。

在列好队的每队“原木”前面，有一名端着装填买弹的三八式步枪的七三一队员，以立姿从极近的距离瞄准队列的第一名。随着一声“击发”的口令，步枪喷火了，“原木”们的身体从第一名开始弹了一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贯穿3……，贯穿4……，贯穿5……”手拿记录纸的队员记下了“三八式步枪从7米的极近距离发射，御寒衣、普通军装、裸体人体的贯穿性能。”不同的距离，不同的枪枝，实验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进行着，一批批“原木”就在枪口下被残酷地夺走了生命。

五、“狮子吼的恶魔医师汗水淋漓”

“不到一秒钟，‘原木’就剧烈地喘息，翻着白眼，浑身起鸡皮疙瘩断了气。”

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战争这块土壤上疯狂开放的黑花，同时又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战争恶魔催化合成的狂虐的医学研究机关。嗜杀嗜杀的侵略者，以其天良丧尽的思想把科学和战争联结在一起，残忍、冷酷地醉心于毁灭人类的各种实验。让我们看看这些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恶魔医师吧。

据第七三一部队的队员描述，部队长石井身材高大，身高超过1.80米，蓄着胡子。经常一身戎装，胸前挂着勋章。口才很好，喜欢挺胸腆肚滔滔不绝地演讲。只要一有事，就把全体人员集中到63栋的大礼堂，强调使命、布置任务、解说时局，手上缠着麦克风的软线，大声吼叫，以至队员们私下称他“耍把戏的猴子”。

石井对细菌战有种疯狂的迷恋，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研究细菌武器。比如人体实验，活的“原木”、死的“原木”、健康的“原木”、感染病毒致死的“原木”，都是他研究的对象，甚至第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家庭、他的助手，一旦染上病毒，也都会成为他手术刀下、显微镜里的研究对象。

除前文提及的“石井式陶器炸弹”之外，还有制造细菌的方法、鼠疫菌寄生跳蚤体内的方法、鼠疫菌干燥保存法、鼠疫菌增毒的方法，以及许多设备、器械，都是这个恶魔般的“天才”研究创造的。

第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使用的是石井亲自创造发明的细菌培养器（加压式培养器），并亲自研究出短时期内能培养和繁殖大量细菌的工艺流程，为了制造大量的、经过培养仍然保持强烈毒性的鼠疫菌，石井和高桥班想出了给“原木”一个接一个“移注”鼠疫菌的办法。他们先给“原木”A注射生苗疫苗，让他体内血液、淋巴当中产生的抗体和鼠疫菌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直至“原木”死去。在与抗体斗争中取胜的鼠疫菌，它的毒性相应地增强了。于是，把“原木”A的血清再注射给“原木”B。浸入毒性较高的鼠疫菌和“原木”B的抗体相斗争，就会产生更强烈的菌，然后把它再注射给“原木”C。这就是为培养出具有强烈毒性的菌株，而以“原木”生命架设的增毒桥梁。对其它细菌的增毒，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在增毒过程中，也有人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这些人的抗体变强了，对细菌具有较强的免疫力，从防疫研究上，他们是高“价值”的“原木”。可是

老让这些免疫力特别强的“原木”活下来，就会让源源而来的新“原木”无法容身。于是，石井命令对“原木”采取“间苗”。将老“原木”处死。由特别班人员将他们从单人牢房带到特别处置室。以往曾多次作为被实验体的“原木”，怀着戒心不愿走出室外，特别班人员就对他们说：“决定释放你了，为了预防要注射疫苗。”“被带到特别处置室的‘原木’手腕上，‘噗哧’地扎上装有 20CC 氯甲烷的注射针……不到 1 秒钟，‘原木’就激烈地喘息，翻着白眼，呼吸困难，浑身起鸡皮疙瘩断了气。……这种‘间苗’多的时候，一个月要处置 20 多个。……一度曾经徘徊在死亡线上，但最后得救的‘原木’，这回确定被子了。真是无情的事啊！”一个原队员这样回忆石井下命令“间苗”的情景。

石井是“夜猫子”型的工作狂，常常白天在部队长室里呼呼酣睡，一到晚上头脑就很清醒。他的口头禅是：“就七三一的工作，无论是什么样的小事，只要是建议，哪怕深更半夜也不要紧，请随时到我屋里来。”他自己也是一想到什么有关细菌研究和细菌战的主意，哪怕深更半夜了，也立即叫来副官吩咐：“集合干部，现在马上要开紧急会议。”

石井生活放荡，沉溺于酒色，经常出现关东军司令部有紧急事联系时，他的副官们一齐出动，分头在新京（长春）或奉天（沈阳）街上的酒店里一家一家地寻找部队长的事情。他还曾因贪污公款和财务帐目不清被收容审查。1942 年 7 月，他又因侵吞公款，贪污腐败被革去第七三一部队长职务。也就是在这次解除职务后，他去了南京，在那里指挥了日军侵华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浙赣作战”——大规模的细菌战。

1945 年 3 月，石井重新就任第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他把部队代号改称为二五二二。5 月，他向部队提出：“实验阶段已经结束，今后，只有朝着实施细菌战的‘X 日’一路增产了。”

六、“为逃脱求解放浴血而死”

“与其把我们当上拨鼠作残酷的实验，还不如把我们杀掉好……”

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审判长审问的证人是在第七三一部队经理科工作的掘田见习士官。

问：在监狱里供实验用的人，是顺从地忍受这种实验的吗？有没有囚犯反抗的事例？

答：1945 年夏天，目黑（指与掘田证人一起受过第七三一部队队内教育的目黑军医）邀我到他的实验室去玩。我耽搁了一会儿之后，就到他那里去了。不知为什么，他非常激动，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我问他原因，他告诉我说，收容在监狱里的人反抗了。我通过三楼来到监狱那栋房子。那是我第一次到监狱去看。

手持步枪的 2 个人从房顶上监视着监狱，在监狱的门旁同样站着四五个手持步枪的人，都是特别班队员。但是这时，监狱已经平静下来了。

问：对这些囚徒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打了实验者的这个囚犯，从牢房里跳出来，跑到走廊，手拿钥匙打开了几间牢门，一部分囚犯跑出来了，可是那只是一些大胆的，而且那些大胆的人都被枪毙了。

问：就是说，反抗实验者的人们都被枪毙了？这确实吗？

答：是，确实。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的《公审文件》中，涉及到“原木”暴动的证词仅此一段，而堀田本身没有亲眼目睹。但顺着这条线索，人们可以看到“原木”们面对恶魔般的敌人，为争取人的权利和生的权利，拼出短短的生命，作了勇敢不屈的抵抗。

关押“原木”的特设监狱，是由20多个单人牢房和集体牢房构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独立建筑。牢房大小约4铺席（4张榻榻米），用40厘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的墙和铁门隔开，周围有一圈走廊。从走廊到外边去，要使用一侧的楼梯，由一道很厚的钢铁造的门把走廊和楼梯隔断。

在墙壁中间安装了粗大的管道。这管道有两个功能，一是由这条管道给各牢房通风换气；另一功能是能有效地把收容进来的“原木”全部杀死。其设计是：把通在墙壁中换气筒一边的阀门关闭，从另一边送进毒瓦斯，在10数秒钟之内毒瓦斯就可以通过管道到达各间牢房。“一朝有事，只要一按队长室内的阀门，‘原木’就会一个不剩全部报销。”为了全部虐杀“原木”，曾使用过两次毒气装置。一次是1945年6月上旬“原木”暴动时用的，另一次是同年8月9日开始的第七三一部队的撤退和崩溃时。

对于第七三一部队队员来说，“原木”是只有号码而无姓名的单纯的实验材料。然而，“原木”到底还是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收容在单人牢房里的多数“原木”，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敢爱国者。不少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指战员，也有学者和记者。乍一看，手脚被束缚，白天蹲在床上躲开看守的目光，可是一到晚上，他们就秘密地开始了狱内斗争。

从这间单人牢房到那间单人牢房传递信息，互相自我介绍，传播房内的事情。

一个曾是特别班队员的人回忆说：“有的时候，押送进来了头脑好的中国‘原木’。他被收容进来的情况和他的经历、姓名，各个牢房好像早就知道了。其证据就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原木’被挑选作实验体，在对他进行活人实验时，各个房间的‘原木’全体绝食，进行了默默的抗议，也就是绝食斗争。发生这类事的根子，就是因为有连结各房间的通信手段。这样想的特别班班员们，当一个‘原木’死亡，在给这个单人牢房消毒时，对室内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可是什么都没发现。”

也有这样的事：把加进伤寒菌的糖包子作实验送给“原木”吃，可是所有的“原木”谁都不伸手。这是因为有经验的“原木”给各个房间通气说：“包子里有可能掺入了细菌。”

更为惊人的是，各个单人牢房之间，有“物”的来往。“物”有各式各样的，为了拯救患病的“原木”，有跟着饭食一起传的干果，有用手纸记载了实验内容的信等。

“特别班在一开始的时候，被这些单人牢房里发生的事，弄得神经相当紧张，把认为是元凶的‘原木’一个接一个地作实验杀掉了。然而通信网从临死之前的‘原木’又传给了新进来的‘原木’，从来没有中断过。……天长日久，特别班班员们也只得死了心。……无论怎么考虑，也弄不清他们是怎样互相取得联络的，此事至今仍是个谜。”一个原队员说。

在被隔绝了的单人牢房和单人牢房之间，悄悄地移动着的“物”，是“原木”们还活着的证明，是不屈的战斗精神的证明。

最令第七三一部队队员惊骇的是，单身牢房的墙壁上写满了大字。每个字的大小约 20 厘米见方，是紫黑色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看就知道是用血写成的，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字体。它是被关押的八路军指战员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表达对侵略祖国的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党的无限热爱，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在处处剥落的混凝土结构的墙壁上，这一个个凸凹不平的字，那紫黑色的一笔一划，具有震撼人们灵魂的巨大威力！

“当我看到墙壁上的字时，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大概是在临被用作实验体杀死之前，竭尽全身气力写下的。当时，我虽然对共产党、共产主义思想什么的一无所知，但却受到了实在难以形容的冲击。……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竟还有仍然抱有那么坚强信念的人。……当时我直感到他们不是‘原木’，而是勇敢的人。”这是当年站在单身牢房墙壁前，被血写的标语所震撼的原队员的叙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鲜血书写的标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是对法西斯主义和第七三一部队为代表的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控诉，它激励着陆续被关押进来的囚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要为民族的解放和维护祖国的尊严而斗争。它像一首无声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

1945 年 6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 8 点 30 分，第七三一部队本部各单位进行点名朝会以后，2000 多名队员刚刚回到各自的工作地点。在特设监狱 7 栋二楼单人牢房左侧的一个房间中，一个俄国“原木”开始诉说身体异常。在同一单人牢房里，收容着 2 个俄国人，另外一个“原木”喊来看守，告诉他“同室的人身体出现异样。”

对七三一队员来说，活人实验是日常业务，因此对“原木”的身体异常、诉说有异常反应，不能置之不理，必须把这种异常反应丝毫不漏地记录下来，确保实验资料的完整和准确。

在 7 楼巡回的一个特别班员，往诉说异常的俄国“原木”所在的左侧牢房走去。他从牢房正面的窥测窗子往里一看，确实有一个俄国“原木”躺在木床上，带着手铐的手按压着胸部，发出了呻吟声。在他身边，同室的“原木”一边担心地叫喊着，一边带着手铐在看守着他。这种情景，在特别班员的眼里司空见惯。于是，他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把钥匙插到单人牢房出入口的铁门锁孔内，打开了铁门。

实际上，特设监狱牢房门上的锁，都是按同一结构专门制造的，这样便于提高管理效果，也符合七三一部队“原木”消费速度和补充速度的要求。也就是说，这座特设监狱采取了一把钥匙可以开关一切单人牢房铁门的办法，省得每当“原木”出入，都要一一寻找对号的钥匙。

铁门打开了，特别班员走近了呻吟着的“原木”。突然，痛苦呻吟着的俄国“原木”像弹簧那样一跃而起，猛扑向特别班员。与此同时，另一个“原木”也与特别班员扭打在一起。他俩对准被突然袭击惊呆了的特别班员额际，狠狠地砸了一锁，并从特别班员手中夺得了通用钥匙，这只是发生在一瞬间。

惊魂未定的特别班员跌跌撞撞地从单人牢房逃了出来，跑到走廊上，狼

狈地钻出隔断单人牢房走廊和楼梯相通的铁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外边把门闩放了下来。这样一来，虽然单人牢房出入口的铁门已被陆续打开，可是在第二道关卡，可以阻止“原木”的逃跑。

从楼梯下来的特别班员，跑进了“口号”栋特别班室，向当班的简短地报告了情况。让“原木”夺走了通用钥匙，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使整个特别班骚动起来。当听说走廊与楼梯的铁门已被关闭，当班的才松下一口气。他一面命令全副武装的班员立即出动，一面跟总务部联系，请求火速增派警备人员。

这时，在7栋二楼夺得通用钥匙的俄国“原木”，一面一个接一个地飞快打开各个牢房的铁门，一面大声地呼喊：“快出来！快逃跑！”

“在7栋，‘原木’发生了暴动！请求火速增派警备人员。……请全副武装赶到特别班来！”接到紧急电话的总务部，一片紧张气氛。由于总务部里的办公室多是女军属（文职人员）和老头儿，能够立即派出警备人员的部门，只有印刷班和摄影班。并集中了8个军属（文职人员），在兵器库前领了三八式步枪和子弹，并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展示了7栋的构造图。接着，他们将子弹上膛，在特别班员的带领下，冲进中庭，面向7栋一列横队散开，把枪对准了牢房。

“增援部队”的队员，看见了在离枪口15米的前面，7栋二楼的走廊里，身着黑色囚服的“原木”们在来回走动。左端，一个褐色头发、40岁左右、宽胸脯、红脸膛的俄国人，用手抓住走廊的铁栏杆大声地叫唤。“原木”的两眼充满了愤怒，那声音很粗，不断在中庭回响。

“小川君，这家伙在说什么？”一个队员问总务部调查科会讲俄语的小川翻译。

“噢，大意是，你们欺骗了我们，把我们禁闭在这里，反复进行残酷的实验，杀了很多人……他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紧张得面色发青的小川，快速地回答。

小川翻译把扩音器放在嘴边，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向俄国“原木”喊话，让“原木”赶快回到单人牢房。他的喊话立即被“原木”所打断，“原木”们挥着拳头继续叫嚷着：“你们用枪口对着我们，这一点也不可怕……日本人都是一些懦夫。赶紧把我们放出去……与其把我们当土拨鼠作残酷的实验，还不如把我们杀掉好……”

一声枪响，那个俄国“原木”的身体就像被弹起来似的，转动了一圈；以一只手还想抓住铁栏杆的姿势倒下了。

一个当时在现场的队员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俄国人所说的话，是被剥夺了自由的人发出的心声。……但是当时的我不理解他的愤怒，觉得‘原木’毕竟不是人；让‘原木’那么小看岂能容忍！让他们暴动还得了！然而，在面临死亡的最后一刻，在枪口前面挺胸昂首，跺脚抗议的那种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饮弹而死的俄国人，……我们用子弹封住了他的口。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被失去了自由的、赤手空拳的他们给压倒了。我们在暗默中省悟到：正义不在我们手里。一想到那时的情景，如今依然夜不成眠。”

俄国“原木”被枪弹打死后，紧接着在特设监狱的中庭，出现了恐怖的景象，口号栋的三楼屋顶上和监狱内走廊的中庭，站满全副武装的队员，一个高大的足凳被搬到中庭里，接着，装上了连接软管的瓦斯圆筒，给端着步

枪站在中庭的全体队员发了防毒面具。

毒气罐的阀门打开了，从对着换气装置末端的喷啼尖端，猛烈地喷出了速效性毒气，沿着换气筒传进来的毒气，由7栋二楼各单人年房的通风口流入各房间。

仅仅在几分钟内，收容在7栋的全体“原木”就都死去了，这就是堀田证人所目击的“……但是到了这时，监狱内已经平静了。”这是毒杀全体“原木”后的一种令人生惧的死寂！和奥斯维辛一样，日本侵略者在这儿也施行了用毒气大肆虐杀手无寸铁的囚犯的暴行。

“原木”的暴动，给了第七三一部队队员一个极大的冲击。他们以不屈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单纯的实验材料，而是具有反抗性格的人类。

“真可惜，实验材料给消灭了……”在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一个恶魔般的上层人物这样懊恼地说。

七、“崩溃的白魔巨塔哪里去寻梦迹”

焚尸炉忙于烧毁人头标本，腾不出空来焚烧“原木”的尸体

自从1939年第七三一部队移防到平房附近以后，哈尔滨市及其周围便接连不断地发生奇怪的灾难——突然流行各种急性传染病。

1940年夏天，位于当时新京（长春）西北50公里的吉林省农安县，突然发生了混合鼠疫。更奇怪的是，主要应在冬季流行的鼠疫，却在夏季流行起来。鼠疫开始发生在县城内，几天后蔓延到城外的农村地带，发病者一个又一个地相继死去，死者达300多人。

同年，在哈尔滨市的傅家甸地区，突发过伤寒病。当时传说是因为有人往水源里撒了病菌，死者不少。这次伤寒病，甚至把当时住在哈尔滨的近10万日本人也卷进去了。

就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的同一时期，新京（长春）火车站后面，离车站北面附近1公里地密集的贫民街，突然发生了鼠疫。

接着是位于离哈尔滨市东北方20公里处附近的满蒙开垦团里，饲养的羊和马突然患了原因不明的病，接连不断地大批死亡。

这些各地的传染病，其实都是第七三一部队和关东军特务机关联合作战，人为地发生、人为地平息的。它是以市、街、区为舞台，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实验”。

除了以人为对象的细菌战研究，以七三一部队的研究实验为基础，日本侵略者还新设了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细菌战部队——第一部队。关东军司令部交给该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开始对苏作战的时候，一旦日本因作战的需要转移到大兴安岭的话，就用细菌和烈性毒物污染所有的河川、贮水池和水井，要让所有的农作物荒废，让牛羊全部死光。”第一部队进行了家畜传染病和毒物实验。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崩溃和逃跑的日子，终于降临到活主生地把3000多人作为细菌战实验材料加以残杀、肆无忌惮地实施着暴虐的第七三一部队自己头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带来了七三一部的崩溃。

1945年上半年，整个战局对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不利。2月，在苏联克

里米亚雅尔塔的利瓦吉亚宫，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代表着已稳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券的“三巨头”——美、英、苏三国，开会讨论了对战后世界问题的处理意见。2月11日，“三巨头”在秘密的《雅尔塔协定》上签字。美国同意苏联在远东的一切领土要求和主权要求，其中包括外蒙古独立、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权益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同意在战胜德国3个月内对日宣战。

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政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已经敲响！

从同年4月份以来，1000多架美国飞机，接连对东京狂轰滥炸，皇宫、皇太后宫、明治神宫等处相继中弹，东京成为一片火海，到处断垣残壁，与此同时，斯大林命令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从刚刚结束战斗的欧洲战场调回国内，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6月，在克里姆林宫，刚刚接受“苏联最高大元帅”军衔的斯大林召集苏联红军远东作战会议。他决定：3个月内打败关东军，命令苏联红军立即开赴远东前线。

此时，昔日号称“无敌的70万关东军”已无往日的威风。随着南方战线局势的恶化，其主力已有20个师团被抽调到南方各地，剩余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差。可以说，关东军握着的唯一“现代武器”，就是第七三一部队的各种细菌和毒药。

石井四郎部队长清醒地意识到末日的来临。5月，他集合部队干部作了“日苏开战势在必行……今后七三一要全力以赴，突击细菌和跳蚤、老鼠的增产”，提出要今后实施细菌战作准备。

七三一部队已经发明了鼠疫苗的干燥保存法——制造干燥菌的技术，生产了具有比普通鼠疫苗高60倍毒素的变性菌。鼠疫苗雨化技术已取得相当进展，陶器炸弹业已完成，并正在大量繁殖一种生存能力特别强的老鼠和“具有最有效的吸血能力的跳蚤”。“5月10日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今后的两个月之间必须大量生产鼠疫苗，以及投放水井、贮水他的伤寒菌、霍乱菌、污染河流和牧场的炭疽菌。……柄泽班增加了人员，进入了24小时生产的体制……。其结果，光鼠疫苗就生产了近20公斤……包括已储存的，加上干燥菌，我想已达到100公斤。”这是原队员的证言。据原队员说：在战争结束前夕，第七三一部队作为“可以使用”保存的各种细菌数量达到了“如果全部用理想的方法散布的话，地球上人类就会统统死光”的程度。

规定鼠疫跳蚤的增产目标是“300公斤”（约10亿只）。据说田中班有4500个跳蚤饲养器，在短短几天内就能确保生产1亿只跳蚤。“但是，要生产马上就能使用的、活生生的10亿只跳蚤，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听说要在这么多跳蚤身上撒上鼠疫苗，把它们统统放到苏联军队，撒到城市里去……。我真感到这简直太不寻常了。”一个原队员这样追述往事。

下达了以“增产300万只老鼠”为目标的号令，为了捕获老鼠，组织了“特攻队”，队员们在卡车上装了大量的捕鼠器。在哈尔滨、新京（长春）的各市街到处转，还动员居民、学生去捕鼠。

死到临头的第七三一部队开展的细菌、跳蚤、老鼠增产运动，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但它并不能挽救其覆灭的下场。

8月6日凌晨2时45分，美国提尼空军基地上的“思诺拉，格”号B—29轰炸机起飞。6个半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广岛上空，投弹手费雷比少校

按动了投弹按钮。

广岛上空 600 米，一个巨大的火球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蘑菇云滚滚上升——世界上第一颗新型的大面积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爆炸了，死神在广岛上空降临。

3 天后，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两弹原子弹，夺去了 30 多万无辜人民的生命，他们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陪葬品。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命令：8 月 9 日 0 时，进攻开始。

8 月 9 日 0 时，暴雨裹着狂风，电闪夹着雷鸣，苏联红军 5500 辆坦克同时向日军阵地冲来；1000 多架轰炸机冒雨起飞，许许多多的海军舰艇蜂拥而至。长达 4400 公里的中苏边境上，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外蒙骑兵团，总计 150 万兵力，在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向日军同时发动攻势，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日军的防线，以惊人的速度向我国东北全境和朝鲜推进。

“苏军开始进攻了”，犹如晴天霹雳，使在东北的关东军及其他在华日本人陷入大混乱之中，第七三一部队的队员及其家属也骚然不安。

8 月 10 日天刚亮，关东军司令部给石井部队长发来了“前来接受命令”的电报。

但是，石井部队长已经一天没有露面了，去向绝密，谁也不知道。部队的长官慌忙让 N 副官前往新京（长春）受命。

N 副官来到乱成一团的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已飞往外地。N 副官禀告自己是前来接受命令的，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是：“苏军进攻速度迅速，关东军各部队已开始南下转战，七三一部队可以独断专行。”

N 副官返回七三一部队，已是 8 月 10 日晌午。命令很清楚，要求七三一部队自行决定撤退事宜。上层领导骤然感到形势紧迫，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

当天夜里，石井四郎部队长回到七三一，他重新召开了撤退会议。会上，石井部队长和菊地少将（第一部部长）等的意见尖锐对立，据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石井部队长的撤退方案是：保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是最大的问题。由已派去的西中校（教育部长）向苏联军队进攻途中的海拉尔、孙吴、牡丹江各支部的七三一队员下达消灭证据及全体自杀的命令。向往在东乡村官舍的队员、家属们下达以此为榜样，全体自杀的命令。目前收容在监的“原木”一个不留，统统杀死；与此同时，“彻底”破坏“口号”栋建筑，部队的设施由工兵进行爆破。全体人员，包括少年队南下至通化。

激烈争论的原因，出在石井方案的上。菊地少将主张“在六三一部队里有许多有才能的研究人员，与其逼他们白白自杀，先决的倒是要拟定出挽救支部的计策。”他口气强硬地说：“部队长应带头作出努力，让队员的家属返回日本内地。”

最后，石井部队长作了让步，决定“家属立刻开始撤退，部队长到各地去部署列车运输，指挥各支部撤退。”石井部队长又重新在七三一部队消失了。

这期间，石井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把七三一积累的、为准备细菌战的各种资料，大量的实验数据、菌种带回日本；第二是安排七三一撤退的列车优先通过，避免让苏军抓到俘虏。为此，他最大限度地使用了七三一航空班所属的军用飞机；第三是专门将特别班员紧急避难，因为特别班员都来自石井

家乡，是七三一部队的核石井部队长给特别班员下达的直接命令是：“把‘原木’杀死之后，全体人员立即紧急撤退！”也就是说，七三一的善后你们不要管，杀完‘原木’以后马上撤离。

8月10日，特别班用毒瓦斯杀死了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全体“原木”，总共40多人。

自从“原木”叛乱后，特设监做的换气装置又重新换成了毒瓦斯的注入筒。

“简直如同观看笼子里拼命挣扎的大猩猩似的……”一位目击屠杀全体“原木”的队员这样说。

“原木”中有几个尚未被毒瓦斯熏死，他们拼命敲打着铁门，发出可怕的哀鸣，痛苦地用手抓挠着自己的喉咙。特别班的队员手握毛瑟枪，慢慢地走近“原木”，对准他们的胸膛扣动扳机。“拖着杀死的‘原木’们的腿，把尸体一具接一具地扔到7栋楼旁边挖好的大坑里，浇上汽油和重油，点着了火……七三一的焚烧炉由于忙于烧毁人头标本，以及培养细菌的琼胶、大量的文件、器具，腾不出空来。……‘原木’的尸体很不容易燃烧，但是撤退却要分秒必争，脚底抹了油的特别班队员，烧毁尸体的作业刚刚进行了一半，就往上边匆忙地盖上点土逃跑了……因此，有的手脚还伸在土上面，根本起不到掩盖犯罪的作用。七三一部队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命令道：‘把尸体重新挖出来，完全烧毁！’那些担任挖掘瞪着眼睛僵硬的‘原木’一具具尸体任务的队员们，忍着剧烈的恶心，不断地挖着。”一位队员这样回忆道。

8月11日，满载着特别班成员和贵重资料的3列军车，从平房站七三一部队的专用铁路上开出。

平房站里仍在忙碌着，来不及烧毁的标本被装上卡车运往松花江边，乘着夜色扔进江里。细菌培养器、冷冻设施、陶器炸弹等全部被逐一破坏。工兵在紧张地作业，“口号”栋的各个房间和走廊都被浇上了重油，放起了大火。在滚滚腾起的黑烟中，随着震撼整个设施的巨大声响，这座巨大的魔窟倒塌了。无数老鼠从动物舍逃往四周原野，田中斑建筑物里，逃出了几百万只跳蚤。队员和家属们每人发得1小瓶草味班发明的剧毒氰酸钾化合物，作为自杀用的。六神无主的人们被深深地卷进逃亡的巨大漩涡之中。

8月16日夜里，当满载逃亡队员和家属的列车在新京（长春）车站停车时，石井四郎手持蜡烛突然在站台上出现了。他眼里闪着困兽般的凶光，对着列车大声嚷道：“……日本战败了。你们马上要回日本内地去……但是，无论到了哪里，你们都要保守七三一的秘密。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泄露了军事秘密，我石井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都要把泄露者找到。你们可要记住哪！”

回到日本的石井四郎，在东京新宿区办了个旅馆。1945年冬，他受到美国占领军的传唤，当远东军事法庭开庭之际，苏联曾要求审判和惩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以石井四郎部队长为首的官员。石井四郎连忙与GHQ（驻日盟军总部）联系，把秘密携带回国的七三一有关资料提供给美军，以求保身。

结果，美国政府决定：“对日军细菌战班子的所有队员都不作为战犯起诉。”

美军悄悄地让在中国上海被俘，关进收容所的北野政次（1942年至1945年之间任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回到日本。极其秘密地安排了石井-北野会谈，使他们能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应付审问。

GHO的审问徒有形式。事后，美军把“石井四郎以下的领导干部下落不

明，七三一构不成战犯”的解释通知苏联方面。这个进行过世界史上空前的细菌战，残杀“消费”了 3000 多人生命的第七三一部队罄竹难书的罪恶，因为新的战争需要被掩盖了下来。

1945 年冬天至次年的初春，猛烈的鼠疫袭击了平房附近的广大地区。在初发源的那个村里，平均每天要死 10 个人，400 户人家全部死光。恶魔部队的残骸上，依然散发着残害人类的腐臭。

第七章慰安妇的血泪

慰安妇，一个伴随着日寇侵略战争出现的新名词，她们是在二次大战中流尽血泪的女性团体，是被战争这头怪兽残忍吞噬的一群羔羊。日本侵略者诱骗和驱赶了 20 万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少女、少妇，在中国及东南亚充当慰安妇。这些进入地狱之门的弱女子受尽人间折磨，过了长达 8 年的非人生活。日寇的铁蹄，摧残了她们的身躯；日寇的罪孽，殃及了她们的一生。慰安妇，一个与强奸、轮奸连在一起的名字，一个与耻辱、罪恶伴生的名字。

一、性病：日军司令部亮起红灯

大正六年，日军 7 个师团进军西伯利亚，被花柳病消灭了 1 个师团

“七·七”事变后，日寇随即进攻上海，战火迅速蔓延。上海沦陷后，松井石根大将于 1937 年 11 月 5 日令北路兵团、南路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发起南京攻略战，意图一举摧垮中国首都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从杭州湾登陆开始，趾高气扬的日寇以胜利者的姿态一路烧杀奸淫。及至攻陷南京，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 2 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到的有关强奸的调查报告和控诉呈文叠起来有一人多高，每一份报告和呈文都记录了日寇的兽行。

调查报告 13012 号

高攀柏村王娄氏，年 44 岁，被敌兵先奸后杀。

调查报告 21314 号

中华门外贾彭氏，年 29 岁，连遭日寇数次奸污，迄今生死不明。

调查报告 33041 号

陈二姑娘，年 18 岁，在南门外沙洲圩被日寇强奸数欢。嗣日又连续被奸污。

调查报告 14311 号

杨周氏，年 17 岁，在黄泥塘地洞内被敌轮奸，复用枪毙杀头部致死。

调查报告 15271 号

刘宝琴，年 21 岁，被日寇 2 名轮奸，嗣后又被日寇强奸数次。

调查报告 16431 号

陶汤氏，年 18 岁，被日寇轮奸后，以刺刀戳于肚上，续以火烧死。

……

控诉呈文 1123 号

1937 年 12 月 16 日度及 17 日，南京最少有 1000 妇女被日军强行奸污。其中一妇女遭日军轮奸达 37 次之多。另一妇女抱一南 5 个月之婴儿，因啼哭为日军窒息致死，其母复遭奸。

控诉呈文 2331 号

1937 年 12 月 30 日，日军在青云巷 6 号抓走青年妇女 6 人，将她们带至城西某日军医院。妇女们白天洗衣服，晚上通宵被轮奸，年龄较大的被轮奸到 10 至 20 次，较年青的且又长得好看一些的被轮奸 40 次之多。

控诉呈文 3120 号

吾等亲见汉口路 23 号 2 名中国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日兵强奸。

.....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当年率先进入南京城的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面对着血泪斑斑的《调查报告》和《控诉呈文》却狡辩说，他的第6师团进入南京后，住宅未毁一间，瓦未掉一片，连猫也未死一只。他的部队未进民宅，露宿街头，默默地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更不用说杀人和强奸了。

法庭出示了若干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南京沦陷以后，谷寿夫的第6师团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第6师团长谷寿夫不仅亲自杀人，甚至还在南京大街上公然强奸妇女。第6师团进入南京一个多月，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已在军队中迅速蔓延。性病之严重，已经开始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第6师团性病蔓延的情况，引起了南京攻略战最高指挥长官松井石根大帝的注意。松井命令组织军医官到北路兵团和南路兵团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情况令人震惊。性病蔓延的情况，绝不止谷寿夫的第6师团。南路兵团的第18师团、第114师团及国崎支队，北路兵团的第3师团、第9师团、第11师团、第13师团、第16师团及重藤支队，各部队均发现了性病有如星星之火逐步燎原的情况。

松井石根铁青着脸听完军医官的调查报告，下令在指挥部紧急召开性病对策会。

当各部司令长官及有关军医进入会议室，对会议室里亮着的一盏红灯议论纷纷的时候，松井威严地发话了：

“花柳病进入我军兵营，诸位不感到脸红吗？大正六年，皇军7个师团奉天皇陛下命令开进西伯利亚，结果花柳病横行。因花柳病而丧失战斗力的官兵比战死者还多，大约与战伤者相等。皇军7个师团，被花柳病消灭了1个师团.....”

松井瞥了瞥红灯，凌厉的目光在一个个司令官的脸上扫过。当他的目光与谷寿夫的目光对接的时候，略略停顿了一下，压低了语调说：

“强奸不是大日本皇军的光荣。与日本军人接触过的女人，必须让她们永远沉默，明白我的意思吗？”

谷寿夫“啪”地跳起来，高声说：

“明白。”

“我军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绝不能让花柳病吞噬我军，让大正六年的悲剧重演。浅野医官，请你说说你的意见。”

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活像眼镜蛇的浅野军医站起来，分析了花柳病蔓延的原因。他说，军中的一些不洁者道德败坏，自己得了花柳病以后，不但隐瞒病史，还企图让所有的健康者都染上不洁之病，以减轻心中的不平衡和环境对他的蔑视。这些花柳病患者进入中国战场后，到处寻找女人，再由染病的中国女人传染给其他人。浅野医官说，据在常州某村的调查，进攻南京的先头部队路过该村以后，该村80%的妇女均染上性病。当后续部队再次糟塌该村的妇女时，花柳病便成了部队的影子。花柳病的潜伏期不过1个星期，而治愈却颇为不易。浅野得意洋洋地说：

“诸位长官，今天我向松井司令建议，在司令部亮起红灯，提醒各位务必注意花柳病问题。凡是检查出患有花柳病的官兵，一律要写出悔过书并实行隔离。暂时没有条件隔离的，洗澡要安排在最后，让他们使用染成红色的手纸。关于预防问题，有两点：一是刚才松井司令说的，必须让与皇军接触

过的女人永远沉默，既无强奸之名，亦无性病之忧。第二嘛……浅野有意放慢了速度，看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才卖弄似的说：“为了满足官兵的性饥饿，司令部决定在各部队设立慰安所。至于慰安妇，除了就地取材外，我们已向陆军本部发出了求援……”

二、征集慰安妇

诱骗、欺诈、强逼……20 万妇女被驱赶上前线充当慰安妇

为了保持侵华日军的战斗力，不让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时被花柳病吃掉 1 个师团的悲剧重演，设立“陆军慰安所”和寻找“慰安妇”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慰安所”和“慰安妇”是十分新鲜的名字。有许多当过慰安妇的女人却不知道自已曾被称为“慰安妇”，她们被人称为“婊子”，当作牲口，当作工具，被使唤，被使用。日军征召时，除少数人得知将从事色情和卖春外，多数女人是被日军作为“军要员”、“打字员”、“看护妇”、“护士”、“女子工员”等招募来的。当然，也有不少是被日军抢掠来的，亦或是“买”来的。中国权威工具书《辞海》没有收列“慰安所”和“慰安妇”的辞条。日本权威工具书《广辞苑》这样解释“慰安妇”：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被日军征集或抢夺作为慰安妇的，除中国女人外，还有日本女人，但更多的是朝鲜女人。

中国慰安妇

日军在中国疯狂烧杀奸淫，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 1938 年 7 月发布《日寇暴行实录》，其檄文说：

日本军阀为达到侵吞中国的迷梦，不惜把它的兵士，一批一批地驱逐到中国来送死。但是，因为他们师出无名，所以不得不用最卑鄙的手段，用“中国姑娘”来做鼓励士气的唯一工具。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沦陷区域以内，成千成万的女同胞，莫不遭受着比屠杀更为惨酷的奸淫。在首都，在山西，在鲁南，在淮河北，在太湖沿岸，以及其他沦陷的地方，兽性大发的寇军，每天强迫我们的女同胞脱得一丝不挂在露天下，供他们玩弄、侮辱，70 岁的老妇，8 岁的幼女都不能幸免！

日军为了不留下强奸、轮奸的证据，对中国妇女往往奸后即杀，且极其残忍。因此，日军后来所到之处，往往十室九空，根本不见妇女踪影。

日本军方在侵华战争中，一应战略物资令侵华日军就地取材。慰安妇，作为可以安慰部队的特殊的战略物资，亦今日军就地取材。

中国慰安妇的来源有以下几种途径：一、俘虏；二、抢夺；三、礼品；四、购买；五、妓女。

日军将在战争中捕获的女战俘及在扫荡中因躲避不及而被日军捕获的青年妇女充作慰安妇。日军从来没有设立过女俘虏收容所，女俘虏除一部分人审讯后即杀害外，其余女俘就弄去当慰安妇了。由于耽心女俘会逃跑或与八路军暗地取得联系，这些女俘一般送到华北、华中属于偏僻、荒凉地区的最前线。女俘被作为性工具无限制地使用，直到实在无法使用了，拖到空地上让新兵作刺杀练胆量用的肉靶子。

日军为充实在各地设立的数以千计的慰安所，在中国城乡用种种手段逼使、诱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国民党有关部门为刺探日军情况，曾组织过

数批年轻亮丽、有爱国之心的妓女，经过短期训练后，化装为难民或妓女，有意识地成为日军的慰安妇。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慰安妇即使探得日军有关情报，也难以传递出去。加上日军发现了数起有关慰安妇刺探并传递情报的事件，以及中国慰安妇谋害日本军人的事件，日本陆军部队认为被占领国的中国慰安妇对日军普遍怀有敌意，不值得信任。因此，日本陆军部从日本本土和朝鲜陆续招募了大批慰安妇来到中国。在中、日、韩三国妇女组成的慰安所里，日本慰安妇的地位最高，而中国慰安妇的地位是最低的。

日本慰安妇

日本国内有严格规定，禁止诱骗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但是，规定是规定，实行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为有了规定，所以日本慰安妇很少有真正的处女，多数是职业者手，以娼妓、艺妓、歌舞妓、女招待等为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前线要求慰安妇的电报频频传至陆军部，陆军部以招募前线“女看护”、“女接线生”、“女卫生兵”等名义征集了一批青年学生。

东京高等女校的小和子、信子就是在欢庆珍珠港大捷的火把游行之后，凭着满腔热血报名的。当她们俩到了中国，得知要当慰安妇的时候，曾有“校花”之称的小和子简直痛不欲生。她一遍又一遍地问：“皇军也会骗人吗？天皇也会骗人吗？”

朝鲜慰安妇

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前，原计划3个月灭亡中国。但是蒋介石在南京陷落前宣布迁都重庆，并将党政机关先期移至武汉，主张长期抗战。日本陆军部在占领南京后开始考虑准备长期战争的问题，计划侵华日军至少要在华留上两三年。这么长的时间，像武器和粮食一样，女人就是必不可少的军需品。

军方不知以何为依据推算出军队与慰安妇的比例最好是29:1.那么前线需要的慰安妇至少在10万以上。这么大数量的慰安妇，如果全部从日本国内募集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日本国内的公娼与私娼大约有25~30万，经过健康检查，能募集二三万已经很勉强了。这么大的缺口怎么补？虽然军方主张“因粮于敌”、“因女于敌”，但中国慰安妇的敌对意识浓烈，军方就想到了朝鲜女人。

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最初是日本的卖淫业者把魔爪伸向涉世未深的朝鲜少女。陷入色情业的朝鲜少女穿上日本妇女的和服，与日本女人简直没有什么不同。

日本军方第一次向朝鲜总督府提出征集2万名未婚女性的要求，也是用欺骗手法，以招募“女子爱国服务队”的名义进行的。

朝鲜总督府将征集命令下达给各道警察部，警察部再下达至警察署、巡查驻在所，而具体执行，是那些位于最基层的面长和巡查。面长即村长，由朝鲜人担任；巡查则既有朝鲜巡查，又有日本巡查。

村民们虽然不知道“女子爱国服务队”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一听到被点名的姑娘都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时，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女子上前线无非当个看护、接线什么的，苦死当个洗衣妇、清扫妇什么的，要长个漂亮脸蛋干什么？再说，这些活计已婚女子都能干，要姑娘们去干什么？大家议论纷纷。日本巡查扫视了一下全场，说：“看起来大家都很有支持。好，这就这么定了。第一批光荣的女子爱国服务队队员后天上午9点坐火车去亨城。

她们和当兵一样，都是为国家服务。她们将得到良好的训练、从事令人羡慕的工作。服务2年就可回家。那时能给家人带上好多的衣服和钱。就这样，拜托啦！”

日本巡查的话在村子里就是法律，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2天以后，姑娘们每人拎着一个小白褂，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布满童年和青春脚印的故乡。日本巡查把她们送到火车站指定的地点，将她们一一清点，交给了一个日本军人。

三、优先发运的“军需品”

慰安妇成为军马、军犬、军鸽之外的特殊“军需品”，获得优先发运权

无论日本慰安妇，还是朝鲜慰安妇，她们的芳名一旦写进军方的花名册，她们的肉体作为日本军方一种特殊“军需品”的身份便被确定了。

日本慰安妇多数从海上，乘坐军方的运输船由上海进入中国。朝鲜慰安妇人数众多，多数从陆上，乘坐军方的专列运输车由东北进入中国。

军医官小野在日本北九州接受了100多个慰安妇。他让这些慰安妇到长崎某军港的仓库里集中待命。百多个慰安妇跟着小野医官准备登船，可是，在登上甲板前，她们被拦住了。一个海军士兵问小野：

“这是干什么？”

“不是开往上海的运输船吗？底仓的25号、26号由我们包了。”

“25号、26号可是货仓呀！人也进货仓吗？”

“她们是陆军部的‘军需品’，当然进货仓。”

“这也不行，女人不能上船，你知道歌曲中有这样的词吗？——‘不载女人的运输船’。”

小野挠挠头，说：“那就叫你们船长来吧！”

运输船的船长来了，他见到这么多女人也面显难色：

“真对不起，《陆军运输规则》中，作为生物载运的除士兵外，有军马、军犬、军鸽，却没有妇女这一项，这是军规，不能破坏。”

“她们可都是军需品啊！”

“你说的是军需物资吧？她们既不是武器，也不是弹药，更不是粮食、是属于哪一类的军需品呢？”

船长与小野医官的谈话引起了慰安妇的注意，船长戏谑小野，说：“你把人说成物资，把她们当成军需品，不怕她们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吗？”

小野满不在乎地一笑：“上级就是这样交待和安排的。当然，我没有告诉她们。她们即使知道了自己是军需品，也不会介意的，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经过一番交涉和请示，慰安妇还是按计划登船了。此后，一批批的慰安妇在各军港登上军用运输船，不再受到阻挠和盘问了。作为军规的《陆军运输规则》，并没有在“军马、军犬、军鸽”的后面补上“军妇”一项，大家心照不宣。以后，凡有此类军需品，一律优先发运。

被作为“女子爱国服务队”挑选出来的朝鲜姑娘，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竟有“慰安妇”这样的职业，她们从各地来到京城，再由京城登上专用军列——闷罐子车，被当作“军需品”拉往中国。

四、人间地狱——“慰安所”

白天是地狱，夜晚同样是地狱，除了地狱还是地狱

1938年，日军征集了大批中、日、韩慰安妇后，即令于各地开设慰安所。

侵华日军直属的第一家慰安妇——“陆军娱乐所”，开设在上海军工路附近的杨家宅。在一座有围墙的院子里，军方建筑了10栋临时木板房，每栋有10间，每间有门牌号和1个小窗户。每间房里有1张木板床、1张桌子和1把椅子。80多个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妇女在这里当上了慰安妇。“陆军娱乐所”的牌子不久就换成了“陆军慰安所”。

1938年，日军在华开设的慰安所大致如下：

上海开设陆军、海军慰安所7家；

南京开设数字不详；

九江开设陆军慰安所24家；

芜湖开设陆军慰安所6家；

汉口开设陆军慰安所20家；

南昌开设陆军慰安所31家；

杭州开设陆军慰安所数字不详；

厦门开设海军慰安所数字不详。

侵华战争期间，随着战火的蔓延，日本军方到处开设慰安所，一直到1945年战败。8年期间，几乎没有间断过。

日军在上海开设的慰安所，除军工路杨家宅外，主要还有以下几处：

江湾镇万安路743号，原址是一个严姓大户人家的房子，抗战爆发后，破日军占用改作慰安所。

四川北路四川里（现1604弄）41号、52号、63号，当年均开设过慰安所。

四川北路2023弄7号、松柏里39号，当年开设过慰安所。

海山路映生里（19弄）1号，当年为慰安所。

东宝兴路125号、138号、160号，当年为慰安所。

乍浦路180号及乍浦路254弄内，当年均开有慰安所。

公平路425弄，日军开设“海乃家”海军慰安所，作为驻沪海军陆战队的指定慰问机构。

邯郸路末段，当年有一个叫“旭街”的地方，日方盖了4幢两层楼的砖木结构房，共36开间，作为慰安所。

南翔镇李家大院，日军在此开设过慰安所。

南京开设慰安所的数字不详，但从慰安妇的人数来看，慰安所可能超过上海。据1942年日军第十五师团军医部的一份《业务要报》记载，该年南京受检的慰安妇中，日本为1007人，中国为513人，朝鲜为113人，1943年2月某日接受检查的慰安妇中，日本为266人，中国为157人，朝鲜为14人。

芜湖于1937年12月10日沦陷。芜湖慰安所开设于1938年1月，以设在二街的凤宜楼旅社改建，并有日本军人守卫，主要防止中国妇女逃跑。

芜湖后来建的慰安所，有点像日本医院的大病房。中间是通道，两边是简陋的房子，每一边约有50张床，门口拉着一块布帘子，慰安妇就在里面接

客。

天津的慰安所最早设在槐荫里1号，名称叫“军人俱乐部”。最初征集的是妓女，以后陆续开设，中、日、韩妇女都有。

日军第三师团卫生队在经过镇江、扬州战役以后，于1937年12月18日进入扬州。扬州维持会为日军征集了47名中国妇女。在一座叫作“绿扬旅舍”的4层木楼上正式开设了慰安所。

常州驻屯军慰安所设于日华会馆南侧的围墙里。慰安所特别规定“不得以中国人为顾客”。慰安所以对士官和士兵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6点，下午6点至次日上午9点，接待准尉以上军官。这和其它城市的慰安所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军官比较集中的城市里，低级军官不得与士兵划为一个等级。

1944年，日军进入湖南宝庆城。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后方主任参谋令宪兵队长山田定准尉立即寻找中国妇女，准备开设慰安所。山田定准尉令曹长找来了十几个中国妇女，交给了后方主任参谋。不久，师团慰安所就开张了。

1945年3月，独立警备步兵第三十九大队奉命换防至河北省易县。换防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慰安所，大队本部一个叫高桥大治郎的伍长负责慰安所的设立。高桥后来又开了2家慰安所，一家用中国慰安妇，一家用日本慰安妇。朝鲜慰安妇和中国慰安妇供尉官、士官和士兵使用，取名为“大坂屋”里的日本慰安妇则主要供将校军官使用。

内蒙的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慰安驻屯在那里的士兵，1940年起，日军先后在铁路沿线地区设立了若干慰安所。内蒙慰安所以中国慰安妇为多，有不少是女战俘和被抓的妇女，朝鲜慰安妇人数较少。和其它城市一样，中国和朝鲜慰安妇供士官和士兵用，另有少量的日本慰安妇供将校军官使用。

设在内蒙的慰安所多利用中国人的土房子改建，又冷又湿。整日关在破屋子里让人蹂躏的慰安妇、她们几乎终日不见阳光。

日军设于各地的慰安所，一部分由日本军方直接经营，也有一部分交于来自日本的卖淫业主经营。但卖淫业主在中国开设慰安所，要事先得到军方的许可，慰安所由军方提供，慰安妇亦由军方供应。

日军为设于各地的慰安所作了若干统一规定：

1. 慰安所只允许军人（包括文职人员）入内，入所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证》；
2. 入所者要交钱领取入场券及避孕套；
3. 价格：士官、士兵、文职人员每次2元，准尉以上军官加倍；
4. 购券后应进入指定房间；
5. 时间每次限于30分钟；
6. 完事后立即出屋；
7. 不使用避孕套者禁止入内；
8. 室内禁止饮酒；

……

这个规定各地不尽一致，但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则都是一样的。

价格方面，一般在1~2元之间。当时一个日本上等兵每月的薪饷是10元24钱。日本慰安妇收费最高，中国慰安妇收费最低，朝鲜慰安妇居中。常州慰安所以1小时计，日本妇2元，朝鲜妇1元30钱，中国妇1元。易县慰安所，日本妇5~8元，朝鲜妇2元30钱，中国妇2元。内蒙慰安所，朝鲜妇2元，中国妇1元30钱。

许多慰安所将时间限为 15 分钟，甚至 10 分钟。将校军官安排在晚上 6 点或 8 点以后，直至次日上午 9 点。各地慰安所几乎都作了首先保证将校军官使用的规定。日军将校军官还以“初夜权”的形式训练慰安妇。

对于慰安妇来说，永远是地狱里的囚徒。

白天是地狱，晚上同样是地狱。只要不跨出慰安所的门，除了地狱还是地狱。

在前线的慰安妇，每天接待四五十个是很平常的。繁忙的时候，每间慰安妇的屋前排起百多人的长队。有一个慰安妇，在 3 个小时的时间里接待了 76 个人，最后，她连站都站不住，当时，慰安所内甚至还出现了“母女慰安妇”、“姐妹慰安妇”、“姑嫂慰安妇”以及“妻子慰安妇”等等罪孽。

慰安妇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慰安所这座活地狱里煎熬。

对于慰安妇们来说，死了真比活着好。但是在慰安所里，她们连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没日没夜的折磨，她们的身边几乎日日夜夜都有粗壮的男人相伴。要寻死，也没有机会。屋子、床铺、桌子、椅子，都是用薄板做的，想撞也撞不死。

在慰安所里，发生过数起慰安妇杀死压在她们身上的军人或者割下他们生殖器的事，这多半是中国慰安妇干的。日本军方因此对中国慰安妇比较警惕，特别是充作慰安妇的那些女战俘。

五、慰安妇的控诉

往事不堪回首，如今要讨还公道，

当年的慰安妇，如今已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了，她们大都不愿再去揭开 50 年前的伤疤。而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时时困扰着她们，乃至影响了她们的一生。以下是几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慰安妇的血泪控诉：

个案 A：臂上刺上“台北”的慰安妇

我的家在台北。那年，有人来招募“女给”，说就是酒店，餐馆的女服务员，比较好赚钱。我们一共去了 12 个人，从高雄坐船到海南岛，有一个叫“陈仔”的人带我们去。他怕我们逃跑，在我们每个人的手臂上强行刺下了“台北”两个字。我一生为手臂上的这两个字不敢穿短袖衣服。

到了海南岛，才知道是做那种事。慰安所在一座军营附近，由一个东洋的人旅舍改建的。每天会客 10 至 20 个人，多时 20 至 30 人。规定每次 15 分钟，要排队等候，但这些日本兵连等 10 分钟的耐性都没有，一个劲地催：“快！快！”他们总是成群结队而来。

比较漂亮的就惨了，门口总是一长排人，起床后都无法走路。

进来的人要买牌子，一支牌 2 元钱。结帐的时候，老板抽一半。

个案 B：他们把痛苦的呻吟当作兴奋的叫喊

我 19 岁那年，在根据地被鬼子抓走，送到一间特别的小房子里。那时我还不懂男女之事，看到男人就脸红。那天晚上，来了近 20 个日本兵。到第 5 个人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真是如刀割、枪刺一般疼，我拼命地哭，拼命地叫喊，可是鬼子竟把我痛苦不堪的呻吟当作兴奋，愈干愈有劲。直至今现在，我也无法忘记那刀割、枪刺般的痛苦！

个案 C：坐在椅子上让人选

卖淫婆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让客人挑选。选上谁，你不去不行，不去就打耳光，打过耳光还要去。这是不忙的时候。到了忙的时候，门口排上队，就没有什么挑不挑了。

平均每天接三四十个客，一次 15 分钟，要做到晚上 10 点才休息。到了晚上，常常有当官的来，还得去洗好澡陪他，供他发泄。

个案 D：连说话的劲都没有

在慰安所，从早上到傍晚士兵归队，除了中午吃午饭休息了几分钟，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工作。各式各样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涌来，有多少男人从我身上通过，我一点也不知道。到了晚上，连说话的劲都没有。

个案 E：为了天皇和国家必须报名

我原来在北海道当艺妓，那时欠了 300 日元的债（相当于现在 200 万日元），没法还。听说到中国前线作慰安工作能还债，加上又强迫报名，说是为了天皇和国家，必须去，我就报名了。那年我才 19 岁。

我乘“太平丸”到的中国，同去的有 48 个人，除了两三个被选为军官用外，其余的人都接待普通士兵。

个案 F：几百个女人投身于大海

那年，朝鲜半岛到处掳掠处女，说要成立“爱国女子挺身队”，所以半岛 15 岁至 18 岁的少男少女结婚到处盛行。我当时 18 岁，刚找到婆家，没有结婚就被抓走了。

成千的朝鲜妇女被装上运输船，传说要把我们送到日本某个军需工厂工作。可是在大海上，一群押送我们的日本兵就对我们提出肉体要求，大家不肯。日本兵说：“你们现在干和到了目的地干有什么区别”，大家才知道受了骗。日本兵不管姐妹们愿意不愿意，强行把她们拖到甲板上强暴。在贞操与死亡之间，姐妹们选择了贞操。那条船上，前后有几百个女人投身于茫茫大海。后来，日本兵将其余的女人全部捆上手脚，防止她们再跳海。

个案 G：我要讨回公道

第一次逼我干事，是个当官的。我害怕，哭得厉害。当官的用刀抵着我的喉咙强暴我，夺走了我的贞操。我想逃，但根本没法逃。就这样，做了五六年慰安妇。

回家以后，我想想自己的身子是脏的，又失去了生育能力，哪敢嫁人？再说，又有谁会娶我这种人！

当年，日本人说我们当慰安妇是为了天皇，为了国家。真是见鬼，“天皇”、“国家”与我有什么关系！日本政府应当对慰安妇作出赔偿，我要讨回公道！

个案 H：……

个案 I：……

……

看过日本电影《望乡》的人，绝不会忘记当过“南洋姐”的女主人公阿崎婆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然而，与当年的慰安妇们相比，阿崎婆惨痛的遭遇又显得何等普通呵！

第八章 中国苦力的地狱

5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不仅在中国大陆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且在日本国内也摆开了残害中国人民的屠场。

位于日本北部秋田县花冈町的中山寮，就是日本法西斯在自己的国土上，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屠场之一。骇人听闻的“花冈惨案”就发生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无辜百姓和在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士兵，在日寇刺刀的威逼下，被押送到日本各地从事奴隶般的苦役。仅在花冈中山东从事奴役的中国劳工就有1000亲人。他们在法西斯的棍棒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累死、饿死、冻死、被凶恶残暴的日本监工打死、摧残折磨死……。从1944年8月8日第一批中国劳工押抵中山寮，截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有418人悲惨地死去，死亡率高达42%。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在日本受奴役的中国劳工更是如此，人人都有一部惨痛的血泪史。

中山寮啊中山寮，人间地狱的中山寮。
所长河野是阎罗王，寮长伊势是恶判官，
众监工都是那——青面獠牙的吸血鬼；
他若叫你半夜死，你就活不到朝五更。

……

花冈河啊花冈河，花冈河边血泪多。
鬼子抓我中国人呀，千名人身遭折磨。
头天难友在一起呀，明天尸埋半山坡。
垛垛的白骨堆起的堤呀，滩滩的鲜血流成的河。

……

这首歌谣，就是中国劳工悲惨遭遇活生生的写照。

日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在闻知“花冈事件”的真相后，悲愤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的痛苦。说它是残酷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在战争时期。但试问这样的事是人间所应有的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

中国劳工是如何来到日本的，“花冈惨案”又是怎样发生的？让审视历史的镜头对准50多年前——

一、劳动力的劫掳

东条内阁作出把华人移入日本的决定，日寇在我国进行了罪恶的劳动力劫掳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把国内的劳动人民送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战场当炮灰，国内出现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会议作出了从中国掳掠劳工的决定。决定说：“日本之劳务需要，近年来益显紧迫。尤以劳动部门之劳务不足，更为严重。因此，本内阁决定，……将华人劳动者移入日本内地，期其协力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

自此，侵略者便开始了罪恶的劳动力大劫掳。在战场上，日寇以活捉我抗日战士为重要目标之一。以前，日军俘虏了中国士兵，大多杀掉；此时，全部关押。鬼子在占领区，设立了许多俘虏营，专挑身强力壮者，押送日本。在沦陷区，鬼子汉奸到处抓人，被抓的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小贩……罪名往往是“私通八路”。日寇加紧对我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在扫荡过程中，疯狂地掳掠青壮年。

这里，记述几位“花冈惨案”幸存者关于被捕的回忆：

王敏，河北深泽县人。1938年19岁时，在本村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副村长、区民政助理员和区长等职。他说：“1944年4月的一个深夜，我和区委书记到本区的甄家庄执行任务，进村后谈完工作已到后半夜，天下起了大雨，我与房东和衣睡下。黎明时分，五六个待枪的敌人突然破门而入，没等我爬起身来，几只枪口已把我堵在炕上，连拉带扯把我推到屋角。敌人发现我手腕上戴块手表，便争着抓我胳膊。就在敌人争抢我的手表时，我拔腿向外跑，因跑得太急，滑倒在院子里。敌人追上后，用麻绳把我倒剪手捆上，我被捕了。”

王敏被捕后，被押到无极县城的日本宪兵队。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阴险的目光，用中国话对他审问：“你叫什么名字？”王敏随便报了个名字：“我叫张开花。”“不对！你的为什么叫女人的名字？”边说边狠揍了他两下耳光，敌人露出了凶相。王敏沉着地回答：“是爹娘给起的。”敌人又问：“是哪个村的？你的，什么的干活？”王敏回答：“是侯村的，老百姓，送信的。”简单审问后，鬼子便把王敏关押起来。

第二天，鬼子又开始审讯，敌人见他一问三不知，恼羞成怒，用棍子朝他劈头盖脸打来，边打边问：“你的，到底什么的干活？不说，就打死你！”王敏忍着疼痛说：“打死我，我也是老百姓。”这时，又过来几个鬼子，用枪托狠狠往他身上捣，疼得他不由发出呻吟声。鬼子歇斯底里地嚎叫，王敏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一个鬼子大声喊叫：“给他电的干活！”另一个鬼子立即将两根电线头分别缠在王敏的两只手上，顿时，手摇发电机发出的电流，通过他的手涌向全身。王敏“啊”的一声，昏过去了。醒来后，敌人继续审问，王敏始终不露身份。此后，敌人把他押送到石门市集中营，“张开花”的名字，一直跟随他到了日本。

赵满山，河北保定市郊人，1944年4月，他和父亲赵有义先后被抓，一起被押到日本花冈町中山寮服苦役。赵满山说：“俺村离城不远，村中人家大多从事制造毛头纸的手工业。父亲做小买卖，卖毛头纸和盐、烟之类的小

商品，还常给西边八路军驻地送纸、盐、布匹等用品。日子一久，被村上的汉奸、特务知道，报告给日军。一次，父亲骑车夫保定车站附近卖货，鬼子、伪军一哄而上，就以通八路的罪名把父亲抓走了。”

赵满山的父亲被抓后，急坏了全家。牲口卖了，大车也卖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求爷爷告奶奶，托有门路的人设法把他父亲保出来。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保出来，而且过了不到半个月，汉奸、特务带着一帮日本兵，在天将明未明的时候，撞开了他家的门，把赵满山从被窝里给抓走了。那年，赵满山刚 18 岁。这次，村里和他同时被抓的共有 5 人，其中一人叫杨义，是共产党员。在保定，杨义受的刑最多，拷打、灌辣椒水，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了，尸体喂了洋狗。赵满山也受到拷打，日军用烟头烫他的脸和嘴，问他是不是八路，他死不承认。敌人就把他和一同被抓的几个人由保定押解到石家庄集中营。

袁子河、张洪辰、张士贵，山东齐河县人。他们回忆说，1937 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齐河县城，经常出城骚扰，烧、杀、抢、奸淫、掳掠，什么坏事都干，对略有反抗者，便加以杀害。大姑娘、小媳妇更是惊怕，穿的是破衣烂衫，还在脸上抹上泥土和锅底灰，鬼子一来便躲进柴草堆、芦苇塘。

1945 年 2 月的一天清晨，鬼子出城大扫荡，来势汹汹地一下子包围了袁子河家所在的村庄，大肆逮捕青壮年。全村约有 40 多人被鬼子五花大绑抓到齐河县城，安的罪名是八路军嫌疑。张洪辰被抓时他正帮助大哥摆摊卖茶叶、纸张，在回家歇晌时撞到 4 个日本兵，不容分说就被抓走了。张士贵是出门走亲戚，走在去济南的大马路上，上来几个日本兵，硬把他抓走，说是“皇军要人的干活”。时至 1944 年至 1945 年年初，鬼子在这一带经常进行疯狂扫荡。齐河县是如此，整个鲁西北大平原的各县以及邻近的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均遭殃。他们把人抓走后，先集中关押在济南，然后押到青岛，运往日本。仅在花冈町中山寮，被日寇从齐河县劫掳的同胞就有近 60 人。半年过后，日本投降，已有 26 人惨死于花冈河畔，死亡近半数。

耿諄，河南襄城人，国民党第 15 军上尉连长，在洛阳战役中受伤被敌俘虏；刘智渠，河北蓟县人，八路军战士，在河北省定县火车站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和日本兵发生冲突，子弹打完了，和战友刘小碗、王诚汉一同被俘。还有李振平，八路军 120 师独立第三支队侦察员；刘虞卿，国民党军第 15 军上尉军需；孟连琪，八路军老一团一营战士。还有刘锡才，青岛码头工；褚万斌，河北掌鞋工；刘玉林，山西介休人；翟树棠，河北饶阳人，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被日本兵劫掳或俘掳，共同患难于日本花冈中山寮。

自 1943 年 3 月至 1945 年 5 月，日本帝国主义将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以及在华北、华东各省进行大扫荡中掳掠的中国平民，分批押送到日本国内从事奴役，先后达 41758 名。由于日军的残酷虐待，在押送途中便死亡 2823 人。中国劳工被强行分配在日本 35 家企业的 135 个场所从事非人的劳动。其中土木建筑业最多，共 63 处，15018 人。其次为采煤、开矿、冶炼业，共 47 处，15816 人。还有港湾运输业 21 处，6073 人。造船业 4 处，1210 人。死亡率在 40% 以上的有 7 处，以花冈中山寮为最。

二、血泪浸透的劳工集中营

一处集中营就是一座阎王殿，滩滩鲜血染红了大地

日寇劫掳的中国青壮年，先集中关押于各地的集中营，每一处集中营，都是一座阎王殿。

刘智渠、王敏、耿谆以及赵满山父子等人，被捕后都先后被关押于石门市集中营。

石门市（今石家庄市）集中营，是一个四面都有炮楼，像兵营一样的大院子。院内除了有几间像办公室和鬼子宿舍一样的房子外，还有几排只有草顶和柱子，没有墙壁的草棚。草棚的四周安有通电的铁丝网。每排房前都有日本兵端着枪，来回不断地巡逻。棚内不时地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低沉的呻吟声。

草棚内阴森恐怖，气味难闻。一头放有带刺的木宠和铁笼，另一头地上有粪尿、有痰、有呕吐出来的东西。一个不算太大的草棚内，足足关有 1000 余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连一个穿衣服的人都没有，全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每当一个被捕者押进草棚，鬼子兵就比划着勒令他脱光身上的衣服，寻个空地蹲下。和刘智渠一同被俘的八路军侦察员刘小碗在地上蹲得不正，上身朝前倾着，鬼子兵就在他背后狠狠踢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刘小碗猛地爬起来，对准鬼子兵就是狠狠一拳，其他鬼子一下子猛扑过来，揪着他的头发、胳膊，拖出来，残忍地把他扔进了铁笼里……

关在这里的被捕者，白天只准蹲着，不准坐下和站着。有的人实在蹲不住了，坐下或站起身来，只要被巡逻的日本兵发现，就是劈头盖脸地一顿毒打，稍有反抗，就被揪起来，扔进木笼或铁笼，直至残害致死。

据先前关进草棚的人说，以前，被捕者还给一件衣服穿，由于有一次，大家想集体逃跑的事被鬼子知道了，鬼子兵就把几个领头的人全部关到地窖里，让他们活活地饿死。为了防止再有人逃跑，就把大家的衣服剥掉，全变成赤裸裸的了。日本人还增加了监视的宪兵，并在集中营中安插了汉奸，从事告密。

每天东方发白，日本兵就来巡查。只要一见倒在地上的人，就用靴子踢、棍子打，要是不动弹，那就是死了。鬼子兵就命令蹲在旁边的人把尸体抬出去，放在早已准备好的人力车上。离集中营不远的地方，挖了许多埋尸体的坑，像这样死的，每天都要埋二三十名。

赵满山被押解到石门市集中营，在草棚内找到了父亲赵有义。四十刚出头的赵有义，瘦了许多，已被折磨得不像人样。父子一见面又惊又悲，抱头痛哭。赵满山是赵家的一条根，父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如今见儿子也到了这个鬼地方，更是泣不成声。赵有义悄声对儿子说：“我在这儿报了 50 多岁，装成老头，听说抓来的人要送到日本或东北去当劳工，年岁大的可能不要，我有希望放出去，但愿你也不去日本最好……”父亲这个唯一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他们父子俩一起被押送到北平西苑集中营，后又双双被押送日本花冈中山寮。

北平西苑集中营是一个比石门市集中营更大的院落，这里至少可关押 1 万人。

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被捕者被鬼子押送到这里。他们都被捆绑着，每 10 个人反绑的手用一根绳子连在一起。进了集中营的门，才给解绳，而后依次更换衣服。两旁站有许多拿着手枪和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宪兵，个

个凶相毕露，如临大敌。鬼子旁边总是站着一个人穿中国衣服、有日本人模样的脸孔、手拿一根铁鞭的“凶鬼”。每当一个被捕者脱下自己的衣服时，这个“凶鬼”便用铁鞭狠揍一下他裸着的背脊，一边打着人，一边咆哮着：“是谁教你小子抗日的？”“好好记住金翻译老爷的面孔吧！”。“金翻译？”有人狠狠瞪他一眼，心里骂道：“这也能算是中国人吗？你小子已经泯灭了天良。”

北平西苑集中营同石门市集中营有些不同的是，住的是长条大房间，像火车的卧铺车厢，一边是连在一起的木板通铺，一边是走道。每个屋里关有100来人，铺板上铺着一些破草席。吃饭也是一天两顿高粱米饭，没有菜。吃的时候，有持枪的日本兵监视。每次吃饭，由几个被捕者把饭桶抬来，一人分一碗，几口就吃完。因此，大家常挨饿。

在这里，被捕者经常挨打，得了病的人被送入隔离室，但没有医生，更没有药吃。死了的，就装进一个可以把底抽出来的“抽屉式”棺材里。棺材很大，一次能容十几具尸体。当这个棺材装满了尸体，鬼子兵就命令被捕者抬着，送到一个预先掘好的大坑上，将底一抽，尸体落进坑内，盖上些土，就算掩埋完了。

刘智渠被押解到西苑集中营以后，一次开饭时，看到抬饭桶送进牢房的人中有同他一起被捕的战友王诚汉，两人见面又惊又喜。以后每次见面，他们趁日本兵不注意时，便匆匆交谈几句。刘智渠告诉王诚汉，刘小碗在石门集中营，因反抗鬼子兵的侮辱，被残酷地害死了。一听说年仅18岁、活泼可爱的战友刘小碗已经牺牲了，王诚汉热泪横溢，默默地低下头，表达对战友的哀思。

有一次，王诚汉指着一处对刘智渠说：“我现在就住在那儿，旁边一个屋子里关的全是女俘。”

一听说这里有女俘，和刘智渠同铺相邻的李大哥迫不及待地插嘴问道：“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妻子？她今年25岁，比我矮半个头，手脚都很大，头颈上有一颗黑痣，还带着一个4岁的小姑娘。”

王诚汉看了李大哥那样焦急的样子，慢慢地对他说：“那屋里的人很多，都很年轻，也有小孩，每回抬饭去，总是放在门口，看不清人。今后，要是有了消息，一定来告诉你。”王诚汉还说：“金翻译和鬼子都是一些禽兽不如的家伙，有的女人被拉出来，就没有看见再回来。”

原来，李大哥和妻子、女儿都是被鬼子抓走的。他在河北藁城县开一个小药铺，他丈人在乡下生了病，便让妻子带着信和药品去探望。当妻子领着4岁的女儿杏儿回娘家时，在城门口碰到日本兵的检查。鬼子硬说她是要到游击区通风报信，就把她娘俩一块抓走了。不久，鬼子又到李大哥的铺子里去搜查，把李大哥也抓起来了。

亲人分离，生死未卜，李大哥怎么也捺不住了。就在那天吃过晚饭后，屋里便没有了李大哥。不久，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漫骂声，仔细一听，是金翻译在发脾气和用铁鞭打人，他怒斥说：“你这个死不了的家伙，一个人鬼鬼祟祟往女人屋里跑干什么？到这个地方还想搞鬼吗？……”这个人被打得哼了起来，人们从这声音辨别出那人就是李大哥。嘈乱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可是李大哥再也没有回来。听说被揪到行刑室，金翻译硬说他“想作暗探”，鬼子兵就把李大哥折磨死了，临死前悲惨地叫着：“杏儿……杏儿她……妈！”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上，王诚汉照例抬着饭桶来了。他带着激动的语调低声对刘智渠说：“昨天晚上，金翻译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窜到了我隔壁的屋子里，想强奸一个妇女，却遭到她的坚决反抗。凶鬼强奸未成，恼羞成怒，就把这位妇女所带的、正吓得大声啼哭的四五岁的小姑娘扼死了。妇女抱着小女孩的尸体，整整哭了一夜，天亮后却不见了她的身影。今天早晨，在一口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据看见尸体的人说，这妇女的头颈上有一颗黑痣，分明像是李大哥的……她。”

“李大哥！”刘智渠情不自禁地几乎喊出声来，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到他手上拿着的碗里。

刚吃了早饭，金翻译跟在几个日本兵的后面走进屋来，他调高了嗓门命令大家到院子里集合。于是，大家都赶紧走出去，一看院子正中升旗台的旗杆上，正捆绑着一个脱光了衣服的青年。日本兵命令大家跪在升旗台的周围，一个鬼子军官站在旗台的土墩子上开始“训话”，金翻译作翻译：

“这个被绑的俘虏，是在命令他抬尸体去埋的时候企图逃跑，当场被皇军打了一枪倒下来的。现在，为了让大家看看，就在这里处刑……。”

大家抬头看了看捆在旗杆上的那个青年，他的腿上流着鲜血。

开始行刑了。一小队日本兵肩扛插有闪闪发光刺刀的步枪，正步走到旗杆前面。军官一声令下，就有两个鬼子兵从队伍里走出来，端着枪作立正状。接着，就一边大声叫着，一边以旗杆上青年为目标进行冲锋、劈刺，两把刺刀同时插进青年的体内。随着惨痛的叫声过后，这个青年的头就突然倒垂下来。鲜血从两道伤口里像喷泉一样，丝丝地喷射出来，把黄色的土地染成了鲜红。

这两个鬼子兵完成了任务，回到队里。军官又下命令，另外两个鬼子兵又从队伍里跑出来，像刚才的动作一样，对着青年的肉体刺杀。等这一队士兵都轮流刺杀了一遍，死刑的执行才算告终。

逃跑的事，在集中营里，时有发生，但极少有人能逃出去的。在济南集中营里，就发生过难友集体逃跑的事。

一天，有个老太婆到院子里来卖甜粥，听人说，她是在这里干活的伪军家属，所以才能进得院子来。老太婆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买碗甜粥吧！吃点吧，你们就要去日本国了，留着钱也没处花啦！……”老太婆的吆喝声，立刻触动了被捕者的神经。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说，如果真要押到日本去，今生今世怕是回不来啦。有的人蹲在一旁发愣，也有人小声啜泣。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咱们与其等死，不如逃出去！明天早晨送饭来，打开铁门时，咱们就往外冲！”“对！往外冲！”许多人附和着说。还有人嘱咐大家：“冲出去了，就爬围墙，围墙那边一段电网豁着个口子。”“鬼子来开门，就抢他们的枪，还可以用院子里半截子砖头作武器。”

第二天早上，几个被捕者送饭来了。铁门一打开，几个领头的难友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死死卡住了来监视吃饭的两个鬼子的喉咙，其他人便一起往外冲。这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跑在前面的几个人还真的爬上了围墙上的电网豁口逃出去了。但守卫的鬼子很快就醒悟过来，拉响了电铃。敌人冲出来，对着人群就开枪。砖头顶不住真枪实弹，许多同胞被打死在院内，大部分人被鬼子的刺刀和枪口逼回到牢房内。鬼子拿来绳子，把一个个都捆绑起来，连在一起，饭也不给吃。不久，就把大家押向火车站，又押上了去青岛的火车……

三、大海上的漂泊

船在海上航行，没有淡水，难友们个个渴得喉咙里像烈火在燃烧

1944年7月28日，是“花冈惨案”幸存者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300名中国同胞，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作为日寇劫掳的、押住日本花冈中山寮从事苦役劳工中的第一批，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流着泪，像货物一样从青岛码头被装上船。

船头上写着“信浓丸”3个大字，船顶上插着日本的太阳旗，船上装满了从中国掠走的铁矿石。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货船缓缓地离开码头。这时，同胞们如梦方醒，意识到就要离开自己的祖国，被押送到日本国做苦工了。顿时，大家禁不住哭泣起来，有不少人纷纷跪倒在甲板上，眼巴巴望着慢慢远去的祖国，心如刀绞。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为爹娘亲人祝愿的祷告声，和着“哗哗”的海浪声，交织成一曲生死离别的悲歌。

船航行不远，突然“啪”的一声，有人跳水了。监押的日本鬼子慌忙地朝海里打枪，也不知打着了没有。鬼子吆喝着驱赶人们进船舱，不准大家看，还把舱顶板盖了起来。难友们只是默祷这个跳海的同胞能泅水，能躲过灾难，游回到祖国的海岸，不致葬身鱼腹。

船舱内充满了哭声和哀号。难友袁子河想着家中的老父、老母，还有哥嫂和兄弟，怕今生今世难于见面，特别是妻子刚怀孕三四个月，孩子生下来就没了爹，这日子咋过啊？止不住的泪水从眼眶一直淌到了下巴。张洪辰和张士贵是同村的，张士贵见张洪辰哭得伤心，便过去劝导说：“兄弟，别哭啦，咱们俩在一起互相照应，总有一无能回家的，我回去，你也回去！”张士贵虽这么说着，眼泪却刷刷地往下流，心中也想着家中老父孤身一人，没人养活。他俩相对流泪，几个老乡也蹲在一起哭。这时，下来几个鬼子，拿着棍子就没头没脑地把大家揍一顿。然而，棍棒也没制住人们的哭泣声，船舱里的难胞十有八九都泪流满面。

在船上，日本鬼子把大家按军人一样组编起来。被俘前系国民党第15军的上尉连长耿諲，被鬼子指定为大队长，他成了大家的总指挥。

同胞们呆的船舱，是整个货船的最低层。底下也装着铁矿石，上面铺着旧草席。底舱处于海平面以下，而整个船体都用大帆布蒙盖着，汹涌的海水从船顶上不时地冲过去。每到这时，船体就上下跳跃，左右晃动。船舱里又闷又热，令人窒息，许多人晕船了，不少人呕吐了，好像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似的。大家已难受得不知饥饿，最渴望的是新鲜空气和能喝到水。

水……生命之源。船在大海中航行着，却像在沙漠中彷徨一样。同胞们连一滴水也得不到，个个唇干舌燥，喉咙里干涸得像火一样燃烧。病倒了的人，更是苦苦哀叫着：“我要喝水！”，“快给我水喝吧！”……但日本鬼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对待。

夜里，有人偷偷地溜到甲板上，找到一只小水桶，把几个人的腰带连在一起，缚在水桶上，从海里弄上来一桶水，立刻送进船舱。听说有了水，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围着小水桶，用手捧着拼命往嘴里送。凡是喝到水的，都叫苦不迭，海水既苦又咸，根本不能饮用。

耿淳作为鬼子指定的大队长，担负着管理 300 人的“使命”，眼见同胞们和自己一样受着口渴的煎熬，沉思着。一会儿，他爬起身来，便去查看通往船舱的蒸汽管。突然，他发现有一根铁管上有个小洞，从洞里吱吱冒出来的水蒸汽凝结成一滴一滴的水珠。他马上找来一只小茶杯，耐心地去接水。半天，总算接到了半杯。随后，便叫大家学他的样子，轮流去接水喝。点点滴滴的淡水，滋润着同胞们干涸的嘴唇，就像沙漠中发现的甘露，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水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饥饿又同样折磨着每个人。在船上，一天只吃一顿饭，以小队为单位派人轮流到甲板上用蒸汽锅蒸饭。每个小队，每天只准蒸一次。派去蒸饭的人把棒子面往笼屉里一倒：锅里加上海水，点上火。蒸出来的，既不像窝窝头，也不像面糊糊。没有碗筷，大家只能用手捧着往嘴里塞。本来一小锅饭，只够一小队人吃个半饱，如果轮到哪个小队蒸饭时，正好遇上大风浪，大风把笼屉掀翻，又一个浪头打过来，把饭冲跑了，这一天，这个小队人就甭想吃饭了。

口渴、饥饿、窒息、想念亲人和对前途命运的忧思，加上日本鬼子棍棒的毒打和侮辱，一天、二天、三天，许多人抗不住，病倒了。有的发高烧，有的泻肚子，有的呕吐不止。船上没有药，更没有医生，3 个同胞死去了。每死一个人，日本鬼子就命令人把尸体抬到甲板上，扔进大海里。

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航行着。为了躲避美国飞机和潜水艇的攻击，走走停停，有一次，整整停了两天，说是要等日本军舰来护航。

难友们在舱内挣扎着，整整 7 天 7 夜，他们没有见过天，没有见过太阳，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更没有呼吸过一口舒畅的空气。8 月 5 日上午，“信浓丸”终于到达日本本州西南端的海岸城市下关。今日的下关，就是昔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不平等条约的地点——马关。

1945 年 4 月 18 日，第二批被押送日本花冈中山寮的中国劳工 600 人，在青岛码头登上“衡阳丸”，经过半个多月的漂泊，于 1945 年 5 月 2 日到达下关。船上死亡 11 人。

1945 年 5 月 11 日，第三批被押送中山寮的劳工 100 人，又在青岛码头被日寇驱赶上了“白京丸”，经过 20 天的漂泊，于 5 月 30 日也到达异国他乡。船上死亡 2 人。

自此，近千名中国劳工在敌人的“虎穴”中，在死神的监督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

四、“特别优待周”

踏进异国他乡的第一周，日本人宣布“特别优待”，然而……

中国劳工在日本下关上岸后，随即被日本警察押上火车。火车一直沿着日本海岸向东北方向驶去。

途中又有 2 个同胞死去。隆隆的车轮声，仿佛就是哀乐，为死去的难友送行。

在火车上的中国劳工，忍受着饥饿、棍棒和颠簸，谁也没有精神观望异国他乡的景色。然而车到一个大城市，鬼子却传下话来：“不准往窗外看！”鬼子的这个“不准”，反而引起了一些劳工的好奇，有人便偷偷地向外张望

几眼。鬼子见有人向外张望，就猛扑过来，对他们连连打脚踢，边打边吼叫着。

原来，这是个挨了轰炸的城市，到处是一片废墟，有些建得较坚固的房子，也露出断垣残壁。这样的情景使劳工们得知：日本本土也挨炸了。虽说他们中间许多人弄不清楚这是谁炸的，但是他们意识到鬼子的末日快来临了，凶狠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必将遭到应得的报应。

火车走走停停，中途又换过两次车，整整行驶了两天两夜，才到达了目的地。这儿是个乡村车站，被群山环抱着，站牌上写着“花冈”两个大字。

花冈是日本北部的铜矿开采区。1944年5月29日，花冈同和的7号矿床，由于花冈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渗入，出现塌方事故，压死日本矿工11人。同和矿业公司为了防上事故的再次发生，保证矿区安全，提出在花冈河上流，另挖一条新的河道。这项改建河道的工程由鹿岛组（今日本鹿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劳工就由这1000名中国人来充当。

在花冈车站下车后，一个个被捆绑着的中国劳工，拖着疲惫的步子，来到一个广场。广场的正前面是个像戏院的建筑物，日本人叫它“共乐馆”。不管是在途中，还是在花冈，他们都没有吃上一粒米或喝上一滴水，每人的身体都已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但在他们灰扑扑的脸上，因为过度饥饿而凹陷下去的眼睛，却仍透露出戒备的神色。

劳工们一排排地被绑在炙热的广场上，因为身体极度衰弱，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直立起来，只能互相靠在难友们的肩膀上支撑着身子。

不少村民围在他们身边，像看从天而降的什么怪物一样议论纷纷。一位日本中年妇女随便说了一句：“瞧！这副可怜相，大热天的还光着脚丫子……”妇女的话正巧被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察听到，便立即走上前去，一把抓住那妇女，用力一巴掌打上去，一边骂道：“你这个不忠于国家的混蛋！”中年妇女被打倒在地，鼻血直流，但围观的人谁也不敢向前扶她一把。空气中弥漫着腾腾杀气，看热闹的人一个个离开了现场，而把身子躲起来偷窥的人却愈来愈多。

劳工们在“共乐馆”广场稍停片刻，日本警察又命令继续前进。沿着山路走了好半天，队伍在一个山脚下的空地上停住了。翻译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排房子说：“你们就住在那里，是一所叫‘中山寮’的房子。”

这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山助中有一个空场和几排用木板围成的房子。除了一幢房子结构较好，是监工办公室和宿舍外，其它3排都是简陋的木板房，这就是劳工的住房。监工室外面的木板墙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有“中山寮”3个字。“中山寮”！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服苦役的住地，一所真正的人间地狱。

从办公室的屋里走出来几个日本人，迎接押送中国劳工的警察和便衣。不一会儿，翻译于杰臣对大家说：“那管理你们的代理寮长伊势和辅导员们要对你们训话。”于杰臣是中国山东人，在中山寅充当翻译。

伊势开始“训话”了，于杰臣作翻译。他首先说明中山寮的河野寮长因另有任务，所以，这里的一切事情由他代理。接着，他拉大了嗓门继续往下说：“你们既已到了这里，想已有一定的决心了！还是放聪明一些好，要是还像从前那样顽固，不听辅导员的指示和命令，对建设大东亚表示懈怠，定要受到严惩，那时可不要后悔……”

“训话”时，伊势的脸上无丝毫表情，其他辅导员也都绷着脸。瞪着眼，

活像庙里泥塑的菩萨。

“训话”完了以后，大家在于杰臣的引导下，分别走进3间鸟笼似的房子。外面已经黑了，房内一点青白色的微弱灯光照着这阴森屋子。

吃晚饭了。一个人一个馒头和一些煮得很老的蔬菜，饥饿已极的劳工们两三口就吃完了。这，就是他们已经饿了两天以后得到的晚餐。

于杰臣告诉大家，这里一切实行“军事化”。

第二天清晨，室外的高音喇叭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劳工，大家急急忙忙地起身，天还是黑乎乎的，人人都是没睡够的样子。他们既不用换衣服，也没有漱口、洗脸的地方，仅揉揉眼睛、摸摸脸，起身的一套就算都做完了。

吃过早饭，劳工们立即在空场上集合。伊势命令大家先向南方行礼，说是向东京的天皇“遥拜”，并规定每天早晚各一次。接着，开始“训话”。他说，“头一个星期让你们休息，不正式工作，这是对你们的‘特别优待’。但是你们也不能游手好闲地尽是玩，要开山，把它开成梯田，以便种庄稼，这是为了‘大东亚’生产应尽的一点义务……”伊势训完话以后，进行编队。耿谆仍被指定为大队长，罗世英任副大队长，3个中队的中队长依次是李克金、张金亭、王成林。每个中队分4个小队，并指定了各小队长。最后又指定彼捕前系国民党少尉军需的任凤岐担任庶务。

出工前，每人发给一把铁锹。劳工们手拿铁锹，在日本监工的监押下，整队向远处山边走去。到达目的地，分散开来，挖山、整地。山上有许多黑色小飞虫，当地人叫它“野马蜂”，从早到晚，成群在劳工们头上飞舞，一股劲儿地叮刺他们的身体，拼命吮吸着他们身体中残存的鲜血和营养。

进入中山寮以后的“特别优待”周过去了，一块块梯田修成了。然而，劳工们每天得到的食物却是：早晨、中午一人一个馒头，晚上一碗面糊糊。饥饿、劳累、小黑虫的侵袭，加上水土不服，使许多劳工病倒了。

夜里，大家倒在铺位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伊势说让我们休息一星期，这倒底是什么意思？开山挖地、从日出到天黑，这叫休息？”“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特别优待’？”“休息是这个样子，正式工作会怎么样呢？”……

五、死神监督下的苦役

饥饿、劳累、毒打……非人的折磨，劳工们一个个被死神带走了

正式做工的第一天早晨，集合、整队、点名、遥拜。劳工们个个心里有些不安，不知日本人会要他们干些什么。

伊势照例开始“训话”：“……从今天起开始工作，你们的任务是挖沟。因为这儿的河水一直流到矿山的矿床上，对采矿很有妨碍，必须另挖一条沟，改变河流的方向，防止矿床的坍塌。矿山是大东亚建设的动力，工作绝对不许怠慢。你们必须和军队一样遵守纪律，听从辅导员的指示。大队长、中队长和各小队长要严加管束，否则，唯你们是问！”

“训话”后，劳工们就出发了。他们爬山越岭十几里，到达一个山谷的顶部。这里，在两个山坡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福田命令大家，就在这一段河道上动工，把这条小河截弯取直，加宽挖深，修筑涵洞。新挖的河道要宽2丈，深3丈。

根据辅导员的指示，每个小队就在自己分工的河段上开始挖掘。施工时，小河的水继续流着，他们有的就泡在这泥水中干活。有的在山坡上开山挖石，有的搬运修筑涵洞所需要的物资。拌混凝土用的小石子，要从山上往下抬，水泥要从山下往上背。在监工们的棍棒和吼叫声中，50公斤重的水泥，每人每次最少背一袋，有的人硬让背两袋。他们空着肚子，背着重物，几乎是头贴着地面爬行。他们只有一件衣服，被迫赤背工作，经毒虫叮咬，浑身红肿，溃烂成疮，流着脓、淌着血，汗水、泥水、灰沙粘合在入身上，浑身上下弄得不像个人样。辅导员们拿着棍棒，来回穿梭似地巡逻着，只要看见准稍微伸伸腰或歇口气，就立刻对他拳打棒击。

午饭是由做饭的劳工背着送到工地，他们听号开饭，领到的食物仍然是一个二三两重的馒头和一条腌菜梗子，每天就是用这点可怜的食物支撑身体从事12个小时的艰苦劳动。

中午吃了饭以后，允许歇息一小时。在这一个小时内，许多人都往山上跑，也有人跳进小河沟。因为，虽然吃过“饭”，谁的肚子里都是空空的，想到山上寻找一些能吃的野菜，或是希望在水中摸点小鱼小虾，充塞肚皮。

刘智渠的腿在刨山时受了伤，鲜血从小腿流到了脚跟。赵有义的手膀子被小虫子蜇过后，溃烂并已化脓，不断地流黄水。他们工作时疼痛不堪，然而又怕鬼子监工的棍棒，不敢停手，只得忍耐着干。在刘智渠旁边干活的张肇国，刚伸了伸腰，正巧被日本监工福田看见。他跑过来，对准张的左手狠命地打了一棍，将其手腕骨打断，见张被打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又抬腿猛踢。

那边，日本监工清水拿着棍子对着一个姓孙的劳工头上猛打。孙“啊呀”惨叫几声，就倒下了，手脚慢慢伸开，不动了。清水仍不罢休，对着躺在地上的孙继续用脚踢，用棍子打，孙还是动也不动，原来已经死了。清水若无其事地命令2个劳工把尸体抬走了。

工程继续进行着。劳工们日复一日弯着腰、流着汗，在呻吟中度过；在鬼子监工拳打脚踢和棍棒飞舞下，咬着牙、忍着饥渴的情况下度过。他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日子。监工为了不让他们歇工，给每个人发了一件蓑衣，即使是刮风下雨，都得披着它照样出工。

他们既没有洗澡的地方，又没有洗换的衣服。头发胡子长了，没有剃刀、剪刀，无论哪个人都是头发乱蓬蓬，满身污垢，衣服褴褛。因为饥饿，个个眼睛、面颊都凹进去了，瘦得简直像根柴草棍。由于营养奇缺，许多瘦骨嶙峋的劳工得了浮肿病，无力干活，只得住进病号房。进了病号房，本来少得可怜的伙食还要减去一半。夜晚，他们躺在铺位上，就怀疑自己明天早上能不能起来。每天出工中午休息时，上山偷偷找野草吃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有人中毒死了，也没能阻挡住饥饿的人群。

一天，大队长耿谆代表劳工向伊势和管理食粮的小烟要求增加粮食，小烟不仅不答应，还拿棍子把他赶了出来。第二天，伊势“训话”说：“现在，日本正指导东亚各国从事‘大东亚战争’，你们当然要节约支持军队，而且要好好做工。”伊势还宣布：“为了支持‘大东亚圣战’，从今天开始实行‘建设突击周’计划。”

这个所谓的“建设突击周”，就是比以前的工作强度还要大，不完成监工所指走的一天的工作量，既不许回寮休息，也不让吃饭，还要受惩罚，遭毒打。劳工们被迫早晨顶着星星上工、晚上，又顶着星星收工，一天要干十

五六小时的活儿。一次，袁子河从山上往下运石子，石子装在斗车里，一天的定量是推 40 车，在饿着肚子无力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的活儿是太艰难了。袁子河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天只推了 36 车，少了 4 车。收工时，被福田这家伙揪住狠狠打了 4 棍子，打得他直不起腰来，第二天，他还必须坚持干，否则要把昨天的“欠帐”一起还，要受到加倍的惩罚。在劳工中，像这样的惩罚，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突击“建设”的过程中，大家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了，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病倒的人数日益增加，因为身体不好而被认为干活不好挨打负伤的人也越来越多。伊势腾出劳工宿舍旁边一所木头陋屋充当病号房，其中一间存放骨灰盒，并指定劳工刘当路和刘玉麟两人看护，负责填写死亡报告书和焚烧尸体。

由于到病号房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引起了鹿岛组的注意，便派来一个医生进行检查。这医生不是来治病的，主要是检查大家的病究竟是真是假的。因此，只要看到哪个病人说话还有点劲，或者还能够走动走动，统统认为是装病的，先揍一顿，然后强迫去做工，即使这样，病人仍然有增无减。由于病号的食粮只有干活的一半，有些劳工为了多吃一点饭，硬是拖着病躯去做工，结果倒在工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四五人死去，被抬到后山去火化。每个死去的劳工都是赤裸裸地被火化的，因为，他们仅有的一身单衣也必须剥下上缴。

刘智渠因腿伤，做工时非常痛苦，耿队长看了很不忍心，经再三请求早势，同意也把他调进病号房当看护。

有一天，刘智渠试着写了一次死亡报告书，来到办公室送给伊势看。伊势刚看了其中几份就突然发火了，狠狠打了他几耳光。原来，他把报告书中所列的死亡原因照实写了“缺乏营养”、“脑部打伤”等，伊势要他一律改写成“痢疾”、“急性肺炎”、“日本脑炎”、“肠胃病”等。

刘智渠明白了：日本人打死人、害死人，还要隐瞒事实真相！

六、难熬的冬天

两米深的积雪覆盖着山和大地，劳工们仍穿着单衣干活，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煎熬

冬天来临了，劳工们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两米深的积雪，掩盖了山和大地，寒冷的山风刮个不停。他们身上穿的仍是在国内发的那件单衣，破烂得早已不能蔽体，更不用说御寒了。脚上穿的始终是草鞋，和赤脚没有两样。

每天清晨，日本监工用鞭棒把大家赶往工地。他们踏着深雪，爬过几十丈、几百丈高的冰山，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到了工地，他们还是赤足下水，挖掘河道，脚都冻得红肿了，青紫了，又溃裂了，一直到趾甲脱落。夜晚，他们拖着湿透了的衣服和冻得发麻的身体回寮睡觉，整夜都在不断地颤抖着。

他们的住房，是用宽窄不一、厚薄不等的板条子钉成的。风雪之夜，雪花随着呼啸的山风，透过板缝不停地往工棚里灌，每人一条粗线毯和一条薄

棉被子，怎能抵御寒冷？他们只好几个人挤在一起，相互用体温取暖。就在这冰窟一样的宿舍里，他们熬过了一个个漫长可怕的冬雪之夜。

为了不被冻死，劳工们想了个办法，干活时把那条长方形的粗线毯，沿其中两角的对角线对折，两角裹在两条腿上，另两角围在腰里。但是没有几天，被鬼子监工都扯下来了。

后来，他们又把装过水泥的纸袋子，撕成衣服形状，用纸袋子上的线绳，把纸一块块连起来，做成内衣，有的人干脆把几块纸搓一搓，分别捆在腿上和腰里。这个办法总算坚持了一些日子，但好景不长，鬼子监工又不允许了，就在工地上逼着大家脱光衣服撕了下来。看着劳工们一个个冻得不停地发抖的样子，监工们歪着脖子拄着棍子，狞笑着说：“穿暖和了的不干活，干活的不冷！”

晚上收工时，人们还得爬到雪山上，每人劈一捆松树枝背回来，以备晚饭后烤衣服和“冰鞋”。烘烤时，一烤就是半宿。最难烤的是冰疙瘩的草鞋，怎么烤也烤不干，第二天早晨又成了硬梆梆的冰鞋，穿不到脚上。烤火用的树枝，因为潮湿冒着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还要遭日本监工的毒打。

冬天里，到处是冰天雪地。树叶枯落了，野菜野草没有了，小河小沟封冻了。劳工们除每天那么一点的食粮，再没有别的东西充饥了冻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日本人拿来了一些破旧的军用毯子，夜里二三个人合盖一条。但是，不久发生了大问题，就是在他们全身都发现了虱子。这些虱子，不知道是那些旧的军用毯子上的，还是从他们这些污垢已凝结成块的身上生出来的，它繁殖很快。从此，他们又多了一重灾难，瘦弱的身躯，又受虱子的攻击。

有人想了个法子，在山坡的倾斜处挖一个灶，把被物、毯子放在灶上，上面盖着土，下面点火熏蒸，不一会儿取出来一看，附在上面的虱子全死光了。采取这种“蒸衣杀虫法”对付虱子，人们的身子才算好受了一点。

但是，到病室里来的人，依然是有增无减。一旦病倒了，几乎是很难再起得来。赵满山的父亲赵有义终于也被送到病室来了，他除了严重的营养不足外，还拉痢疾，手和脚也冻得很厉害。因为耿队长向伊势请求的结果，赵满山也被准许以看护的身份到病房来，顺便照顾他的爹。

日子一天一天艰难地过着，1945年的元旦到了，大家得到了一天休息。从2日起，又开始了以前的生活：做工、挨打、受冻、饥饿、病死……，一切都和从前一样，然而，吃的馒头却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回，不是量的减少，而是质的变比。从前的馒头虽然小，却是而粉的，这次馒头中间掺进了苹果粉。依照监工们的说法，青森地方出产的苹果是日本有名的、品质很好的特产。但是劳工们实在品尝不了这种名产，因为苹果粉终究不如面粉耐饥呀！

不久，馒头的质又起了变化。苹果粉又变成了豆饼、树皮和苹果楂，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再后来，馒头又变成橡子面窝头，吃完后就胀肚、拉稀。

这样，死亡率更高了，特别是年岁大的劳工，几乎死光了。赵有义也不行了，呼吸越来越弱，时常昏迷不醒，甚至懒得吃东西了。几天后，他含恨离开了人间。

渐渐地，在青年人中间，死的和病的也日益增加到了4月里，第一批送中山寮的中国劳工，剩下不到100人了。人员不断减少，工作却一天天加重，

大家知道这样下去，恐怕都要死光为止。

5月上旬，日本警察押来第二批劳工 587 人，6月初，又送来 98 人。他们中年幼者仅十四五岁，年老者已六十有余。除了编入原来的三个中队外，又新组成了第四中队。他们和第一批劳工住同样的鸟笼似的房子，干同样的苦活，受同样的虐待，吃同样的东西。由于他们不像原来劳工那样已经有过中山寮非人磨难的经历，因此。刚一来到，死亡、得病率更高。

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转入局部反攻，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连遭败绩。因此，鬼子监工对中国劳工的迫害更加疯狂，一连串充满了血和泪的惨事，在 1945 年 6 月相继发生了。

刘泽玉，山东人，因饥饿而逃跑，被捉回后，日本监工清水用火烧铁烙其双腿，使其一卧不起。年老的王连邦，山东人，被迫带病干活，因不堪忍受而上山自缢未遂，被日本监工福田打得当场毙命。肖志田，河北人，因饥饿夜间出外寻找食物，当夜被捉回寮来，鬼子监工用木杠砸烂两腿，5 天后伤重而死。体弱的刘发贵，山东人，因不堪答打而逃跑未成，被小烟、长崎、福田等一群鬼子监工当众用麻绳沾水轮番抽打，三死三醒，两天后即死去。薛同道，山西人，困饥饿至一民家讨饭，被寮方察知，小烟、福田、长崎等监工，用牛皮鞭轮流痛打，使他粪尿溢流而死……

鬼子监工还命大队长耿諄、中队长张金亭、李克金等人，打自己的同胞，他们严加拒绝，因而遭到毒打。

死亡的阴影压上了每个人的心头，死亡的葬坑已明显地摆到了还活着的 700 多同胞面前，每天，每个人都有死的可能。但是，中国劳工并不惧怕死，他们只是不愿像这样在敌人的棍棒下悄悄死，更不甘心遭敌人之凌辱。“仇恨”像一把火，早已烧红了他们的心，烧红了他们的眼，烧滚了他们的血。

一场悲壮的、令日本当局震惊的中山寮中国劳工抗暴斗争发生了。

七、暴动的悲歌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了！”……暴动遭到了镇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5 年 6 月，中山寮全体劳工就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正像暴风雨来临前天空布满着乌云一般。

早在 3 个多月前，大队长耿諄同书记长刘虞卿等骨干，多次密谋筹划暴动。为了安全和保密，他们都是通过单线联系进行动员和周密策划的。一天黑夜，暴动骨干分子跪在死难兄弟的骨灰盒前山盟海誓，立下了“生死与共、决不反悔、跟着耿諄大队长进行暴动”的誓言。

暴动原定 6 月 27 日举行，但为了避免误伤两名较有人性的日本监工，便改变了暴动日期。劳工们要杀的是凶恶残忍的日本监工利丧尽天良的汉奸，而对善良、友好的日本监工，至今花冈幸存者也抱有感激之情。有个 40 多岁的监工石川忠助，人们称他为“老头太君”，他从来不打骂劳工。他家住秋田县城里，回家休息时，经常从家里拿些苹果悄悄分给劳工们吃，有时还背点大米，熬成粥分给大家充饥。在那个年月，日本国民的生活也是很贫苦的，能够这样对待劳工，实在是难能可贵。

另一个叫越后谷义勇，年纪最小，只有 19 岁，懂得一点中文，说话和气，对劳工和病人常表同情，大家都叫他“小孩太君”。原定暴动日期为 6 月 27

日，后来得悉，这天他俩都值班，只有6月30日他俩才休息。于是经大家秘商，大队长耿谆决定把暴动日期改在6月30日。受尽摧残和折磨的中国劳工，为了避免误伤石川和越后谷，甘冒极大风险，推迟暴动日期，其胸襟是何等宽阔、博大。至今尚健在的越后谷，视花冈难友为挚友。1987年，耿谆赴日参加花冈殉难烈士慰灵祭时，越后谷至机场迎接，见面后感激涕零，深深鞠躬致敬、致谢。

1945年6月30日晚上，性命攸关的时刻来到了。朦胧的月光照在花冈这片荒凉的山坡上，中山寮内外，一片寂静，只有厨房里那个老马蹄表不慌不忙“哒哒”地响着。行动的时间在人们心目中的一分一秒地接近，肩负千斤重担的耿谆沿着宿舍作战前检查。

晚上11点钟，日本监工已睡熟了。大队长耿谆一声令下，李光荣、刘锡才等20多名劳工，敏捷地跑出宿舍，手持铁锹和铁镐直奔鬼子监工宿舍。接着，劳工们纷纷行动，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

刘锡才，这个勇敢剽悍的山东大汉，闯入敌室，一锹把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砸碎了，他的任务是守住电话机。由于这一误击，惊动了日本监工，他们惊叫而起，正想外逃，李光荣等人迅速冲进来，与刘锡才一起当场砸死了猪股、小烟、桧森3个监工。此时，负责把守窗户的劳工还未到位，其他监工便跳窗而逃，长崎逃跑千成，被处决在窗外。刘玉林、刘虞卿等人处决了丧尽天良、向日本监工告密的汉奸任凤岐。

由于初战执行计划不周，让作恶多端、凶暴残忍的监工福田、清水等人逃遁，这一出乎意料的波折，使劳工们下一步的计划遭到相当阻碍。

形势的突变，迫使原计划不得不改变。耿谆与几个暴动组织者紧急商议，决定取消到花冈町警察署夺取枪支的计划，带队迅速离开中山寮，把病人都带走，人手一把铁锹当武器。这时急促的脚步声和“带好武器，赶快跟着上山”的呼喊声，划破了山坳的夜空。

劳工们揩着额头上的汗与脸上的血迹，迅速集中到空场上。耿谆简要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杀了虐待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可是，现在形势紧迫，我们就要到山上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有饭吃，有衣有鞋穿。弟兄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郎，我们是大国的国民，要保持我们的道德，严守纪律。”说完，就领着队伍出发了。

山路崎岖难走，杂草灌木丛生。天黑路不熟，劳工们又饿又弱，有不少人掉了队。天亮时，狂吼乱叫的日本乡军和警察布满山野，将他们四面包围起来。

不久，日本正规部队赶到。随着一排排子弹，许多难友中弹倒下了，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活着的人又一次被敌人俘获。为了镇压这一暴动，日本当局动用了警察、宪兵、地方乡军和正规军近2万人。

起义后的第二天上午，劳工们一个个陆续被抓回来，送到广场。日本警察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双手在背后绑在一起，然后从卡车上一脚踹下来。鬼子用枪托殴打他们，使他们个个都血流全身。四周除了乌压压的围观人群，就是带着武士刀的警察、宪兵和军士在监视他们。

被抓回来的劳工全被逼迫跪在用小石子铺成的广场上。时值盛夏，烈日当头，他们长时间在炙热的阳光下跪着，身子不准移动一下。若是身体渐渐麻痹而坐或倒下的话，监视的警察立刻会走上来不停地殴打。

整整3天3夜，他们就这样被绑着跪在广场上，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

米，他们不只是饥饿，还像火在心口燃烧一样干渴。几十人倒下了，他们的尸体开始腐烂，广场上臭气冲天。直到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活着的人用口去接雨水，才免于一死。第四天中午，熬过来的人才分到半碗面疙瘩。

与此同时，广场正面戏院里的拷问和迫害也在残忍地进行。耿谆、刘虞卿、刘智渠、张开花（王敏）、刘锡才、刘玉麟、李克金等暴动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先被皮鞭抽打一顿，然后被绑在长板凳上，水灌进嘴已和鼻子，直到奄奄一息为止。接着，再竖起长板凳，使灌进去的水又呕吐出来，等到稍稍恢复一点力气后，再重复一次。有的还被铁丝绑住两手的大拇指，吊在半空中，然后遭到棍棒拼命的殴打……

鬼子对耿谆的审问开始了。

问：“为什么暴动？”

答：“每天做 16 小时的重劳动，吃的不够半饱，雪天雨天从不停工，看守对我华工横加罪名，滥施毒刑，因受摧残致死者将近 300 人。我身为队长，挽救有责，暴动之事，是我的命令。”

问：“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谁？”

答：“没有指定人，我是向大家下的暴动命令。”

问：“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你知道吗？”

答：“仅在花冈一处，我同胞遭你们残害致死的就有近 300 人。这该由谁来抵命呢？”

耿谆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使审问者哑口无言。

为了顾及全体同胞的生命，更不忍目睹同胞之惨状，耿谆、刘虞卿、张金亭、刘玉麟等 12 名劳工队干部，都勇敢挺身而出，一切责任，一切罪状，都一身承担。7 月 4 日，他们的手都带上了铁铐。被关进了牢狱。在狱中，他们再一次用皮肉，用骨头，抗击敌人的酷刑。敌人企图逮捕更多的“凶手”，残害更多的同胞，然而他们始终未吐一字秘密，都争抢着自己担承杀人罪名，坚决否认除自己以外同胞的罪名。

几天以后，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察遵照上司命令对劳工们宣布：耿谆、刘虞卿、张金亭、刘锡才、李光荣、刘玉麟、张赞武、孙道敦、宫耀光、赵树森、褚万斌、李秀深等 12 人确定为杀人犯，将送到秋田县去受裁判，别的人暂不问罪。

他们 12 人背着死刑的刑架和无期徒刑的枷锁，在铁窗里艰难地生活了数月，幸亏日本投降，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7 月 4 日，活着的同胞们相互搀扶着第二次进了中山寮。他们虽然侥幸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然而已是奄奄待毙。

7 月 16 日，他们在警察和宪兵的威迫下又开始了苦役。

8 月中旬，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苦难日子总算熬到了头。虽然日本监工一再封锁，但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终于在劳工中传开了。他们扬起头，扔下工具，再也不出工了。而那些压迫他们的日本监工个个哭丧着脸，耷拉下脑袋，不再管理他们了。不久，盟军派人接管了中山寮，劳工的生活得到了改善。1945 年 11 月下旬，活着的 500 多名在中山寮从事苦役的劳工，带着死去难友的骨灰盒，回到了祖国。可是，418 名花冈殉难者，和在日本 135 处从事苦役的成千上万名殉难者，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天，没有看到残害他们的凶手被送上绞刑架的这一天，他们的冤魂在异国他乡哭泣！他们的亲人在胜利了的祖国土地上哭泣！

第九章罪有应得的元凶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罪魁祸首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受审之前

东条英机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用墨画了圆圈，在烟斗里塞进了氰酸钾

1945年9月2日上午，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已被布置成一个庄严、肃穆的会场。这不是一般的会场，日本政府向同盟国的投降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9时许，由独腿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军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由接受投降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同盟国即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签字仪式结束后，数千架盟军飞机越过“密苏里号”上空，历史性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胜利完毕。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同时也表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4国代表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意首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了法庭工作程序及其工作原则。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苏、美、英3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盟国驻日本最高统帅应执行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诸条款（包括惩办日本战犯）一一实现。随后，经过美、苏、英、中、法、澳、新西兰、荷9国之间数次外交谈判，达成协议，规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上述9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来，印度和菲律宾也参加了这项决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便由这11国的代表组成。这意味着日本法西斯战犯将被套上正义的枷锁，等待世界人民的审判。

根据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由盟军驻远东最高统帅实际负责这个协议。事实上，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避审判，从1945年9月起，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就开始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犯。1945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8人被宣布为甲级战争嫌疑犯。11月19日，前陆军省大臣荒木贞夫等11人，12月2日，黎本宫等52人，12月6日，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前皇宫内大臣木户幸一等9人，也都被指定为甲级战争嫌疑犯。这样，到1945年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共指定了110名前日本领导人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其中，除前首相近卫文麿、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文部省大臣侨田邦彦、前日军总长杉山元、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自杀外，其余人均被盟军逮捕拘押。

1946年1月19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军最高委员会决定，颁布了关于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并于当日颁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

澳大利亚代表韦勃爵士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审判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的法官是当时中国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汝璈博士。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规定，所有各被告均可以自由选择辩护律师。事实上，各被告都由美国陆军部配置美国籍义务律师一人。此外，各被告又自己聘请了与其自身关系密切的日本法律界人士为其辩护律师。所以，日本甲级战犯有庞大的辩护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将 70 名战犯分 2 批或 3 批向法庭起诉，由法庭分案受理。第一批起诉的 28 名战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魁祸首，其中有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最高指挥官。他们对于日本侵略国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实行，都负有重大责任。

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到第二年 5 月 3 日东京审判开庭的 8 个多月中，当初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帝国陷入了困惑、苦恼、虚脱和混乱的境地。一些自知罪责难逃的战争罪犯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装病，有的慌乱挣扎，也有的想静观事变，企图寻找一条逃避惩罚的途径。

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举行投降书签字仪式后的第十天，即 9 月 12 日，报纸报道了偷袭珍珠港时的内阁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的消息。这是给当时的日本国民生动具体地留下“战争罪犯”形象的第一个事件。

东条为了能使自杀成功，也费了不少心机。他手枪不离身，还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用墨画了圆圈，而且在每次洗澡后都重新画上。此外还把军刀放在身边，甚至在常用的烟斗里塞上了氰酸钾，以备万一。9 月 11 日，东条听到了吉普车的声响，他感到大事不妙，匆忙进了洗澡间，浇水洗了洗身子，然后穿上崭新的军服，把自己锁进书房，用手枪朝着事先涂好的印记开了一枪。几乎在枪响的同时，美国宪兵踢破了客厅的板壁闯进书房，看见东条中弹倒在地上，一脸痛苦的表情。就立即把他扛上汽车送往医院急救。事也真巧，由于子弹射偏，未及心脏，东条在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后来他在对他的辩护人谈到此事时说道：“没有打中心脏，也许年纪大了，标记地方的皮肤有点下垂，也许自己对自己开枪，手有点不听使唤。心里曾想：打太阳穴也许好一点。可一张惨死的脸相被弄到外国夫，又觉得难堪。……事到如今，准备回到第一种设想，把一切都毫无保留他讲清楚。”

东条自杀未遂的第二天，12 日下午，原海相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由盟军 20 人的部队从住所被带到横滨，这是第二号战犯。同一天上午 5 时左右，66 岁的杉山元在自己的军司令部里自裁。

从 9 月中旬起，接到盟军逮捕令的日本战犯就开始陆续到美第八宪兵司令部报到。10 月 5 日，岛田繁太郎大将以下 21 名战犯嫌疑者从横滨监狱送到东京大森俘虏收容所。该收容所曾是日军虐待盟军俘虏的地方。东条英机在伤愈之后，于 10 月 7 日深夜，从横滨的美军医院被秘密地收监到大森俘虏收容所。生活待遇和其他战犯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住了一间木板房。

盟军最高司令部 11 月 19 日又发出命令，将下列 11 人作为战犯逮捕，关进巢鸭监狱。这些人是：

荒木贞夫、本庄繁、鹿子木原信、小矶国昭、久原房之助、葛生能久、松冈洋右、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南次郎、白鸟敏夫。

上列名单中，本庄繁于 20 日上午 10 点半，在青山旧日本大学的一个房间里自杀。

接着，12 月 2 日，盟军总司令部又发布了逮捕各界知名人士 39 人的命令，其中包括皇族梨本亲王等人。

惩罚日本国际战犯，这是《波茨坦宣言》明文规定的了的，所以盟军在东京设立司令部后不久，就开始逮捕战争嫌疑犯。在进驻日本后两三个月里，共逮捕了 100 人以上的战争嫌疑犯。

二、面对法庭

28 名被告都声称自己无罪，但法庭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1946 年 5 月 3 日上午 8 点 42 分，在一前一后两辆雪白的吉普车护卫下，一辆美国大型军用客车“嘎吱”一声停在了东京市谷高地的一座建筑物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在这里——前日本陆军省大厦会堂内正式开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大厅，曾经是日本各军阀首脑阴谋策划、发号施令侵略中国、进攻东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地方”，如今则成了审判、清算这批战犯自身的法庭。

在大厅靠近厅壁的高台上，是长长的法官席，后墙上悬挂着参加法庭组织的 11 国国旗，各国法官就在自己国家的国旗前依次入座。正中是澳大利亚法官、审判长韦勃，他的右侧是美国法官，左侧是中国法官。靠着法官台对面的厅壁设有半圆形的被告人席和辩护人席。审判厅的右侧有池座和楼厢，池座是新闻记者席，楼厢是作为旁听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日本听众席，另一部分为美国听众席。旁听者持有特许通行证就可以听审，但必须经盟国军警搜身检查。

从清早起，法庭的旁听席已座无虚席。中、美、苏、英 4 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朱世明、美国第八军司令艾契堡等人，也作为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列席旁听。

战犯们先被带到审判大厅被告传唤室，十一时左右被传呼入法庭。此时，无论是法官、检察官、翻译人员，还是旁听者，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人们都想看看，这些不久前曾在太平洋地区兴风作浪的“英雄”，妄图玩弄数十亿人民之命运于掌股之上的“大人物”、欠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几千万人民血债的刽子手，如今成了什么模样。

28 个被告分为两排坐在被告席上，前排之首是土肥原贤二，后排之末是坂垣征四郎。他们有的披着和服，有的穿西装，也有的一本正经穿着军装。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其中虽也有几个人装模作样地把身子挺得笔直，竭力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但却掩饰不住惶恐不安的眼神。

据当时各国记者的报道，此时的东条英机与其他 27 名首要战犯，审判前所抱的轻松心情已完全消失。以前，东条英机在狱中闲读日本各家经典，现在仅翻阅报纸了。并很注意审判消息，认真摘要，然后沉思默想。审判之前，在这批战犯之间盛行着的“棋战”，现在也都兴趣全无了，所有战犯都开始注意报上刊载的审判消息，内心都惶惶不安，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何种命运和下场。

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书是 4 月 29 日公布的，被起诉的有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等 28 人。

原告为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度、菲共 11 国。

起诉书把犯罪分为 3 类：第一类，破坏和平的犯罪。第二类，杀人罪。第三类，战争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共提出 55 项诉因。28 名被告不仅作为

犯罪军阀及共犯而有罪，对战争中的手人和违反陆战法规也有个人的罪责。

东京审判的认罪传讯是在开庭的第三天，即6日上午进行的。首先点名呼叫被告，接着询问是否承认起诉书里列举的罪行。被告要是承认有罪，就不需要辩论，直接进行量刑宣判。要是提出无罪的话，接着就开始辩论。这些狡猾的战争狂人通常都会宣称无罪。这是法庭早有所料的。

传讯时按字母顺序一个个地点名。首先是荒木贞夫起立，韦勃审判长问：你主张有罪还是无罪？荒木一下子胡子扬起来，脸上绷紧了，稍稍挺挺身子，一字一顿地说：“这件事，由辩护人来回答。”但韦勃审判长宣布被告必须自己说，荒木才有点不服地说：“无罪！”

接着，土服原：“主张无罪！”

畑俊六微微血色上涌，小心翼翼地回答：“对于全部诉因主张无罪。”

板垣、贺屋、木材、松冈……都宣称自己“无罪”。

最后，东条像是从胸膛里挤出话来似的：“对——全部诉因——”在这儿顿了一下，这是东条的习惯。接着，慢条斯理地说：“我——，主张无罪。”

虽然这些刽子手们都厚颜无耻地称自己无罪，但历史和事实是无情的，他们往日的丑恶行径，也不是战犯们几个字就能篡改得了的，法庭已收集了充分的证据来揭露和审判其罪行。

东京法庭自1946年6月3日开始，进入出示证据（包括人证、物证）阶段。首先由检察方面提供证据。

由于东京审判牵涉的历史性事变和事实非常繁杂，仅引证与控告被告犯罪有直接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就有数十种之多，而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十三条（1）项的规定，出示证据方不必对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条约和协定都加以证明。因此，检察方面的第一步工作是把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列出来提交法庭通过。第二步工作是把起诉材料分为若干部分，而将每一部分的工作委托给一位陪席检察官去做。起诉材料共分为13个部分：

……

第二、1931年至1945年对中国东北（满洲）的军事侵略。

第三、1939年至1945年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第四、在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地方做麻醉品买卖。

第五、1932年至1945年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第十二、在陆上和海上对战俘所犯的罪行。

第十三、对占领区平民所犯的罪行。

对于上述13个部分，检察官一般是按照下述原则进行分工的，即起诉部分的证据，各由所调查情节关系较密切的国家的检察官负责提出。

从1946年6月4日至1947年1月24日，法庭接受检察方面提出、作为证据的文件共计2485件，证人书面证言561件，并有109名证人到庭作证。此外，法庭的速记记录共达16259页。可以说，在战争中所有遭受日本侵略、或者与日本有某种关联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出庭指控和作证。

当时，令东京中国法官们日夜焦虑的，就是怎样使双手沾满中国人血腥的主要战犯能够受到法律的严裁。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还有秘书、翻译举行了数不清的会议。他们抱定一个决心：如果侵略我国的主要日本战犯得不到严惩，就无脸见江东父老，就一齐跳海自杀！

他们仔细研究英、美的法律程序，据理力争。又调阅了盟国的大量档案材料，从中搜寻证据。在茫茫大海中，他们找到了一根又一根可以刺死战犯的钢针！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最机密”的命令：“士兵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说出来是不对的。”还有一件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的、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关于侵占南京日军暴行的一个秘密电报。在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电报结尾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为它来自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各国的法官们对它给予很高的作证评价。

法庭需要详尽、具体和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是雪国耻、报深仇的时机！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求。他带了2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来了大屠杀时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所以，当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人。尤其使松井感到惊愕的是美国人、英国人也站到了证人席上，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牧师也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s·贝德士站在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

“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3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和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绍恒一起到南京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N·英罗向法庭提供了他精心收集到的8件宣誓证词。英国人彼特·罗伦斯和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在法庭上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

除了许多证人，中国检察官还向法庭提供了美国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13人的宣誓证言66件！

面对这些证据，松井石根只能是一脸的懊丧和无奈。他确实有些懊丧，他也知道“士兵之罪，责在将帅”。攻占南京时，他曾对他的部队发出过“整饬军纪与风纪”的训示，但他也发出过“发扬皇军武威”的命令。结果呢？正如他在1937年12月18日的“忠灵祭”上斥责部下时说的那样：“你们艰苦奋斗，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即使如此，在法庭上他还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

检军官问道：“被告松井石根，你见过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报告没有？”

“见到过。”他说。

问：“你采取过什么行动？”

答：“我出过一件整顿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门口。”

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这张布告会有什么功效吗？”

松井无话可说了。他想了想又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问：“多少宪兵？”

答：“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

问：“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

他低下了头，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 17 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也参加了暴行的时候，松井一副窘态，说不出话来了。

三、最后判决

有人主张流放荒岛，有人主张无罪释放。最后表决结果：6 票对 5 票

1948 年 4 月，历时近 2 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了起草判决书阶段。在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的争取下，法庭推定由中国法官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1948 年 11 月 3 日，东京法庭判决书的制作全部完成。

判决书的第五章，论述了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它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间开始，到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投降时告终。虽然 28 名被告参加这一过程的时间有早有晚，但侵略中国，无疑是以被告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的主要罪行。被告自己也承认，侵略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兽行中，判决书记载了日军在上海、苏州、南京、汉口、广州、长沙等处的暴行。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叙尤为详细，这是法庭接受了中国法官的建议。在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时，中国法官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有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杀掉，日军还将其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单设一章予以说明。”

庭长和法官们同意了。

因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突出的法西斯暴行事件，因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案的审理特别认真。据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回忆：“我们花了差不多 3 个星期的功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 10 多位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 100 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鞠讯了松井石根等人。”

在法庭上，中国籍证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伍长德，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违反起码的人道主义，惨杀南京百姓的滔天罪行：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南京城的第三天，即 1937 年 12 月 15 日，伍长德当时弃家搬进了“国际委员会”办的难民区。当日下午，一批日军闯进了难民区，把 2000 多个中国难民绑起来带到汉西门外，日军用 4 挺重型机关枪对他们进行疯狂扫射，难民纷纷中弹倒下。伍长德在和同胞们一起被赶到射击圈时，没等枪响就先倒在尸体上，躲过了枪击。刽子手在枪击之后，又挨个用刺刀捅。伍的后腰也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但日军还不肯罢手，又往被害者身上浇煤油，点火焚烧，然后离开。伍长德身上也着了火，疼痛难忍，便滚入了护城河，以求速死。时值冬日，河水较浅，伍没被淹死，反而把身上的火熄灭了。当时伤势虽重，但幸非要害，挣扎着爬到了岸上，趁着黑夜、

躲到了离杀人场不远的的一个草棚中，得到一位乞丐老妇的照顾，才得以辗转逃生。以后，伍的后腰上就留下一个5寸长的伤疤。

伍长德的证言，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得法庭官员和旁听者深为震惊。其实，伍所亲身经历的那次屠杀，只是日本侵略者实施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极小部分而已。

在南京城紫金山下，日寇将附近的2000多名难民驱赶到山脚下，全数活埋。

在燕子矶，日军到达以前，聚集了10万多难民。侵略者到后，即将难民赶至沙滩包围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射击。所有的尸体，或漂浮江面，水为之赤；或堆积沙滩，日晒雨淋，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处积尸还无人过问，恶臭气味远在数里之外都能闻到。

在南京城郊草鞋峡，日本侵略者一次就屠杀了5万多中国难民。当时的一位公务员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某日晚，我住在城郊的一个山洞中，听到草鞋峡一带枪炮声甚密。次日，天尚未明，来了两个浑身是血的人，一个姓冯，一个姓郭。述其经过日军进城后，将俘虏及男女老幼难民计5.7万多人包围起来，用铅丝或绳索捆绑，2人一扎，排成4条，驱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以至尸积如山，日军复用利刀乱戳，再浇上煤油，纵火焚烧。冯、郭两人倒卧地上，拖尸盖身，方得死里逃生。

类似上述屠杀惨例，在南京就有几十起之多。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南京2个多月共屠杀了中国俘虏和难民达30多万。

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也向法庭提供了证词。金陵大学教授贝蒂斯的陈述词是：“余为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之创立委员，其主要任务为在南京陷落后救护难民。入城日军的残虐行为，极为广泛。华军于武装解除后，均被押送至长江畔用机枪扫射。在72小时内，委员会埋葬死尸达3万具，妇女亦多被强奸。余曾5次目睹强奸事件，其中1人且为大学教授夫人。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万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起。我的朋友亲眼看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个日本兵轮奸。”

约翰·梅奇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也会被杀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被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

法庭里灯光熄灭，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到白色的银幕上，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阵枪响，一片尸体。刀光一闪，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颤栗，被刀刺死的婴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大屠杀的判词中指出：“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抵抗。日本兵云集市内并犯下了种种暴行。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击。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市的最初二三天的期间，至少有1.2万名非战斗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掉了。”“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宫的许可而实行的。”“从南京逃出的平民中，有5.7万人

被抓走和拘禁。在拘禁中，由于饥饿和拷问，以致许多人都死掉了。许多未死的人，又被机关枪和刺刀杀死了。好些中国兵在放下武器后 72 小时内，被拉到长江岸边集体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 3 万以上。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 6 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 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它团体所埋尸体达 15.5 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继续提出：日军在南京“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害的处罚。”“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判决书接着提出：“日本兵在街道上唤住没有携带武器的平民，搜查他们的身体，如果搜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枪杀。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抢劫，……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市区的商店是被一块一块地烧掉了。日本兵竟毫无理由地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 6 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判词，都是在法庭获得确凿可靠的证言证据后才进行判决的，从这简洁的判词，可以看出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以至全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法庭上出示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只是东京审判过程中提出的、关于被告罪行的无数证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此次东京审判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 4336 件，双方提供证人 1194 人，其中 419 人出庭作证。

判决书还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屠杀俘虏、被拘禁的平民、病人和负伤者及医务人员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1942 年 1 月）、泰国的琼蓬角（1911 年 11 月）、荷兰所属在印度的望涯群岛（1942 年 2 月）、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1942 年 3 月）等 100 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如在香港的屠杀中，日军冲入某医院内，用刺刀刺死床上的病人、伤员，强奸和杀害医院里的护士。

判决书确认，上述种种屠杀行为“大部分是由军官所命令的，有些时候是由高级将领所命令的。许多时候，军官实际上在执行时还监视、指挥甚至参与了实际的杀害。”

判决书指出，在日军铁蹄所及之处，他们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方法包括灌水、烙刑、电刑、踩杆子、悬吊、坐钉板和鞭笞。到了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的陆海军竟然堕落到了吃人肉的地步。某一日军俘虏说：“1944 年 12 月 10 日，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叫许多部队吃同盟军队的尸肉，但不准吃友军的尸肉。”有时候在军官宿舍中，把吃敌方的肉当作庆祝宴会似地来举行，甚至于陆军的将级军官和海军中的少将都参加了这种宴会。被杀俘虏的肉和用这种肉做的汤，竟拿来供给日本士兵当膳食。法庭审理表明，在有食物时也会吃人肉。换句话说，此时，吃人肉并非迫于“需要”，而是出于嗜好！

判决书在叙述了日军的上述种种暴行后指出，各国政府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统治集团对此置若罔闻。他们默认并隐瞒了日军所犯的种种暴行。因此，日本政府成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如此，法庭在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时，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11国的法官们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原来，东京的国际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争论颇为激烈。

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含庭长韦勃爵士），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投死刑票。有人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有人甚至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

法官们还没有最后投票，但通过争辩表态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梅汝璈和助手们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和他的同事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直到投票表决结果出来以后，他们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6票对5票！以一票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战犯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其他日本战犯也被分别处以徒刑。

这是一份正义的判决，是罪恶累累的日本首要战犯应得的惩罚。历史是无情的，正义最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必然趋势。

正如判决当日，中国法官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所指出的：“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历史，证实了当年中国法官在东京的断言。

最后还必须指出，东京法庭虽然使绝大部分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也有很大的遗憾之外。因为当正义与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美国却舍弃了前者。如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魁祸首、天良丧尽的石井四郎，就因为向美国提供了全套细菌战资料而得到了庇护，从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此举令多少受害者难瞑其目。

11月12日判决下达后，7名战犯的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早晨在巢鸭监狱执行，执行从凌晨零点1分开始，行刑只用了35分钟。

在最后一天，即12月22日，被判死刑的7名战犯都写了信，还相互致了最后的诀别辞，都提出希望同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单独会见一小时。在这些会见中，提出特别要求的只有东条。人，他要求最后吃一顿日本式的饭菜，这一要求被允许了。其他6人则仍然吃美军军用口粮，但7人都没什么食欲。

执行场上，除了官方监刑人，医生和监狱的重要军官，总司令部还邀请了下列对日理事会4国代表监刑：

美国代表兼对日理事会议长威廉姆·J·西波尔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巴特里克·肖、苏联代表库茨曼·迪比扬格中将。

在第一批处刑预定时间前20分钟，4名战犯分别在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一楼特设的佛坛前，在那里听完念经后被护送到绞刑台。佛坛前的仪式一结束，由监狱值日军官带路，美国陆军牧师和日本教诲师跟着，战犯按土肥原、松井、东条、武藤的顺序排着，各人两旁有2名美军看守押送，一行人静静地走向刑场，行列的最后跟着2名监狱的军官。

被处刑者来到绞刑台时、一个个地经过确认。绞刑台入口处早已有监刑人在受刑人到来之前就等着，在他们作了确认后，受刑者上了 13 级台阶，站在绞刑台上，面对着监刑人。死刑囚一上绞刑台，头上就被戴上了黑头巾并套好了绞索。台上的主执行官向执行指挥官敬礼并报告准备完毕，此后，执行官向着死刑囚方向发出了抽开 4 张踏台的信号，此时正好零点 1 分 30 秒，战犯到达 1 分钟后。

土肥原于零点 7 分 30 秒被宣布死亡，东条为零点 10 分 30 秒，武藤零点 11 分 30 秒，松井零点 13 分被宣布死亡。接着，第二批于凌晨零点 10 分被带到刑场同样处刑，踏台于零点 20 分抽掉，垠垣零点 32 分 30 秒、广田 34 分 30 秒、木村 35 分 30 秒，分别被宣布死亡。

受刑者没有借助别人，自己走到了死亡的地点。在绞刑台上听了几句佛教祈祷的嘟噜，但都没有留下最后的口信。死刑囚备有一个医生跟随，一断定死刑囚已死亡，便招呼上缴医官，由该医官经过检验，确认并宣布死亡。死囚穿的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美军救护工作服。

东条英机等 7 人被绞死后，尸首分装 2 辆美军卡车，由宪兵吉普车随行，运到横滨。这些死尸先被放在美军公墓，到上午 7 时 40 分再被送到横滨公共火葬场。火葬场外有武装美军警卫，许多日本记者与好奇者在外面徘徊，但都被美军警卫驱散。骨灰被美军吉普车从火葬场载走，尔后被撒入荒野。

这天上午，教会、寺院等，举行了麦克阿瑟元帅所说的和平祈祷。但东京银座等地因圣诞节即将到来，到处人山人海，这样重大的新闻也在腊月岁暮的忙乱中变得烟消云散。

四、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

南京成千上万民众观看刽子手谷寿夫的下场

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于 1946 年 2 月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了对侵华日军乙、丙级战争罪犯 2000 余人的审判工作。

1946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本战犯处理政策会议决议：“与南京及其它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

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罪犯引渡到中国，接受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审判。

战后，根据同盟国协议，将所有的日本战犯分甲、乙、丙 3 级。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现任责任者，即违反人道罪；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直接执行者，即犯直接责任罪。同盟国还议定，将乙、丙级战犯由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所以，直接指挥进攻南京中华门、并在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的乙级战犯谷寿夫，屠杀中国 300 余人的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丙级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等人先后被引渡到中国受审。

为此，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 10 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各地区日本侵略者战犯。

这里就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田中军吉的审判情

况略作介绍。

战犯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侵华日军，谷寿夫师团一直驻扎在包括雨花台在内的中华门一带，所部在南京停留约 10 天。这期间是日军在南京暴行最高峰的时候，也是战犯松井石根要日军发扬“武威”的时候，而中华门又是当时日军杀人最多、暴行最惨的地区之一。谷寿夫于 1946 年 2 月 2 日在东京被捕，被关进巢鸭监狱，同年 8 月 1 日，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引渡到中国。

1946 年 8 月 3 日，谷寿夫在上海战犯拘留所期间，由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询问，但此人老奸巨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避重就轻。当检察官问他的经历及几次侵华路线时，他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当问到他有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他时而装糊涂，时而矢口否认，并推托说：“12 月 21 日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1946 年 10 月 19 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提审谷寿夫，谷犯对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由中华门入侵南京供认不讳。但他又故伎重演，否认在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暴行。但事实是不容篡改的。法庭在起诉书中指出了谷寿夫的犯罪事实及起诉理由：谷寿夫为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激进军人，一生充任军职，在中国先后率所部入侵济南、华北等地，沿途纵部任意抢、杀、奸、烧、掠，罪不容辞。驻兵南京期间，为宣扬日本武威，以摧残中国民众抗日精神与民族意识，与中岛今朝吾等部，发动举世震惊、旷古惨劫之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达数十万人。起诉书的附件中，附有成千上万的杀、奸、抢、烧等事例，此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被告以其毕生精力，推行“日本征服东亚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国策。

起诉书最后指出：被告处心积虑，从事侵略、破坏国际和平，侵犯中国主权的罪行，在战争中又违反人道及战争法规，以种种暴行加于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被俘士兵，并在南京造成旷古未有的浩劫，穷凶极恶，举世公愤，并应科处极刑，维护正义与和平。

1947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现南京市中山东路 307 号）大礼堂，对战犯石寿夫进行了为期 3 天的公审，被告供认他所率领的侵华日军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与战犯中岛、牛岛等部队入侵南京，但对其所部在南京所犯的罪行则进行狡辩抵赖，推卸责任。

接着，由中国参加挖掘被害人尸骨的法医潘英才说明红十字会当时所埋尸骨，及中华门外被侵华日军屠杀的无辜平民，大多数有被日本兵枪杀，以及被铁器所击致死的伤痕。

继由当时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所见侵华日军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城后，到处杀人、奸淫、放火、抢劫的情形，并证明当时红十字会掩埋被害人尸体有 4 万余具。

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的证词指出：“自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死、刺伤与强奸平民，并枪杀彼等认为曾是中国军人之非武装人员，情势万分严重，达 3 星期至 7 星期之久。前 3 星期内，尤其是前 7 天至 10 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指数。本人曾见日军枪毙中国平民，满城各街尽是死尸。”

军事法庭在 1947 年 3 月 10 日的最后审判中指出：“被告所部在攻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

中华门、花神庙、小心桥、正觉寺、万家山、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 19 万以上。在中华门下关码头、东岳庙、堆草巷等处，被零星残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 15 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 30 余万人。这些事实，已经有身历其境的证人殷有余等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的许传音等人具结证明。此外，还扣获日本侵略军为炫耀武功而拍摄的屠杀照片和屠城电影片及其他资料为证。其中，日军谷寿夫部队，攻陷南京，由中华门首先进城，先行屠杀，就此两天（12 日、13 日）内，中华门内外，遍地尸首，惨不忍睹，有的日军还用刺刀刺孕妇腹部，致腹破坠胎而死。”

该庭还指出：“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杀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残烈，亦属无可矜全，应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基于上述结论，依法判处谷寿夫死刑。

1947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1 时，战犯谷寿夫被绑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南京成千上万的民众，其中有当年大屠杀中被害人的家属及亲友，他们站在街道两旁及刑场周围的山坡上，观看这个屠杀南京人民的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田中军吉被列为战争罪犯后，由驻日盟军总部将他逮捕归案。乘“建国号”飞机，于 1947 年 5 月 18 日抵达上海，旋即押解南京。5 月 29 日，南京军事法庭即开始审讯。

1947 年 12 月 18 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决定：战犯田中军吉与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合并审判，并在励志社进行公审。公审后，该庭对战犯田中进行了宣判：战犯田中军吉隶属于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充任大尉中队长，于 1937 年 12 月侵入南京的时候，在南京城西一带，用日“助广”之剑，砍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 300 余人，已为被告所承认，并有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所编《皇兵》一书，刊登该被告之军刀照片并标载“曾斩 300 人之队长爱刀‘助广’”等字样可稽。并有该被告亲自挥刀斩杀中国平民的照片，可资印证。可见战犯田中军吉是南京大屠杀中实施杀人的共犯之一。根据被告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违反了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构成了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故依法对战犯田中军吉判处死刑。

1948 年 1 月 27 日，南京军事法庭张贴了关于判处战犯田中军吉等死刑的布告：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等（即南京大屠杀案共犯），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争人员，罪证确凿，经本法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28 日正午 12 时，由庭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等 3 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

为了彻底清算日军侵华罪行，新中国政府也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于 1956 年 6 月至 7 月，对关押在中国的重要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因审判在沈阳和太原进行，故称为“沈阳和太原审判。”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于 1956 年 6 月 9 日至 19 日、7 月 1 日至 20 日分别对前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 8 名战犯的侵华战争罪、违反战争法和人道原则一案与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 28 名战犯组织和操纵伪满傀儡政权、侵略中国罪一案进行了审判。

从 6 月 9 日至 13 日下午，法庭对被告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在确凿的证据和证人的证词面前，8 名被告都当庭服罪。

法庭首先审问了铃木启久。证实铃木所部在 1941 年 12 月至 1944 年 10 月，在河北、河南等地犯下了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 1942 年 10 月，被告为了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一手制造了潘家戴庄（即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惨案。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之一、44 岁的农民周树恩出庭作了证，他是在屠杀后从埋人的坑里逃出来的受害人，并诉说了他一家 13 口人，被杀了 6 口，家中粮食牲畜被抢劫一空的情况。

铃木启久所犯的各项罪行，为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 181 件、证人的证词 45 件、查讯笔录 89 件、照片 38 张等证据所证实。

法庭继续审问了藤田茂等 7 名战犯。证实了这些被告，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杀害我被俘人员；有的命令把我国百姓当作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或作为战场上的“扫雷工具”；还有的甚至指挥部下对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将拘禁者作为试验细菌武器的实验材料，都对我国人民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特别军事法庭在 6 月 19 日上午 8 点 30 分开庭宣判结果：判处铃木启久徒刑 20 年，藤田茂、上坂胜徒刑各 18 年，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徒刑各 16 年，船木健次郎徒刑 14 年，鹤野晋太郎、木神原秀夫徒刑各 13 年。

在沈阳审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 6 月 10 日至 11 日、6 月 12 日至 20 日分两次在太原，对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以及城野宏等 8 名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并按其罪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在沈阳和太原审判的同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1956 年 6、7、8 月间，先后分 3 批对上中正高、小羽根建治、小林高安等在押的 1017 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布从宽处理，免于起诉。这样，除了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受到法庭审判处刑的罪犯之外，在押的其他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回到日本。

沈阳和太原审判，以及我国政府分 3 批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在国内外均获得了良好的反映。受审判的 45 名战犯，在特别法庭判决宣布后，大都表示要悔罪认罪、重新做人。 1956 年 6 月 23 日，第一批被释放的 335 名日本战犯曾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中国烈士献花圈、默哀致敬。他们在悼词中说：“决不再走过去的罪恶道路，决不容许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正如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我国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宽大的。”这种处理表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极为旷达的胸怀与希望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对保卫远东和平产生了深远积极的影响。

尾声 战犯的忏悔

人类通过亿万年才摆脱了兽性，成为万物之灵。但是要某些人倒退为野兽，却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年，多少年轻的日本军人刚刚侵入中国领土时，有的怀里贴心揣着妻子送的彩漆双偶，耳边响着母亲的叮咛；有的囊中藏着一缕恋人的乌发，身上还带着家乡的稻香。然而，用不了多久，日本军国主义便将他们训练成了一头头天良泯灭的战争野兽，唆使他们毁灭道德、毁灭良知、毁灭生命，同时也毁灭了他们自己。岁月在飞速流逝，一些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犯管理所中，泯灭的人性逐渐复苏，良心受到日益严厉的审判，他们纷纷向世人忏悔自己在中国犯下的弥天大罪，以恳求历史、世人与良心的宽恕。

日本战犯大部分是在 1950 年 7 月由苏联移交我国的。移交时苏方代表还警告说：“这是一批极端反动的法西斯魔鬼，不可救药。”的确，他们在苏联伯力的几个监狱辗转 5 年之久，来到中国时依然反动成性，气焰嚣张。他们被关在座落于巍巍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以前，这里曾是日本人建造的伪满洲国的抚顺监狱，是九死一生的地狱之门，正如但丁《神曲》中“地狱篇”内说的：“跨进这个门的人们啊，摒弃希望吧！”

灰色高墙内，布满了阴森森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壁，叫做“镇静间”。我们的爱国同胞，有的就被关在这里，连坐都坐不起来，被活活地闷死、饿死！

可是，此时此刻，这座伪满监狱的监狱长大村忍和其他日本战犯一同，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大村忍一见这个熟悉的地方便苦笑着说：“这是从前咱们给中国人盖的监狱，想不到现在由咱们自己来往啦！这叫‘自食其果’呀！”

曾在这里被关押的日本战犯 982 名，其中原属军队系统的 667 名，行政系统的 44 名，警察系统的 139 名，宪兵系统的 116 名，特务系统的 16 名。这些人可谓是战争魔鬼中的极其凶残者。

军队系统的有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他沿我长城内外，到处建立无人区，仅在河北省遵化、迁安二县即杀害和平居民 230 余人，烧毁房屋 1570 余间。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河南省长坦县小渠村惨案、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惨案、河北省滦县潘家峪惨案等。仅潘家峪惨案一次就杀我和平居民 1200 多人，其中 19 名幼儿被摔死，63 名孕妇被杀死，100 多名妇女被强奸。有的孕妇遭强奸后又剖腹挖出胎儿。

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自 1931 年起 5 次随军侵入中国，4 年进行了 36 次血洗城乡的“讨伐扫荡”，制造了上段村等多次大惨案，残杀我军民 49000 余人。他的部队用刺刀逼着我 100 多位同胞跳进一口井里活活淹死。最恶毒的是用我同胞做扫雷工具，炸死 60 多人，还用我同胞做活靶，训练士兵的杀人胆量……

行政系统的有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国务院总务厅长古海忠之。他们仅仅根据“治安维持法”就抓捕我 177000 多名同胞……

警察系统的有伪满警务总局警务处长今吉均、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宪兵系统的有驻伪满新京的日本宪兵大佐队长斋滕美夫、日本关东军宪兵大佐队长吉房虎雄。特别系统的有伪满中央保安局特务调查科科长岛村三郎、驻奉天日本特务机关中佐辅佐官内藤一男、日本特务机关华北交通团防

卫本部“富永机关”主事富永顺太郎。

正是这些战犯们，使中国的神圣领土，痛受蹂躏；中华儿女，惨遭杀戮；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未有的深灾大难！哪座青山，没有烈士的尸骨？哪条江河，没有民族的血泪？

然而，这些战犯走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并未恢复人的良知。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衔，足蹬马靴，两撇浓密而稍弯的仁丹胡，将他凶恶的目光衬托得更加凌厉。他每天都认真地向日本宫城遥拜。

伪满警正鹿毛繁太可谓是罪大恶极，仅 1936～1937 年，就抓捕、杀害吉林省柳何县委组织部长刘喜明等 52 人。用刑极其残酷。火烧、装进麻袋摔死等等。如今他却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我要回国！我要自由！”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硬说他不但没有罪，而且“帮助满洲国建设”还有功。那个仅在 1939 年的 10 个月当中就在北满抓捕中国抗日军民将近 3000 人的中央保安局特务调查科长岛村三郎，不但不写坦白材料，却写了厚厚的一本书，书名是《民族矛盾不可调和论》。伪满新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饭守重任说他残杀中国人民是执行了“神的意志”。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在厕所里和其他战犯订攻守同盟。少将旅团长庄司巽，在小组会上硬说他“爱护中国人民”，理由是：他部下抢了 24 匹马，他只留下了 3 匹。最令人气愤的是宪兵少校绫真喜雄，装作对世事无争的样子，整天拜佛念经。

在中国政府与人民长时间耐心的人道宽恕和疏导下，许多日本战犯终于良知发现，由昔日的嗜杀成性的魔鬼变成呼唤与热爱和平的卫士，成为中国人民坦诚的知友。他们懊悔为了邪恶而毁灭了中国多少个春红夏绿、多少个水秀山青。于是，他们用曾经行凶的双手，以自身的经历写出了小说、诗歌、剧本等各种体裁的悔罪文 728 篇，这既是日本战犯的悔罪自白，又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

《细菌实验》写的是伪满的一个日寇细菌工厂，怎样把我们 4000 多名爱国同胞用作细菌试验、枪伤实验、冻伤试验、爆炸试验、毒气试验，有的被活活地拔出神经，有的被开膛后扔进了炼人炉。

《太行山下一魔窟》揭露了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的野战病院，在河北省焦化镇拿我们的被俘战士作活人解剖试验。凶手，就是作者本人。他们把一名健壮青年突然按倒在手术床上灌麻药，一连进行了三次开膛试验，然后又切断四肢。受难者还没有死，野兽们又往他的血管里打空气加以杀害。作者写道，这时候，“那个中国人的左胸脯发出了“吐噜噜、吐噜噜”的响声，声音是那样的凄厉和悲惨。他的下鄂缓缓地下垂了……用听诊器，只能听到胸膛里微微地响着断气后特有的一缕沙沙的凄凉声音……这声音，在 11 年后的今天，依然真真切切，响在我的耳鼓……我的心如同刀绞。”

“制造无人区”是铃木启久暴露自己在中国长城内外实行“三光政策”的血腥罪行。他总结历史教训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用尽了阴谋诡计，也无法使历支的车轮倒转，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无人区的阴谋终于不能实现。中国人民创造了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繁荣的人间乐土。如今，山，是照样地林木青葱；水，是照样地碧波荡漾。而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永远被埋葬在中国大地！”

《小小的木偶》是一篇悔罪叙事诗，作者姓田村，却没有留下名。原来，作者出证时，妻子赠他刻有一对恋人的木偶，这是他们爱情的象征。但随着

他人性的丧失，也就抛弃了木偶。他透过泪花，想起他毁灭一对中国恋人的情景。于是，他拿起了笔。

诗，并不地道，现摘录一部分，不妨作为一篇韵文悔罪录来读。

小小的木偶啊，
勾起我的悔罪心；
简直一模一样，
想起另一对年轻人。

那是 13 年前，铁蹄踏在中国的山东。

对于争取自由的人，
我的回答是：
“鲜血磨亮我的刀锋！”
“残暴”这两个字，
怎么能够形容？
我是杀人魔鬼，
万恶的畜一道道峡谷绕山岗，
“白泉”是个朴素的村庄，
山上青松泉下柳，
石头垒屋泥做墙。
这是普通一座房，
春联散发着笔墨香；
彩纸剪成红喜字儿，
刚刚贴上纸格窗。
在那个小的玻璃上，
好一对和谐的纸鸳鸯。
这和木偶上的一对年轻人，
简直一模一样。

……

“开始扫荡！”
我喊叫得那么疯狂！
像恶魔的粗气，
在暮霭里荡漾。
军队一阵阵地嚎叫，
像扑食的恶狼；
枪声响处，
哭声，一片沧凉。
从屋里，
跑出一位老大娘，
仇恨的眼泪，
声讨我这杀人魔王。
她额上的皱纹，
抖动着愤怒的心；
惨叫声随着两手，
揪住我的心房。
啊……

那是一副多么吓人的仇人模样。
我不愿染污了屠刀，
把子弹推上枪膛；
紧紧贴着老人的头，
发出血债累累的又一枪。
“放火！”
一声令下，大火飞扬。
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
还有美丽的一双鸳鸯。
小小的木偶啊，
我听得见你愤怒的胸膛，
掀起八万里滔滔大浪。
野兽们纵有万把条枪，
杀不绝中国人民的斗志昂扬；
纵然烧毁千万个城市村庄。
也烧不尽中国人民的热血汪洋。
中华民族从血泊中站起，
我这魔鬼已缴械投降。

日本战犯自 1956 年 6 月至 1964 年 3 月，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完毕。他们临别时在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前痛哭悔罪，给中国政府写感谢信，称中国为“重生之地”、“第二祖国”，在“告别词”里千恩万谢。20 多年前，当他们踏入我国神圣领土的时候，是一群灭绝人性的恶鬼；20 多年后，他们挥泪告别时已经恢复了理性，成了人类队伍中的一员。

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以后，他们究竟表现怎样。这是对改造日本战犯工作的最后考验。

最初被释放的战犯在日本午鹤港一登陆，就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表示“低下头来，衷心谢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促进日中友好”。不久，他们就组织了“中国归还吉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本部设在东京，支部遍于全国。

“中归联”坚决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派国友俊太郎和三轮敬一等当年的战犯到国会去请愿。请愿条件很特殊，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中归联”的会员不是什么“民族英雄”，是可耻的战争罪犯。他们的目的是，只要日本政府承认了这一条，就不得不承担起发动过侵华战争的罪责。

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被提前释放回国以后，立即加入了“中归联”，而且拿着服刑中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古海忠之写给老同事岸信介（当时的首相）的警告信到日本政府，吓得岸信介东躲西藏，不敢露面。藤田茂就向新闻界公布了这封信，揭露岸信介的侵华罪行和复活军国主义的罪恶阴谋。这封信轰动了全日本。不久，藤田茂被选为“中归联”会长。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是“中归联”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会亲访友，发表文章，出版了《三光》，活生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的滔天之罪。这本书刚一问世，就被抢购一空。《诞生》的作者古尾荣一，是在《三光》的影响下写了这本侵华罪行的忏悔录，而且自费出版，赠送亲友，表示悔罪。一本《日中不再战》的书里，也发表了藤田茂写的一篇悔罪文章。

促进中日友好是“中归联”的又一项主要工作。战犯们感激中国人民的再造之恩，积极地促进中日友好，纷纷加入了“中日友好协会”，“中归联”还被选为常任理事团体，藤田茂在青森县创办了“日中友好协会”支部，还和前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共同组织了“前军人日中友好协会”。三本武夫不顾生活艰苦，创建了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支部，制造过“三肇事件”的岛村三郎被选为“日中友协”高知县支部的常任理事兼组织部长。“中归联”还有100多名会员，被选为“日中友协”的中央或地方领导人。

从前的细菌战犯榊原秀夫，让儿子上大学，专修中国语。塚越政男给女孩子起名为“真理子”，给男孩子起名“友好”，教育下一代和中国人民永世友好。

欢迎中国赴日代表团是“中归联”的第三项重要工作。

“中归联”的成员衷心感谢中国人民使其获得新生的大恩大德，每当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他们奔走相告，热诚款待。如1963年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归联”在东京的金刚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会长藤田茂代表全体会员向我代表团赠送礼品，表示感谢。菅野荣和他的妻子背着亲手收获的新大米，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来，把新生活的劳动果实献给恩人。在广岛，一名曾经参与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中归联”会员，自愿在夜间给中国代表团当警卫，保护代表的安全。此类迎来送往、竭诚接待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另外，“中归联”还大力宣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如曾任汪伪政权指导官的原陆军少校城野宏，自愿在中国贸易会上作义务解说员，还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长篇文章，赞扬毛泽东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战犯归国后，经常从日本各地给中国捎来或寄来无数封书信，表达他们悔罪谢恩的心情。

从前谋杀赵尚志的伪满警察署长井田久二即在信中感谢中国人民使他“死去了的良心复苏，恢复了人的感情”，“总觉得断绝音讯，心中有愧。若不写信感谢，难受得寝食难安。”还发誓说“决不会离开认罪的道路、正确的道路。我亲眼听见的、中国的崇高与美丽，在我的眼里至死不变。”

改造初期扬言要把认罪服罪的战犯推进大海的市毛高友来信说：“我积极参加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队伍，虽然慢步如牛”，却也正为持久和平与中日友好而奋斗呢！”

筑谷章造来信说：“我既然从中国获得了新生命，就绝不再背叛中国人民。”

最后释放的原特务头子富永顺太郎在信中说：“离开的地方越远，日子越久，我们对于‘第二祖国’——温暖关怀胜于父母的伟大中国，越从内心里感到无法克制地爱慕和向往，我每天晚上都洗耳恭听发自北京的无线电广播，每当我收到订购的《人民中国》和其他的画报周刊时，我都像遇见了怀念已久的亲兄弟一般，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城野宏来信热烈祝贺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核爆炸试验的成功。菊池义用大字正楷，把心里的话写给了北京中央广播电台。题字是“毛主席万岁！”“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1965年9月7日，76岁的团长藤田茂率10人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献了铜碑。碑文是：“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他们来到了抚顺市郊平顶山的烈士纪念碑前。藤田茂用悲痛的声音读了

“悼词”。其中说：“生儿育女，建立家庭，这9年的生活，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啊！每当忆念到此，对于中国人民的感谢，便从内心深处汹涌而来，成为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我们反对侵略战争，拥护持久和平，呼吁日中友好！”他们邀请了当年的受害者夏廷泽作了报告，目的是再一次敲响警钟，以防昔日的悲剧重演。

他们来到了“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藤田茂在门口站了足足一分钟，心潮起伏、热泪盈眶。他们紧紧围住了曾经引导他们认识真理的“恩师”、挽救过他们生命的大夫、一口一口为他们喂过饭的护士、给他们做饭做菜的炊事员，止不住的热泪滚滚，说不完的千恩万谢。

大批和平善良的人由于走上侵略战争之路，变成了嗜血成性的鬼，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然而大批的战争魔鬼通过改造，不仅恢复了人性，甚至成了坚定的和平战士，这却是旷古未有的珍闻。这是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所创造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类文明史的巨大贡献。

后 记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究竟对中国的平民百姓犯下了多少罪恶，世人恐怕已难以考证，但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即使把目前所能找到的有关文字记载全部汇集起来，也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有罪恶中的极小部分而已。

由于侵略者的行径过于暴虐与残忍，使人深深觉得即使只是淡淡地描述，也无法掩盖浓浓的血腥。我们之所以不怕玷污笔墨编写了当年侵略者种种的兽性与兽行，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更重要的是为这个世界多提供一些有益的警示，真诚地希望我们共同拥有的地球上再不会发生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恐怖杀戮，人类决不该如此堕落！

“沉舟侧畔千帆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都饱受过战争的创伤，更应该和睦相处，携手相助。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乃至全世界各个民族都能互谅互让、同舟共济，那么，地下众多的冤魂，才会真正安息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学院丛笑难老先生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并为本书撰写了前言，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果达

1995年3月

